

## 译者的话

吉田茂是日本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曾多次担任执政党和政府首脑，被认为是战后日本复兴和发展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他的思想及其制定和推行的政策，至今仍对日本发生着重要影响。因之，在日本还时常出现“吉田茂热”。

日本国际问题专家猪木正道(曾任京都大学法学院教授和防卫大学校长)为吉田茂撰写了全面的传记。本书原译自《正论》月刊连载部分(1980年1月-1981年10月)，相当于单行本的下卷，即吉田茂执政生涯部分，是这部传记中的核心。全书出版后，我们又对照进行了校译。

本书作者选取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到签署旧金山对日和约这一段风云变幻的重要历史时期，通过吉田茂争取实现和平和担任外相、首相职务的主要活动，评价了他对结束战争、重建日本的贡献，特别是在维护独立、振兴科学、恢复经济、解决国计民生和重返国际社会等方面的作为。作者写出了吉田茂敏锐的“战略”眼光，敢冒风险的决心和魄力，果断的政策措施，老练圆滑的斗争策略，以及不无怪癖的性格作风，文笔流畅。对了解吉田茂其人和日本从战争废墟上走过来的历程，对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的历史和近代史都有参考作用。

但是，从书中也可看出，吉田茂作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谋士，他的反共反华的意识和立场是很坚决、顽固的。他的许多言行，包括结束侵略战争，对中国问题的所谓“远见”和设想，无疑皆出自维护垄断资本和国际反共势力利益的需要。如他在拟给

NY 62/08

杜勒斯的信中说什么要“把中国拉出来，使其成为自由国家阵营的伙伴”；并向杜勒斯毛遂自荐地说，“日本能够有所作为的一项就是渗透”，“日本发挥突破竹幕的作用是最适当不过了。”而作者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有的地方却加以肯定、渲染和美化。在所引用的历史材料中也不乏对我称谓不当、乃至诋毁之词，请广大读者注意分析和鉴别，我们对个别地方作了必要的删节。

本书由江培柱、郑国仕同志负责翻译并作了注释，赵安博同志校阅。原书中引用的吉田茂本人著述的一些段落，翻译时参照了《十年回忆》的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出版）并作了部分改动。谨此说明。

译 者

1986年1月

## 目 录

第一章	争取和平 .....	I
第二章	外务大臣 .....	51
第三章	组织内阁 .....	99
第四章	第一届吉田内阁 .....	148
第五章	下野时期 .....	243
第六章	第二、第三届吉田内阁 .....	276

## 第一章 争取和平

有一种说法认为，日美开战是日本中了罗斯福总统设下的圈套。自从1948年(昭和23年)美国伟大的史学家查尔士·彼阿德严厉批评罗斯福准备开战的外交以来，有人简直如获珍宝，持续不断地根据彼阿德的学说，为日本军国主义领导人开脱责任。

当然，开战前夕美国外交并不是没有问题的。对于近卫首相试图通过和罗斯福总统的首脑会谈来回避日美开战的努力失败一事，约瑟夫·格鲁大使就提出过批评。据约翰·埃默森公使的回忆录《急风暴雨中的外交官》(朝日新闻社1979年版)所载，格鲁大使说，“直到最后，大使馆的劝告始终是正确的。罗斯福总统应当会见近卫公爵，不论成功的可能性如何小，为了拯救和平，不应抛弃这最后的机会，这是我们始终不渝的信念。”

但是，日本把周围国家几乎都作为敌人、进行名副其实的全面战争，那些军国主义领导人究竟在想些什么？保障国家安全的大前提是尽量减少敌人，增加朋友，这是人们的常识。到处树敌、减少朋友而进行战争，无论多么强大的军事力量也是不能取胜的。

即使罗斯福设下了圈套，而陷入圈套的人的政治责任也是严重的。1904年(明治37年)2月日俄战争开始时，日本就有日英同盟这样强有力的国际支援。再考虑到当时美国和大英帝国之间有



“不成文的同盟”关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日本几乎是和全世界国家站在一起而进行战争的。

但是，相反，帝俄一方是孤立的，虽然有俄法同盟，在日俄开战后两个月，由于英法协商的结果，有关对日战争问题，这一同盟基本上失去了价值。

日本进行日俄战争的情况是：只把俄国一国作为敌人，而以英国为首的朋友却不断增多。从指导战争的观点来看，日俄战争当时的日本，处境可以说是比较理想的。1904年以后仅仅过了37年，同样的日本，却在以许多国家为敌的绝望形势下，同英美等国开战，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朋友只是希特勒的德国和莫索里尼的意大利。德意两国的支援是无济于事的，无异于从“霞关大楼”（日本外务省所在地——译者）的屋顶滴眼药水，毫无疗效。相反，同希特勒德国结成军事同盟，正是把日本推向绝望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

埃默森公使的回忆录载有如下一段意味深长的往事：

1941年（昭和16年）10月14日，从旧金山登陆、11月中旬到国务院任职的埃默森会见了赫尔国务卿的远东问题顾问霍贝克。霍贝克问：“你们大使馆的人对于同日本的战争有什么看法？”埃默森回答说：“我们认为日本虽然急于统治东亚，但是并不企图以战争方式实现，如果他们感到做不到这一点，将会自暴自弃地诉诸战争。”霍贝克对此反应很是严厉：“你说说看，历史上曾有哪一个国家自暴自弃地发动战争？”

的确，在历史上也许找不到任何一个自暴自弃地进行战争的国家。而日本恰好开了这一先例。正如埃默森公使所承认的，他对霍贝克的见解是重复了格鲁大使屡次强调的警告。格鲁大使1941年11月3日向赫尔国务卿发了一份长电，最后的结论是：“如果日本认为同美国的武装冲突不可避免，随之而来的很可能是以突然的方式采取剧烈的行动。”格鲁大使在第二天的日记中，使用

了“整个国家剖腹”的用语。他不断强调和极力主张，这不仅是将会发生的，而且是非常现实、十分可能的。格鲁大使正确地指出：“日本的伦理、理性是无法用西方尺度衡量的。”格鲁大使的警告不幸而言中。日本终于陷进了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自我毁灭的战争。

无论是日本政府或统帅部，都是在无视德苏战争进展的情况下，断然决定同英、美开战的。这一点我们不可忽略。1941年10月初，德军发动的第一次莫斯科的攻势取得了相当成功。10月12日卡卢加陷落。两天以后，加里宁格勒也被攻下。10月16日起连续3天莫斯科发生恐慌，据说大约有100万市民逃了出来。但是，诺门坎战役的胜利者朱可夫元帅被任命为莫斯科城防司令。由苏中边境调来的增援部队，迅速地加强了苏联的守卫力量。在11月17日开始的第二次攻势里，德军逼近离莫斯科中心34公里的地方，由于零下30度严寒天气的帮忙，苏军开始转入反击。

进攻莫斯科的惨败使希特勒德国第一次受到沉重的打击，而且不仅是一个局部地区战局的失败，它关系到希特勒德国的命运。如果对苏的闪电战不能成功，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第三帝国的彻底失败。

希特勒德国的失败是注定不可避免的，难道日本的战争领导人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吗？德军在莫斯科城下的总崩溃，他们显然是知道的。但他们仍然下决心同英美两国开战，除了用“剖腹自杀”来形容之外，还能说些什么呢？

值得注意的是在塞巴斯蒂安·哈弗那的最畅销书《论希特勒其人》中，把德国的参战称之为不可理解的最严重的错误决断。哈弗那认为，希特勒是在12月11日对美国宣战的，但这一宣战没有给德国带来任何好处，而只能使战败成为定局。

由于日德意三国签订的是防御同盟，所以不能因日本陷入对美战争，德国就负有义务自动参战。罗斯福总统虽然很想参战，但是如果德国对美国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如果希特勒毫无动静，

美国就没有理由对德宣战。可以肯定，希特勒对美宣战正是罗斯福求之不得的。

哈弗那的主张很有说服力。他认为，如同日本对德苏战争袖手旁观一样，德国也应在日美战争中持旁观态度。正象哈弗那所说的，对美宣战对于德国来说是致命伤。

为了解开希特勒令人毛骨悚然的决断之谜，哈弗那引用了希特勒在参战两周前一次令人害怕的谈话。他说，德意志民族为了求得生存，如果不作流血的准备，必然被其他更强大的国家所灭亡。这是他当时对丹麦和克罗地亚的外相说的。

希特勒在战败的那一年又重复了同样的话，命令军需部长施培安，破坏德意志民族为了生存所必要的一切生产、运输和通讯设备。

哈弗那的解释是否正确自当别论，也许可以说，日本同这样一个变态人物统治的国家结盟一起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恰好证明日本本身也是不正常的。

## 二

除了吉田茂等极少数人以外，战争开始时的日本，恐怕可以说已经接近疯狂的程度。特别是奇袭珍珠港的辉煌战果足以迷住了国民的心窍。

但不要忘记，就在当时也有人能以冷静的眼光，看清战后世界和日本的形势。和吉田茂同为高知县出身、比吉田小一岁的岩崎小弥太就是其中之一。开战后第三天，他以三菱公司最高领导人的身分把嫡系干部召到总公司进行训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所讲到的“对英美旧友的态度”这一部分。

他说：“原来有不少和我们三菱公司在事业上相互协作的英美人士，直到今天他们仍为我等的朋友。在同一事业中始终相互团结共事，具有同一利害关系，目前不幸分属于干戈相见的两个国

籍。国家对于他们的企业和资产采取合法措施是理所当然的，但不能因此而毁掉旧友谊。所以，只要国法允许，维护他们人身财产的安全和权益，是我们日本人基于道义的情理，也是应尽的义务。他日，和平恢复时，他们仍将和过去一样是我们的忠实伙伴，而且将来也应当是忠实的盟友，以便相互团结，重新致力于世界和平与人类幸福。”

在三菱公司协议会上的这一训示，立即付印、分发给三菱公司每个成员。当时我在三菱信托的福冈分店工作。读到这一训示，十分感动，这是难以忘怀的。因为我感到，在仇视英美两国国民的气氛中有勇气讲这种话，实在是我国的莫大骄傲。

当时，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夫妇被软禁在东京大使馆里。吉田茂经常去看望他们并送些东西。吉田也和岩崎小弥太男爵一样确信，战后日本会同英美两国建立友好关系。岩崎小弥太和吉田茂不同的是，前者认为在生产 and 经济领域为战争效劳是三菱最高领导人的义务，而以外交为专职的吉田则与此相反，认为应当采取措施尽早结束战争。

据《木户日记》记载，1942年2月21日下午2时，吉田茂与木户内大臣进行了面谈。谈了些什么，无从知晓。但是从2月15日新加坡陷落一事推测，吉田茂是否可能向木户建议，不要错过早日媾和的时机。在《十年回忆》的第一卷中吉田茂有如下回顾：“开战的第二年，1942年（昭和17年）2月，纪元节<sup>①</sup>过后，即将攻占新加坡之时，听说木户内府拜见了天皇陛下，奏称：‘战局虽对我有利，但前途多难’。记得木户上奏的内容要点是，敌方丝毫未丧失战斗意志；战火不易熄灭；结局必然是战斗到底。因此，应尽早抓住机会，力求实现和平等等。

“我也认为如果要进行和平工作，攻占新加坡之后是一个不可

---

<sup>①</sup> 旧纪元节是2月11日，现改为建国纪念日。——译者

放过的好机会。新加坡是盟军、特别是英军在远东的生命线，控制这一要冲，将使今后情况向有利方向进展，成为重大的转机，因此利用这一机会推进和平谈判，将使战争早日结束。至于具体如何做，我也设想过。”

认为攻克新加坡是寻求和平的良机的人不仅是吉田茂一个人，这是许多日本人当时的幻想。比如一个小个子突然向一个巨汉头上猛击一拳，然后伸出手来说：“咱们和好吧！”，难道巨汉能心甘情愿地接受吗？肯定要拒绝说：“别胡扯！”而进行反击。

我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况稍加研究以后认为，当时争取实现和平几乎没有可能。世界大战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大国进行斡旋、调停，除非有一方精疲力竭、举手投降，否则是不会在中途实现和平的。外交专家吉田茂考虑到“新加坡和平”的可能性是非常奇特的。可以理解为这是吉田茂乐观主义精神和坚韧不拔性格的体现，直到最后也不抛弃希望、不断探索和平途径。

责任感很强的吉田茂绝不会半途而废。即使不能马上实现，他也一定认为必须随时掌握和平的线索。

在这点上，天皇对东条首相指出要早日实现和平是很值得重视的。2月12日《木户日记》记载，东条前首相在谒见天皇时上奏“大本营联席会议将对今后内外政策进行研究”时，天皇指示说：

“关于结束战争，想来你们也能充分考虑到不坐失良机。为了人类和平，一味拖延战争，扩大危害是不好的。而且战争拖长，军队素质必然下降。当然这一问题与对方有关。今后要看英美态度如何，也要看德苏之间战况推移，半途而废毫无结果也是不好的，但是要充分考虑上述情况，制定万无一失之对策。”

在这种情况下，吉田茂从两方面进行了努力。一方面，对辅佐天皇的木户内大臣经常讲授一些外交知识；另一方面，为准备将来的和平而收罗国内的政治力量。吉田茂给其岳父牧野伸显的两封信，表明了他的动向。一封日期不详，从前后文脉来看估计

是1942年(昭和17年)3月写的,内容如下:

“拜启。日前曾进言要币原男爵常与近卫、木户两人接触,努力使他们增长一些外交知识和素养。高松宫殿下那里也应时常会晤,以使高松宫听取外交方面的意见。后来未见进展。此事,我请松平康昌侯爵斡旋公侯和男爵的会晤,谅你已有所闻。昨天和原田熊雄在来栖处见面,也提到上述情况。我以为,解决当今时局问题只有依赖外交。而当局埋头于军事内政,缺乏对外交的关注。如此下去,总有一天战争会出现灾难性结局。虽无把握,但我以为两公向内府灌输外交知识实为当务之急。高松宫殿下同样特别需要注意多了解外交事务。他们也甚表同意。最近将有机会见到高松言,视情况还要进言。”

“原田君等人今如前来,有便时请将上述内容转告。已有风闻德国方面强烈要求日本对苏作战,内府在此时的努力尤为重要。匆匆成书,望希见谅。顿首。”

另一封信是1942年(昭和17年)4月3日写给牧野伯爵的。这封信告诉我们,就在日本陆海军连战连胜的时刻,吉田茂仍积极安排宇垣大将和平沼男爵的会见。

“拜启。当前时局愈加险恶,对苏关系亦令人担心。如果再次突然袭击,造成既成事实,把我政府牵连进去,那真是有关国家兴亡之大事。”

“关于对币原男爵进行外交教育一事(对近卫和内府亦然)也是在最近出现令人担心趋势下提出来的。前不久,我已敦促宇垣大将下决心敢于赴难,不去计较社会上种种传闻。亲自动去拜访平沼交换意见。对平沼,我也劝他在宇垣来访时,能以谦虚坦荡的胸怀予以接待和交谈时事。有幸,双方接受了我的规劝。29日,宇垣大将去平沼官邸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会谈。谈话内容尚未得知,但是据说宇垣认为谈得相当融洽,他对谈话时的气氛相当满意。以上消息我马上转达给了池田、冈田大将,他们两个人,特别是池

田很高兴。我近日还将拜访池田，面告上述喜讯和会谈情况，拜托他在平沼、近卫公、木户等人中进行斡旋。以上，特先报告。顿首。”

关于宇垣、平沼会谈的内容，《宇垣日记》3月30日和31日两天记载了要点，30日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29日与平沼氏会谈，谈话内容要点为：一、破坏有余，而建设未必有方。尤其是内部思想上令人寒心的情况屡屡发生，实堪忧虑。二、政府对内外形势是否有正确认识与适当政策？如果有正确认识 and 适当政策，应当始终尽力帮助与支持。但看来并无正确认识，亦无适当政策。我等之忧虑和决心也是由此产生的。三、~~军人对政治的干预~~，必须制止，国家之祸根在此。官僚之横行霸道是因为有人追随脱离常轨之军人。如能追根溯源，彻底追查，从根本上下手，则并不难制止。敢于从事这一切的军队首领是谁呢？”

再看3月31日的“追记29日会谈”：“陛下之心是始终热望和平的。但是，辅佐陛下的巨僚们有无诚心诚意使之实现的热情和政策，是值得怀疑的。现在，日本处于微妙的境地，敌方英、美希望日苏开战，而友方德、意也要求日苏交战。当支那问题尚未了结，如果再开日苏战祸，日本必将面临累卵之危。只要中国问题得到处理，对付苏联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对此，平沼表示完全同意，应当绝对避免在解决中国问题之前与苏发生事端。日本要采取主动，立即恢复同中国的邦交，以此为主要活动，进而争取恢复世界和平。”团结以宇垣一成为中心的政治力量，谋求结束战争的动向。正如后面所说的，是从1942年（昭和17年）12月开始的。但是宇垣、平沼进行会谈是它的准备。

### 三

在1942年6月5日中途岛海战中，日本遭受重创，损失4艘主

力航空母舰。众所周知，这次失败，成为太平洋战争的转机。

吉田茂提议派近卫公爵去瑞士。他把自己的想法报告近卫，并向内大臣木户进言。《十年回忆》第一卷里吉田茂这样说道：

“前些时候我考虑过似乎可以派近卫公爵到瑞士去进行和平工作，当辗转听到木户侯爵的意向后，更增强了信心，认为我的想法有实现的可能。不知不觉间到了6月上旬，当我听到中途岛作战失利的消息时，便认为如失去和平工作的良机将不堪设想，于是立即向近卫公爵说明了我的想法。

“公爵似乎很惊讶，但我建议说：‘和皇室最亲密的公爵如果到瑞士去，即使是一般的逗留，也会引起欧洲各国的注视。倘若英国战局不利，一定会有人对公爵进行工作；倘若德国陷于苦战，也会有人来接近公爵。现在如由空中或海上去，是非常危险的，不过经由朝鲜、中国东北利用西伯利亚铁路时，即使多少有些困难，瑞士还是能去的。’公爵问：‘有希望吗？’我答道：‘有没有成功的希望，只有试探才能知道。不过我想至少在表示日本对和平的诚意这一点上会有收获。’公爵似乎也多少感到一些兴趣，并嘱咐我和木户内大臣也商议一下。

“于是我又向内大臣提出这个建议，而内大臣却不肯轻易表示赞成与否。因为我风闻东条首相早已注意近卫公爵的言行，并认为有加以取缔的必要，所以我觉察到内大臣那时也有些踌躇。结果，我的建议在木户那里压了下来，后来杳无音信。关于这个和平交涉，我并非成竹在胸，不过也不无遗憾，因为如果实现，情况当有所不同”。

6月11日《木户日记》记载着：“下午3时半，吉田茂来访，就近卫赴欧一事谈及他向近卫所提建议，并征询我的意见。我回答说：‘为了世界和平，对尽早结束战争这一基本出发点自然没有任何异议，关于是否派近卫出马，尚需慎重考虑。’让我们看看另页写的吉田所提的意见：



“为完成圣战和国家百年大计之事业，愿献上国见。今天正是近卫为皇室和国家作贡献之机。你应率大使或公使以及三、四名外交官，以视察为名亲赴欧洲。途中，各国元首和政治家如要求同你会谈，可以会见。经过苏联和轴心国到瑞士之类的中立国。对任何一个交战国，都可找交通便利的地方落脚。暂以超脱之态度观察形势。其间，随行人员应在暗中活动，促使各国政治家与你接触。战争如越来越对德国有利，美英将通过你寻求摆脱困境的活路。如果战局不利，德国也会采取同样态度。凭借近卫过去的阅历，美国、德国都会以你为友。我国外交如能善于运用你这样的地位，就可以使我国在和局中处于主动地位。

“你在欧洲数旬，如观察前途无望，可以若无其事地踏上归途。如果还有一些希望，可从我国文武官员、学者、企业家中选拔一些人才（最好在欧美有朋友的）开始准备和平条约草案，供帝国政府参考。同时，让这些人担当重任，促使各国同我交往，维护我国利益。一旦世界媾和时机成熟，你可受帝国政府委托，作为全权首席代表，率领上述适当人才出席媾和会议，随员可参与具体媾和事务，作为全权媾和的幕僚。”

吉田茂自己也准备随近卫公爵前往瑞士。他的心情是，只要能拯救祖国日本，什么事都愿意干。提出与近卫一起去瑞士时，还可以从陆路去，不致有生命危险。但是过了两年10个月，即战争结束前4个月，吉田茂为进入英国领土，专门拜访军令部次长小泽治三郎海军中将，希望他协助出动飞机或潜艇保护。

幸好有1966年6月14日前舰队司令官小泽对竹内诚、宫崎勇的谈话记录，我想在这里引用一下：

“我在昭和19年（1944年）秋从南方回到东京，秋月老人曾三四次把我叫到豪德寺的住宅，他本人已年迈体衰，卧床不起，但让我坐在枕边，同我谈了很多事。因为他在明治以后当过外交官，对日英外交史特别熟悉，谆谆开导我说，‘英国过去就对日本

抱有亲切感，应当以此为基础进行和平工作。战争基本上不是打错了吗！？要让小矶下台了，开展一场运动赶他下去，然后让米内当首相’。因为我知道小矶内阁成立的经过，就说：‘那不大可能。’他问：‘那么谁合适呢？’我回答：‘老前辈铃木贯太郎最合适。’铃木当时是枢密院议长，可是老人说：‘铃木怎么样我不了解’，这说明他已经有些糊涂了，哈哈……

“秋月老人还说：‘好象你们对我说的不大理解，把币原和吉田叫来听听我的意见’，我婉拒说：‘不要见了，因为我在军令部而不在海军省。币原是老人在任奥地利公使时的年轻秘书，吉田是牧野的女婿，秋月老人的夫人是牧野夫人的姐姐。所以好象经常叫他们来。’

“记得是1945年(昭和20年)4月，突然捷五(秋月老人的养子)打电话到日比谷的军令部宿舍说：‘吉田急于见你！’吉田正在里屋和我父亲谈话，就让我给你打电话，要谈什么事不清楚。我就请他转达‘那么明天下午到这边宿舍来吧！’

“第二天吉田乘车来了。在二层军令部总长房间见了面，吉田说是和秋月老人交谈后有些事情请求帮忙。首先是希望提供飞机在印度或英属领地降落，把那里作为基地，开始同英国谈判。

“但当时飞机数量很少，处境十分困难，就毫不隐瞒地说：‘现状如此，一点通融余地都没有。’吉田一听说道：‘那么出动潜艇，把我们当作货物装上，拉到英国势力圈里去！’于是又谈到了潜艇的现状：‘我们的潜艇不仅无法攻击敌人，连向南洋群岛输送食品都忙不过来。’本来不应说的情况也直说了，郑重地婉拒了他的要求。吉田说：‘那就不好办了，怎样向秋月老人说明呢？’我说：‘你就向老人如实报告，小泽会向他说明的’。然后把吉田送到大门口。这时我从大门往外一看，在树荫下站着两三个怪人，我怀疑可能是来监视的。

“那以后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有消息说吉田被宪兵队逮捕了，

我吃了一惊，想到事情不好办，所以赶忙回家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捷五，并让他不要告诉父亲，保持沉默。今后在我没有交待之前不要把币原或吉田叫来。秋月老人从此以后急剧老衰，不到两个月便去世了。”

小泽治三郎海军中将与秋月老人有亲戚关系，小泽夫人是秋月老人的侄女，小泽住处也在豪德寺，离秋月老人住宅很近，所以交往很密切。军令部的宿舍就是海军部东侧贵族院议长的官邸，1945年5月24日，在空袭中烧毁。战后，这个地方建起一座民事法院。

秋月左都夫老人明治42年(1909年)被任命为驻奥地利公使，大正三年(1914年)6月26日辞职以后住在豪德寺安度余生。老人在临终前的病榻上还指示吉田茂乘潜艇去英国领地进行和平工作，这是很了不起的。而吉田茂敢于冒生命危险按老人的话去做，这种勇气也令人佩服。小泽军令部次长也很称赞吉田茂的勇气。他钦佩地说：“我会见吉田时就感到他是一个胆大、刚毅、果断的人。”小泽舰队司令的这段话没有注明确切的日期。实际上吉田茂被叫到秋月老人住宅是4月13日，吉田茂去军令部宿舍拜访小泽中将是4月14日，第二天即1945年4月15日，吉田茂就被宪兵逮捕了。

#### 四

吉田茂被宪兵队逮捕之前一直和岩渊辰雄、殖田俊吉、小畑敏四郎等人一起为结束战争进行活动。日本外交学会所编《太平洋战争结束论》第三章《民间的结束战争活动》中，编者向山宽夫列举了下述人名：

岩渊辰雄(每日新闻报社前政治部记者、政治评论家)；吉田茂(前外务次官、驻英大使)；小畑敏四郎(预备役陆军中将、前陆军大学校长)；近卫文麿(公爵、前内阁首相、枢密院前议长)；真

崎甚三郎(预备役陆军大将、前陆军教育总监);殖田俊吉(田中义一前内阁首相秘书);古岛一雄(贵族院议员);牧野伸显(伯爵、前内大臣、吉田茂岳父);桦山爱辅(伯爵、贵族院议员);原田熊雄(男爵、西园寺公望元老的前秘书、贵族院议员);真崎胜次(预备役海军少将、真崎甚三郎的弟弟);森冈二郎(内务部前警保局长、台湾总督府前总务长官);鸠山一郎(众议院议员);宇垣一成(退役陆军大将、前陆军、外务大臣);小林跻造(预备役海军大将、前台湾总督);铃木贯太郎(退役海军大将、枢密院议长)。

看了这个名单就可以知道,各式各样的人都有,情况各有不同,差别甚大。除了热望早日结束战争这一点之外,这些人几乎没有其他共同点。大致划分的话,可以分为吉田茂派和岩渊辰雄派。

不言而喻,吉田派有牧野伸显、桦山爱辅、原田熊雄、小林跻造和接近小林的森冈二郎。吉田茂和小林海军大将在天皇还是皇太子时代出访欧洲时就建立了联系。

岩渊派有真崎甚三郎、小畑敏四郎、真崎胜次,鸠山一郎也加入了这一派。1942年秋,鸠山把岩渊介绍给吉田茂。岩渊辰雄认为,“二·二六”事件后,陆军的所谓统制派把皇道派的真崎甚三郎、小畑敏四郎编入预备役是开辟对中国进行侵略战争的途径,因此除了恢复皇道派之外看不到任何整顿陆军、避免战争的前景。岩渊辰雄对表现异常的皇道派表示支持是令人感到震惊的。

殖田俊吉也是从反共、反苏的立场出发加入岩渊行列的。他过去曾支持过皇道派的将军们。殖田和吉田茂的关系始于前者任田中义一首相秘书、后者当外务次官之时。

众所周知,近卫文麿在1937年6月组织第一届内阁时,与其说是解决芦沟桥事件,不如说对真崎等皇道派的特赦更为热心。

二·二六事件前夕,吉田茂会见了真崎甚三郎大将,不仅没有留下什么坏印象,相反还产生了好感,这在《西园寺公和政局》

一书第四卷中是有记载的。真崎甚三郎是一个具有怎样思想的人，又当别论，但他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向山宽夫的论文写道：“岩渊为了彻底整顿陆军统制派而考虑起用皇道派，并不仅仅由于皇道派是在陆军中唯一能对抗统制派的派系，而是因为这一派的自由主义思想和统制派完全相反，竭力抨击军部或军人对政治的干预，并且在坚定地站在反苏反共立场方面使岩渊抱有深深的同情。”读了这段文字以后，我确实感到很吃惊。不能说由于反苏反共思想就一定是自由主义；皇道派极力抨击军人干预政治的说法也很奇怪。昭和初年最强有力地推动军人干预政治的难道不正是以荒木、真崎为代表的皇道派吗！？

1944年6月15日美军在塞班岛登陆之后，木户内大臣将近卫应当起用皇道派的意见上奏天皇，天皇发出了如下指示：

“真崎——在任参谋次长时，擅长于提出国内改革方案一类的工作。改革方案中出现过国家社会主义之类的词句和要求彻底整顿等等。他任教育总监时的方针所培养的人现已成为骨干力量。

“柳川——在二·二六事件中作为一名师团长未能尽到压制职责，贺阳宫的评语、当第十军司令官的好成绩，都是让部下去做。是一个靠部下如何才能办成事的人，不是担任方面军司令官的人才！

“小畑——作战家，作为大学校长不能掌握满井佐吉，只能担任军司令官！”

名不虚传，由此也可以看出，天皇对真崎甚三郎等皇道派将军的严厉批评是多么贴切！近卫那种由皇道派来抑制统制派的想法本身就是很荒唐的，正是皇道派，把陆军拖入了派系斗争的泥沼中。宇垣大将1943年1月8日日记的如下记载，值得注意：

“最近关于陆军异乎寻常的行为，我想虽然我也应承担一部分责任，但是大部分责任在于派系抗争中苦斗的上原勇作元帅。他由

于反抗心理和偏见，特别庇护荒木、真崎等人，以图恢复自己派系的势力。据说元帅在与世长辞弥留之际，对于庇护把军队引入歧途的荒木、真崎等人深深感到后悔。”

可以说，真崎、小畑等皇道派和吉田茂等人结合在一起推动早日实现和平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皇道派是自由主义者，而是因为我们的陆军沦为反主流派的缘故。

以吉田茂、岩渊辰雄等人为中心的和平活动，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2年11月到12月，关于促使宇垣内阁成立的活动，11月7日《木户日记》有如下记载：

“11时，听取秘书官长提供的如下情报：同冈田(启介)会谈中获悉，最近内田信也探望近卫，近卫谈到下届政权，由于宇垣出马之声甚高，果真如此，陆军大臣由谁继任是一个问题。后来，内田亲访宇垣，谈及此事，宇垣推荐，可由梅津(美治郎)或山下(奉文)担任陆军大臣候补。另一方面，小畑敏四郎中将拜访宇垣，向他进言，‘一旦由宇垣组阁，是否可让真崎大将担任陆军大臣？’宇垣回答说：‘由于真崎大将不是现役，组阁时要实现这一想法有困难。’后来，宇垣又去拜访真崎，谈及此事，真崎对宇垣及时联系的恩惠深表谢意。不过，顺便提一下，这同荒木、小畑两人拜访牧野有无关联，尚属疑问。”

拥护宇垣大将组阁的运动在开战之前也常有，不过都没有成功。不言而喻，最大的障碍在于找不到合适的陆军大臣。1942年11月到12月，吉田茂等个别往访宇垣大将，进行了工作，仍是因陆军大臣的问题而失败。考虑到陆军中央被东条一派所控制，当然不能指望通过普通方法推荐陆军大臣的候补人选。于是小畑敏四郎考虑，以非常手段先让真崎恢复现役，然后任命为陆军大臣，一举肃清统制派，可是宇垣大将没有照办。这一年12月26日《宇垣日记》写道：

“为挽救时局，近卫一派直到目前仍然敦促我出马，热情

极高。而且这期间出现了与我曾经描绘过的方案相近的模型，但是，我绝不愿在他人控制下组阁。”

由此可见，宇垣大将不赞成任用真崎大将为陆军大臣的方案。宇垣大将本认为真崎大将、荒木大将等皇道派是派系斗争的中心人物，因此把真崎陆军大臣强加给宇垣的想法完全不现实。后来岩渊辰雄提出让宇垣恢复现役、兼任陆军大臣、由小畑敏四郎中将当次官来辅佐宇垣的方案，宇垣也没有接受。宇垣并不愚蠢，他不会被派系色彩最浓厚的皇道派强硬势力所利用。

从1943年1月6日《木户日记》也可以看出这一活动的失败：

“3时半，在官邸与很久未见面的近卫进行会谈，谈到战局的发展、内政各项问题。”在这段文字之后又写道：“对推荐宇垣大将组阁的运动，有如下四点情报：一、在吉田茂住宅接头；二、参加者有吉田、小畑敏四郎、真崎大将、松野鹤平（或鸠山一郎？）、小林跻造、古岛一雄、岩渊辰雄，池田成彬也有联系（山下龟太郎住处）；三、内田信也同本会晤无关；四、宇垣大将不同意起用梅津（美治郎）大将，这是因为他担心南大将系统势力的扩张。”

1943年1月6日正是上一年年底大本营决定从瓜达尔卡纳尔岛撤退的日子，在新几内亚、布亚纳等地方也连续出现全军覆没的“玉碎”。这时候，越来越多的人看出，日本失败已经不可避免。

欧洲战线方面，上一年11月19日斯大林格勒苏军进行大反击，以此为转机，德国第六军的命运已危在旦夕。11天之前，艾森豪威尔将军率领的美英盟军，开始在北非登陆作战。

吉田茂等人想方设法企图早日实现和平、挽救日本的愿望和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用皇道派来整顿陆军的想法只能说是南辕北辙。

## 五

在拥护宇垣大将组阁失败之后，吉田茂等人的和平工作进入

了争取建立小林跻造内阁的第二阶段。从1943年春起，吉田茂和岩渊辰雄一起经常同海军大将小林见面，希望他挺身而出。结果，从1944年3月14日《细川日记》可以看出，近卫文麿公爵对细川获贞已经谈到如下程度：

“昨日在吉田茂处，我会见了若槻、币原，另外又见了小林跻造。小林和小畑之间相互已经充分谅解。目前考虑的班子是准备让小林担任首相兼海军大臣，真崎充任参谋长，小畑任陆军大臣，吉田出任外务大臣，据称小林和小畑有充分信心抑制陆军。留下的问题是海军巨头之间的谅解，即冈田、米内、小林三者之间的谅解是绝对必要的。以前他们都和我(近卫)谈过，要我出任首相，但我推脱了，我说，自己是中国事变以来的负责人，而且形式上仍以重臣的身分为现内阁顾问，所以还是全部换新人为好。象上述阵容，也可以由高松宫殿下担任首相。”

在近卫文麿上述发言之后，即1944年3月21日，吉田茂给若槻礼次郎写了一封信，明确说出了吉田茂有关争取实现和平的想法，让我们来引用一下：

“敬启者。前次光临，不胜感谢。殖田俊吉早就是与我等具有同样抱负的忧国之士。他从思想方面，我从外交方面，对目前形势深感忧虑，并为商定有效对策而煞费苦心。得知殖田将往访阁下，而日前我的谈话十分仓促，未能尽意，因此，借便敬呈一书，如内容有重复，还望海涵。

“前年，攻陷新加坡前后，我曾向重臣们进言，敦促开展争取和平的外交工作，但未被采纳。从那时起我就认为，如果不由军人出身、重视外交的政治家出来勇挑重担，即使战争得胜也将难以收拾战局，更何况战事并非有利。在当局物色不到合适人选的情况下，象今天这样容忍军人的暴政是不行的。外交之难，从来不在外，而在内。如果不能制止军部，不遏制他们对外交、政治的干预，争取和平的外交终究是无法推行的。所以，我首先着手作宇



垣大将的工作。前年秋天以来，我们经常就时局对策、特别是制止军部的对策等交换意见，但是终未能了解他的一贯信念。结果，与军部妥协了。看来他的本意是想借用军部的力量挽救政局，他离开陆军多年，在陆军已无影响，不痛下决心，也只得如此。但是如果继续目前的状况，没有必要更迭内阁。

“即使对军部内情不甚了解的人也都明白，改造军队的途径在于：在陆军，寻找对现状不满的人，只有依靠军部本身的反省才能促使军部恢复原状，也就是起用多年来与目前当权势力相对立、对他们的行动经常提出批评、被他们敌视的真崎一派，让真崎一派负责整顿军部的工作，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宇垣大将也赞成上述精神和原则，表示愿为后盾。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态度变得暧昧起来。所以，我们和真崎一派合作在海军寻找意气相投的人，结果就想到了小林大将。从去年春天以来，按照上述宗旨促他下决心，虽然未能如愿以偿地立即承担内阁首相的重任，但是明确回答说，‘只要有奉公之途，任何情况都在所不辞’，思想方面今后由殖田继续做工作，以加深认识。在陆军有关人士中，经常敦促他和真崎、小畑两人晤谈。外交关系上的问题，与我们通常之所见相同（对币原外交无异议，寄希望于熾和外交之意）。我们之间就最机密的事进行研究，讨论过小林组阁的方案。当然，真崎一派能否真正抑制住军队，尚有令人担心之处。尽管如此，如果仍然继续迎合军部现领导人的状况，国家前途势必更加令人担心。说起来，正是由于对军部之专横拔扈，未加重视，一味强调诱导和利用，才导致目前这种局面。为了消除多年的弊病，需要狠下决心。如果把目前国家的危机随便交给那些既无此决心、又没有对付军部方案的人去负责，显然势必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德国之覆辙。

“当前最紧急的事是使战局朝有利的方面发展，增强处于南太平洋上国防第一线的我国海军，使之基本上能挫败美国海军

的攻势，为此，陆军应倾注全力，增援海军。在战局多少有转机时，设法开展外交工作，以便导致和谈局面出现。然而，如举国上下为战局不利之传闻所震惊，就会忘却整顿国内态势，无法专心致志地进行应战准备茫茫然贪图敌机不来的那一天之安逸，似乎没有决心去探讨，如何挽救日益严重的国家危机的方案。

“以上恳请阁下深虑。阅后请即焚毁。 敬具。”

吉田茂的想法和考虑问题的特征，在这封信里表达得十分明显。上面已经指出，由真崎，小畑等皇道派来整顿陆军是不现实的。即使按他所说，究竟能否挫败美国海军，使战局多少出现一些转机，也值得怀疑。但是吉田并不灰心，不愿让争取和平的努力半途而废，即使不能如愿以偿，也要不屈不挠地奋斗到底。这就是典型的吉田作风。

实现小林内阁设想的最困难之点，恐怕在于要让天皇理解，真崎大将或小畑中将，如有可能，两人都回到现役的必要性。因此才有殖田俊吉呈文上奏之举。在1949年12月号的《文艺春秋》上，当时吉田内阁的法务总裁（法务大臣）殖田俊吉以《日本巴德里奥事件<sup>①</sup>经过》为题，发表文章如下：

“那份上奏书表明了前年东条内阁时，我们一些志同道合的人的设想。当时在吉田、岩渊、近卫、真崎大将、小畑中将、真崎胜次少将、森冈次郎等人中间，酝酿让小林跻造海军大将出来组阁，取代东条内阁。这期间考虑过在小林内阁让真崎大将或小畑中将任陆军大臣、小林自己兼海军大臣的方案。

“要摆脱军部对政治的控制，完全由新内阁掌握，整顿腐败透顶的军部，尽早结束战争，实现和平。为此，由真崎或小畑当政是很必要的。但是，这些人都是预备役，由预备役的人任军部

<sup>①</sup> “日本的巴德里奥事件”。巴德里奥是意大利元帅，1943年7月墨索里尼下台后，成立巴德里奥政权。1944年4月，改组新内阁，吸收共产党参加，直到1944年罗马解放为止。——译者

大臣在当时已不可能。不能指望在现役军人中有人出来整顿军队，更不用说考虑把战争转向和平。因此，无论如何要从预备役中少数有限的人中选出军部大臣的候补。即使如我们所希望的任命小林当首相，但组阁最大的难关在于不能从现役中挑选陆军大臣、而要从预备役将军中任用。

“为此，要使陛下充分认识到这样做的必要性，认识到需要采纳小林的意見。虽然把必要性奏给天皇，那复杂的情况陛下能否马上理解，就不得而知了。所以，我把理由详尽而通俗易懂地写出来，相信届时会起些作用的。当时小林的想是，如陛下不采纳这一意见，则不可能组阁。因此势必辞退。但是留下这样一封信，说明：‘为什么这样做是必要的，情况已写在这里，请过目’。怀着这种心情写的，就是这份‘上奏文’。

“写这份材料，并不是为了被任命时，在陛下面前宣读，而是为了未被任命时，将它留在陛下处，以便陛下考虑。如果因为这份材料，使新内阁不能组成，但这也是一个机会，使陛下清楚认识到以下情况，即：日本政治的实际情况是如此，日本陆海军真相是如此，战争目前是处于这种阶段。能做到这一点，目地也就达到了。恐怕陛下对实际情况毫无所知。有鉴于此，才决定写一份明确而详尽的长文，并决定由我来写，于是我便写了这份上奏书。根据上述意图，这份东西不太简单，必然是供陛下慢慢阅读的长文。原稿写出后，小畑君看过，作了些改动。近卫只简单看了看，除此之外还没来得及给其他人看。我们的同志中间，因为已经谈定，内容无须一一再看，但是，因为有些和军事有关的问题，因此又特别和小畑君谈了谈。”

如果近卫文麿和若槻礼次郎赞成吉田茂等人的和平工作，成立小林跻造内阁的绝好机会不久就会出现。因为1944年7月18日东条内阁以承担塞班岛失陷责任的形式宣布总辞职。同一天下午4时起，开始举行重臣会议。对有关重臣会议的经过，《木户日记》

下卷以6页篇幅作了详细记述，但是若槻也好，近卫也好，始终未能在会上提出小林海军大将的名字。

若槻礼次郎发言说：“我认为战争期间还是由军人负责为好，今天国防第一线只能依靠海军。如果从海军产生首相，也许心情上会有些顾虑，因此，我想从陆军产生首相为宜。既然是首相，就要有些政治手腕，从这一意义上说，虽然我对最近的情况不甚明了，但我以为宇垣大将比较合适。”

近卫文麿谈到陆军内部左翼思想的危险性。他说：“十多年来，陆军内一部分人有左翼思想，直到今天在军队官员和民众中还有人进行联系，企图进行左翼革命。这一点比战争失败更加危险。战争失败尚可维持皇室和国体，而革命则不可能维系。从这点来看，选拔陆军大臣任首相是很重要的。”

按理本应由真崎大将和小畑中将提出整顿陆军的主张，但是近卫没有勇气点出皇道派将军们的名字。结果，后来发言的人举出了铃木贯太郎。

第二天下午6时，近卫拜访木户内大臣，提出了建立小矶、米内联合政权的建议。7月20日下午4时，再度举行重臣会议。会议决定推举小矶和米内两位大将组阁，吉田茂等人的工作宣告失败。

## 六

吉田茂等人争取尽早实现和平的工作进入第三阶段。虽然也谈过推荐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组阁，但到了1945年1月要求近卫文麿公爵再次出马的呼声高涨起来。

1月10日，《细川日记》记载着富田健治对细川获贞的谈话，“小畑、吉田两氏要求近卫公再度出马就任首相，不知意下如何？”

这时，美军已在吕宋岛登陆，美国空军对日本本土的轰炸也

日益激烈起来。据1月6日《木户日记》，天皇征求木户内大臣的意见说：“顷接报告，美军企图在吕宋岛登陆，已侵入林加恩湾，菲律宾战况日趋严重，根据战果进展，有必要听取重臣之意向，汝意为何。”此后一个星期，《木户日记》再次写着天皇对战局的忧虑，希望征询重臣意见的内容。过去，除政府和统率部首脑的人以外，木户内大臣都极力避免其他人拜谒天皇，现在他终于让步了。于是决定，2月7日平沼男爵、9日广田弘毅、14日近卫公爵、19日若槻男爵和牧野伯爵、23日冈田大将、26日东条大将分别单独谒见天皇，上奏各自的意见。除了东条大将持强硬的主战论外，各重臣对战局之危急均表绝望。可是正如若槻男爵在《古风庵回忆录》中所承认的，“没有谁能进一步拿出勇气、提出实现和平之建议。事已如此，再议论什么本土决战，也不能挽救这不利局面。因此应当说‘无论如何，必须停战’。当然，我内心是这样想的，可是我不能讲出来，这是我的缺点。的确，我感到万分惭愧，因为直接在陛下面前，眼睁睁地看着陛下的英姿，无论如何说不出‘你投降吧’之类的话。”这可以说是很老实的自白。只有近卫文麿公爵以事先准备好的上奏书为基础，一针见血地陈述了战争必然失败的意见。这份上奏书当然不是殖田俊吉写的长文，而是近卫自己在汤河原执笔起草的文章。近卫2月14日上午10时进宫，在天皇书房拜见并回答了天皇的提问，这一天藤田侍从长患感冒，由木户内大臣陪同接见。

让我们引用一下近卫上奏书中特别重要的部分：

“虽然十分遗憾，但战争失败已成定局。我想在此前提之下，陈述如下”。这段话一开始就说得很气魄。近卫把其他重臣在陛下面前不敢说的话，首先提了出来。接着谈到了共产革命比战争失败更可怕的看法：

“战败固然是我国国体之创伤，但英美舆论直至今日还没有到达提出变革国体的地步（当然有一部分激进的主张，而且将来

如何演变尚难推测)。因此，我认为只是战败，在国体上尚不足虑。从维护国体原则出发，更值得忧虑的倒是比战败更可怕、伴随战败而发生的共产主义革命。”其后，上奏书论述了关于苏联势力的严重扩张、渗透，以及东欧、伊朗、西欧等形势，并断定说：“根据这种形势来推论，我认为充分存在苏联不久干涉日本内政的危险性(即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存在，共产党人强烈要求参加戴高乐政权和巴德里奥政府，废除治安维持法和防共协定等等)。回顾国内，实现共产革命的条件正日益成熟，即：生活的贫困，工人增加了发言权，对美英敌对情绪高昂的反面有亲苏气氛，军部内一派人的革新运动，趁机兴起的新官僚运动，以及幕后支持和操纵的左翼分子的活跃等等。特别令人担忧的是军部内一派开展的革新运动。”

这期间，吉田茂小集团，尤其是殖田俊吉和岩渊辰雄的影响很显著。虽然在前年7月18日的重臣会议上，近卫讲过这一意见，但上奏书再次雄辩地进行了论述。阐明军部的一部分人怎样被共产革命所利用，结果：“多数少壮派军人相信我国国体和共产主义是可以并存的。军部内革新论的基调也在于此。大部分职业军人出身于中等以下的家庭，许多人的境遇比较容易接受共产主义，而且，他们在军队中受到的教育完全集中于国体观念一点上，共产党人正在用国体和共产主义可以并存的观点来引诱他们。”

接着，近卫上奏书断定：“现在已经很清楚，当然发动汤州事变、中国事变，最后导致大东亚战争的都是军部有意识的计划。”上奏书还坦白地承认“过去10年中间，臣不肖在军部、官僚、右翼、左翼多方面交友甚多。最近，自己静静地进行反省，得出的结论，并以这些结论为镜子对照过去10年间的动向，深感许多情节是与上述有关的。”

这里也有近卫文麿的检讨：“我这期间虽曾拜领大命，两次组阁，但为避免国内摩擦，尽量容纳这些革新论者的主张，焦思苦

虑地指望能够达到举国一致的结果，却没有充分认清潜藏在他们的主张背后的意图。这完全是由于我的无能所致，因此十分抱歉并深感自己有责。”

近卫公爵的想法可以称之为“阴谋理论”的典型。在解释社会现象时，没有比“阴谋理论”更吸引人的了。简单的结论就是，如果少数坏人集团策划阴谋，那么只要把那些坏蛋搞掉就万事大吉了。

反共方面凡有对自己不利的情况都归之于克里姆林宫的阴谋或国际共产主义的阴谋。1950年代给美国带来严重危害的麦卡锡主义就是反共“阴谋理论”的代表。

近卫文麿由于他过去十分信任的尾崎秀实与理查德·佐尔格<sup>①</sup>相勾结，充当苏联间谍这一深刻的个人经历和体验中，得到教训，后来成为反共“阴谋理论”的俘虏。共产主义的“阴谋理论”也好，反共的“阴谋理论”也好，都起着把这种理论的主张者从现实中“解放”出来、引诱到第二现实或第三现实梦幻世界的麻醉作用。

把一切统统归之于共产革命阴谋的近卫上奏书也确实是一篇奇文。

上奏书说：“我认为结束战争最大的障碍是从九·一八事变以来直到今天，军部内那些影响时局的人们的存在。清除这些人、重建军部，正是从共产革命威胁下拯救日本的前提和先决条件。惟望陛下当机立断。”这一结论完全是脱离现实的所谓梦幻世界的想法，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可是，近卫上奏书中与这种“阴谋理论”混杂在一起的还有些正确的判断。上奏书写道：

---

<sup>①</sup> 尾崎秀实(1901-1944)评论家，近卫文麿的智囊人物，因1941年佐尔格事件被处死刑。

理查德·佐尔格(Richard Sorge 1895-1944)德国报纸记者，共产党员，1933年到日本后，从事情报工作，进行反战和平工作，1944年被日本政府杀害。——译者

“从战争必然失败这一前提说来，我认为继续进行不可能取胜的战争，完全上了共产党的当。因此，从维护国体立场出发，我确信，应当早日迅速采取措施，结束战争。”

这种说法不是“游离”现实的梦幻世界的判断，对于1945年2月的大日本帝国来说，这是唯一正确的判断。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阴谋作依据，是近卫的被害妄想，但结论是正确的。

自从日本错误处理芦沟桥事件，导致日中爆发全面战争以来，陶德曼大使的和平工作遭到失败，发表荒唐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让陆军开进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结成三国同盟，进而占领法属印支南部……自1937年7月起，可以说我国所进行的种种愚蠢行为，近卫文麿公爵都是主角。但是，近卫的上奏书直接向天皇强调结束战争的必要性，这一点可以说具有历史功绩。

下文还将提到，近卫文麿在上奏的前夜，曾在平河町吉田茂官邸住过一晚。他把上奏书的草稿交给吉田茂看并征求意见。两人彻夜长谈，交换意见。吉田茂对草稿作了一些修改，近卫提出要让牧野伯爵看，另外又复写了一份。

2月14日上奏完毕之后，近卫公爵下午3时往访吉田茂，近卫微笑着满意地说道：“今天因为有木户内府陪见，我才下决心谈出来了。”

在这次见面以后两个月，吉田茂被宪兵队逮捕。

## 七

关于逮捕吉田茂，当时担任东部宪兵队司令官的大谷敬二郎大校在《昭和宪兵史》（1946年三铃书房出版）一书中是这样说的：

“4月15日早晨，宪兵逮捕了吉田茂、岩渊辰雄、殖田俊吉等人。特别高等警察队长高坂武夫中校14日下午紧急派出以野田准



尉为首的监视班，埋伏到大矶，任务是查清吉田是否在大矶并监视事件发生后的行动。

“以木村准尉为首的逮捕班于同一天夜间到达大矶，他们与监视班进行联系，负责警戒。木村准尉15日早6时叩敲吉田住所的大门。由东部军军法会议法务官开出的拘捕证要吉田随行，于是把吉田带到了东京。吉田被捕后，野田准尉的小队抄了吉田的家，但未发现吉田复写的近卫上奏文。后来知道，吉田茂当时就让情妇小铃藏在和服衣带里，不久就烧掉了。

“吉田茂犯罪嫌疑的事实是：在军事上‘造谣惑众’并‘违反军事机密保护法’。前者内容为以下三点：一、有散布近卫上奏内容的嫌疑；二、有散布陆军已对战争失去信心和士气低沉的反战言行；三、有污蔑军队的言行，认为关东军、陆军中央已被赤色分子操纵。后者内容为有探听并透露关东军的编组、装备、行动等嫌疑。”

宪兵队下决心逮捕吉田茂等人是因为陆军省防卫课长得到了重要情报，让我们引用一下《昭和宪兵史》：

“在这种场合，防卫课长从何处得知近卫上奏书的呢？当然是军事资料部，这里有一段有趣的故事，现在已被一些人所详知，所以也无须保密了。

“宪兵派往大矶的小组，特别是对吉田东京住宅的监视工作有所开展，了解到一些情报，但大矶方面完全无法下手。不过，吉田的另一处住宅，有一个文书在不声不响地干着自己的事情。于是宪兵暗中把这个文书抓起来，并弄清他的身分。难怪他有双重户口，样子也有些可疑，原来他是根据军事资料部的指示潜伏的特务，吉田抄写的上奏内容就是这个年轻书生偷出去的。”

对吉田茂东京住所当然也不会放过，而且已安排停当，这说明宪兵队也派人充当侦探，她就是名叫早苗的女佣人。令人瞩目的是，除了这个宪兵队的侦探以外，还有一个名叫麻纪、装扮成

吉田家女佣人的特务，把麻纪送进去的是陆军省兵务局防卫课的分室。牛込河田町的陆军科学学校附近建立了一个绝密的情报机关。以下让我们称其为秘密机关吧。在大矶另一处住宅不声不响、认真工作的文书也是这个秘密机关的工作人员。在崑山清行所著《陆军中野学校秘录》(1971年番町书房出版)一书中，对于安插女佣人或书生的借口，有过详细的描述。首先，在原来的女佣人外出时，总是借机向她灌输：“在吉田茂这样的危险人物身边服务，要不了多久，危险也会降临到你的头上”，使她常常担惊受怕，告假不上班。而女佣人不在，生活不便，于是巧妙地推荐聪明能干的麻纪来顶替。当时正是闹粮荒的时候，这个女佣人常常从神奈川县中郡伊势原的家里带一些米、黄酱、酱油等生活必需品，吉田家如获至宝，逐渐由器重麻纪到十分信赖她。其实，麻纪带来接近官价的农副产品都是秘密机关弄来的。她说一声“去弄点东西来”，便可以长时间外出，而利用这期间同秘密机关进行联系，是再方便不过了。

过了不久，麻纪也往吉田茂的大矶住所送些吃的，了解到大矶那里人手不足，吉田很发愁。秘密机关考虑到这是选派文书打进去的极好机会，就让麻纪提出要求到大矶去当佣人。她去了以后又对吉田茂说：“我的远方亲戚在当兵出征过程中得了疟疾，被送回国内并免除了现役，现住在赤羽伯父那里，整天闲着没事干，叫他来帮帮忙吧！”吉田茂正痛感人手不足，所以，很快就上了圈套。就这样，1944年11月29日，秘密机关工作人员东辉次军曹住进了吉田的大矶住所。他按照上级的命令和自己姬路的家人分开，并把户口转到了东京市牛込区若松町66号。秘密机关还伪造了京华商业学校的毕业证书和学业证明书，还办了受伤复员军人免于入伍的手续，申请把物资供应主副食用本转到东京赤羽麻纪的伯父家里，至此，东辉次军曹完成了全部伪装工作。

在大矶吉田住所的东军曹，每天是怎样度过的呢？让我们来

引用一下《陆军中野学校秘录》的有关章节：

“每天早上6时半清水静起床，东军曹也闻声而起。提水是这一天工作的开始。那年月，物资匮乏，连双象样的木屐也没有。木屐带断了没处买，就用院子里棕榈树枝来编带子。要用扁担挑起装得满满的水桶，走上十多个石头台阶，路又滑，连布袜也不能穿，而且在那个时代布袜也根本弄不到手。从后面沙漠吹来的刺骨潮风打到脸上象刀刮一般。挑完水就开始用竹耙搂树叶、枯枝。吉田住宅周围有六、七十年的老松树三、四百株，就是打扫直通公路的山下小路，至少也要三、四十分钟的时间。干完这件事，就提着半升左右的瓶子去邻村二宫牧场取牛奶，回来打开木板套窗，才能吃早饭。饭刚吃完，就得拿上大小两个包袱到大矾街上去，回来时背回装得满满的两个包，大包装的是冷藏库用的冰块和配给鱼，小包里塞满配给面包。吃过午饭，到住宅周围的松林里打柴、提水，准备洗澡用。从提水到引火烧柴要两个小时，再加上劈柴，一共需要四、五个小时。这期间，如果一说有电话来，就得赶紧跑到接通山下电话的家里。等到有客人来，就得跑到火车站去买票。那时一天分配给五支香烟，可是有时一天难得有空闲抽上一口，除非到夜深入静之时。更谈不上什么休息、保养身体了，就连进行谍报联络的时间也没有。”其中提到的无法休息、保养身体指的是，原来把东军曹说成是因病解除应征入伍的伤员才送到吉田这里来的，因此，吉田茂第一次见面时就说：“那你就在这儿轻松轻松吧！现在身体全好了吗？休息保养一段时间再说。”

因为吉田茂的东京住宅有宪兵队和秘密机关分别派遣的特务当佣人，而在大矾的另一处住宅，又有中野学校出身的秘密人员伪装成文书，通过宪兵队和兵务局防卫课这两条线，吉田茂的动静被侦察得一清二楚。

从1939年起，宪兵队把吉田茂当成“外事方面需要监视的嫌疑”，开始进行侦察。秘密机关给吉田加了个“约翰逊”的暗号，可

能是因为这个名字的发音恰恰与“吉(田)反战”相近的缘故。吉田茂反对战争是事实，可是他不象列宁等人那样，进行反战活动，希望本国在战争中失败。列宁考虑的是把战争失败作为发动革命的时机，这种革命的和平主义和吉田茂的保守和平主义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据宪兵队的审讯记录，吉田茂有如下口供：“无论怎么说，日本如果不同英美友好相处，绝对不会成为一个繁荣的国家，所以，必须尽早结束同英美的战争。即使对英美的战争失败，国体绝不会灭亡，但如果国内被赤化，那么日本只有灭亡。”

把具有这种思想的人当作国贼来对待，安插文书、女仆充当特务等行为，再清楚不过地暴露了军国主义日本的黑暗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希特勒德国和斯大林苏联同军国主义日本有相似之处。有人为了贬低战后的日本，把投降以前的日本说得似乎一切都好，其实，用人类的自由和尊严这个尺度来衡量，人们都不能忘记，大日本帝国的晚期是处于最坏的情况中。

东军曹也好，麻纪也好，在当时的日本都是忠于职守的爱国者。从主观上说，是为自己的国家而充当特务的。在1955年7月29日《时事新报》登载的前首相吉田茂回忆录《随意想到的》第四章中，吉田茂也提到了东军曹的事：

“他不是一个人男仆，因为我家里缺少帮手才由女仆推荐她称为‘表哥’的男人来当文书。干活勤恳认真，家里人都象宝贝一样器重他。可是，当我被宪兵队监禁前夕，他突然不见了，同时，推荐这个男人来我家的女仆也不见了。我觉得很奇怪，但当时并没有特别注意。后来一了解，才知道是宪兵队的特务，他以及介绍他到我家的那个女仆一道监视和报告我的行动。这个特务很简单。在我家任务完成以后竟然钻进近卫的另一处住宅。在走廊的地板下安上了窃听装置，屋里的谈话全都能录下来。

“战争结束以后，这个人偷偷地来拜访我，对我表示歉意说，

‘战争期间干了些很对不起你的事，但并不是自愿的，因为接受命令不得不干，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很抱歉’我鼓励了他一番说：‘你忠实地完成了人家交给你的任务不必道歉’，他就回去了。以后为找工作事还来求我帮忙，我于是帮他找了个工作并担保说‘工作负责、态度认真’。从那以后就再没有音信了，我想现在一定还活跃在某个岗位上！”

## 八

1945年4月15日到5月2日 吉田茂在九段下(东京地名——译者)东京宪兵队接受审讯。第二天被送到东部军法会议，关押在代代木陆军监狱。关于审讯的内容，吉田茂在《十年回忆》第一卷里曾提到过。他写道：

“从大矶的住宅被带往宪兵队的途中，我在汽车里推测，这次被传唤的原因可能是前面所说有关秋月翁的潜水艇那件事。可是九段宪兵队的审讯毫未涉及秋月翁的问题。他们说：‘你是知道近卫公爵在二月秘密上奏的详细内容的，赶紧说吧！’这真有些出我意料之外。但是我下定决心，对宪兵队的这种审讯，一概不答复。因为连旧宪法还保障书信的秘密，所以我认为不必要说出奏折内容，也就是说，我行使了现在所说的沉默权。”

如上所说，在吉田住宅写的近卫上奏书被秘密机关的特务复写后送到了宪兵队。宪兵队想知道的是近卫公爵上奏时天皇提了哪些问题，近卫是怎样回答的，以及吉田和近卫彻夜长谈的内容与具体的策划。据《细川日记》所记，对于近卫的奏折，天皇和近卫之间进行了如下问答：“陛下问道，‘美国说不取消我国皇室的存在，这一点究竟如何？’我说，‘从格鲁和美国首脑集团的想法来看，似乎不会走到否定皇室的地步。’陛下说，‘梅津认为美国并未降低取消皇室论的调子，所以他主张彻底抗战，我对这点也有怀疑。’陛下还说到，‘梅津和海军认为，今后如能诱敌至台湾，便可

一举击溃。’此外，陛下指出，‘也可以考虑采取外交手段，不过在采取外交手段时，陆军将发生动摇。杉山说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元帅’。但是近卫批评说‘那是杉山的愚蠢想法’，天皇陛下说，‘元帅这样一个头衔也不可能压得住！’参加陪见的木户内府听了也笑起来。天皇陛下还谈到‘关于统率军队的问题，三笠宫推荐阿南，我还不大了解。’

“近卫提的人选主要是目前军部的反对派小畑、石原、宇垣，还有阿南，但陛下的态度均颇为冷淡。”

吉田茂一直保持着缄默，拒不开口。《昭和宪兵史》也描写了他顽固抗拒的态度：“例如，殖田俊吉供认关于陆军赤化的问题曾对吉田讲过，可是就是对他读了殖田的审讯记录，吉田仍然顽固地加以否认说：‘那是殖田说的，我不知道’。他似乎最担心的是暴露近卫奏折，以致连近卫也被捕，因此，顽固地否认与近卫奏折有任何牵连。”但是吉田茂手抄的近卫奏折被查到，因此连他也不能不认帐。在吉田审讯记录末尾，有“由于考虑不周而诽谤了军部，很抱歉”之类的话。这是东都宪兵司令官大谷敬二郎在《昭和宪兵史》里提到的。

的确，吉田茂等人关于陆军正在赤化的想法，是由皇道派的小畑敏四郎灌输的。大概因为刚好与事实相反，所以吉田承认了这一点。吉田对审讯采取的态度是很不错的，《细川日记》也指出过这一点。

宪兵队除了对近卫奏折外，对吉田茂和美国大使格鲁的关系也进行了调查。让我们再来引用《十年回忆》第一卷的章节：

“我同格鲁大使的交情很深，开战后他被软禁在美国大使馆时，我有机会就送些食品给他。

“宪兵队调查我同格鲁的关系时，问道，‘你同大使曾约会过秘密会谈，在什么地方，为了什么目的要见面？’我觉得问得很奇怪，回答说：‘并没有约会过。’他们说：‘我们有证据。’我说：‘请把

证据给我看看！’他们便把我写给格鲁大使的信的抄件拿了出来。我一看，原来是我因为大使即将乘交换船回国而写给他的那封信。我想这封信一定遭到了检查，尽管我说这是写给格鲁大使的一封告别寒暄信，但是他们并不相信，又指着说：‘这是什么？’我看了一眼，原来是‘Some better days’那句话。我说：‘这是将来有机会再会的意思。’他们不同意我的解释，说：‘这就是约会秘密会晤。’尽管无聊，我却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说明，用英语写就是这样，只是日本话‘再会’的意思，决不是可以解释为秘密会晤的字句。结果，好象他们始终未能理解，我想他们也不打算理解。”

在九段宪兵队18天和代代木陆军监狱22天，吉田茂是怎样度过的呢？《十年回忆》第一卷说：“九段宪兵队的审讯尽管很严，但对待我还是客气的。”至于陆军监狱，该书同一节里说：“这里的单身牢房非常干净，难得的是从未和跳蚤、虱子之类打交道。”

但据岩渊辰雄所说，在监狱中臭虫和虱子一起向吉田茂袭击，使他十分苦恼。因为痒得厉害，不断用手去搔，指甲抓破了皮肤，后来就化浓了。“身上到处涂满了红药水，简直目不忍睹。偶尔见面时听到他发牢骚说：‘啊，太惨了，痒得根本睡不着。’监狱房间是木板地，吉田睡在地板上，盖的是麻生家送来的毛毯，开始几天咬得没法睡，整天对着墙壁坐着。要是活动活动身子，还得受人责备。可是到后来睡觉时给个垫子，有时允许在屋里自由走动和作操。”

从吉田茂所写陆军监狱单间牢房“从未和跳蚤、虱子之类打交道”的情况来推测，岩渊辰雄的说法可能指的是九段宪兵队。

战争末期的日本，到处都有跳蚤、虱子和臭虫，想到这些情况，应当说代代木陆军监狱是特别干净的。

在1945年5月25日的空袭中，这座陆军监狱被烧毁了，吉田茂描述过当时的情景：“空袭激烈起来了，从九段望去，代代木空旷地带的另一边涩谷地区已经变成一片火海，卫戍监狱也中了烧夷

弹。在那次空袭中，警报传来后，宪兵马上把我领到菜窖里避难，而那里也热得受不了。我心想：‘如果闷死岂不糟糕！’正在这时，宪兵说：‘我们到那边去吧！’于是我们便到明治神宫外苑去避难。以后怎样，我已记不清了。总之，我被转送到目黑监狱去了，当这个监狱也遭到空袭时，便迁到了目黑小学，前后共迁四次。在小学只住了四、五天，他们就通知我说：‘你可以回家了’这就是所说的暂时释放。”

岩渊辰雄回忆当时情况说：突然获得假释的吉田茂、殖田俊吉和岩渊辰雄三人都穿着仅有的一套蓝色监狱服，样子非常难堪。只有吉田带着麻生家送来的几条毛毯和一点点钱，殖田、岩渊就借了吉田的毛毯和十元钱的电车费，三人搭乘一辆运菜的军用卡车上了路。车子开到中目黑，吉田下了车，因为他要拜访一下疏散到这里的山口饭馆女主人白井邦。在《吉田茂传》的中卷里已经写过，白井去世不久的父亲留下来的衣服，连布袜子等的尺码都和吉田穿用的身材一模一样。吉田就在这里换了装，然后回到大矶自己家。后来的情景，在《十年回忆》第一卷中以“叛逆者一变而为阁下”为题写道：“以后我在大矶静养了一个星期，目黑小学又来传唤。我想这真麻烦，到了那里以后，工作人员说：‘岛田法务中将正在办公室等你，’我觉得情况有些改变，当我被领进屋子的时候，岛田中便将‘阁下、阁下’地称我，并且说：‘没有比阁下再爱国的了。’昨日的叛逆者今日却成了‘阁下’、成了‘爱国者’。我不禁报以苦笑，心想多半是无罪了，于是说‘多承费心，谢谢。’我致谢后，岛田说：‘请等一下，请听完我的话以后再……’。我想难道还有什么附带条件？他却解释说：‘关于阁下的问题是否起诉，在陆军内部还相当成问题。我是不主张起诉的，但是主张起诉的人也很多。最后由阿南阁下决定不起诉了。’言下之意是‘现在你应该道谢了’。不管怎样，我听说不起诉，是非常高兴的，不过他们把我审问一番，究竟有什么收获呢？老实说，宪兵队的做法的确有



些奇怪。

“自从被宪兵队监禁以后，并无一人来访问我，恰在此时，有一天，一位头戴战斗帽、身穿战时服的人突然来到我家。家人大吃一惊，以为宪兵又来了。仔细一看，原来是近卫公爵。而且公爵的头一句话也很有趣：‘喂！没有宪兵吧？’我想公爵真不愧是一位摄政的宰相。”

宪兵队为什么要逮捕、监禁吉田茂等三人呢？《昭和宪兵史》的记叙，清楚地说明了他们的用意：

“东部宪兵队在逮捕吉田等人的同时，派城内的分队采取行动，企图一举拘捕有反战、反军言行的人。列入黑名单的，大概有10人左右。在这些被捕者当中，多数是自由主义者，对军部或战争本身是不满的。

“同时，拘捕吉田一派和拘捕鼓动反军反战的人的目的可能在于对这些人发出警告：如果肆无忌惮、轻举妄动，随时小心宪兵的铁锤！”

## 九

逮捕吉田茂、殖田俊吉和岩渊辰雄三人之后，宪兵队原预定还要进行第二次逮捕，把原田、桦山、小畑、柳川、酒井等人都抓起来。但是后来缩小了搜捕范围，仅仅为肯定吉田茂等人的证据，对原田、桦山、小畑三人进行了在家审问。他们可能认为，在逮捕吉田茂等人后已经充分达到了威吓的效果。

那么，为什么吉田茂等人在4月15日被捕、5月底又被释放了呢？

4月15日小矶内阁倒台，两天以后铃木贯太郎内阁成立。又过了两天，苏联通告日本，不再延长日苏中立条约。陆军首脑非常担心这样一来要求和平的气氛会高涨起来。海军大将铃木贯太郎虽坚决主张打到底，但到8月10日请求天皇作决断之前，没有表

露内心本意。从种种迹象来判断，陆军强硬派肯定已痛感必须对和平力量进行镇压，于是他们就把打击的目标放在最明确宣传必须实现和平的吉田、殖田、岩渊三人身上。

但是4月30日希特勒在柏林地下室自杀以后，5月8日卡塔尔元帅代表德军签署向盟军无条件投降的文件，日本已完全孤立无援。所以，5月14日战争指导最高会议的成员决定，通过苏联开始进行结束战争的工作。由于5月24、25日两天的大空袭，包括官城在内的东京都，大部分烧毁，关押吉田茂等人的陆军监狱也被烧掉。宪兵队不得不释放罪行不重的吉田茂等人。

在“叛逆者”变成了“阁下”、被认为是“爱国者”的环境下，我认为陆军首脑的心理也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对于还残留一点理性的日本人来说，1945年5月底的日本仅仅剩下了一条活路，那就是结束战争，除此之外别无出路，这已经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据1949年12月号《文艺春秋》上殖田俊吉写的文章称，殖田等人曾制定过一个庞大的政变计划。让我们来引用《日本巴德里奥事件经过》一文的材料：

“他们(宪兵队)认为，我们似乎属于吉田茂的阴谋集团。事实上也是一个大阴谋集团。我们确实有各式各样的计划。天皇将发布由近卫组阁的指示，这样，当天晚上举行只有陆军大臣真崎和近卫首相两个人的任命就职仪式，他们两人继续留在宫中，按照原定计划和事先拟好的名单把陆军部、总参谋部的首脑集团全部解职，编入预备役。不仅搞掉总参谋长、副总长、陆军部的军务局长，而且把他们下边的一伙人，一直到宪兵队司令全部编入预备役。

“近卫怎么样了？指示下达后，他应当到官中来，可是迟迟不见人影，出了什么事吗？正当人们发出议论的时候，全部解职的行动已经完毕，近卫已从宫中走出。第二天早上指挥近卫团包围已经编入预备役的主要将校级军官住处，进行逮捕和抄家。然后对国民公开发表声明，说明为什么要做这样果断的处置，对各方

面的派遣军也将说明事实真相。肃清陆军之后就转入下一步的工作。这就是我们的设想，说起来简直象是说梦话，可是那些家伙竟好象完全没有察觉。”

对于这种宫廷革命派的政变方案，正如殖田也承认的“简直象说梦话”，仅仅把预备役的真崎大将恢复为现役一点，就难以做到。即使能够实现，举行了近卫首相、真崎陆军大臣的就职仪式，把陆军部和总参谋部的首脑一个个编入预备役，在工作进行之中被免职的一方能够俯首帖耳、不加反抗吗？

指挥一个近卫团逮捕编入预备役的军官和抄家也是空想。逮捕、抄家不可能顺利进行，首都东京将陷入比“二·二六”事件更大的混乱，并很可能发展为大规模的内乱。

殖田俊吉所以如此认真地考虑梦幻一般的方案，是因为他和岩渊辰雄过高估计了真崎甚三郎、小畑敏四郎等皇道派的实力。反过来说，殖田、岩渊错误地认为，只要把在陆军部、总参谋部占主要职位的统制派除掉，就万事大吉了。殖田等人深信，把日本推进绝望战争的是统制派的阴谋。

把一切坏事都归罪于一小撮恶党的阴谋，这正是前面说过的阴谋理论。具有相当人生经验的殖田、岩渊竟然成为这种单纯的阴谋理论的俘虏，实在是奇怪的。

毕竟吉田茂从一开始就不相信殖田、岩渊的阴谋理论。在上面引用过的《日本巴德里奥事件经过》中，殖田俊吉说：“本来对于这种琐碎的具体问题，我们方面也不过是作为象小畑、岩渊和我这些参谋们的技术性问题来考虑的。”这段话可以作为旁证。

殖田俊吉的政变计划无非是过高估计真崎甚三郎、小畑敏四郎力量的梦话。但是，他们鼓动近卫文麿起草的奏折，使天皇相信必须结束战争，这是十分重要的。认为陆军正被统制派所赤化，所以必须借皇道派之手加以整肃，这种主张是根本错误的。不过在应当尽早结束战争这一点上，吉田茂等人进行的和平工作

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奏折中开头几句话很有气魄。“虽然十分遗憾，但战争失败已成定局。我想在此前提之下，陈述如下”一段话意义颇为重大。难怪有人说这是岩渊辰雄起草的。要不是象他那样的优秀记者是写不出来的。战后，吉田和岩渊的关系逐渐疏远。彼此相互指责，但在争取和平工作方面，可以说两人是通力合作的。

吉田茂被释放后两个半月，实现了和平。当然并不是通过起用皇道派整肃统制派的梦幻变成现实的。东乡茂德担任铃木贯太郎内阁的外务大臣之后，巧妙地避开陆军坚持把战争进行到底的抵抗，直到接受“波茨坦公告”，这段艰苦战斗历程，东乡外相遗著《时代侧面——大战外交手记》中有所记载。

东乡外相感到未能避免开战，自己深有责任，所以认为必须设法尽早结束战争，于是加入了铃木内阁。就任后不久，副总参谋长河边、军令部次长小泽、总参谋长梅津等人相继拜访东乡，希望他协助防止苏联参战。外相抓住这一良机，当即采取措施，召开了只有战争指导最高委员会成员，即首相、陆海军大臣、陆海军参谋长以及外相参加的会议。在5月10日前后举行的这一联席会议上非正式坦率地交换了意见，由此，要求和平的气氛渐趋高涨。

东乡外相之所以能强迫阿南陆军大臣作出决定释放吉田茂，是因为外相与陆军大臣之间有着相当深厚的信赖关系。

东乡外相曾在文章中写道：“这里我想略述一下和阿南陆军大臣的关系。4月底德国崩溃之后，我曾就支那问题及大东亚战争的前景等同阿南多次交换意见。”“对于大东亚战争的前景，我认为美军在日本本土登陆构筑桥头堡之后；日本只能进行零散的游击活动，战败只是时间的问题。陆军大臣也同意这一看法。这一点后来也常谈起。他的考虑是，敌人可能在6月中旬开始登陆，他希望拖到八月，给予沉重打击之后，再实现和平。

“此外，我想附记的是，我多次主张军队、尤其是宪兵不要干预政治；不要因为战争而建立军部内阁；还有释放吉田茂前大使的问题、处理外国人的问题等，对此陆军大臣也完全同意，而且有事实表明按上述意图采取了行动。在战争即将结束时，他不赞成军部若干年轻人策划的政变行动计划，我想也是基于上述根本观念。”

据说东乡外相说服阿南陆军大臣释放吉田茂时，在隔壁都能听到他那铿锵有力的声音。毫无疑问，对于尽早释放吉田茂和不起诉，东乡外相是有巨大贡献的。

## 十

当吉田茂被关在监狱时，在美国，吉田的好友约瑟夫·格鲁正以副国务卿的身分，大力开展对日本的和平工作。吉田茂的和平工作和格鲁的活动立场不同，一个是战争彻底失败的国家，一个是即将取得全胜的国家，所以情况完全不一样。但稍加注意，就会发现两人的和平工作所追求的目标是共同的。

让我们回顾一下，东京的美国大使馆关闭后，格鲁的一段经历。

从1941年12月8日起到第二年6月18日，格鲁大使以下大约100名使馆官员和日本雇员都拥挤在大使官邸、大使馆办事处和馆员公寓。他们有时一起唱赞歌，有时聚餐，或者在馆内小高尔夫球场打高尔夫球，忍受着被监禁的生活。

值得注目的是，1月20日约瑟夫·格鲁写给将接替自己工作的驻日大使继任者的信件。格鲁在信中，向战后到东京任职的继任者提供了详细材料，提到怎样很快物色日本雇员、优秀的美容师、技术熟练的司机等。然后格鲁列举了一些对美国真心实意的朋友，其中当然也包括前大使吉田茂及其爱女麻生夫人。

结束了半年多的拘留生活，1942年6月18日从横滨港登上浅

间丸轮船时，不难想象，格鲁大使等人是多么喜悦。过了一个星期，浅间丸终于出航了。在莫桑比克濒临印度洋的洛伦索·马贵斯港，浅间丸和哥里普斯霍尔摩号轮船在一起，交换了乘客。乘哥里普斯霍尔摩号从华盛顿来的驻美大使野村等日本人在这里换乘浅间丸开赴日本，格鲁大使等美国人登上哥里普斯霍尔摩号返回美国。

哥里普斯霍尔摩号轮船到达纽约是1942年8月25日。从那以后到第三年的5月1日，国务院任命远东局长格鲁作为国务卿的特别顾问专门进行巡回讲演。据海茵里库斯写的《日本外交和格鲁》记载，格鲁用一周时间到西部旅行，用两周时间到南部并且去加拿大两次。到中西部和东北部的旅行更不知有多少次。有时在65个小时内讲演达9次之多。

这位乘坐交换船、从敌国日本回国不久的美国大使，到处有人请他去作报告。他回国后一年之间作报告达250次。

格鲁对他的同胞讲的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提出警告，不要轻视作为敌国的日本。在美国人中间有不少乐观的人认为，只要打败希特勒德国，日本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海茵里库斯把格鲁的主张概括如下：

“格鲁告诉听众，真正的敌人是可怕的日本军事机关。从1931年起，他们就策划侵略和征服、轰炸并进攻美国。日本的领导人是残忍、狂妄和狡猾的。士兵富有战斗经验，坚强不屈。日本的目的是确保现代战争所必需的全部资源，以及这一范围内的军事运输线，从而在远东建立霸权。日本国民生活节俭并富有教养，他们被教育得很顺从，为了天皇和祖国，可以不惜任何牺牲。正因为这些原因，格鲁认为日本军事机关是非常可怕的。”

格鲁大力强调的另一点是，要严格区别日本军国主义者和一般国民，为战后日美合作打基础。让我们再次引用海茵里库斯的文章。

“日本人既不是‘凶恶人种’，也不是‘披着人皮的狼’。日本人显示出‘极端的人种偏见’。世界上还有不少国民受到比危害日本的妄想更残酷、更为兽性的观念的祸害。格鲁还谈到过去日本人对美国人的尊敬，对美国人的友情、礼让和诚意。现在他们被日本军事机关撒下的大网所俘虏，为了继续那种奴隶状态，被驱赶奔赴战场。当日本文官领导阶层认识到是在为战争作准备时，实际上已经中了推行侵略的奸计。日本从内部被军国主义者征服了。”

海茵里库斯继续写道：“格鲁说，战败后日本的社会变革应当从国内发起，而不能由外部强加。应当保持日本政体中一切健全的部分。虽然不能指望，从根上受伤的老树还能长出新芽，但只要树干和树根还健全，那么，着手毫不留情地把烂枝砍掉，其他的枝叶将获得新生。格鲁对日本国民伟大的新生力量坚信不疑。他曾预见，终有一天日美两国人民会在相互理解基础上重新结合。”

对于上述两个方面，为了发扬美国人民的斗志，当然应当强调前者，而随着美国优势日益明显，当然也应该强调后者。格鲁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在大力强调打倒军国主义日本的演说中，并没有模糊日本国民和军国主义的区别。

回国后不久，格鲁在8月30日发表的广播演说中，谈到他所“赞美、尊敬、爱戴的”日本朋友。在格鲁的脑海里一定是想到了和牧野伸显伯爵、吉田茂交往的情景。

1944年5月1日，格鲁就任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同年12月9日他成为新任国务卿斯退丁纽斯的副国务卿。由于斯退丁纽斯经常出席国际会议，格鲁经常需要留在华盛顿，发挥代理国务卿的作用。

在太平洋战争即将结束的重要时期，象约瑟夫·格鲁这样的知日派外交官就任左右美国外交政策的要职，对日美两国都可以说是幸运的。众所周知，由于美国国务院存在着被称之为“亲华

派”集团和“亲日派”或“知日派”集团，关于对日政策，特别是如何处理天皇、天皇制，发生了尖锐的对立。

武田清子教授所著《关于天皇观的争论——1945年前后》(1978年岩波书店)谈到亲华派是战争结束时的国务卿詹姆斯·万斯，格鲁的后任副国务卿迪恩·艾奇逊，远东地区委员会主任卡特·维塞托，格鲁之前的远东司司长斯坦莱·洪贝克，以及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沃恩·拉铁摩尔等人。

对亲日派或知日派，该书提到的人有：直到战争结束前一年担任国务卿的克德鲁·赫尔，约瑟夫·格鲁，前美国大使馆顾问尤金·德曼，格鲁以后担任远东司司长的约瑟夫·勃朗太，远东地区委员会主任乔治·波莱克斯里，以及近代日本史专家修·波顿等人。波顿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42年秋进国务院，他在制定对日政策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从上述对比看来，亲华派和知日派似乎是势均力敌，但如果考虑到美国国民的舆论，客观形势对亲华派有利而对知日派十分严峻，这是不言自明的。据武田教授著作引用的1945年6月29日《华盛顿邮报》舆论调查，美国国民对处理天皇的意见如下：

处死刑 33%； 由审判决定 17%； 终身服刑 11%； 流放 9%； 由于是军阀的工具可不予追究 4%； 作为推动日本的偶像，加以利用 3%； 其他及无回答 23%。

在这种严峻情况下，格鲁副国务卿为了明确承认天皇制的继续，战败后的日本可以作为君主立宪国存在，正在进行拼命的努力。天皇制下的议会政治是使日本安定的唯一统治形式，这是格鲁从长期驻日大使经验中形成的信念。

日本兵俘虏毫无例外地拒绝使用蔑视和侮辱天皇的语言，在塞班和其他地方关押的日本人压倒多数希望维持天皇制，从这些事实里可以找到格鲁主张的依据。但在国务院，除亲华派之外，对格鲁来说，还隐藏着以商务部长蒙盖索为首的劲敌。在格鲁被提



名为副国务卿时有人攻击说：格鲁带头主张同裕仁天皇‘搞交易’。众院议员约瑟夫·加菲把对格鲁交友关系持怀疑态度的《费城记录报》有关社论列入了会议记录。在参院无法通过格鲁的提名问题时，又重新拿到外交委员会去讨论。在外交委员会上，格鲁曾把天皇比喻为“能干的雌王蜂”，他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如果把雌王蜂从蜂群中拿掉，整个蜂巢就将崩溃。”

对格鲁在日本交友关系被人怀疑一事，也是值得注意的。每当想起吉田茂在宪兵队曾因交友关系受到审问，就会知道这两个人在各自的祖国都是遭难者。

## 十一

由于罗斯福总统1945年4月12日突然去世，美国对德、对日强硬派的代表、商务部长蒙盖索失去了影响力。杜鲁门总统摒弃了罗斯福式的个人外交，外交事务统归国务院处理。因此，1944年底成立的国务、陆军、海军三方调整委员会地位大为提高。国务院在该委员会内的发言权也加强了。

这期间，因国务卿斯退丁纽斯不在，副国务卿格鲁被任命为代理国务卿。他焦虑的有两点：其一，追赶败退的德军的苏联军队正在接二连三地解放东欧国家。海茵里库斯写的《日美外交和格鲁》对当时的格鲁有如下描绘：

“在的里雅斯特危机达到最高潮的5月19日，他一个晚上都没有睡着，到了清晨写下了自己的备忘录。其中，他写道：‘对于美国来说，苏联将成为不亚于日本、德国的严重威胁。一旦俄国在远东参战，将继续不断地进行扩张，直到把日中两国都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假如这个世界上有什么确实的事情，那就是将来会发生同苏联的战争！’格鲁认为，美国应当把它的对苏政策置于‘全面立即强硬化’的地步。”

在主张必须坚决阻止苏联共产主义无止境的扩大势力这一点

上，格鲁可以说是冷战派的鼻祖。近卫奏折清楚表明，吉田茂的“反战集团”也抱有同样观点。

其次，与此有关的是，格鲁认为如有可能，最好在苏联参战之前，给日本以投降的机会。1945年5月28日格鲁直接向杜鲁门总统提出了这一想法。内容概要如下：

“应当彻底消除日本军事机关和军国主义的战争目的，但必须把人员牺牲限于最低限度。为此应当仔细研究使日本便于采取无条件投降的措施。如果用某种方式，告诉日本人，当日本完全打败、并丧失今后作战能力时，可允许日本人自己决定它的政治形态，这样也就给了他们保全面子的办法，否则要他们投降的希望是不大的。”

总统原则上赞成格鲁的建议，并指示和陆海军部长以及两军参谋长谈一谈。陆军部长斯蒂文森和海军部长福勒斯塔尔也都赞成，但马歇尔总参谋长以“军事上的理由”要求延长两三个月的时间，因此，格鲁的方案没能实现。格鲁6月15日、16日、18日一再向总统建议，杜鲁门总统倾向于延期到波茨坦会议时付诸实施。

从赞同格鲁对日呼吁方案这一点可以看出，陆军部长斯蒂文森一方面敦促加速研制原子弹，准备在日本本土登陆的作战方案，另一方面也在考虑用政治手段向日本提供投降的机会。这一考虑得到海军部长福勒斯塔尔的支持。在部长中最有实力和发言权的斯蒂文森陆军部长下决心支持格鲁的对日政策，其意义非同小可。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以联合宣言方式发表的“波茨坦公告”第十二条说：“一俟达到上述诸目的，根据日本国国民的自由意志，有和平倾向和权威的政府建立起来，盟军占领部队即应从日本国撤走。”陆军部长斯蒂文森向总统提出的草案里，本来在这段后面还有一句重要的话：“当这样的政府决心推行使日本将来不

可能发展侵略性军国主义的和平政策并以此得到爱好和平各国的相信时，可以实行现皇统治下的君主立宪制”，据说由于取代斯退丁纽斯于7月3日就任国务卿的亲华派詹姆士·万斯的强烈反对，删掉了这句话。可以想象，如果“波茨坦公告”能按原来方案通过，将大大提高我国和平派的勇气，接受“波茨坦公告”也将会更为顺利。

不过，即使“波茨坦公告”删掉了最后一句重要的话，但如果用心细读，也可以充分理解它并未排除天皇制继续存在的可能性。第十条“日本国必须消除阻止日本国国民增强恢复民主主义倾向之所有障碍”，可以说就是承认军国主义化以前的日本俨然存在民主主义倾向，就是承认天皇制和民主主义并存的证据。

在“波茨坦公告”被拒绝的情况下，杜鲁门总统下决心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美国的原子弹7月16日刚刚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试验成功。当铃木贯太郎表示无视“波茨坦公告”、要继续战争之时，使用原子弹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8月6日，广岛被第一颗原子弹炸毁。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8月10日，我国终于以御前会议上由天皇圣断的方式接受了“波茨坦公告”。但是，日本的接受，附加了“在不包括要求变更天皇国家统治大权得到谅解的前提下”这样的条件。对此，盟军方面8月11日答复：“投降之时天皇和日本国政府的国家统治权限置于盟军最高司令官控制下，盟军最高司令官采取为实施投降条款被认为必要之措施。日本国的最终政治形态，根据‘波茨坦公告’，由日本国国民的自由意志决定。”

根据上述答复，日本国体是否得以维持，对此我国的抗战派与主和派之间再次发生尖锐对立。结果在8月14日御前会议上，天皇发出第二次指示：“据说对国体问题有种种疑义。从上述答复文意来理解，对方颇具好意。但对方的态度有些令人不安，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不愿猜疑，我认为这主要是我国全体国民的信念，

觉悟的问题，所以我以为可以接受对方的要求，并愿大家也这样考虑。”

从天皇的讲话中可以看出，对格鲁副国务卿是十分信任的。格鲁副国务卿继续进行不懈的努力，说服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国务卿万斯。他甚至把写有自己看法的文件塞进前往机场出席波茨坦会议的万斯国务卿的口袋里。格鲁的坚定不移的信念是，“波茨坦公告”已经明确了天皇制的存在，不使用原子弹也可以使日本投降。广岛和长崎几十万人因此而丧生的确是很遗憾的，但是以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形式使日本实行战略性投降，应归功于日美两国的理智良识。所以，吉田茂和约瑟夫·格鲁的友谊与信任所起的作用值得高度评价。

日本方面在接受“波茨坦公告”时，起主要作用的除天皇外就是外相东乡、首相铃木和海军大臣米内。但在促使天皇作出两次“圣断”方面，吉田茂等人的“反战集团”的功绩是很大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吉田集团和格鲁远隔太平洋，在日本国体观上持有一致的看法。在警惕共产主义扩大势力方面，吉田和格鲁的意见也完全一致。

## 十二

约瑟夫·格鲁看到日本已经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便决心辞职，因为他认为自己的任务业已完成。著名的新闻记者德鲁·彼阿森著文称他为“裕仁派的急先锋”，在《民族》等自由派杂志把他叫做反动的绥靖论者的情况下，担任副国务卿职位是非常困难的。格鲁的辞职书于1945年8月15日提出，第二天总统致函慰劳，接受了他的辞呈，时年格鲁65岁。顺便提一下，吉田茂此时也将近67岁了。

同年8月15日，铃木贯太郎内阁宣布总辞职，两天之后，以东久迩宫为首相的新内阁宣告成立。吉田茂是当时最有希望担任外

务大臣的候选人，可是由于内务大臣木户的反对，最后由重光葵就任外相职务。不当外相，反而是吉田茂的运气。东久迩宫内阁是以处理陆海军复员和接受占领军为主要任务的过渡性内阁。如果吉田茂8月17日当了外相，在9月2日美国密苏里号军舰签署投降书仪式上，将不得不代表日本政府扮演一个屈辱性角色。处理所谓“大东亚战争”这样一场极为轻率的战争的善后事宜并不是他的任务。在战争中担任外务大臣等重要职务的重光葵是再合适不过了。

当时还不是吉田茂出场的时候。对于那时的情况，他在《十年回忆》第四卷写了不少有趣的轶事，那篇题为“不觉酒醉坐过站”的小插曲，充分显示了吉田茂的潇洒。

“事情发生在东久迩宫内阁成立后不久。有一天，国务大臣近卫公爵同我联系说有个什么问题要我去征询牧野伸显伯爵的意见。于是，我到当时隐居在千叶县我孙子地方的牧野老先生的住处去了一趟。回到永田町首相官邸作了汇报。本来准备办完事情就赶回大矶，不料碰上了东久迩宫内阁国务大臣小畑敏四郎（前陆军中将），近卫就说：‘多日不见，一起去喝两盅吧！’感情难却，于是我们一起向荻洼街尽头的近卫临时住宅荻外庄走去。

“公爵夫人也进来畅谈，话题自然转到战争时期天南海北的种种情况，兴致勃勃，无尽无休。又被夫人亲手做的可口饭菜和公爵珍藏的香槟酒所俘虏，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溜走了。想要回家时，一站起来只觉得头晕目眩，哪里知道已经酩酊大醉，步履蹒跚，身不由主了。虽然夫人一再挽留、安排住宿，可是大矶家里有事，还是决定回去。公爵也担心路上出问题，打发家里寄宿的一名文书开车送我到新桥火车站。在汽车上因为醉得不省人事，究竟怎么上的火车，我已根本记不起来了。

“过了几个小时，睁开眼睛一看，觉得有些奇怪，尽管在夜里也看得很清楚，右边是山、左边是海，大矶哪有这样的地方

呀？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一会儿，火车停了，下车一看才知道已经坐过站到热海了。想马上再坐车返回去，最后一趟列车已开走，无奈只好在车站候车室里过了一夜。”

那天晚上酩酊大醉的情景充分体现了从军国主义桎梏下挣脱出来的解放感。因为近卫文磨和小畑敏四郎都是战争期间和吉田志同道合的人，同样有很深的解放感。还有“香槟变鞋子”的一段，那是接着发生的事。

“我后来发觉，那天晚上自己虽然醉了，但还象宝贝似的抱着那瓶近卫送给我的香槟酒。看起来对于喜欢喝酒的人酒瓶再重些也不以为苦的。早上醒来看到很多人正在排队，我知道不去站队就买不上票，就赶忙站到队伍里，可是，运气不佳，正好轮到我前面两三个人时，挂出了‘票已售完’的牌子，真是令人生气。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到下一趟列车还得足足等两个小时。肚子饿得直叫，可在当时车站附近没有一处饭馆和卖早点的铺子。我前思后想附近有没有熟人，终于想起了我当驻英大使时在伦敦就学的蜂须贺。对他倒无须讲客套，随便怎么都行，于是提着香槟酒就到蜂须贺家去了。找到以后开门见山提出让招待一顿早餐并一鼓脑儿把头天晚上的经过也都讲了。吃过饭之后，蜂须贺说：‘送你点好东西！’说着拿出一双新鞋，据说是英国的新产品。我收下鞋子，感谢之余，作为还礼，就把近卫送的香槟酒放在那里。后来见到近卫时，他问：‘那天晚上回去没出什么事吗？’我就一一如实讲了。公爵笑着说：‘当时真是喝了不少，酒逢知己嘛！’看起来也是喝多了一点儿。但是我没有讲香槟化为新鞋的事。”

吉田茂并没有仅仅沉醉于“解放感”之中。对于如何重建因自我毁灭的战争完全失败而成为一片焦土的日本，他一直不断地在思虑着，计划着。这里可以引用几封足资证明这一事实的意味深长的信件。信是用蘸水钢笔写在明信片上、寄给开战之前被特别派往华盛顿的来栖大使的。吉田将这些信寄给原田熊雄时，附言

写道：“另外一些明信片是想写给来栖君的。寄上也供老兄过目消遣，来栖处另书。”

这些信的一部分由原田熊雄的女婿胜田龙夫在1975年11月19日《日本经济新闻》文化版上，以“吉田茂的信件——论述战后昭和史出发点的重要资料”为题作过介绍。

8月27日致来栖前大使的风景明信片共五张，正、反两面都写满了字，内容如下：

“敬复。注定要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假如魔鬼有儿子，那一定是东条（此句原为英文——译者）。迄今我一直以为，我国的败仗也是古今内外不曾有过的大好事。重建皇国的气势自然尽寓于此。切除军阀操纵政治之毒瘤，肃清政界，发扬国民道义，刷新外交，振兴科学，引进美资而重建财界，终将导致进一步发扬帝国精华。如是，败仗就未必是坏事。雨后天地更佳。总之，事态如能顺利发展，我们由衷地感激圣上英明决断而一举结束战争，正可谓皇天尚未弃我也！”

让我们暂时中断引用。用英文写的“假如魔鬼有儿子，那一定是东条”的话充分表达了吉田茂对东条英机的憎恨。如今回顾来看，魔鬼的儿子显然并非东条一人。和吉田茂很亲近的近卫公爵也负有重大责任。真崎大将、小畑中将等皇道派的手也不干净。但在战争刚刚结束之时，吉田茂把东条大将作为军阀头目加以抨击，是理所当然的。

值得注意的是，吉田指出，只有根除“军阀、操纵政治之毒瘤”，才能开拓皇国极为光明的前途。赞美日本的败仗是“古今内外不曾有过的大好事”，这可以说显示了吉田茂非凡的见解。吉田还断定，振兴科学，引进美资，可使战败成为重建日本国的绝好机会，这说出了吉田茂治理日本的手段。在盟军先遣部队到达厚木机场的前一天，他已清楚地说明他作为战败国日本宰相指导我国的基本方针。

吉田茂既然衷心称颂圣上结束战争的英明决断，自然要通过战争时期的和平运动竭力为这一决断的下达创造条件。看来，吉田为能够参加这一工作感到无限欣慰。

下面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继续引用信上的话：

“关于‘扯谎的老兄’的世界名声一事，如果真相大白，自然会云消雾散，不必过虑。如果了解美国人气质的话，就不必发无谓的牢骚。我等惟应为日美和解效力而已。至于我，上山出家以白云为伴亦可，下山周游，闲话叙旧亦可。寒舍被焚后，住房虽狭窄一些，但还有提供下榻的余力，不知能否来此一游？此地之原田老先生害怕烧夷弹的威胁，搬出高轮山窟，隐居松田，甚为寂寞。恰好我让迁居疏散到那里的‘山口’老板娘前去探望。两位老人意气相投，谈到深夜。”

所谓“扯谎的老兄”是指来栖大使在华盛顿同赫尔国务卿谈判中发生奇袭珍珠港事件。当然，所谓“攻其不备”的阴谋是和来栖大使没有任何牵连的。信中下面所写的流露出了吉田茂的人情味。

“俗语称因果相报，从前使我受折磨的宪兵们害怕承担‘波茨坦公告’所说的战争责任和虐待美国俘虏的责任而心怀鬼胎，正在到处逃避躲藏，丑态百出。他们的头目东条目前正潜伏在青梅的古寺中。在我被释放当时，内心里就暗暗地诅咒：‘走着瞧吧！你们也会有一天活该倒霉，’现在正应了我那句‘活该’的话，所以心里真是痛快。这般滋味对于象老兄那样没有进过监狱、在社会上悠哉悠哉的人是体会不到的。奉劝你一定体验一次！哈哈。”

“活该倒霉”，说得多么直率啊！

“鸠山公也不简单。过去和我一样儿经厄运，隐居在浅间山。现在时机成熟，即回到社会上。如能按美国所要求的民主那样去干，则正是先生春风得意的岁月。如今在东京，他的部下见到浦贺湾登陆的美国舰队就象本乡的选民乘船来到一样欢腾庆幸，与先生共享无限喜悦。与之相比，只有我这个官吏出身的人依然冷



冷清清，形影相吊。起居虽无须挂牵、关照，但与往常一样，甚为寂寞。”

吉田茂指出了8月22日从轻井泽到东京的鸠山一郎及其家人、部下喜悦心情。

“我经常拜读从你那里借来的杜维廉著的《英国历史》，我国的现状与独立战争当时的英国十分相似。英国那时失去了13个州的殖民地，与欧洲大陆以法国为首的国家相敌对，孤立无援，民怨沸腾。但这期间也蕴藏复兴之机。拿破仑战争前后，老皮特和小皮特、皮尔、卡斯尔雷、坎宁、帕麦斯顿、迪斯累里等一代著名外相辈出，终于在重建19世纪英国的历史上留下了业绩。重读这部书，确实感慨无量。来栖和吉田也以上述诸名流为楷模，在既挽狂澜之后复出，创一番事业如何？海和山是不同的，为乐观情绪所支配，不知不觉已损失了数页美术明信片。为索还赔偿，静待尊书早至。代向老夫人请安！”

吉田茂从杜维廉的书中重温了皮特父子、皮尔、卡斯尔雷、坎宁、帕麦斯顿、迪斯累里等人和英国的优秀外交政治家们在美国独立后的困境中重建英国的历史，并谈到了自己准备充当建设新日本领导人的抱负。在被打败和被抛弃、看起来已经根本无法东山再起的日本，竟有如此坚定、自信的人物，实在是令人惊叹不已。

## 第二章 外务大臣

### 一

罗伯特·沃德教授在他的论文中指出，从1945年8月15日天皇发布结束战争诏书起，到9月2日举行投降文件签字仪式，一共有19天时间，日本政府根本没有准备利用这一段过渡期间。辻清明教授也有同样看法，他在《战后改革与政治过程》的论文中引用了沃德教授的说法：

“日本政府根本没有有组织地和有效地利用这19天的过渡期间。他们注意的是当前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而对占领所要求的各项问题，似乎忘记考虑所必须采取的态度和策略。不仅如此，对事前应了解占领可能带来的情况和政策问题，也毫不关心。令人觉得奇怪，但这恰恰表现出日本政治中的独特风格。不过，从我们关心的角度来看，重要的事实是，日本政府没有作出任何设想，好象采取了‘完全由对方摆布的姿态’，等待占领期间的到来，让形势自然发展。如果说有唯一的官方立场，那就仅仅是维护天皇制。政府没有任何对策，更不要说考虑什么反占领的高度谋略了。领导体制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随时都可以接受占领，并且执行命令。”

如果日本政府是一个能够有组织地和有效地利用这19天的机构，按理也不致于把日本拖向几乎同全世界为敌的绝望性战争。

象吉田茂那样考虑以“振兴科学，引进美资”来重建日本的日本人是例外中的例外。政府也好，国民也好，都处于茫然若失的状态。东久迩官内阁正竭力说服庞大的陆军和海军投降，再无精

力考虑其他。大部分群众忙于糊口度日。十分活跃的仅仅是那些贪婪的人，他们聚集在一起，等待军需物资的临时发放。

投降书签字后那一天下午四时，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元帅的副总参谋长马歇尔少将把铃木九万公使叫到了横滨总司令部，通知他说：“日本方面希望盟军不要进驻东京，但是我们不能接受这一要求，总司令部决定，几天内迁往东京。今晚你将收到有关进驻的要求事项表。”日本政府曾考虑设法阻止占领军司令部进驻东京和发行军用券。接着，铃木公使从马歇尔少将口中得知，已经把价值三亿日元的B类军用券发给了各部队。马歇尔少将说：“明天10时预定把这一份布告和其他两份布告以及有关文件交给你，现在先非正式地把三份布告的文本给你看，请事先办好手续，迅速公布这些布告”。

这三份布告都是麦克阿瑟元帅9月2日签署的。日文文本在秦郁彦博士执笔的《美国对日占领政策》(昭和财政史——《从战争结束到媾和》第三卷，1976年东洋经济新报社出版)一书中从130页开始登了整整4页。

第一个布告《告日本国民书》，采取不经过日本政府、直接向国民发出呼吁的形式，宣布盟军最高司令官对日本国的全部领土和居民实施军事管制。日本政府的行政、立法、司法的一切职能，今后一律在最高司令官职权下行使。在军事管制期间，以英语为正式语言。

第二个布告宣布，为维护盟军最高司令官麾下之全军安全和占领区内秩序安宁，在最高司令官权限下发出布告命令，违反训令、妨碍治安和抵抗者将在占领军法庭受到惩罚。

第三个布告比其他两份更使政府首脑震惊。据这份布告规定，B类军用券是与日本银行券等价的法定流通货币。曾经天真地希望“暂缓进驻东京”、“不要发行军用券”的东久迩宫内阁，对于情况的严重性感到异常惊讶。特别不利的是，第一个布告明确

记载着“由于日本帝国政府向盟军无条件投降，美日之间，日军与盟军之间长期的武力斗争已经结束。”

的确，1943年11月27日开罗宣言曾经使用了日本国无条件投降的表达方式，但“波茨坦公告”第十三条写道，“我等要求日本国政府立即宣布日本国军队无条件投降，将根据该政府的诚意，提供适当的和充分的保障。日本国其他选择，只能是迅速而彻底的毁灭。”这就是说，被要求无条件投降的是军队而不是国家。但第一个布告却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日本国政府的无条件投降。

铃木九万公使对马歇尔强调，日本与中央政府已经垮台的德国不同，对日本国民的命令应通过日本政府发布。他说：“盟军的进驻和占领没有发生任何流血不幸事件，进展顺利，这说明国民遵从天皇大诏，结束战争，诚实地履行投降书的条款，与盟军合作，所以，此时我认为，只有尽量尊重天皇和政府的立场才是明智之举。”铃木公使的论述看来很有说服力。

东久迩宫内阁立即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决定派遣停战中央联络事务局长官冈崎胜男深夜赶往横滨。冈崎本人回忆说：“1945年9月2日天亮之前，我们即出发，先参加停在横滨海面的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的投降书签字仪式。签字顺利完成，总算喘了一口气，放下心来，返回东京已是下午3时左右了，但刚过6时，从横滨联络事务局又来人说有紧急要事找我，说是盟军当局决定第二天早晨向全国各地发布‘告日本国民书’，他们送来了布告的抄件。

“我一看，这份布告有3个，第一，把天皇置于盟军最高司令官的指挥之下；第二，今后禁止使用日本纸币，国民一律使用美军军用券；第三，关闭日本法院，由美军军事法庭行使一切裁判权。我当时挂着停战中央联络事务局长官的头衔，所以，首先了解这一情况。我认为，情况非同小可，赶紧向重光外相报告。当晚召开了临时内阁会议，好象是以东久迩宫首相为中心商讨了种种对策。到了晚上将近10时的时候，把我叫到首相官邸，以东久

迹宫首相为首，近卫、重光等其他大臣也都在场。绪方书记官长说：‘如果发出这样的布告，那么，政府一天也干不下去，你再辛苦一趟，到横滨去交涉一下，不要发这样的布告。’但时间已过10时，这么晚恐怕很难找到负责人了。何况我认为要使已经印好、准备颁发的布告作废是根本不可能的。我极力推辞说：‘自己不能胜任，请外务大臣前往’，但外相不答应，不幸我的职务是停战联络局长官，只得勉强接受这一难办的差事。

“事出无奈，乘汽车到了横滨。抵达时已过深夜，司令部只剩下值班的了。从那里我又跑到总参谋长住的大饭店。这里重兵把守，通过几步一岗的哨所，十分不容易。有时还要装作美籍日本人。费尽周折，终于设法进到里面，在传达室打听到了参谋长的房间。上了楼梯，走近要去的房间一看，因为是夏天，门半开着，再往里看，面前是会客厅，里面是卧室。在月光下可以看到白色蚊帐中有一个人睡觉。于是我鼓起勇气走到里边，打开电灯，叫醒了蚊帐里的人。那人睡得昏沉沉的，慢吞吞地起来跟到会客厅，开口讲起话来。我仔细一看完全不象总参谋长。开始他大发雷霆，我也无话可说，只好道歉，一五一十地说明情况。他一听是美国人的事，就消了气说：‘这事情不好办，我来帮你找吧！’忘记了刚才的发怒，开始往别处打起电话来。结果，我没有见到总参谋长，但找到了副总参谋长马歇尔少将。不久，睡意朦胧的马歇尔少将出现在面前，我到了会客室，利用这一生难得的机会，极力诉说日本政府的苦衷。对方对我的话是否感兴趣也很难说，不过恐怕总会意识到半夜三更前来的热心和情况的严重性。他最后说：‘好吧，尽我的可能去争取。先取消明天发布布告。不过麦克阿瑟元帅和总参谋长意见如何，我就知道了，因此，究竟怎样，我不能保证。’可是，他马上叫来报务员，让给日本各地部队发出改变预定的广播命令。就这样，总算防止了一清早就发那几份布告的事态，我基本上完成了任务，迎着夏日的夜光，赶

回东京。

“到东京后又叫醒重光外相，说明事情经过，重光为此也很高兴。只做到这一步还不能放心，于是我们两人马上到横滨去找麦克阿瑟元帅，仓促地吃了点早饭就又坐车出发了。如果事先提出约见要求，也可能遭到拒绝，因此直接到了司令部，等麦克阿瑟元帅来上班时要求会见。这一天麦克阿瑟元帅对待我们还不错，马上把重光领到房间，听我们讲了情况。日本政府的大臣见麦克阿瑟元帅，这是第一次。结果，他也同意取消这三个布告。

“这一情况当时没有公开。如果我们在日本使用美军军用券、由美国军事法庭进行审判，那会是一种什么局面啊！想起来真是不寒而栗。我在头一天出席密苏里军舰上的签字仪式就一夜没有睡觉，今天又害得我没合眼，实在是困得难以支撑了。”

## 二

冈崎长官的回忆，尽管对三个布告的内容有记错的地方，但它说明了当事者悲壮努力的情景，充满魄力。

重光外相的《昭和之动乱》只字未提冈崎长官的活动。但其中写道：“经过一个晚上的思索，第二天(9月3日)早晨去横滨，在盟军总司令部会见了麦克阿瑟总司令官、萨塞兰登参谋长，详细陈述了有关日本签署投降书的决心和准备，要求取消盟军推行军政的计划”。重光外务大臣对麦克阿瑟元帅谈话的宗旨是和铃木九万公使、冈崎长官的说法一致的。因为《昭和之动乱》的主要内容最明确不过地表现了日本的立场，让我们在这里引用一下：

“考虑到结束战争是国民的意志，是天皇直接作出的决断，忠实履行‘波茨坦公告’的内容是天皇的决心，为直接实现这一决心，完成树立皇族内阁的一切准备工作，是履行‘波茨坦公告’最忠实的方法。‘波茨坦公告’明确宣布，以日本政府存在为前提，并未预定要以取代日本政府的方式直接颁发军政令。日本和德国的

情况是不同的。盟军如果期望履行‘波茨坦公告’，并以此为满足，那么可以认为，由日本政府实行占领政策是最明智的。与此相反，由占领军推行军政，直接担负施政责任，那是超出了‘波茨坦公告’的要求的，不仅和日本方面预期的愿望相违，而且可能造成解除日本政府忠实履行占领政策的责任、引起混乱的结果。如是，责任不在日本方面。日本政府已根据一般指令第一号，采取措施着手解散军队、全面解除武装，并下令停止一切和军需有关的工厂进行生产。”

由于铃木公使、冈崎长官和重光外相的努力，停止了盟军推行军政和类似军政的直接管理，这对日美两国都是有利的。假如坚持“超出‘波茨坦公告’的要求”，日本政府被解除了忠实履行占领政策的责任，可能造成混乱，对此重光外相认为，日方不负责任等理论是以江藤淳教授所指出的“350万尚未复员的日军无声的压力”为背景的。所以，说服了麦克阿瑟元帅。但是有人认为，“这无非是用武力为后盾进行的威吓。”这种说法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到这个地步为止，工作还顺利。可是日本报界报道重光外相不屈不挠斗争情况之后，盟军总司令部的态度强硬起来。以泄露同麦克阿瑟元帅会谈内容为理由，对重光外相施加种种压力。麦克阿瑟元帅9月6日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出有关盟军最高司令官的权限通报说：“天皇和日本政府的权限置于麦克阿瑟元帅支配之下。盟军和日本的关系并非建筑在合同基础上，日本是向盟军无条件投降的。”对“波茨坦公告”作了可以说是歪曲的夸张解释。

进而，重光外相在停战中央联络事务局的改组问题上，在内阁也曾处于很孤立的地位。他始终坚持，外交应由外务省外事局负责，保持“外交一元化”，而其他大臣却认为应由直接隶属于首相的高级机关负责，两者之间存在着严重对立。

9月11日，占领军把宪兵派往东条英机住处，把自杀未遂的东条收容到横滨医院，第二天又抓了海军大将岛田繁太郎，因此重

光前往横滨总司令部，指出这些行为违反了“一切占领政策都将通过日本政府实行”的保证，应由日方逮捕，然后引渡给盟军。13日，盟军总部将32名包括现任大臣绪方竹虎在内的战犯嫌疑名单交给了日方。

在这种严重形势下，重光外相对于东久迩宫内阁依然故我，似乎仍企图恢复平时日本政治的状况，感到十分焦虑不安。让我们看看他在《昭和之动乱》一书中是怎样说的吧：“占领军想完全改造日本，对于履行‘波茨坦公告’的基本想法与我们不同。他们将提出何种要求，大体上可以预料到。当前既然已经提出要求引渡作为战犯的内阁中枢的主要大臣，即使临时撤回这一要求，也是对内阁不信任的表示，等于取消了内阁履行投降条款的资格。本来，皇族内阁就是为顺利结束战争而建立的，这一工作已经结束，而且忠实履行‘波茨坦公告’的方针业已决定，可以认为本届内阁的任务已经完成。面对这一新的情况必须清除旧时代的人物，物色能和占领军密切合作的新人重新组阁。”

在这一认识基础上，重光外相事实上提出了内阁总辞职的建议，东久迩宫首相要求外相辞职。9月17日公布了重光外相的辞呈。绪方书记官长认为，只有吉田茂继任最合适。这一意见被采纳。同一天，吉田茂被任命为外务大臣，“二·二六事件”刚刚结束时，曾被推荐预定出任外相，由于陆军横加干预，未能实现。从那时到今天已经过了9年半。

### 三

看一看9月17日《木户幸一日记》，便可以了解重光外相的建议未被采纳的情况。

“下午1时，东久迩宫首相来室，谈到重光外相建议，根据美国国内气氛，内阁除殿下外，应全部辞职，另由年轻人担任各部部局一级职务，就此征询我的意见，并说同近卫、绪方竹虎也



都谈过，近卫主张全部从众议院议员中物色人选，而绪方反对。从目前议员的构成情况来看，绪方的意见是正确的。虽未考虑成熟，但想先让重光辞去外相职务，选择能和麦克阿瑟元帅打交道的人担任外相，然后参酌麦帅的意向（涉及战犯问题），进行第二阶段的改造。首相问我意见如何？我表示完全赞成，并希望今后不要徒劳地倾向于唯心论，而应该现实地处理问题。

“2时45分，首相东久迩宫再次前来，谈到外相后继人吉田茂事。”

绪方书记官长极力推举吉田担任外相，吉田茂是如何考虑的呢？让我们看看《十年回忆》的记载：

“9月17日，美军进驻后不久，我住在大矶，殿下内阁的书记官长绪方竹虎打电话给我说：‘殿下有急事召见，请马上带礼服来京！’当时我以为可能是关于盟军总部方面的事务，便登上来接我的汽车，下午6时左右驰往东京。到首相官邸时，会见绪方，他说重光外务大臣已因事辞职，要我继任。我因为隐居已久，不了解情况，并且认为此时此职应由国内外有名望的人担任，遂提名当时健在的池田成彬和币原喜重郎二人，向绪方推荐。绪方却支支吾吾，不采纳我的意见。据说殿下也正在焦急地等待着，遂前往麻布市兵卫町住友别墅的东久迩宫临时公馆，谒见了殿下。

“殿下带戚容，说道：‘请你多帮忙！’我重复了对绪方说过的话，推荐了池田和币原二人，但是没能象对绪方那样推辞，结果我接受了这个重托。当时虽已深夜，竟在当夜举行了任命就职仪式。

“记得当时还有这样一段插话：因为事出突然，我临行时竟然忘记携带穿礼服时需用的黑皮鞋，绪方问道：‘皮鞋怎么没带来？’我答道：‘你没告诉我连皮鞋都带来呀！’说罢，我们相对一笑。没有办法，我只得借了一双皮鞋，出席了任命就职仪式。不过鞋子太大，穿起来不合脚，弄得步履维艰，而且蹒跚作响。在陛下的面前更是小心翼翼、煞费苦心，当时的窘态至今难忘。就这样，

我开始了迈向参与政治的第一步。”

黑皮鞋是从内阁官房总务课长佐藤朝生那儿借用的。究竟是忘记带黑皮鞋，还是因为东京住处遭轰炸被烧掉才没有带，已经无从知晓。不管怎样，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吉田茂是一个很幽默的人。吉田茂是很讲究穿著的。在伦敦大使官邸，和家人一起吃晚餐时，也要穿上礼服。这次不得不穿上别人的啪嗒啪嗒响的皮鞋，一副狼狈相令人同情。

第二年5月22日，第一届吉田内阁组成后，吉田茂仍兼任外务大臣。除片山、芦田两届内阁时代下野的17个月之外，吉田茂在第二次吉田内阁、第三次吉田内阁都兼任外相。任命冈崎胜男为专职外相是在1952年4月30日，即旧金山对日和约生效两天之后。虽然在占领之下，不存在通常意义的外交，但是，和盟军总部的交涉任务很重，也很棘手。正因为如此，占领之下的外务大臣职务尤其重要。吉田茂就任外相以后，首先感到需要的是官邸。从吉田当外交巡回大使时就在他身边工作的秘书官北泽直吉为此事四处奔走。最后决定借用麻布市兵卫町被烧毁的原田积善会馆楼房作为外相官邸。从那时起直到后来搬往白金迎宾馆，吉田茂一直住在这里。北泽秘书官在后面所说的巴莫事件发生、被投进巢鸭监狱以前，也一直在这里和吉田生活在一起。

紧接着吉田茂就对外务省进行大整顿。他认为对于亲军阀、亲德国的革新派充斥在核心阶层猖獗一时的外务省必须加以整顿，使其正常化。为使气氛一新，吉田茂指示北泽秘书官要外务次官松本俊一、政务局长安藤义良、调查局长杉原荒太、停战中央联络事务局长官冈崎胜男等人辞职。

9月22日，吉田茂任外务大臣之后第五天，盟军总部发表了“日本投降后美国的初期对日方针”。最重要的是第二部分“盟国的权限”，明确了间接统治的原则。其中写道，“鉴于当前日本社会的性质和美国想以最小兵力和资源达到目的的要求，最高司令官在

促使美国目的得以圆满完成前提下，将通过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政府机构和各机关行使权限”。最重要的是紧接着的下述但书：“但上述方针在天皇及其他日本国当权者不能满足最高司令官实施投降条款的要求时，最高司令官将要求改组政府机构和变动人事，或以直接行动之权限、义务加以限制。”

“第三部分 政治”包括下述三项内容，即：(1)解除武装和实现非军事化；(2)战犯；(3)鼓励追求个人自由和实现民主的进程。“第四部分 经济”包括9条：1、经济上的非军事化；2、支持民主势力；3、恢复和平的经济活动；4、赔偿与偿还；5、财政、货币和银行政策；6、国际贸易和金融关系；7、日本在国外的资产；8、对日本国内的外国企业机会均等；9、皇室的财产。

“对日方针”发表5天以后，天皇到美国大使馆访问了麦克阿瑟元帅。这段时间的情景，可以先听听吉田茂的说法：“我天皇陛下首次访问麦克阿瑟元帅，是在占领后不久的9月27日。当时我刚就任东久迩宫内阁的外务大臣，接到陛下想见麦帅的密旨以后，经过深思熟虑，认为还是会见为宜，遂向麦帅转达此意。麦帅也极力赞成，并且说：‘不过我不能到宫里去访问，如果陛下能来，无论什么时候，我都欢迎。’在这第一次会见以后，我见到麦帅时，他对于同陛下的会见表示非常高兴，并说：‘我从未见过象陛下那样坦率纯真而又善良的人。陛下的品格实在高尚。’后来陛下又访问过几次麦帅，还和麦帅建立了亲密的感情，能够畅所欲言了。据说身材高大的麦帅在美国大使馆门前，如同拥抱似地迎送了陛下。”

实际上，从占领初期起，盟军总部的参谋们为了显示麦帅的权威就曾建议，把天皇召到总部来。麦帅否定了他们的建议说：“这样会伤害国民的感情，在国民眼里造成把天皇贬为殉教者的形象。不，我将等一等。过些时候天皇会自发地来见我的。就目前情况而言，东方的坚强忍耐，较之西方的急于求成，更符合我

们的目的。”

在访问实现之时，麦克阿瑟说：“我感到有些不安，担心天皇是否会开始诉说自己不应作为战犯受到起诉的立场。”但他很快就知道这种不安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天皇作了下述发言：“我对国民进行战争时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所作的一切决定和行动，负完全责任。我就是以这样的身分，为了听任贵方所代表的各国对我的裁决，而来拜访的。”麦克阿瑟元帅听了天皇的话似乎很受感动。后来曾写道：“天皇决心承担有被处死的危险的責任，使我深受感动。按照我所了解的种种事实，这一责任显然不应由天皇来承担。这种充满勇气的态度，确实感人肺腑。在那一瞬间，我深深感到，坐在我面前的天皇，作为个人来说，也是日本最高尚的绅士。”

穿着翻领军装的麦克阿瑟元帅和穿礼服的天皇在一起的照片使日本国民感到惊讶。但是天皇和麦帅的会见取得的巨大成功，对此后日美两国命运是莫大的幸福。

特别有幸的是，新外务大臣吉田和麦帅之间的关系很密切。据吉田的女儿麻生和子所写的回忆录《关于父亲》，他们的关系是相当好的。“那是最初会见麦克阿瑟的时候。父亲回到官邸笑着问我：‘你见过狮子笑吗？’麦克阿瑟和父亲会谈时经常在盟军总部的房间里大步走来走去。有一天，他们争论得很激烈，麦帅又开始在房间迈着大步走来走去，父亲见到这一情景想起动物园中关在笼子里的狮子就笑了起来。这一笑激怒了麦克阿瑟，严厉指问：‘笑什么？’父亲一想，这下子可坏了，但是大胆如实回答说：‘我感到象是在狮子笼里听教诲，忍不住就笑了。’麦克阿瑟第一次见到如此不逊的日本人，目瞪口呆地紧盯着父亲，终于他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可以说，从这时以后父亲和麦克阿瑟结下了友谊。父亲这种不加粉饰的诙谐和机智为许多人所喜爱，并且度过了不少次危机。上边说的就是一个例子。”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日本所以能够度过后来的大风大浪时代，很重要的因素有两个，这就是麦克阿瑟元帅对天皇的尊敬和对吉田茂的信赖。

#### 四

狂涛和怒浪是从1945年10月4日盟军总部发表的要求对政治、公民、宗教自由解除限制的备忘录开始的。这份备忘录要求废除一切压制的法令，其中包括压制对天皇的自由议论，废除治安维持法等镇压法令，释放政治犯，要求解散思想警察等镇压机构，罢免内务大臣、警保局长、警察总监、“特高”警察首脑。

天皇和麦帅并列的照片9月29日在报纸上登出后，内务大臣山崎严以有伤天皇尊严为理由禁止出售。从此盟军总部下令全面废除对言论自由的压制。哲学家三木清9月26日死在监狱一事也使盟军总部态度更加强硬。

仅仅由山崎内务大臣辞职并不能解决问题，于是东久迩宫内阁宣布总辞职。请看10月5日的《木户幸一日记》，

“1时45分，接到与首相一起进宫的指示，中途离开会议室，立即出发。首相谈到按照昨晚麦总部交待的去进行，实无法完成任务，因此提出辞呈。拜谒天皇后又到皇族休息所参见，并就后继内阁等事进行商量。

“2时10分至2时半，到御文库谒见天皇，见到首相辞呈后，接受选定后继内阁首相之命。

“3时，近卫来室，就政府内部形势和今后趋势等进行恳谈。

“3时45分，据平沼枢密相、藤田侍从长传达的圣旨前往谒见天皇，进入参殿者休息厅，当即就后继首相等事进行全面磋商。这时，大家一致认为，应按下列条件推选：不是美国方面有反感的人；对战争责任没有嫌疑的；通晓外交者。第一候选人是币原男爵，第二候选人是吉田外相，获得一致同意。”

5时20分到50分，到御文库拜谒天皇，禀奏上述决定，天皇同意。

这里可以不必进一步引用了。吉田茂早在这一时期，就被推举为后继首相的第二候补，这是很值得注目的。假如第一候补币原男爵坚持不干，吉田茂也许早就受命担任首相了。正如他本人也承认的，吉田从来就是专心致力于外交的人，对内政也很关心，不乏素养。为了使吉田茂担任首相更够格，需要相当的见习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到第二年5月下旬，给了他7个多月的缓冲期间，应当说对国家、对吉田本人都是非常有益的。

后继首相一事，首先必须取得盟军总部的事先谅解，吉田外相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

“关于取得麦克阿瑟总部的谅解，派松平书记官长去外务省和外相商谈的结果，根据吉田外相的意见，达成一致：作为内部情报，由外相本人去交涉。6时10分，吉田外相来室，我委托他同总司令部的萨塞兰登参谋长进行交涉。

“7时，吉田再来，报告说，在吉田外相与萨塞兰登参谋长谈话时，麦克阿瑟元帅也来参加，一起进行了交谈。麦克阿瑟总部无意干涉日本内政，他们认为，根据现在听到的经历，币原男爵是一个受欢迎的人物。因此，7时45分到55分去御文库谒见天皇，谈到对币原事前尚未作任何工作，突然召见会感到困惑，委托吉田外相先同本人打招呼，让其了解意图。”

吉田茂《十年回忆》第一卷也谈到动员币原出马的情况。“于是，产生了下届内阁首相人选问题，而木户内大臣则倾向于币原喜重郎男爵。因此，内大臣秘书官长松平康昌衔命来访，要求我设法敦请币原氏出马。币原男爵是我担任外务次官时代的外务大臣，是我的前辈，是当时外交界元老之一。因为他是和平主义者，所以也一向为军人所不满，以致久离宦途，隐居在野，毫不干预政治。我马上前往当时在玉川的男爵公馆，转达了木户内大

臣关于后继内阁的意旨。

“然而，男爵却多方推托，不愿接受。我劝以当今时势决不可回避责任，宜及早收拾大局。就把绪方过去对我说的那些话又照样向男爵说了一遍。我虽然舌敝唇焦极力劝说，但男爵却举出许多理由坚不接受。互相争论了大约一个小时，我终于败北而归。

“后来，我把经过报告了木户内大臣，并且说：‘除内大臣直接说服外，别无他策’。我在辞别币原公馆时曾对男爵说：‘宫里马上就会召见你，请作好准备。’于是，内大臣马上把币原氏召至内大臣府，告以陛下非常忧虑的情况，谆谆劝说。关于敦请币原组阁一事，似乎内大臣已于事先获得陛下的同意，据说当日曾由御膳房备餐，二人边食边谈。

“这样，木户内大臣了解到币原确已动心，即刻奏知陛下，并且和过去的形式上的手续不同，当时由陛下特别赐座，勉慰有加。币原十分感动，遂接受组阁的重任。”

据说对于声称自己“没有信心”的币原，天皇作了说服工作，讲到：“现在有谁有信心呢？”

吉田茂的《十年回忆》在这以后写了关于奏荐币原担任后继首相的方针和谋求盟军总部承认的情况，有些当然是吉田茂记错了。但在总部交锋时的对话意味深长，因此想复述一下：

“当我走进司令部参谋长萨塞兰登的办公室时，萨塞兰登便问道：‘有什么事？’我立即答道：‘后继首相已内定币原先生，特来禀告。’正在这时，麦帅走了进来，问道：‘你们在谈什么？’我答道：‘征求你们关于币原男爵组阁的意见。’麦帅又问：‘他多大年纪？’我马上答道：‘七十几岁。’麦帅说：‘年岁太大啦！’接着又问道：‘会说英语吗？’币原氏本来是人所公认的英语专家；但是麦帅竟发问说：‘会说英语吗？’我立即答道：‘当然会说。’币原在世时，我曾打算和他开个玩笑，把这句话告诉他，挫他一下锐气，但是始

终未得机会。”

由于币原喜重郎男爵自1931年12月11日若槻内阁总辞职以来14年间在政界消声隐迹，天皇下令由币原组阁，大多数国民的反应是：“币原还活着吗？”事出突然，币原男爵本人也毫无准备。于是，吉田茂提供方便，把外相官邸让出来，作组阁总部。组阁的参谋是内务官僚出身的次田大三郎。最后决定，吉田外相、下村陆军大臣、米内海军大臣留任，任命堀切善次郎为内务大臣。10月9日，币原内阁宣告成立。

对于币原喜重郎10月5日被作为后继内阁首相第一候补的提出，古岛一雄的活动是不能忘记的。这位犬养毅以兄长事之的老政治家，仔细考虑了东久迩宫内阁之后应托付于谁的方案，并与近卫公爵进行了商谈。据《古岛回忆录》所载，“当时一下子浮现于脑际的便是牧野（伸显）常说的币原。牧野经常谈到币原，认为，不利用币原的外交信誉是失策”，据说因此古岛推举了币原。古岛往访币原，进行试探。币原婉言拒绝说：“我不了解人，就经历来说，的确和加藤等人一起做过事，但我只了解外交一个方面，对政党等等一无所知。因为不了解人，在这时是没有资格接受出马要求的。”但是，古岛一雄并不死心，很有耐心地说：“虽然如此，眼前不是没有更合适的人吗？除了你下决心，再没有别的办法。人，把他放到一定岗位上就能干。”

在敕选议员组织起来的“乙酉会”上（这些议员对研究会的霸道甚为不满），古岛也提出了推荐币原的建议，首先表示赞同的是次田大三郎。因此，次田充当币原的组阁参谋一点也不奇怪。

币原内阁成立前后，以及后来日本有重要意义的两个动向是很值得重视的。一是修改宪法问题，另一个是释放共产党人等3,000名政治犯的问题。

熬过18年监狱生活的德田球一、志贺义雄等人于10月10日被释放时，发表了出狱声明《告人民书》，声明说，“盟国军队进驻日



本形成了日本民主主义革命开始的环境，对此深表感谢”，“我们的目标是打倒天皇制，根据人民总的意愿建立人民共和政府。”

修改宪法问题，后面还要详述，这里仅根据10月9日《木户幸一日记》谈谈这一天币原和木户之间的谈话：“直到大臣就任仪式举行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就修改宪法问题，同币原进行了磋商。币原男爵对这一问题是极为消极的。他主张在运用宪法过程中逐步达到目的。我也抱同样看法。但美国对这种说明感到不满，因为他们想通过自己之手达到自己的政治意图，使日本的宪法自由主义化，结果便强制要求修改。男爵对此进行了争辩，但斗不过以武力为靠山的总部，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屈服而把不同意见载入记录。但是，从宪法是天皇钦定这一点来看，是一个重大问题，希望进一步充分考虑。天皇也经常就宪法修改问题征询意见，因为是宪法实施以后才发生的问题，内大臣只能就大致方向作答，并考虑以近卫为中心进行调查，天皇表示同意。

“中午，在官相室用餐，与石渡官相商谈起用近卫之事。

“3时，近卫来室，谈到修改宪法问题的经过。

“3时35分至45分，到御文库谒见天皇。

“下午7时，高木八尺、松本、牛场、松方(三郎)等来访。其后与麦克阿瑟总部联系，看来对方相当积极，急于修改宪法。因此，痛感有必要尽快制定对策。”

从木户日记这一段简练的记述中，可以感到猛烈的暴风雨即将来临前那乌云一般的阴森恐怖。

从那一天起不到两个月，12月6日有命令下达，要逮捕战犯嫌疑者近卫公爵和木户内大臣。10天以后，近卫文麿服毒自杀。由此可见情况发展到了极为紧迫的地步。

## 五

吉田茂就任外务大臣不久，有一天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吉田

茂对秘书说了一声：“我出去一下”，就和他的女儿和子一起离开了外相官邸。可是，许久没有回来。到了傍晚还没有什么联系，秘书官北泽开始担心起来。他想：“因为与和子在一起，不会到什么不三不四的地方，多半是到牧野伸显那里去了。”可是从官邸打电话去问，回答说：“没有来。”这就怪了，也许是汽车在中途出了故障。就又托警视厅打听通往千叶县牧野住处公路上的情况，也了解不到什么，不料到了晚上10时左右吉田外相平安地回到了官邸。秘书官北泽说：“究竟怎么回事呀？不知道你的去向，我不得不委托警视厅进行寻找。”吉田听了回答说：“到铃木贯太郎那里去了！”

吉田茂和前首相铃木贯太郎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他在学习院上学期间，铃木大将当时是海军少校，在学习院任军事教官。从那时起，吉田茂就非常尊重这位武人。战争期间吉田茂进行争取和平工作时，也和铃木贯太郎保持密切的联系。这一情节前面已经说过了。此后不久，铃木大将在东京的住所被烧，疏散到利根川和江户川的汇合的那一带地方去了。吉田外相到位于茨城与千叶边境上偏僻的小城去拜访铃木海军大将是为了什么呢？可能是希望他能就任平沼枢密院议长的后继职务。可是，对吉田茂来说，更重要的是就日本何去何从问题直接求教于尊敬的铃木大将。吉田对铃木说：“在这样困难的时期，奉命就任外务大臣，应怎样工作，请指教。”铃木回答：“你就堂堂正正地干吧！”吉田茂在归途的汽车里反复玩味这意味深长的教诲。吉田的理解，所谓堂堂正正地干就是明辨是非曲直、能干的认真干、不能干的能干的意思。

从麻布市兵卫町的外相官邸向外眺望，可以一眼看见被战火焚毁、化为一片废墟的东京的残垣断壁。前曾引用过吉田在给来栖大使信中对于重建日本表现那样乐观，他每天眺望废墟过程中也不由得叹起气来，但是他不是容易失望的懦夫。

吉田茂嘴里不断自言自语：“日本人一定能站起来，日本一定

能复兴”，脑子里在积极构思重建日本的宏图大略。毫无疑问，铃木贯太郎的话成了启发他奋勇前进的新起点。这是吉田茂从外交专家向政治家转化的开始。

幼年和少年时代，从养父吉田健三那里接受的熏陶和生父竹内纲赋予他的先天素质，使吉田茂具有直感地把握日本经济纲要的能力。在秘书官北泽和爱女和子陪同下，吉田茂每周至少要乘车到东京的闹市转一次。他看到所谓黑市逐渐盛行的情况，使他越加确信，如果废除物资统制，就一定能抓到经济复兴的关键。

从担任驻安东领事和驻奉天总领事时候起，吉田茂就对经济政策颇感兴趣，不断磨练自己掌握对市场经济具有独特见解的本领。他一贯主张，如果不尊重专家的意见，经济政策不可能成功。

对于重建新日本的事业，吉田茂一再深思熟虑，他开始抓经济复兴工作时，就决定把经济专家请到官邸来。通过北泽秘书官接到指示的经济局长井上孝治郎找曾经担任外务省顾问的胁村义太郎（他是位经济专家，因为“人民战线事件”被开除出东京大学经济系）商量的结果，请了有泽广巳、东畑精一、中山伊知郎、高垣寅次郎、高桥正雄等教授和东洋经济新报社的石桥湛山等人组成吉田外相的智囊团。

正如吉田茂讲过的“曲学阿世”<sup>①</sup>那句名言一样，他非常讨厌那些企图插手非自己本行事业领域问题的学者，相反，对专家学者的专业知识则给以极高的评价。这是他的显著特征。有趣的是，他的岳父牧野伸显也非常愿意集合专家学者，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牧野依靠他的孙女婿武见太郎，聚集了一大批以武见工作地点理化研究所的仁科博士为中心的学者集团。或许，吉田茂听取学者意见的这一想法是岳父的遗传吧！

<sup>①</sup> 是指歪曲学术真理、趋炎附势的人。——译者

币原首相为准备10月11日就职演说，拜访麦克阿瑟元帅时接受了妇女解放、奖励组织工会、学校教育民主化、改革司法制度和经济机构民主化等五项指示。总部经济科学局长克雷曼上校在四天之后发表了如下声明：

“对解散财阀，从一开始就期望避免采取镇压手段，由日本方面自发地采用为达到目的所必要的适当措施。总部期待掀起改革的声势，并将提供协助。但如果日本方面不采取任何措施，总部自然要发布命令。我们劝告和鼓动日本自己主动地沿着这一方向行动。这是对利用战争谋取暴利的公司、托拉斯的惩罚措施。总部对任何托拉斯或公司由能够左右国家政治、国民生活的垄断经济而拥有的支配力，都将采取破坏的方针。总部预定对日本提出的经济措施，主要部分年内可以拟定完毕。”

美国关于解散日本财阀的占领政策的考虑是，为使日本非军事化，不可避免地要解散财阀。与美国对禁止垄断十分热情的传统相一致，无疑对日本财阀也存在着某种误解。吉田外相10月19日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抨击了这一点，他说：“日本经济机构是由三井、三菱及其他旧财阀建立起来的。日本国民的繁荣也是这些财阀的努力所带来的。解散这些财阀究竟是否符合国民利益，尚属疑问。各财阀集团在战争中尽管亏本也经营所属各种产业，这是因为政府根本无视这些财阀的损失而命令他们制造军舰、飞机的缘故。和军阀勾结、谋取暴利的是新兴财阀。军阀禁止旧财阀在满洲等占领地区活动，而给了新兴财阀不少特权。旧财阀在和平时期就积累了财富，因此他们最喜欢结束战争。”

吉田外相的发言对于当时解散财阀的占领政策是一种“挑战”，因此发生了一场所谓“舌祸事件”。但是，从大的方面来看，可以说他的见解是正确的。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阀，的确对战争的推行提供过合作，但并不赞成发动以英美为敌的轻率战争。前所引用的岩崎小弥太男爵在三菱协议会上的讲话，代表

了四大财阀的本意，这样说并不过分。

关于希特勒德国也可以这样说。阻止希特勒贯彻极权主义的最后堡垒之一就是德国财阀。被赶出大学的许多优秀研究工作者，让财阀收容和保护起来，为战后的复兴作出了贡献的事实是不能忘记的。

三菱重工业公司社长乡古洁应东条首相恳求就任内阁顾问以后，岩崎小弥太男爵1943年8月5日以“干部、职员不干预政治”为题发表了训示，结尾部分，男爵以激烈的言辞提出了如下警告：“今年秋天，我等承担国家生产重责，夜以继日、励精图治，亦恐力所不及，哪里还有余暇左顾右盼、徘徊彷徨？为此要求在我三菱公司工作的人，不管是干部还是职员，均需按既定方针行事，决不参预各种政治性活动以及参加类似团体的策划。这决非因袭旧传统，或任意墨守成规，而是面对国家非常时局不能不至诚奉公、尽到自己的本分。”

就在三井、住友和安田三个财阀提出“自动”解散之后，三菱顶住，没有后退，至少还坚持在专门经济领域为国家服务、绝不干预政治的大原则。岩崎男爵坚定地表示：“总部命令财阀反省过去、自动解散，可是三菱过去没有对国家、社会背信弃义的行为，也没有同军部官僚勾结、挑起战争事端，而是服从国策命令、竭尽全力履行作为国民应尽的义务。回顾以往，毫无羞愧之处。进而言之，三菱还向全社会开门，拥有1万3千名股东，从信义上说，也绝不能背叛参加公司的各位股东的信赖而自动解散！”但是岩崎这般英勇豪迈的抵抗没有收到效果，日本政府于11月4日向总部提出了四大财阀拥有股东的公司“自动”解散的计划，两天之后，得到了总部的批准。

在人事关系上，吉田茂与三井的池田成彬、向井忠晴等人较为亲近，可是在思想上与同乡岩崎小弥太男爵非常接近。岩崎男爵因腹部大动脉瘤和下大静脉血栓症，10月29日住进东大医院，

12月2日由于大动脉瘤破裂而猝然去世。

第二年5月22日，在第一屆吉田內閣成立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吉田表示，“关于财阀问题，在任外相时期表明的见解，我现在仍然认为是正确的”。这可以说是吉田茂给悲剧性逝世的岩崎小弥太的悼辞了。

## 六

几乎就在围绕解散财阀问题上，岩崎小弥太男爵躺在病床上进行苦斗的同时，修改宪法问题也与此平行展开，并且发生了近卫文麿公爵的悲剧。与刚直不阿的岩崎男爵因大动脉瘤破裂而亡故的情况相反，近卫公爵两周之后服毒自杀。

近卫文麿同修改宪法问题所以开始发生关系，要追溯到10月4日他以东久迩宫內閣副首相級的国务大臣身分拜访麦克阿瑟元帅之时。在参谋长萨塞兰登和总部的政治顾问艾奇逊大使陪同下，麦帅会见了近卫国务大臣，对于近卫所说“想听取你对政府机构和议会组成的意见和指示”，麦帅以非常坚决的口气回答说，“第一，要修改宪法。必须通过修改吸取自由主义成分；第二，议会是反动的。即使解散了议会，在现行选举法下更换人员，也会换上一些同类型的人。为避免发生这种情况，有必要扩大选举权，承认妇女参政权，承认工人的权力。”接着，双方就如何实现上述各项的方式方法进行了交谈，之后，近卫公爵说：“就我个人来说，由于种种原因，很多想做的事情都没有实现。今后愿在元帅的鼓励、帮助之下，竭尽全力为国奉公。”对此，麦帅回答说，“那很好。公爵虽为封建家族出身，可是作为世界主义者，通晓世界事务，而且公爵还很年轻，希望你勇敢地站在领导的前列。如果公爵把一些自由主义分子集合在你的周围，拟出修改宪法方案公诸于世的话，我想议会也会跟上来。”近卫公爵听了这些话，理所当然地认为让他承担制定修改宪法方案的责任。

据说本来近卫在往访麦帅时有一种恐怖心理，担心是否会被指名为战犯。但是，从麦帅那里受到激励，不仅使他放了心，而且干劲更加充沛了。近卫讲到“元帅非常繁忙，如果有人能和我定期交谈，不胜荣幸”时，麦帅回答：“任何时候都乐于同你交谈”，并对将要告别的近卫说：“今天的谈话非常有益。”

“今天的谈话”指的是在谈修改宪法问题之前近卫对麦帅表示他对2月14日上奏天皇的内容持完全一致的意见。据矢部贞治所著《近卫文麿》下卷记载：“毫无疑问，军阀和极端的国家主义者，破坏世界和平，把日本拖入今天的局面，但是对于以皇室为中心的封建势力和财阀所起的作用及其功过，我认为美国的看法也是很错误的。看起来他们似乎是和军国主义者相勾结，造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但事实恰恰相反，他们常常起到抑制军阀的煞车作用。”这是近卫谈话的前提。谈了这些以后，近卫还断定说，职业军人“大部分出身于农村中层以下的家庭，他们对原来的地主和资本家阶级抱有反感。特别是东北地方的严重状况，使他们对日本社会的不合理感到愤慨，这就给了左翼分子以可乘之机。”近卫在提出他一贯的主张后，得出结论：“防止日本赤化并使日本成为建设性的民主国家，当然要排除军阀势力，但是，另一方面，也要让封建势力和财阀存在，通过一步步渐进的方式走向民主性的建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德国，就有社会民主党，它起了阻止共产革命的作用。然而在日本，除了财阀和封建势力之外，再没有比他们更稳定的势力了。当前，自由党和共产党的势力正在抬头，但这股力量还微弱无力。自己出身于所谓封建势力家庭，所以不好发表这方面的议论，但自己决不想替这种势力辩护。只不过想强调指出，如果今天从日本把这种稳定势力一下子清除掉，那末日本很快就会赤化。”

众所周知，麦克阿瑟元帅是一个对赤色分子极端仇恨的反共分子。因此，近卫所说的防止赤化危险的意见对元帅肯定是很有

参考价值的。但可以想象麦帅也会考虑到，为防止赤化而原封不动地保存所谓封建势力的财阀，从美国和其他盟国的舆论来看，几乎是不可能的。

会见麦帅四天后，近卫公爵在东大教授高木八尺、松本重治和牛场友彦三个人陪同下，拜访了艾奇逊大使。艾奇逊就有关修改宪法问题同总部合作的基本方针，以及具体做法等征询意见，并提出了如下12项修改要点：

- (1) 提高众议院的权威，特别是对预算的权威；
- (2) 撤销贵族院的否决权；
- (3) 确立议会责任原理；
- (4) 贵族院的民主化；
- (5) 废除天皇的否决权；
- (6) 削减天皇诏敕、命令的立法权；
- (7) 规定有效的权利规章制度；
- (8) 设置独立的司法机构；
- (9) 对官吏弹劾和罢免的规定；
- (10) 减少军方对政治的影响；
- (11) 废除枢密院；
- (12) 由国民投票和一般投票确立修改宪法的规定。

近卫公爵会见艾奇逊大使以后，往访木户内大臣，据10月8日《木户幸一日记》所载：

“5时半，近卫、高木尺八、松本重治、牛场(友彦)来访，谈他们就修改宪法问题与盟军总部政治顾问艾奇逊面谈的情况。如果象目前这样耽误时间，麦帅总部将把修改方案摆在我们面前。这样，而作为钦定宪法下达，是我们难于忍受的。大家都谈到需迅速妥善处理。但这决非容易之事，因此约定加以充分考虑。”

第二天，即10月19日，木户内大臣和币原新首相就修改宪法问题进行磋商。上面已经提到，币原对修改宪法问题极为消极。



第三天上午，11时50分至12时25分，木户内大臣拜谒天皇，上奏修改宪法问题的经过并高兴地接受了天皇要近卫就此着手调查的指示。

10月11日《木户幸一日记》称，近卫公爵接受了以下的命令“在接受‘波茨坦公告’之后，大日本帝国宪法是否要修改？如果要改，范围如何？”近卫公爵承担内大臣府工作，和另一位接受这一工作任务的佐佐木惣一博士一起开始着手调查修改宪法问题。

可是，近卫公爵接受麦帅的委托，着手抓修改宪法问题时，突然，对他的责难强烈起来。最早提出反对的是10月11日内阁会议。对此，《木户幸一日记》记载着，大约11时半至12时半，石渡宫内大臣走访内阁，就天皇指示近卫公爵调查修改宪法问题，同币原首相、次田书记官长达成谅解以及后来内阁会议的情况：

“然而在下午的内阁会议上，首相说明了情况，因为有人坚持主张，修改宪法当属国务，应由内阁着手进行，于是首相让石渡宫内大臣来我这里晤谈。本来对宫中调查宪法也并不是没有不同意见，因此我要近卫前来。近卫、石渡、牛场、松平、高木等人一起聚集在我的屋子，最后商定，不论政府的意向如何，作为我们辅佐天皇日常工作的一翼，负责进行调查。”

在内阁会议上开头炮的是松本烝治国务大臣。他说：“修改宪法是重大的国务活动，当然应由内阁负责。皇室宫中机构、内大臣府进行修改宪法的调查，是越权，应当立即提出抗议。”

其他大臣也赞成这一强硬主张。结果在10月13日决定以松本国务大臣为中心开始研究修改宪法问题。

对于内大臣府主要负责修改宪法一事，东大教授宫泽俊义等宪法问题专家也表示反对。报纸的调子也都倾向于支持国务大臣松本和宫泽教授的意见。站在日常辅佐天皇立场上的内大臣府，调查了解修改大日本帝国宪法本身，正如佐佐木惣一博士所说，决不违背宪法。问题在于从侵华战争到进驻法属印度支那，近卫

公爵对所有这些扩张政策都应负责，而看来现在却由他掌握修改宪法的领导权。

特别是近卫文磨10月15日在会见美联社记者时谈到修改宪法基本方针以及进而对《纽约时报》的记者林泽·伯劳特详细谈论修改宪法问题时，都反复讲到麦帅暗示要他成为日本自由主义者的领导人，这在相当程度上刺激了内外舆论。

10月21日近卫在会见美联社记者拉塞尔·布拉因兹时，谈到天皇退位问题，也表明他十分糊涂。而对近卫更为不幸的是，这位记者发出的电报竟说：“如履行‘波茨坦公告’，陛下将退位”。

近卫到底如何考虑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呢？我想这是每个正直的日本国民都会产生的坦率想法，外国的批评也越来越严厉。10月26日，《纽约时报》登载了哥伦比亚大学那萨聂鲁·伯法教授的看法：“象近卫公这样的人领导日本新宪法方案的起草工作、制定日本未来的计划，不仅是对他的赞许，而且等于对他公开的肯定，这是咄咄怪事。”伯法教授还谈到近卫在对华侵略之初担任首相的事实，认为“把近卫置于目前这种地位，是日本投降后远东发生的一件最危险的事，是我们最严重的错误。与此相比，天皇存废之类不过是细枝末节罢了。”

## 七

麦帅对于美国国内的舆论动向，当然很敏感，对日本国内日益强烈谴责近卫公爵的形势也不能漠不关心。

1945年11月1日，总部发表了如下声明：“在修改日本宪法问题上，人们对于近卫公爵所起的作用似乎有严重误解。盟军当局并非为修改宪法而选择了近卫。在东久迩内阁总辞职之前，他是代理首相职务的副首相。因此，才向近卫转达日本政府必须修改宪法。第二天，东久迩内阁辞职。在修改宪法问题上，盟军当局同近卫之间关系仅此而已。

“盟军统帅对新首相币原传达了修改宪法的指示，后来近卫与修改宪法的有关事宜都是从皇室关系中产生的，并非受到盟军总部的委托。根据上述步骤，筹备工作由日本政府接替。在相当时期之后，这一问题的全貌在日本国民全面彻底的讨论并通过最后修订方案之前将向日本国民公布。”

这一声明对于遭到内外舆论谴责的近卫公爵，简直是一份绝交书。东久迩宫内阁总辞以后三天，艾奇逊大使应近卫公爵的要求，发表修改宪法各项指示，显然与上述声明矛盾。牛场友彦就此提出质询。据说总部的菲拉兹准将曾解释说：“对近卫公爵是太抱歉了！”

近卫文麿则感到麦帅背叛了他。近卫产生这种情绪并不奇怪，他最害怕的是被指控为战犯嫌疑，可已成为大势所趋。但他还是用尽最后的精力来处理修改宪法问题。他发表了一份声明：“现在进行的修改宪法筹备工作，是根据麦帅的指示开始的，这是事实。但我个人并没有得到麦帅的命令和委托，我着手这项重要工作，完全是日方决定的。从目前情况看，我相信，到11月20日将能把我的调查结果呈报给天皇。”

这一声明可以说反映了近卫的心境。紧接着又来了第二个沉重打击。11月9日，近卫公爵被传讯接受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的讯问。他被带到芝浦港停泊的美国炮舰上，从下午2时至5时进行了严厉的讯问。因为近卫从中国事变的爆发直到大东亚战争之前曾三度组阁，对他进行调查是理所当然的。虽然战略轰炸调查团的任务是调查，而不是起诉，但在当时气氛下，近卫象受到了致命一击，这一点也并不难理解。

近卫文麿未屈服于这种恶劣条件，几乎每天都到箱根宫下属的奈良屋的别馆去同佐佐木惣一博士讨论修改宪法问题。在内大臣府被废除两天前的11月22日，近卫公爵把“帝国宪法修改纲要”这份“近卫草案”上呈天皇，佐佐木博士另于11月24日以“帝国宪

法修改之必要”为题写了一份个人方案呈给天皇。

近卫公爵和佐佐木博士分别上呈方案的原因是，内大臣府突然被废除了。到11月19日，已对小矶国昭、荒木贞夫等11名战犯嫌疑发出了逮捕令。此后不久，近卫服氰酸钾，结束了54岁的生涯。

吉田茂曾经对被逼得走投无路的近卫公爵进过忠告。这可以由他写给木户幸一内大臣的信得到证明：

“木户内府阁下，拜启。遵命日前到箱根往访近卫，劝说暂时避开世人的注意，他也很赞成。宪法问题也已调查完毕，今日将上奏。报纸也将刊登，关于内容将有种种传说，对公未必有利。告诉公爵，关于今日上奏之事不可宣扬，上奏之后迅速摆脱宪法问题。也请内阁方面照顾（已告知法制局长）。盼宫内府省予以保密，请阁下向宫相转告。吉田茂顿首

十一月二十一日”

10月7日的《细川日记》反映出近卫想继东久迩宫内阁之后出马的情绪：“昨日在官邸与富田氏会面，当时谈到天皇命币原担负大任的经过，起初，木户侯曾推荐近卫，但察觉到近卫可能不愿意，就又考虑币原，并通过吉田去作工作。小畑以拥戴近卫呼声很高来劝近卫，近卫也几乎相当明确地表示了出马的倾向，并曾为此试图直接会见吉田，但因内阁会议开始而未果。这期间，吉田与内大臣府接触，最后落实由币原继任。富田也好，小畑也好，都对币原内阁不满意。”

近卫由于小畑的劝说，心情有所变化，愿意组阁。吉田外相也为币原男爵的出马尽了力量。近卫没能见到吉田，虽然是由于开内阁会议，但在吉田脑海里根本没有考虑过近卫。对于从中国事变到第三届近卫内阁总辞职为止近卫文麿应负之责任，吉田茂比近卫本人还看得重一些。

同一天的《细川日记》记载着币原男爵约近卫公爵到荻外庄访问时，对近卫“是否准备让鸠山干”的问话所作的答复：“鸠山在东

北事变时曾与军队一起攻击币原外交软弱，他不迎合军队之说，纯属虚构。我本人是不信任鸠山的。”

币原的这一发言，在第二年4月中旬至5月初解除鸠山一郎公职问题突出时，为说明币原表态之谜提供了线索。同时，不可忽略的是，币原对鸠山的批评也包含着对近卫的含蓄批评。主观意图如何又当别论，从伦理上讲，客观结果是，近卫也经常迎合军方。

从近卫文磨10月4日会见麦帅、认为麦帅指定他做日本民主化的领导人起，到12月16日服毒自杀，这期间吉田茂最担心的是皇室的安泰与否，根据《波茨坦公告》，天皇制的命运将由日本国民意志决定，吉田茂对于人心背向，理所当然地深表关心。

11月7日《细川日记》在这点上有令人注目的一段插话。细川护贞11月5日访问外相官邸时，和吉田茂、白洲次郎、麻生和子以及秘书等共进晚餐。据说，当时吉田的爱女和子讲到“父亲平时很少到明治神宫去参拜，而在11月3日明治节时却突然徒步去参拜，在潮水般的人群中挤来挤去，回来以后说：看到那样多的人参拜，我放心了！”

近卫文磨被指名为战犯嫌疑的4天以前，12月2日，总部命令把梨本官与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等人一起逮捕起来。吉田外相决心拿自己的职务为赌注，拼命阻止把皇族送往巢鸭监狱，因而去找麦帅。结果麦帅同意将梨本官拘禁于涩谷松涛御殿的住处。但是，第二天消息走漏，东京特急电报道，麦帅向日本外相让步，使美国政府感到震惊，严令总部再次逮捕梨本官。吉田外相的努力，终于化为泡影。

逮捕梨本官，不仅是当时极为轰动的事件，而且也是一个谜。人们推测，这可能是作为天皇的替身，才逮捕皇族的人。尽管如此，逮捕的不是闲院宫前总参谋长，也不是伏见宫前军令部总长，而是梨本官，原因何在，很难理解。事实真相大概是美国

选择皇族中间离天皇最远的一个吧！

## 八

以国务大臣松本烝治为委员长的宪法调查委员会宣布成立，成员如下：

顾问 学士院会员清水澄、美浓部达吉，东大名誉教授野村淳治；

委员 东大教授宫泽俊义、东北大教授清宫四郎、九州大学教授河村又介、枢密院书记官长石黑武重、法制局长官榎桥渡、法制局第一部长入江俊郎、第二部长佐藤达夫。

委员长松本烝治博士总的说来是一位保守的自由主义者，他并不感到有必要改变作为大日本帝国根本的天皇主权主义。松本国务大臣认为，日本所以军国主义化是因为曲解了帝国宪法，相信随着不同的解释，旧宪法也可以自由主义地、民主地加以运用。在这点上，顾问美浓部达吉博士也有相同看法。

本来，旧宪法的天皇主权主义是从普鲁士德国宪法那里搬来的，并非从日本历史中产生的，但它作为明治宪法制定以来半个世纪的“不朽大典”已扎下根来。比较倾向于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也受着普鲁士德国类型的君主主义的束缚，委托热衷于明治宪法的老人们修改宪法重任，结果造成了怎样不幸的事态，终将明了。

1945年10月27日，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两天以前，总部指令日本引渡驻外大使馆、公使馆资产和停止外交活动。10月29日，吉田外相会见副总参谋长马歇尔，申明如完全履行这一指令，不仅将损害日本政府的威望，而且会在国民中引起愤慨和幻灭之感。吉田还提出一份备忘录，表示希望将来能尽快在中立国之间履行外交职能。马歇尔副总长允报华盛顿，但总部

的指令还是要付诸实施，致使日本驻瑞士、瑞典、葡萄牙、阿富汗、冰岛以及梵蒂冈五个中立国的公使馆丧失了外交职能。接着，11月4日总部又发出了指令：“今后，除得到盟军最高统帅许可，日本政府应终止与各中立国政府及其驻日代表之间的关系。”

我至今还清楚记得这两个指令发出时引起的震惊。在这以前，我对美军占领顺利进展的情况是感到放心的，可是当我知道中断同中立国外交关系时，再次痛感占领之严峻。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德国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降到何等可悲的境地，是最明显不过了。

德国当时被占领的只是莱茵河左岸和若干个桥头堡，在大部分国土上，看不到外国军队的影子。与瑞士、瑞典等中立国的外交关系也依然维持原状。但是，日本今天不仅全部国土被占领，而且同中立国的外交关系也断绝了。了解到这一点，使我受到战败和占领的沉重而冷酷的打击。我终于开始直接面对日本丧失独立、已不再成其为主权国家的严峻事实。

被夺去独立和主权的日本，在进行着占领下的改革。首先，值得注目的是政党逐步建立起来。11月2日，以片山哲为总书记的日本社会党诞生，这可以说是除了10月20日开始发行机关报《赤旗》的日本共产党以外，集合了所有左翼势力的联合战线政党。

11月9日，以鸠山一郎为总裁的日本自由党宣告成立。一周之后，日本进步党举行成立大会，11月18日，决定町田忠治为总裁。过了一个月，日本协同党诞生。

在政党登上舞台的同时，建立了一系列改革立法。11月26日召开的第89次临时帝国议会到12月18日解散之前三个星期期间，通过了几个重要法案。

妇女参政权、规定大选举区制和具有限制联记制的修改选举法方案，于11月27日提出，12月15日通过。保障团结权，承认集

体谈判权的工会法和作为农地改革第一步的农地调整法修正案，于12月18日获得通过。

另一方面，12月15日总部提出了关于废除政府对国家神道的保证、支援、保护、传布的备忘录。军国主义日本的扩张主义是以日本国民的选民思想为基础的，而这种选民思想的根据则是国家神道。可能是从这一考虑出发，才发出了上述备忘录。基于同一意图，总部期待天皇自己出面表明他不是神。住本利男所著《占领秘录》上卷有这样的记述：

美军进驻那年临近年底的12月中旬。总部对宫内省指示说，“如果天皇能表明不是神，天皇的立场不是能够得到改善吗！？”从进驻以后总部对天皇制的方针来看，这是必然的结论。宫内省秘密同币原首相进行了联系。首相立即拜见陛下，探询陛下对这一问题的想法，然后确定了以陛下自己的想法提出为好的方针。次田大三郎书记官长从首相那里听到这件事，也表示赞成。首相命令马上着手准备方案，并且决定了用新年诏书方式发表“凡人天皇”宣言的步骤。

但是，起草出来的稿子，首相不满意。他想起外务省的一桩往事——日俄战争的宣战诏书，是由当时外务省雇用一名叫丹尼森的人用英文写的。然后由政务局长山座圆久郎翻成日文，结果写出的文章堪称佳作——所以，币原决心自己用英文写一份诏书。他认为以往的敕书，语言死板，不是好文章。币原想至少要象五条誓言那样通俗易懂。他在多摩川私邸直到深夜，还在用英文推敲。币原对自己的英文有相当的信心，写成了简练的古文稿子，然后定稿。

币原首相的秘书长福岛慎太郎，把首相的古典英文翻成日语，似乎花了相当大气力。福岛的译文又由前田多门文部大臣进行润色。吉田外相建议，一开头就引用五条誓言，据说天皇对此也表示赞同。外相指示北泽秘书官找一份五条誓言的英译本。就



这样，写成了有关建设新日本的诏书，即所谓“凡人宣言”。在12月31日中午传达给内阁记者团，并刊登于1946年元旦的报纸上。其中心部分是如下段落：

“朕与尔等国民之间的关系始终是由相互信赖和敬爱连结起来的，并非简单地由神话和传说产生的，也不是由于把天皇尊为神明、把日本国民看成比其他民族优越、从而必然要统治世界的虚幻观念而产生的”。

这份诏书的抄件加上吉田外相的信，于12月31日寄给麦帅。1月1日元帅发表声明，对天皇的“凡人宣言”表示欢迎，指出“天皇的新年声明使我非常欣慰。天皇发表这份诏书将对日本国民的民主化发挥指导作用”。

在1月6日麦克·格茵的《日本日记》中谈到“天皇放弃神格的元旦诏书的最早草案，实际上是在戴库准将的办公室炮制出来的。”这大概指的是总部给宫内省的指示。

据次田书记官长证实，币原首相曾彻夜修改草案，进行反复推敲。为此，币原首相得了感冒，长时间不愈，后来转成肺炎，总部送来盘尼西林，才迅速康复。在那个时候，盘尼西林还很难弄到，药效是非常显著的。

这里，要提一下吉田茂12月22日用外务省便笺写的一封信：“敬启者，奉天皇之命向贵官致以节日般的问候并送上书桌与砚盒。

“奉皇后陛下之命，谨向麦克阿瑟夫人呈上一套女孩节之陈列玩偶，以及令郎之玩偶和糕点。敬具”

作为一国元首赠送给占领军最高统帅的礼物，是很得体的。正统之君主，不作超出限度的事情。

## 九

1945年12月18日众院宣布解散。第二天内阁会议决定，1946

年1月21日到22日进行大选。但盟军总部12月20日指示，大选的日期暂时推迟。因为盟军总部预定要在大选之前对军国主义分子及其追随者进行整肃。

1946年1月4日，盟军总部把整肃的备忘录交给日本政府。该备忘录共19条，其中最重要的是第14条，“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为了使日本在侵略期间被军国主义的国家主义排斥于帝国议会之外的民主分子有充分的机会获得议席，又为了在新议会中，排除那些欺骗日本国民、犯有妄图征服世界罪行的势力，凡相当于附属文件A号所规定的人，必须剥夺他们与帝国议会有关的一切候选人的资格。”

附属文件A号列举了“罢免和清除的种类”从A项至G项7条。A项为战犯；B项为职业军人和陆海军部特别警察和官吏；C项为极端的国家主义团体、暴力主义团体和秘密爱国团体的主要分子；D项为参与大政翼赞会、翼赞政治会以及大日本政治会活动的主要分子；E项为同日本扩张有关的金融机关和开发机构的成员；F项为占领地行政长官；G项为其他军国主义者和极端的国家主义者。

从A项到F项，客观上十分清楚，只有G项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汉斯·彼瓦鲁德教授在他所著《整肃领导人》一书中指出，“属于A至F的范围，整肃的决定能自行进行。例如，此人是否为现役将校军官，这是丝毫没有争论余地的。而剩下的G项，从是否应被整肃之列角度来说，审查日本领导人经历的人们被授予相当大的权力。”有问题的G项另当别论，币原内阁的内务大臣堀切善次郎、文部大臣前田多门、农业大臣松村谦三、运输大臣田中武雄以及内阁书记官长次田大三郎5人属于被整肃之列。币原首相想以总辞职来抵制整肃的命令，指示吉田外相会见麦克阿瑟元帅。通过吉田外相与麦帅的会谈知道，抵制是徒劳的。币原首相只能改组内阁以度过危机。因此，1月13日，安倍能成取代前田多门任文部大臣，

法制局长官榑桥渡就任内阁书记官长。

整肃的备忘录发出后两天，1946年1月6日外务省给在外相官邸的北泽直吉秘书官来电话传达说：“总部有指示，要求告知在法属印支的北泽参赞的住址。”这无论对吉田外相，还是对币原内阁都是一个不吉利的前兆。因为日军占领下的缅甸独立政权主席巴莫，在战争刚刚结束的8月23日与北泽参赞一起离开西贡，两天之后到达立川机场，然后躲进了新潟县南鱼沼郡石打村的药照寺。

当然这不是吉田茂隐藏的，是重光外相时代的外务省安排的。但1月12日巴莫向盟军总部自首时拿着印有外务省字样的口袋，里面装了20万日元，事情便严重了。

住本利男所著《占领秘录》透露了吉田外相在危急关头得救的情况：“关于外务省为什么给巴莫支出20万日元机密费一事，吉田外相被萨塞兰登参谋长叫去直接盘问，外相回答说，毫无所知。紧接着松岛次官又被中央情报局的索普准将叫了去。次官对情况是了解的。准将是一个爱动感情的人，加上重大情报是从英联邦代表处得来，所以更是慷慨激昂。他大吼道：‘真是荒唐透顶！我们不但要罢吉田外相的官，连天皇制之类也统统取消！’并气势汹汹地要次官滚出去。

“巴莫博士亡命是重光外相时期的事，吉田外相可以回答不知道。20万日元也是得到松岛次官批准、由甲斐课长交给巴莫博士的。

“这笔钱是外务省的机要费。支出时呈报的文件是参考类，仅由松岛次官签字，大臣那里就算‘通过’了（按官厅的习惯，意即没有必要再给大臣看了）。对方说既然是作为外务大臣的机要费，大臣不可能不知道。但这类文件证明，吉田外相回答不知道是合乎情理的。”

由于巴莫事件，外相的秘书官北泽和外务省政务课长甲斐从1月12日到8月2日期间被拘留在巢鸭监狱。吉田外相虽幸免于难，

但在东乡前外相以战犯嫌疑被捕、要求为他支付辩护费时，吉田不得不拒绝从机要费支出，因而遭到谴责。一些不了解吉田茂本身因巴莫事件陷于困境的人们说：“吉田太冷酷无情了。”

## 十

以松本国务大臣为委员长的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按着什么方针进行审议，通过1945年12月8日众院预算委员会松本国务大臣对中谷武世议员提问的答辨，已说清楚了，被称为“松本四原则”的内容如下：

1. 由天皇总揽统治大权的基本原则不变，这一点恐怕是日本绝大多数有识之士的一致认识；

2. 扩大需要由议会议决定的事项范围，这样，将在某种程度上削减天皇的大权；

3. 要使国务大臣的责任扩及全面的国务，以便消除宪法上不承担辅佐天皇责任的部分人介入其中的余地，同时让国务大臣对议会负责；

4. 扩大保护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即不能用和议会无关的立法侵犯自由与权利。同时要使对侵犯自由和权利的救济办法，更加完备。

松本原则从第2项到第4项，的确有所前进，也可以说大有改进。但第一项原则等于说不修改大日本帝国宪法。根据第2、3、4项原则，不管怎样强调议会内阁制和人权保障，但从当时的国际形势看，盟军总部不可能同意严格遵守第1项原则。但松本国务大臣1945年8月11日对盟国方面的回答称“日本国的最终政治形态，按照‘波茨坦公告’，由日本国国民所表达的自由意志来决定。”由此看来，他认为天皇制的存在与否同总部和盟国方面无关，而由日本方面决定。这中间暴露了松本国务大臣的政治感觉的不合时宜。他没有意识到修改宪法不单是日本的内政问题，而且已经成

为有关日本国际政治的焦点。如果松本国务大臣正视这严峻的事实，他在主持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时便会经常同盟军总部保持接触。总部曾希望松本国务大臣主动进行联系，但从1945年10月27日第一次委员会到第二年1月末竟毫无音信，不难想象，总部已逐渐不耐烦起来。

总部对松本国务大臣的委员会审议些什么，感到不安，同时在积极进行研究有关修改日本宪法的准备工作。1945年12月6日劳埃尔陆军少校的报告“关于日本宪法的预备性研究和建议”就是成果之一。这一报告写道：“从分析统治作用实际情况的结果可知，许多权限被滥用。过去20年间军国主义者统制政治，使它服务于实现他们的目的，正是这种滥用权限的结果。”报告在列举了为发展民主倾向必须清除的九条弊端以后，提出了三项建议。

第一，修改宪法是必要的；第二，修改宪法方案必须得到盟军总部的同意；第三，为使宪法清除上述弊端，应确立以下附件所揭示的各项规定。“权利章典”、“能对国民尽责的政府”以及“责任下放地方”等三个英文附件长达10页。劳埃尔少校报告提出后大约过了一个月，1946年1月7日，国务、陆军、海军三方调整委员会通过了“日本政府制度的改革”，作为1月11日的情报送给了麦克阿瑟元帅，成为有名的国务、陆军、海军三方调整委员会第228号重要文件。

这一文件结论部分关于天皇制指出，“日本最终的政治形态虽然应由日本国民的自由意志决定，但以现在的形态维持皇帝制度同上述基本目的不相符”，“应当鼓励和支持日本人废除皇帝制度或沿着更民主的方向进行改革”。

可是，松本国务大臣根本不注意美国方面的这些意图，自己参照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的讨论，从年底到正月起草了“修改宪法个人方案”，1月4日脱稿，松本在三天之后就把这一个人方案向天皇作了说明。宫泽委员把这一方案的要点加以概括，就成了后

来被人称为的甲案。2月8日向总部提出的“修改宪法要纲”正是在甲案基础上经过若干修改而成的。甲案照引旧大日本帝国宪法有关天皇的第一条至第四条的规定，仅仅把第三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改成了“天皇至尊不可侵犯”。

甲案虽然也包括一些“把军队统帅作为国务大臣辅佐的对象”、“贯彻议会内阁制的原则”等有所改进之处，但终归与国务、陆军、海军三方调整委员会的228号文件的要求不符。甲案之外，宪法调查委员会的小组委员会还拟定了一份乙案。乙案除把“大日本帝国宪法”改为“日本国宪法”、“臣民”改为“国民”、“帝国议会”改为“国会”等字句上的修改之外，删去了有关军队的规定，并增添了“受教育的权利、勤劳的权利义务”等有新内容的规定。但是乙案也强烈地维护天皇统治权，这一点和甲案没有不同。东大教授高木八尺博士对于松本国务大臣不听从总部意见而修改宪法的活动感到不安。于是，他在1946年1月26日拜访松本国务大臣，并提出忠告说：“我们感到，即使逐渐进行一些小的改革，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还是听从盟军总部的意见，拟定最后的方案为好。回顾过去我们听到的形势，例如许多宪法条文都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过去的内容，停留在这种程度上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但是，松本国务大臣顽固地拒绝了这一忠告。1月29日到2月4日期间，内阁会议上多次讨论了松本方案。尤为引人注目的是，1月30日内阁会议讨论有关是否设置军队的规定时，吉田外相发言说：“这一点我和惠特尼商量一下，了解对方的意向再定如何？”真不愧是吉田茂，他理解关于修改日本宪法这样严肃的国际政治大问题必须得到盟军总部的同意。

内阁会议在继续讨论松本方案期间，《每日新闻》抢先发表了独家新闻，使盟军总部感到震惊。2月1日《每日新闻》以“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草案”为题，报道了接近乙案的试行草案。松本国务大臣在这一天的内阁会议上说明“这个方案既不是委员会的甲

案，也不是乙案，不过是在研究过程中草拟的一个方案。作为委员会的方案尚未确定”。虽然情况确实如此，但总部民政局长柯特尼·惠特尼准将2月2日向麦帅提出下述备忘录：

“1. 昨天(2月1日)《每日新闻》登载了内阁(松本)委员会草拟、称为宪法修改方案的内容。随信送上这一修改方案的初译文本；

“2. 这份修改方案的内容极为保守，对天皇的地位未加实质性变更，天皇仍然保持着统治权。出于这一理由(其他还有不少问题)，报刊的论调和舆论对修改方案评价都不好；

“3. 政府正式承认有这种不好的评论。昨夜，内阁书记官长(榎桥渡)正式声明，报纸登载的方案并非(松本)委员会的成果，但榎桥渡承认，这一方案可能和一位委员草拟的方案内容相同；

“4. 报纸登载的方案看来就是松本自己的方案。这是因为昨天松本对新闻记者说：‘天皇的地位实质上和过去一样，只不过文字上有若干变动’；

“5. 鉴于上述情况，早晨外务省官员打电话要求将星期二(2月5日)上午预定与吉田外相讨论松本方案的非正式会谈延期到下周星期四，我考虑到目前在吉田试探气球破裂情况下，内阁委员会有可能忠实履行‘波茨坦公告’，认真进行真正的宪法修改工作，所以同意将会谈延期一周(即延到2月12日)；

“6. 我认为举行同意这次会谈(用吉田的话来说是非正式会晤，在那里发言不受约束)为宜的理由是，让掌握关于修改宪法主导权的反动集团知道，他们的行动远远离开了阁下能够同意的基本线。从策略上讲，我认为在正式提出宪法修改方案时，给他们以指导方针远比等待他们决定并提出我们难以接受的方案、然后再强制他们根据新规定从头修改要强得多。”

同吉田外相就以上五项进行非正式会谈，本来是吉田外相2

月1日提出来的。

## 十一

盟军总部民政局长柯特尼·惠特尼是律师出身，长期以来竭力为麦帅服务，受到麦帅的特别信赖。民政局1945年10月是由库利斯特准将领导的。12月，惠特尼接替担任领导，一直任职到1951年4月麦帅被解除职务为止。惠特尼民政局长比上述备忘录早一天为麦帅写成了重要的备忘录“关于宪法的改革”。这份备忘录对于考察盟国最高统帅在修改宪法问题上同远东委员会和对日理事会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引用一下标题第一项和结尾第六项的全文以及第二至第五项加傍线的部分：

“1. 关于日本统治机构改革宪法的问题，急剧地接近新的高潮。日本宪法的修正案已由政府的委员会和个人的委员会起草了几份。下次大选时，修改宪法问题很可能成为重要的争论焦点。在这种情况下，我对一些问题进行了考察，例如，阁下作为最高司令官对处理日本宪法结构进行根本性变革的问题时在什么范围拥有权限，对于日本政府拟定的方案是承认还是否决，或者是否要向日本政府发出命令或指令？我的意见是，有关这一问题，只要远东委员会没有作出决定（无疑该委员会如有决定将约束我们），关于修改宪法问题，阁下拥有与占领、管理日本的其他重要事项相同的权限。

“2. 阁下由盟国授权处理修改宪法问题。

“3. 阁下由联合参谋部授权处理修改宪法问题。

“4. 阁下有关修改宪法决策的权限，除了远东委员会本身关于这一问题作出决策以外，不受实质性限制。……关于改革宪法对阁下权限的唯一限制是在按该委员会委任条款第六项规定的场合，即在对日理事会的成员之一有关‘日本宪法结构进行根本变革



的问题’对于使远东委员会的决策更趋完善而发布的命令持不同意见的时候。

“5. 考虑到如果将来远东委员会发布对宪法结构变革内容的政策指令时,即使决定由阁下发有关宪法变革的指令(命令),如对日理事会的一名成员反对,那么该决定将丧失约束力。

“6. 总而言之,我的意见如下:(a)现在阁下对于日本的宪法结构拥有为实现阁下认为适当的变革,可以采取一切措施而不受制约的权限。如果说有制约的话,那仅仅是在采取措施让天皇退位这一点上,这是需要和联合参谋部协商的。(b)远东委员会发出有关宪法改革指示命令时,对日理事会的成员之一如果反对,宪法改革的指令就不可能对日本政府提出。对日理事会的成员之一有反对意见,将使阁下的决定失去约束力。”

远东委员会12月27日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对1945年10月成立的远东咨询委员会进行了改组。美英苏中四大国,还有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以及菲律宾十一国代表出席了会议。名义上它拥有很大的权限;(1)决定有关管理日本的政策、原则和标准;(2)审查有关盟军最高司令官的政策实施;(3)审议与会国同意的事项。但是和管理德国的理事会方式不同,美国依靠行使“紧急事项发生时的中间指令权”,在实质上单独管理日本。

对日理事会由美英苏中四国代表组成。任务是“就投降条款、占领及管理日本、投降条款补充指令的实施,与盟军最高司令官磋商,提出参考性意见”。但是,麦帅自1946年4月5日出席第一次会议、致开幕词退席以后,再没有出席过对日理事会会议,众所周知,他完全不把对日理事会放在眼里。

如果人们还记得2月1日和2日惠特尼准将的备忘录,对于麦帅在远东委员会进行干预以前,有关修改宪法问题就已决心造成既成事实这一点是容易理解的。客观形势不能容忍松本委员会的修改方案,特别是它不符合国际政治的要求,既然如此,麦帅只能

靠冲击疗法来解决。

促使麦帅下决心采取冲击疗法的另一个原因是惠特尼准将也已指出的《每日新闻》独家报道的修改宪法草案在日本国内名声不佳。2月2日《每日新闻》的社论，也以“对宪法修改草案的疑义”为题，进行了如下的批评：“政府的修改宪法个人方案，一般说来一定要是个进步方案，但它对于作为宪法核心的天皇统治权，却采取了与现行宪法完全相同的基本精神和原则。天皇是日本的君主，对此，我们历来没有异议……在我国成文宪法里，如果采取英国方式，就有必要把实质上不参政的原则以某种形式在宪法中明确表达出来。如果不采取英国方式，而承认天皇自由意志的话，那显然是与民主主义唱反调。”

2月1日，麦帅命令惠特尼准将写出拒绝松本方案的详细解答，到2月3日，他又对民政局提出了三项原则。他接受了惠特尼局长的意见，决定在总部拟定修改方案。麦帅的三原则是：一、天皇处于国家元首的地位。皇位世袭。天皇根据宪法行使其职务和职能，体现宪法所表达的国民基本意志。二、废止运用国家权力的发动战争。日本放弃作为解决争端的战争手段，放弃为维护自身安全而进行的战争。日本的防卫和安全的维护应依靠当今推动世界前进的崇高理想。将来也不能使日本拥有陆海空军的权限和交战权。三、废除日本的封建制度。贵族的权利，除皇族外，只限于现在生存的一代。华族<sup>①</sup>的地位，今后也不具有任何国民或市民的政治权力。预算的类型，仿照英国的制度。

根据这一指示，惠特尼准将2月4日起进行了一周突击作业，完成了总部的修改宪法方案。2月4日在第一次会议上惠特尼民政局长说，“今后一周时间，民政局将发挥制定宪法会议的作用。麦

<sup>①</sup> “华族”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对社会身分的一种称呼。地位在皇族以下，士族以上。是对维新的有功之臣授予特权和爵位的一种社会身分。1947年新宪法颁布后被废止。——译者

克阿瑟将军把为日本国民起草新宪法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交给了民政局。”他在传达麦帅的三原则之后，继续说道，“到2月12日，民政局完成新宪法草案，希望得到麦克阿瑟将军的批准。2月12日，我将和日本外务大臣及其他官员就日本方面的宪法草案进行非正式会谈。看来日本方面的宪法草案右翼(保守)倾向很强烈。但是我将说服外务大臣及其小组，为了维护天皇、维护其自身留下来的权限，唯一可行的出路是明确地接受和承认左倾(进步)立场的宪法。我希望通过说服达到这一结论，说服不成时，不但可以用力量威迫，而且麦克阿瑟将军已经授权使用力量。

“要让外务大臣及其小组满足我们的要求，改变他们的宪法草案方针；制定一部自由的宪法，是我们的愿望。在制定宪法时，日本方面草拟的文件，应当提交麦克阿瑟将军批准，麦克阿瑟将军批准后作为日本人制定的宪法向全世界公布。”

由参加“制定宪法会议”的民政局行政官员查尔士·肯迪斯陆军上校、阿鲁夫雷特·哈西海军中校和马伊洛·拉乌埃尔陆军中校三人组成执行委员会，下设7个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三个人都是法律专家。肯迪斯上校是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法律系科班出身，当过三年律师后进入政界；哈西中校毕业于哈佛大学，入弗吉尼亚大学学法律，入海军之前曾开业，当了12年律师；拉乌埃尔中校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法律系。

## 十二

松本国务大臣2月8日将“宪法修改大纲”正式送到总部时，修改宪法的工作告一段落，5天以后，即2月13日，在外务大臣官邸，总部把它的修正草案交给日本方面。吉田茂《十年回忆》第二卷有这样的记叙：

“2月13日，我们根据盟军总部的提议，在当时设于麻布市兵卫町的外务大臣官邸同对方会晤。那一天我方的人员有我和松本

博士，还有当时担任停战联络事务局次长的白洲次郎；对方有惠特尼民政局长和肯迪斯上校等人。会晤时，惠特尼局长说：‘日本政府提出的宪法修改方案，盟军总部不能同意，因此盟军总部拟定了一个标准方案。现在把它交给贵方，希望根据这个方案迅速起草一份日本的方案。’说着，便拿出了几份英文打字的标准方案，并且说：‘这个方案一定会得到美国政府和远东委员会的同意；麦克阿瑟元帅早已充分考虑了天皇的地位，根据这个草案修改宪法，是能够达到维护天皇制的目的的，否则就不能保障天皇的地位。’他还说：‘这并不是命令日本政府这样作，只是希望日本政府赶快拟定并提出一份在基本原则与根本形态上与盟军总部草案相同的修改方案。’

“对方把草案交给我们以后，说道：‘我们到院子里去散散步，请你们在这个时间看一下草案的原文……’说罢便离开了房间。于是，松本集中精神阅读草案。我也看了一下，首先发现序言里有‘我们日本国人民’这样一句话，第一条写的是‘天皇为国家的象征’，因此，我觉得这是荒谬透顶的。并且，这个草案还规定，国会为一院制。松本虽然和对方交换了几点意见，但是最后决定‘仔细阅读草案内容以后，再提出意见。’当天的会谈便这样结束了。”

民政局长惠特尼准将把总部的标准方案亲手交来时，日方的惊愕是不难想象的。特别是作为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的负责人、起草“松本方案”的国务大臣松本所表现的懊丧情绪是值得同情的。因为对于崇敬大日本帝国宪法、将其视为不朽大典的一代人来说，旧宪法第一条到第四条是“国体”的基本，而人民主权的思想等是极为危险的。因此，2月19日在内阁会议上，松本国务大臣详细报告了全部经过后，压倒多数的人发言认为“象总部方案那样的宪法，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仔细考虑起来，人民主权思想确实不符合我国历史潮流，但普鲁士德国一类的君主主权论也未必完全符合日本的传统。我国历史两千年，主权在天皇，还是在

民并未成为问题的说法是正确的，君民一体才是日本的传统。明治宪法是伊藤博文照搬普鲁士德国君主主权主义的结果，和日本传统有所不同。在这点上，“军人敕谕”也一样。从上古到幕府末期，天皇几乎没有统率过军队。也正是以普鲁士国王为楷模，才由天皇担任大元帅的。

英国宪法从马格纳·卡鲁塔开始，许许多多宪法文本和惯例宪法都没有拘泥于主权在君，还是在民的不明智的问题。硬要说的话，那么，国王(或王后)在议会是主权者，当然，英国宪法学者中至今仍有人主张主权在国王(或女王)，但行使主权的是国会。可是，1649年死守主权神授论的查尔一世被克伦威尔处死，39年之后，詹姆士二世被国会支持的公爵威廉三世从王位上赶下来以后，主权神授论便消声匿迹，确立了国会至高无上的性质，即“君主即位，但不统治”。

吉田茂曾三次出使英国，他似乎认为，只要天皇安泰，主权在君还是在民这种繁琐问题都不重要。不过象吉田茂这样能高瞻远瞩的人是例外。币原内阁的成员几乎全都死抱着旧宪法的天皇制。让我们再来引用一下《十年回忆》第二卷的有关章节，

“于是币原首相2月21日往访麦克阿瑟元帅，直接探询对方的意图。据首相在第二天、22日内阁会议上的报告：麦帅说，‘我衷心为日本着想，特别是会见天皇以后，始终以谋求天皇的安泰为念。但是远东委员会对日本颇为不快，实在出人意料，尤其是苏联和澳大利亚似乎非常恐惧日本复仇。’盟军总部的草案是愿意维护天皇制的，而且这个草案所强调的要点是，第一条以天皇为国家的象征和第二章放弃战争这两项规定。币原首相还说，‘我所得到的印象是，除这两点之外，似乎还有妥协余地。’

“然而当天下午，松本博士到盟军总部去访问惠特尼局长，探询对方所提的草案究竟有多大妥协余地，结果判明，除国会的一院制可以改为两院制以外，对方的态度非常强硬，并且说，‘盟军

总部的草案，作为法典来说是一个整体’，因此，决不象日本方面所想象的那么简单。”

松本国务大臣让法制局第一部长佐藤作助手，自己亲自执笔写了第一、第二、第四、第五章，其他部分由佐藤起草。法制局副局长入江也参加了起草工作。3月2日拿出了日文的草案，两天之后，日文本的草案原封不动地提交盟军总部。

日本方面的这份草案在下述各点与总部的标准方案不同：省略前言，把皇室典范和一般法律相区别，发议权保留给天皇，以进言和同意(advice and consent)来进行辅佐，以及采用两院制等。肯迪斯上校立刻就这几点进行了尖锐质问，松本国务大臣也不示弱。据说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连办公桌都微微颤动。下午两点半左右，松本国务大臣为避免决裂，把后事交给佐藤部长处理，自己先走了。

这一天从下午8时半到第二天5日下午4时，通夜逐条讨论。日本方面参加的是法制局第一部长佐藤，停战联络事务局副局长白洲，以及外务省的小畑薰良、长谷川元吉，共四人；盟军总部方面以肯迪斯、哈西两个人为中心，还有几位官员参加。

住本利男的《占领秘录》上卷对此有非常逼真的描写：整夜谁也没合眼，牛奶、咖啡不断端上来。在讨论到“国会”一项时，天已破晓，佐藤抬头看了看发亮的窗户，感慨万分，脑海里闪现出“孤军奋战”四个大字。

在总部的标准草案里，有不少条款根据日本方面的主张作了修改。除了一院制改为两院制这样重大的更动外，例如，选择职业的自由和学问自由本来是合在一起的，现在又分开；取消了把最高法院判决再拿到国会重新审查的一条；把原案所写法院审判官退休年龄70岁改为“依据法律决定”。土地和其他天然资源国有一条，是松本国务大臣未加说明删掉的，但总部方面也未提出不同意见。有关宪法议决方法以及地方制度也分别接受了松本方案

和佐藤方案。

### 十三

总部归纳整理的最后方案逐一拿到内阁会议上讨论，但3月5日内阁会议上，对天皇的地位持有不同看法的人很多，所以情况严重。据吉田茂在《十年回忆》第二卷里所写，天皇陛下曾亲自表示“内阁会议的决定不宜过于拖延，关于天皇的地位，按照盟军总部的方案也就可以了”。由于天皇这一发言的传达，结果总算平息了争论。也可以说，在“波茨坦公告”时曾作出两个圣断，继此之后这是天皇下的第三个圣断。

吉田茂的《十年回忆》第二卷所回顾的情节，令人注目：“回顾一下修改草案完成以前的过程，就会发现，对我方来说，实际上很象同外国进行缔约谈判，甚至可以说比缔约谈判更富有‘外交性’。”

的确，当时修改宪法不是我国的内政问题，其目的是为了创造条件使已经被国际社会驱逐的日本重新回到国际社会。这是一种占领军与被占领国之间极为特殊的外交谈判。从这一意义上讲，关于宪法是否是强加给日本的这一争论是愚蠢的。为了遭到排斥的日本回到国际社会，必须放弃天皇主权主义，不单单要放弃侵略战争，而且也有必要造成一种印象，连自卫战争也放弃了。

在这一点上应当注意的是，总司令部完成规定“放弃战争”条文的英译本时，“作为解决同其他国家之间争议的工具”这个条件，是和“战争”以及“武力威胁与行使”两点都有关系的，当然这也可以解释为并没有放弃为了自卫的战争。

停战联络事务局副局长白洲次郎3月6日手记里写的内容已广为人们所知：“就这样，具有极其明显的战败特色的宪法草案诞生了。无法抑制‘等着瞧吧’的情绪，只得暗自流泪。”它真实地表达了日本方面有关人士的心情。币原内阁在内阁会议上通过宪法

修正案，从大局上判断是正确的。让我们听听吉田茂是怎样说的，“就我国当时和盟国的关系而论，当务之急就是缔结和约，恢复独立和主权。为此，必须尽早向国内外声明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和平国家的诚意，以取得信赖。政府当局认为，修改宪法固然是一桩大事，但在上述客观形势下，始终纠缠于立法技术问题，并非明智之举，只要在原则上没有问题，就应该把修改草案确定下来。也就是说，在政府当局这种想法的深处大概是‘外交感’发挥了作用。这是事实的真相。”

人们常说：“好了疮疤忘了疼”。日本在独立以后，享受着和平与繁荣，但另一方面却又进行挑剔和指责，说什么美国把新宪法强加给日本，日本接受了强制。说这些话实在是太天真无知了。

吉田茂不久作为内阁首相把宪法修改方案提交帝国议会并负责回答质询。他过去作为币原内阁的外相，为了使人理解赞成修改宪法的理由，至少考虑到如下两点：第一，当时日本在国际社会是何等孤立，被人憎恨。战败8年以后我到慕尼黑留学时有件事使我很吃惊。一个德国人问我：“美国人给你送了多少口袋粮食？”我回答说：“粮食口袋等，我一点也没有收到”。这又使对方感到吃惊。

尽管有希特勒那样恶魔般种种残暴行为，但德国和美国之间还是有着浓厚的血肉联系。除了通过基督教会和天主教会的宗教联系，各方面都俨然存在着无法割断的联系。与此相反，日本和美国的联系渠道几乎丧失殆尽。从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战时在伦敦接受庇护这一点来看，英德关系的紧密程度也可想而知。然而公正地说，日本却只是被美国、被英国所憎恨。

第二点不能忘记的是，日本经济由于长期战争，遭到的打击相当严重。只是直接的战争损失，在战争结束时，就达到那时的497亿日元，相当于国内资产的20%，再加上资本设备的消耗、疏散时的损失，国家财富的损失不可估量。



结果引起了通货膨胀。1945年8月15日日本银行券发行量是303亿日元，到第二年2月18日增加到618亿日元。以1945年7月为100的零售物价指数，第二年1月，上涨到237.3%。尤其是粮食不足，动摇了国民生活的基础。1946年2月11日，总部发出备忘录，同意周济200万英镑的面粉。好不容易才避免了饿死大批人的最坏局面。

如果考虑到这些客观条件，毫无疑问，修改宪法是从卓越的国际感出发、从大局着眼的明智选择。

令人感到惊异的是，那些把日本带入上述绝境、负有严重责任的人们中间，竟然还有不少人发出“不应该接受别人强加的宪法”这类不负责任的谴责。

### 第三章 组织内阁

宪法修改草案大纲和敕语以及内阁首相的谈话于1946年3月6日傍晚由内阁同时发表。第二天的报纸都在“主权在民”“放弃战争的新宪法草案”等大标题下登载了草案大纲，同时刊登了全面支持这一大纲的麦克阿瑟元帅的声明。

在4月10日进行的帝国议会大选中，修改宪法成了争论的焦点。据5月27日《每日新闻》发表的“每日新闻社关于新宪法草案舆论调查结果”，支持草案的天皇制者占85%，反对者占13%，比率相差很大。对于是否有必要放弃战争的条款这一问题，70%回答认为必要，28%认为没有必要。

外务省总务局发表的“对宪法草案大纲的内外反响(之二)”把“草案大纲付出极大努力使天皇制的保存和主权在民的思想加以调和，给人一种安心之感”作为显著的反响之一列举出来。

包含妇女参政权在内的选举权、被选举权的扩大，设置大选举区，限制“连记制”(选举时把两名以上候选人写在同一选票上——译者)等新选举法虽具有划时代意义，但有权者主要关心的不是修改宪法，而是粮食问题。

1945年7月11日，即接受“波茨坦公告”前一个月，主食的配给量由一天两合三勺(“合”是容积单位，一合为一升的十分之一，约180立方厘米，十勺为一合——译者)，削减一成，改为两合一

勺，平均每人不过965卡路里。即使能够完全实行这种配给，也是难以生存的。

从1946年2月底开始，两合一勺的配给也迟迟不能保证。第一个原因是，1945年大米产量锐减，实收3,917万8千石，同前一年相比，减少了三分之一。第二个原因是，交售情况不佳。战争失败的1945年交售计划的85%至90%原拟1946年2月底完成，可是，到二月份尽了最大努力，实际交售额才达到40%。大米黑市的价格高达官价的25倍。农民对威信扫地的政府不满情绪加剧，几乎一触即发，这也是不足为怪的。

结果使维持配给所必需的库存量已经不能确保20天了！据3月22日的统计，库存量能维持20天以上的，在6大城市中只有名古屋为25.7天，东京是5.5天，横滨12.7天，京都6.6天，大阪14.2天，神户8.0天。北海道情况更为严重。3月10号前后，札幌只2.3天，小樽0.7天，函馆0.3天，室兰粮库已空空如也，库存为零天。

主食配给的延迟，从三月份以后就逐渐恶化了。东京4月10日是2.5天发一次，20日是5.1天发一次，到30日6.9天才发一次。在这种险恶的情况下，能够进行大选几乎是不可理解的。到4月7日为止，政党乱立，计有363个政党出现，将近2,800名候选人进行竞争。4月10日投票的结果，确定席位466席，第一大党是鸠山一郎为首的自由党，获得141席；第二位是进步党，94席；社会党获93席，为第三党；协同党得14席；共产党得5席。

由于没有控制多数的政党，只有成立某种形式的联合政权，或者至少必须得到内阁以外的合作。但是无论如何，国民已作出裁判，币原内阁总辞职是顺理成章的。而且许多人认为，掌握政局主导权的是第一大党党首鸠山一郎。但根据5月3日总部的备忘录，鸠山一郎被整肃。5月22日吉田茂第一届内阁宣布成立。吉田茂在《十年回忆》第一卷回顾当时情景时写道：

“鸠山一郎被整肃，确实事出突然。据事后得悉，整肃鸠山的意见似乎早已传达到政府内部，究竟来自何方，虽不大清楚，但是书记官长榎桥渡和内务大臣三土忠造似乎事先已经知道。

“这时，从政府中传出了否定当时所谓‘宪政常道论’的论调，有人认为，如果鸠山不行，掌握政权的未必非第一党不可。当这种论调遭到舆论的谴责时，整肃鸠山的消息便逐渐流传开来。

“因此，关于鸠山的整肃，成为幕后政治的话题，并且似乎早就有人忠告鸠山说：‘你很有被整肃的可能，所以还是在政治上不就任要职为宜。’而鸠山却不顾这种逆耳的见解，竟委派三木武吉进行与社会党联合的工作，但当这项工作失败时，鸠山便遭到了整肃。然而，问题竟因此波及到我身上，我不但没有充分考虑便参加了政党，而且还当了政党的总裁。”

鸠山一郎被整肃不但影响他本人，而且也严重地改变了吉田茂的命运。这是决定日本政治史方向的重大事件。为了理解这一事件，需要先考虑一下这以前发生的松本治一郎事件。让我们听听停战联络事务局政治部长曾祢益在“我的回忆录——从霞关到永田町”一文中是怎样说的吧：

“其中有一个特殊情况。4月3日按当时农历是祭祀神武天皇的假日。那天是确定候选人截止的日子，因公务在身，我一早就去上班。刚一到，马卡姆那里就来电话说，‘为使松本治一郎今天能确定为候选人，向福冈县知事野田发出政府命令！’‘究竟出于什么理由，承认这一例外呢？’‘据说币原首相秘书官福岛慎太郎拿着榎桥渡书记官长的信到了盟军总部，读了信才感觉到，松本治一郎和尾崎琴堂，这两个人都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据说他们是绝对应当定为候选人的，所以从整肃的名单中划掉并安排在今天就定为候选人。’制造这种特殊事例，以后会产生许多麻烦。但是在电话中说不清楚。于是，就到马卡姆办公室去了。而最后答复是‘不要再发什么牢骚，这是司令部绝对不可动摇的命令。’

“事已如此，没有办法，只得沮丧地回来，我这个人性情孤僻。也没到外务大臣那里去汇报。虽然外务大臣是我的顶头上司，但整肃一类问题是内务部和首相管辖的。我是作为内阁一员履行自己工作职责，因此很快打电话给内务部地方局长郡祐一，希望他安排松本治一郎在福冈县地方定为候选人。然后又给法制局长官木内四郎挂了电话，告诉他‘转达给币原，尽早处理。’

“我正感到事情不好办，第二天早晨到外务大臣官邸去时，吉田茂突然大发雷霆说：‘你和榎桥勾结在一起进行策划，真是岂有此理，’接着又训斥我说：‘松本治一郎这件事是司令部的命令，我传达了，你们还没有办吗？’‘首相也说过，如果是命令，那就应该给我书面的文件，没有文件，那就不是命令，不必管它！’等等，和我大发一通脾气。我心想，这真莫名其妙。可是时间已经迟了，松本治一郎终于没有定为候选人。

“弄得我也很头痛，吉田发脾气，说我跟榎桥勾结一起进行策划，是毫无道理的。司令部的正式命令，我当然应该忠实传达，外务大臣不执行，是外务大臣的过错。我夹在司令部和吉田之间，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我曾想很快提出辞职，但在此之前，应当对司令部解释清楚才有面子。不然将使日本政府威信扫地。所以我到司令部去讲了这些情况。究竟该不该发火？我不仅到了马卡姆那里，也去了肯迪斯那里，说明经过，他非常愤慨。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他说‘向麦克阿瑟报告！’我也就离开那里，直接到外务次官那里提出了辞呈。”

这一事件很能说明间接统治的占领是怎样一种状况。松本治一郎是1887年出生的政治家，是一位把毕生献给部落解放运动的民主主义者。因为1942年大选中接受过翼赞会的推荐，所以符合整肃、剥夺公职的条例。榎桥书记官长对总部进行工作的结果，中央情报局的马卡姆中校才打电话给曾祚益作了指示。吉田外务大臣没有接到书面命令，认为没有必要遵从。曾祚益当时因此事受

到吉田厌恶。不久，以鸠山整肃事件为理由，与吉田发生正面冲突，但他对吉田外相抵制总部命令的勇气给了很高的评价。他写道：“在松本治一郎事件当时，我认为吉田很有魄力。吉田曾说过，‘不能因为是总部说的就唯唯诺诺服从，占领军说的话，不合理的还是不合理’。因此他对这件事表示反对。在当时日本政府和占领军力量对比悬殊情况下能够说那样明确的话，是很不容易的。

“不过，这件事的确激怒了中央情报局的马卡姆。后来成了总部内民政局产生反吉田情绪的决定性因素。”

而松本事件又是直接同鸠山事件相关的。这在后面还要提到。

## 二

鸠山一郎生于明治16年(1883年)，比吉田小五岁。父亲鸠山和夫，当过众议院议长。鸠山一郎从大正4年(1915年)首次当选议员以来，一直属于政友会，担任过该会干事长。1927年到1929年，任田中义一内阁的书记官长。后在犬养毅内阁、斋藤实内阁，当过文部大臣。由于跟不上急剧军国主义化潮流而被淘汰。战争期间隐居在轻井泽，战败之后重新开始政治活动。

作为政党政治家，他是忠于议会政治的，从这一点来评价，鸠山充任日本民主化的领导人是称职的。战争期间隐居在轻井泽，也可以证明他是反军国主义、主张自由主义的。

但是，如果想起昭和8年(1933年)4月22日，京都大学发生的要求京大校长解除泷川幸辰教授职务的泷川事件，就会觉得鸠山一郎的自由主义和反军国主义都是令人怀疑的。当时有关方面向总部提供的情报说，鸠山一郎的著述《世界的面貌》美化极权主义和扩张主义，于是，关于审查鸠山一郎公职资格问题，很自然地在盟军总部内部发生了尖锐对立。威洛比少将的情报部肯定鸠山作为

议会政治家的业绩，而以民政局为中心的新政策拥护者<sup>①</sup>却认为鸠山的自由主义是虚伪的，符合整肃的条件。反鸠山派的将校级军官们考虑到利用新闻记者，所以把《世界的面貌》一书的译文交给了《芝加哥太阳报》颇有才干的特派记者麦克·盖恩。

4月6日，即大选投票前4天，麦克·盖恩等特派记者利用和四大政党举行晚餐会的机会组织了对鸠山一郎的“政治审查会”。麦克·盖恩的《日本日记》所记载的情况是这样的：“在这次晚餐会的前夕，我组织了政治审查会，被告就是鸠山。报社特派记者可能不应当参与政治。但是我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一工作都是正当的。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很想帮助日本从有数的几名战犯（准备就任下届首相、具有相当危险性的人）手中解脱出来。同时，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我期待的是头版新闻。

“一周左右前，盟军总部把鸠山1938年访问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回国以后写的书交给我翻译。书中充满了与下届首相身分不符的话。将校军官们试图以这本书为依据整肃鸠山，但他们失败了。于是他们把这本书的翻译工作交给了我。晚餐会开始以前，我把这本书拆开，分成12部分，分别交给了对此事关心的中国、英国、美国等国的特派记者，让他们分担我的工作。第一炮是由国际新闻社特派记者澳大利亚人弗朗克·罗伯特逊打响的。他把鸠山这部著述的一节拿出来开口便问鸠山作何解释，1938年写成的这一节内容如下：‘希特勒从心里爱日本。日本国民要致力于精神训练，不应当辜负希特勒的信任。’以此为开端的追问越来越激烈，的确多少有点猛烈。但是，关于鸠山的历史只能怪他自己。有人质问说，诸如‘纳粹的精神和日本武士道一样’，日本关于工会问题‘应当充分学习’纳粹的方案（总统的整个理念，紧密地贯穿在统率劳动的各项法律之中。这一切都是防止阶级斗争的）等等，他

---

<sup>①</sup> 指拥护1933年美国总统一罗斯福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人。——译者

自己过去写的文章,现在他是否相信?我们从他的著作中引用他顽固地美化希特勒、莫索里尼的语句来追问他(如说什么“尽管英国有种种宣传,但莫索里尼还是坚定不移,勇往直前的,应当把他作为当代英雄,为了意大利,为了意大利的国民,莫索里尼万岁!”)。

“英国特派记者质问鸠山与夏尔玛鲁·谢哈特的会谈内容。鸠山自己写道,在会谈中他提议,‘为了把英国的势力从中国驱逐出去’,在中国采取日德联合行动。中国中央通讯社蔡爱迪要求鸠山说明他所写的在参加英国首相张伯伦及其他保守党领袖的宴会时说‘中国如果不由日本管理,很难继续生存’的看法。

“随着追问越来越尖锐,鸠山越来越语无伦次了。最初,他坚持说什么也记不清了,于是人们引用他书上写的内容来追问,他便说书中写的都是谎言。他还辩解说,只有大学同年级学生聚会时候,才说真话。那时他说过,‘希特勒是个撒谎的人,莫索里尼是个乡下佬,只有张伯伦有些绅士派头。’我们进一步追问说‘今天能不能站在国民面前,承认撒谎是当时的事,而决不是现在,坦白交待自己8年前撒了谎,把国民进一步推向战争深渊?’

“而且,我们的武器不仅仅是那本书,还进一步提供了各种资料:鸠山已经丧失了同查问者进行比赛的思考敏捷性,完全成了一个老态龙钟的人。他对蔡说:‘日华事变爆发当时,我认为如果能以承认日本特殊利益的条件来处理的话,中国不丢面子,日本也得到了满足,一切都将十分顺利。’又对我承认了4个月前说过的话:‘占领新加坡当时,我是从心里支持战争的’而且现在仍然相信‘劳动规律’。

“当鸠山设想晚餐会的愉快,坐下来大约8小时以后,遭到了致命的一击。我们紧逼不放,指出:8年前他对希特勒说‘不久,为了实行我的政策……我成为首相的时代将会到来。’今晚他发表的见解是否等于取消了他作为首相所追求的光明正大政策的许诺?可是他没有回答。



“明天的报纸将以大字标题登载盟军总部和日本政府审查鸠山后已使他通过的反应，我们高兴地等待着这一反应。”

受到这样沉重的打击，谁都会认为一切都完了，可是鸠山一郎却毫不在意或者说十分乐观，好象不感到情况的严重性。

鸠山本人后来回忆说：“那时候我并没有把它看作一回事，我过于相信自己了。世界上的正义并不一定总是胜利。”从他的回忆也可以看出，他过分自信，没有料到麦克·盖恩等新闻记者的审查会有多大意义。

新闻记者是“无冕之王”，这话一点不错。在自由社会，新闻记者扮演的角色是可怕的。众所周知，麦克阿瑟元帅对于宣传报道很敏感。4月6日的审查会对总部的动向有决定性的影响，盟军总部内的反鸠山派把《世界的面貌》交给麦克·盖恩，基本上达到了目的。

### 三

麦克·盖恩等人成立“审查会”4天以后，即大选投票的当天4月14日，停战联络事务局的政治部长曾祚益被中央情报局叫了去。马卡姆中校部下的一位少校说，日本政府必须重新审查鸠山一郎的资格。当时提出的事实如下：

“1. 田中义一内阁时，鸠山作为内阁书记官长主持了蓄谋侵略中国大陆的东方会议；

“2. 治安维持法给日本民主化带来最恶劣的影响。当该法增加死刑条例时，他正担任书记官长；

“3. 镇压自由主义学者，泷川事件时，他是文部大臣；

“4. 在1938年所写的著作中，美化希特勒和莫索里尼。”

听到这些，曾祚部长的直感是“这就不行了！”。那位少校亲切地教诲说：“日本方面要尽快重新审查，以不失日本政府体面的形式，加以处理。以前的松本治一郎事件就已经使人愤怒了，这次

肯定还会冒出一些材料，这样，日本政府的面子就要丢光了。”于是，曾祚政治部长立即把这一内容报告日本政府。不过因为在松本治一郎事件中和吉田外相发生了冲突，并向外相提出辞职，因此，他没有直接向外相转达，而是向总务部长井口贞夫讲的。井口部长每天早晨出席外务大臣官邸举行的会议，当然汇报了这一情况。如果不是在松本治一郎事件中吉田茂和曾祚部长关系别扭，吉田外相可能相当重视曾祚部长说的话，并采取种种措施。

对鸠山一郎来说，造成不幸结果的原因之一是，吉田外相通过停战联络事务局次长白洲不断同威洛比少将的情报部保持接触，因而得到的情报都是乐观的，直到最后，情报部的人也不相信鸠山会被整肃。

当然，即使吉田外相在4月10日一段时间以后竭力庇护鸠山，但是否能免于使他被整肃还值得怀疑。4月16日专门对美国占领军发行的报纸《星条旗报》报道了鸠山候补资格申请书，没有提到《世界的面貌》的有关消息。在第二天召开的対日理事会上，中国代表朱世明就鸠山问题进行质问，事态进一步恶化了。

看到这种形势，内务大臣三土忠造和书记官长榎桥渡出面活动，他们二人根据曾祚部长等人的情报，认为整肃鸠山已不可避免，便开始作稳定币原内阁的工作。

前面引用的吉田茂《十年回忆》第一卷所写整肃鸠山的暗示很早就传到政府内部，虽然我并不了解是从哪里传来的情报，但书记官长榎桥渡和内务部长三土忠造二人确实事先知道，就是指的上述情况。

与吉田外相不重视曾祚部长的情报相反，三土内务部长和榎桥书记官长相信整肃鸠山不可避免是因为有足够材料的缘故。至于三土内务部长，他似乎有野心，想取代币原当首相。

后面还要提到，出于同一动机，三土内相费尽心机，破坏吉田外相的组阁工作。榎桥也在活动，如果实现鸠山内阁，他将继

续留任书记官长，但没有成功。据说是他把鸠山不利的情报送到了盟军总部。

另一方面，币原首相自己也被权力地位的魅力所迷惑，据说他以当时没有控制多数议席的政党为理由而强烈表示愿意留任。政治世界经常出现下述情况：以“公正的目标”为个人的动机作辩护。究竟哪些是真正意图，哪些是表面原则，有很多弄不清楚之处，这正是政治的难处。外表看来骨瘦如柴的币原首相，即使有一点利己的动机和考虑，也是不足为奇的，认为这些当官的只考虑公众利益，倒是不自然的。

4月16日，在首相官邸与内阁记者团会见的招待会上，币原首相说了如下心里话：

“如果一个政党得到过半数议席并能使政局稳定的话，我就很高兴撤下来。我过去完全没有抓住政权不放的想法，今后也不会恋念政权。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能使政局稳定，因为政局不稳定，便不能说一声‘拜托大家’，自己撂挑子而去。现在我脑子里一刻也离不开的是修改宪法问题，不看清宪法如何修改，其命运如何，良心是不允许我拜托大家而离职的。”

币原的发言可以看作是坚持留任宣言。三天后，自由党、社会党、协同党和共产党四个党组成“打倒币原内阁联合委员会”，反对首相留任，并通过了要求币原内阁立即辞职的决议。币原4月19日加入进步党，23日当上了总裁。在这前一天，他屈服于要求倒阁的舆论，宣布内阁总辞职。古岛一雄在“一个老政治家的回忆”里重现了币原内阁临终时的痛苦情景，这里引用一下：

“但到了最后时刻，币原反而不容易辞职了。据说吉田讲过，‘你看币原真差劲，鸠山已经那个样子了——选举结果已使自由党成了第一大党——还留恋首相的位子，不肯放手。这可能发生拥护宪政的骚动。你想点办法吧！’

“于是我说，平时我总是劝他干下去，现在再去要他下台，合

适吗？币原来找我，又当别论，我主动找他不好。正在这期间，币原叫我去。我去一看，正好三土也在，并不断讲鸠山的坏话。我问币原，‘你说有事找我来，什么事呢？’这样一说，三土便悄悄溜了。

“这时币原对我说：‘实际形势，如你所知，拥护宪政运动正在展开。我想向鸠山、片山发出呼吁，怎样做才好，想听听你的意见。’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也不清楚。‘说要呼吁，呼吁些什么呢？’他说：‘反正已有拥护宪政的呼声，不着手处理，很不好办’。我就对他讲道：‘不正是因为你不下台，才有拥护宪政的运动吗？要向他们呼吁，也简单明了，现在举国上下一致在进行拥护宪政运动，不论鸠山也好，片山也好，要谈这类事情肯定会说，请你下台后再谈。这是作为政党首领的想法，你不论怎样呼吁，也没有一个蠢人会响应的？’

“我这样一讲，他又说了些‘这种情况下，治安就无法维持’等意见，我说：‘你也是拥护宪政的人，拥护宪政的题目是非常简单明确的。正因为如此，才要向国民发出呼吁。可是，只讲理论也无用。你不下台，如果掀起了拥护宪政运动怎么办呢？无法维持治安时，只能发布戒严令，稍有差错，麦克阿瑟元帅就会出来。人们常说保持臣节，我保持臣节和你保持臣节的方式不同。让这种荒唐的事干扰天皇，并不是对天皇的臣节。’

“我劝了一番以后，不知他考虑什么，只说了一声‘谢谢’，我说：‘请你好好考虑一下，可不能对鸠山、片山发什么呼吁。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当机立断，干得干净利索才好’。我还问他‘三土经常来干什么？’，‘噢，那是别的事。这次来同我商量的是共产党想让他当总裁、收拾残局，究竟如何’，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共产党究竟谁出面谈的呢？’‘不大清楚，好象是平野（力三）’，‘平野和三土直接进行的交易吗？’‘也不一定。听秘书说，内务部的官员也插手了。所以，三土来谈有这样一件事，同我商量

当个总裁怎么样。现在正愁不知该怎样回答才好?’我笑着对他说,‘现今的社会,让三土马上当总裁,简直是开玩笑。拥护者,自然荒唐可笑,被拥护的更是傻瓜。你不要相信那些梦话了。’他只回答说:‘噢,是吗?’可是到了第二天,他提出辞职不干了。结果,是我的劝告使他下了台。”

币原首相和三土内务部长对政权宝座各自抱有“不寻常的热情”,这是人所共知的。至于三土忠造和社会党的关系,《西尾末广的政治回忆录》有这样的描述:

“币原内阁在大选后仍然顽固地进行留任的工作。对此,在野党自不待言,整个舆论界,反对币原内阁的呼声很强烈。这时,我的同乡、出身香川县、战时任过大藏大臣的三土忠造把我和平野请到麻布的住处,谈过如果三土内阁能够成立,请社会党合作的事,并听取我们的意见。”

据推测,三土忠造的本意是想取代币原,自己担任进步党总裁,通过社会党的合作来组阁。

4月22日,币原内阁总辞职。反币原势力超过了众院半数。币原的败局已定,只得交给古岛一雄老头来引导了。

从4月23日开始,币原首相为奏请天皇同意后继内阁人选,和自由党总裁鸠山、社会党书记长片山分别举行会谈。在这一阶段,鸠山一郎还相信可以和社会党成立联合内阁。原因是头一年8月25日,在银座交询社,西尾末广由平野力三的斡旋同鸠山一郎、芦田均、植原悦二郎、安藤正纯等举行过会谈。

植原悦二郎发言说:“从战败这样一种非常事态中站起来,重建日本,为此需要合作,所以想成立一个新政党。”西尾末广回答道:“我们担任领导的同事们并不是孩子,能够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或者能够协调行动。可是,我认为让双方背后许多人采取同一步骤,是相当困难的。”

鸠山一郎说:“总之,诸位和我们成长的经历不一样,一起干

恐怕有些勉强。”说完，会谈即告结束。虽然如此，却留下了必要时互相合作的“余韵”。

在23日币原、片山会谈之后所举行的社会党中央常务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主张联合和反对联合的两种意见尖锐对立。西尾末广和平野力三等右派所主张的联合论认为，“现在我们党是第三党，所以不能要求马上担任首相职务。目前的措施是向第一党自由党的内阁输送更多的内阁官员，并尽量实现我们提出的政策。”而左派坚持的反对论则认为，“我们作为社会主义政党，和资本主义政党进行合作等于自己否定自己，是站不住脚的。即使能够联合，也只限于我们担任首相的场合。”经过三个半小时的激烈争论，联合论以7票对8票微弱之差败北。

#### 四

为避免被整肃，有人主张谨慎，认为众院议长或国务大臣暂时应当忍耐，可是鸠山一郎力排自重论，而选择了“准备牺牲”的道路。4月30日，他下定决心由自由党单独组阁。

吉田外相按照币原首相的要求会见了参谋长马歇尔，探询鸠山担任公职资格是否有问题，对方说，关于首相人选，如果征求盟军总部意见的话，毫无疑问回答是要被剥夺公职的。

这事对一向持乐观态度的吉田茂来说，是一个巨大打击。据榎桥渡说，吉田茂垂头丧气地说了声“我不知道”，就回家了。币原首相说，“吉田不负责任。过去那样起劲地纵恿，事到如今，却逃之夭夭，鸠山值得同情。再叫吉田来一次，我们谈谈。”于是又找吉田外相来，榎桥书记官长也参加，三人一起进行了交谈。因为鸠山一郎下了宁可牺牲的决心，寸步不让，所以后继首相只有推荐他。吉田外相接受币原首相的指示，给麦帅写了一封信，时间是1946年5月4日，内容如下：

“拜启。自4月22日上报内阁总辞职一事，首相为确定有关后

继内阁方案，同自由党总裁鸠山和社会党书记长片山交换了意见。

“上述两个政党经过长时间的讨论，鸠山已下决心，如蒙允许，愿接受组织后继内阁的使命。同时，两党之间在达成谅解情况下，社会党准备支持新政府的政策。

“在这种形势下，币原男爵拟征得同意奏请天皇令鸠山组阁。币原男爵这一奏请是否能得到阁下同意，望事前予以通报。根据首相的要求，如就此问题能告知阁下的想法，我将感到甚为荣幸。如阁下希望会见首相，首相将愉快地拜访阁下。敬具。”

对吉田的这封信，同一天惠特尼准将复信如下：

“拜复。根据麦帅的指示，我通知你，有关鸠山是否有资格担任公职问题的贵翰业已收悉。在此函收到之前，元帅关于该主要问题的指令已发给日本帝国政府。如这一指令尚未收到，无疑将很快送到你手中。

“指令已完全回答了所提出的问题。敬具。”

吉田外相5月4日上午9时45分接到了盟军总部的指令，指令是5月3号发出的，内容如下：

“一、1946年1月4日在《关于整肃不受欢迎人物的备忘录》中业已指令，日本政府应根据指令的精神和字句，对欺骗和错误引导日本人的，剥夺他们议员候选人的资格；

“二、1946年4月10日大选前后，停战中央联络事务局对鸠山一郎（东京第一选区选出的议员）担任公职资格问题，参照日本政府审查后发表的证据已提出疑问，期待日本政府重新做出审查，停战中央联络事务局已接到通告。

“三、鉴于日本政府对自身的责任未采取任何措施，最高司令官查证鸠山公职资格的有关事实，认为鸠山符合《整肃令》附件A之G项第一和第三点，属于不受欢迎的人。

“A. 1927到1929年任田中内阁书记官长，他对议会不赞成的所谓治安维持法的修改、制定和公布，当然负有责任。这是使

该法律成为日本政府压制言论、集会自由的主要工具，使热心支持主张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少数派的人们可能遭到检举、恐怖活动、拘留入狱等迫害，并阻碍了有效反对日本军阀体制运动的发展。

“B. 1931年12月到1934年3月期间担任文部大臣。他对大量驱逐、逮捕有“左翼”倾向和危险思想嫌疑的教师和压制学校言论自由负有责任。1933年5月，根据鸠山个人的命令，罢免了东大的泷川教授；这是鸠山践踏学术自由的自由主义传统的明显例证。这些行动对于在军阀和财阀的保护下终于把日本国民引向战争、对于精神动员起了促进的作用。

“C. 鸠山不仅参加这种对言论、集会、思想自由的残酷镇压，制造典型，而且参与了强制解散工农团体的活动。他还赞同极权主义，特别是关系到工人阶级工会的管制方面，这已记录在案。他认为把希特勒压制工人阶级的计划移植到日本‘是一件好事’，表明他对于通过组织的自由和自己选举的代表履行集体合同的有关工人权利的民主主义原理，天生就抱有反感。不管地点如何，也不管形式名称如何，无论怎样伪装，首先削弱为相互利益而团结的个人自由进而压制这种自由，是极权主义独裁的惯用手法。鸠山在口头上不论怎样宣称为议会政治作过贡献，但支持对工人阶级进行管制的极权主义原理，就清楚地表明，他是为准备侵略战争、把日本放在极权主义经济基础上而重新改组的超国家主义利益的走狗。

“D. 他的行动一贯支持日本的侵略行为。1937年7月，他作为当时首相近卫的私人使节，为替日本侵略计划辩护而访问了美国和西欧。这期间，他同这些国家谈判有关继续中国事变和占领后进行剥削的经济协定。1937年，鸠山对英国首相说，‘中国如不接受日本统治必将灭亡’，并谎称，日本对华干涉的主要动机是‘考虑中国国民的幸福’。



“E. 鸠山曾伪装成为一个反军国主义者,但1942年大选时,他对选民的致辞说,他的政治信条是支持侵略战争,他‘庆幸’袭击珍珠港‘获得了巨大胜利’,并说九·一八事变和中国事变的真正原因是由于英美使中国国内反日感情高涨。1928年到1929年嘲笑批判田中内阁的人,夸耀田中内阁‘结束了迄今对英美的软弱外交’并且自负地声称,‘现在由田中内阁树立的世界政策正在一步一步实现’。这或者是他的真心话,或者仅仅出于机会主义才这样讲的。不论怎样,都意味着他同臭名昭著的田中征服世界的政策融为一体的关系。这证明鸠山欺骗了日本国民,他是错误引导日本,使之陷入军国主义的重大失败者之一。

“四、鉴于这些事实并考虑到这里未记述的其他情况,盟军总部命令日本政府根据整肃令剥夺鸠山一郎的议员资格。”

事情终于发生了。币原首相本身在滨口内阁任外相时代就被鸠山指责为“软弱外交”,币原对此一直有怨恨情绪,因此他对鸠山是不信任的,这一点前面已提到过。

但是,把个人的感情和公事相区别,这点见识,币原是具备的。他希望了解剥夺鸠山公职问题的真相,因此把曾祜益部长叫来了。曾祜部长报告了中央情报局少校告诉他的话,“实际上这是上次松本治一郎事件的报复。对前不久吉田那种做法,这次要以备忘录形式回敬一下!”据说,被曾祜揭露丢了面子的吉田外相简直是怒不可遏地说,“曾祜那个家伙一边向我提出辞职,一边又在那里捣乱。”

总之,谁都知道吉田茂是一个很难对付、喜怒无常的人。据桥口收所著《饶舌与寡言》一书说,“吉田茂三次总有一次情绪不佳,五次才能碰上一次好情绪”。曾祜部长知道吉田茂大发雷霆,便立刻回到上野毛自己老家,不再露面了。他同意担任福冈停战联络事务局局长,是在三个月以后,即8月份。曾祜毕竟不好断然拒绝外务省老前辈和后辈们的推选。但也正因为这个缘故,不久,曾

祿根据西尾末广的恳切要求，加入了社会党，以后就任担任了民社党第一任书记长。

## 五

由于鸠山一郎被整肃，建立自由党单独内阁的设想失去了基础，如何处理政局善后事宜，又必须重新开始了。

从整肃鸠山的指令传达之日5月4号开始，到吉田茂接任自由党的领导10天中间，日本政局一片混乱，很难了解事实真相。对照一下当事者的证言，有相当多的矛盾。作为自由党总裁后继人选，在提出的候补者中间，除吉田茂外，还有古岛一雄和松平恒雄二人。结果由于鸠山一郎和松野鹤平热心推荐吉田，心满意足当上进步党总裁的币原首相也支持吉田出马，并起了决定性作用。以盟军总部指令方式决定整肃之前，鸠山一郎和吉田茂、松野鹤平三人一起谈过，“万一出现最坏情况，我不能当首相的话，请吉田君来当”，吉田茂一口否定，“我不干！”可是鸠山的想法似乎并没有改变。

鸠山一郎和吉田茂的友谊是从吉田任外务次官时开始的。1928年7月，吉田由于那次“猎宫”运动当上外务次官时，鸠山是内阁书记官长，但当时关系并不怎么亲密。鸠山说：“在他当外务次官时，我和他的交往不深，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个很骄傲、有些怪癖的人。一起到英国之后，发现我们的意见常常不谋而合，觉得他思想稳健、严谨，也很幽默，从此关系变得亲密起来。

“日中事变开始时，我在欧洲，担心形势这样发展下去弄不好就可能和英美打起来，因而让他问问近卫，近卫回话说，‘不必担心，方针是不扩大，所以不会大打，但是事态逐渐扩大了。在伦敦时我很忧虑，曾和吉田谈过。回国以后一星期见一、两次面，谈些如何削弱军阀势力、采取什么措施制止他们横行霸道之类的问题。

题。”

尽管自由党干事长河野一郎反对说，“现在这时候拉住吉田这样的老人干什么”，鸠山一郎还是在5月4号见了松野鹤平和吉田茂，而且单刀直入地要求吉田就任后继总裁。鸠山说：“我被整肃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作为政党总裁，做了应该做的一切。事已至此，没办法挽救了。但是以后的事，请你来干。”吉田回答说：“我干不了那样的差使。外务大臣又当别论，我不是继任政党总裁的材料。”鸠山坚持说：“我们之间谁还不了解谁吗？除了你以外没有别人更合适了！”但吉田仍然不答应。吉田茂以“内政方面一无知识、二无经验，岳父牧野伯爵也反对”为理由坚决推辞，并推荐政党政治家古岛一雄来接替。

于是，第二天即5月5日，鸠山一郎和松野鹤平一起到世田谷区经堂古岛家，恳请发烧38度、卧病在床的古岛老人出马。两个人对古岛说：“事出无奈，暂时一段时间请你来领导自由党，时间不会太长，最多半年，以后再另想办法。”说完，坐在枕边一动也不动。可是古岛立刻拒绝了，他说：“我是一个从政界引退的人，让我来当首相是很荒唐的。我过去劝过犬养不要当首相，对山本权兵卫也说过同样的话，现在我自己又怎么能出来干这种差事呢！吉田比我合适，让他干吧！”

据古岛一雄《一个老政治家的回忆》一书所写，古岛听说有人推举了松平恒雄、松方乙彦的时候就说过：“比起他们来，吉田不是更合适吗！”听到“吉田不太内行”的反驳后，古岛老人强烈推荐吉田说：“要那样说的话，别人更外行，尤其吉田现在还担任自由党的顾问，让他干吧，干吧！”

受鸠山委托，吉田茂开始去说服古岛老人出马。古岛反倒动员吉田说：“我已经是80岁的老人了，怎么还能干？我是绝对不干的，你来干吧！”于是吉田茂又向鸠山推荐外交界老前辈、前宫内大臣松平恒雄。后边还要提到，因为自由党干事长河野一郎也推

荐松平恒雄，所以鸠山委托吉田去作松平的工作。据吉田茂到松平家进行拜访试探的结果，判断并非完全没有希望，就劝鸠山直接出面交涉。

这期间，自由党已经动乱不安，让我们听听河野一郎是怎样说的吧：

“剥夺鸠山先生公职资格第一天，曾极力劝古岛先生出马，第二天，以争取达成同松平先生交涉的决议而结束，到了第三天，尚无任何眉目。但就在这期间，开始出现了芦田均就任政党总裁的活动。在党的总部和一部分议员中间，陆陆续续可以听到让芦田担任总裁的呼声。这是我未到党总部去的期间发生的事。与这一呼声出现的同时，芦田均私下开始对吉田正进行说服的对象松平先生作工作，让松平不要接受后继总裁的差事。

“听到要芦田担任下届总裁的叫嚷，我立即赶到党的总部，有人提意见说：‘干事长应当在干部会上就下届总裁如何解决的问题提出报告。’我报告了前些时候的经过。芦田均便发言说：‘听说要让松平当总裁，我今天早晨见松平时问了一下情况，松平说他不愿意干。干事长到那些不愿接受这一职务的人那里去作工作，不是毫无用处吗？’当时，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我狠狠地训了芦田一通：‘你受谁的委托去见松平？你少管闲事；接受不接受与你有什么相干？你不负这方面的责任，你就不要多嘴，不要插手。谁叫你多管闲事的？’就这样当面痛骂一顿。从这以后，我和芦田的关系就急剧恶化了。”

另据《河野一郎自传》所载，交涉的第三天下午，吉田茂传来的消息说，松平恒雄已回音表示愿意接受，河野干事长说：“好了，这就可以放心了。明天就让松平出面，以后的日程安排也就好定了。”他还念叨着“党的干部会什么时候开好呢？”一切安排停当后才回家。第二天早晨，即5月9日河野一郎在去鸠山家之前先到党的总部转了一下，对党员们说：“今天将向大家介绍新总裁。”

可是，到了鸠山家，河野问道：“今后情况会怎样发展？”鸠山回答说：“喂，你看松野这个人也怪得很，他和你们分手后（夜里3时）好象越过围墙跑到吉田那里去了一趟。”这里再引用一下《河野一郎自传》的记叙：

“我在想松野竟然能爬过那样高的围墙！可是不管怎么说，他果真是越墙到了吉田家把吉田叫醒，两人进行了会谈。松野对吉田说，‘松平已经回答你，愿意干，可是与其迎接松平总裁，倒不如由你来干。我觉得和我们不认识的松平相比，还是你来干更合适。’据说在会谈结束时，吉田讲道：‘既然你有这一主张，让我考虑一下吧！’

“在我看来，松野的行动也并不怪奇。鸠山先生对我说：‘河野君，松平那里的工作可以结束了，如果你没有不同意见，就这样办’。”

这时候河野干事长有多么懊悔是不难想象的。人们从他在党总部痛骂芦田均便可以知道，河野一郎是一个非常自信、心直口快的人。而从松野鹤平不顾已经谈妥让松平恒雄继任的协议、擅自要求吉田出马这一点来说，他的“越权”行动远比芦田均严重得多。但当鸠山说“如果你没有不同意见，就这样办”时，河野并没有说自己不同意。这是因为他衷心尊敬鸠山，在鸠山面前，河野是很自谦的。

《河野一郎自传》还有下面这样的情节：“鸠山先生叮问我有无不同意见时，我回答说：‘可以吧！我并不认为非松平不可，也绝不认为吉田不好。’正在这时，松野君来对我说：‘现在吉田正在作最后的考虑，他要河野君暂时等一等，今天上午就能作出回答……’我接着回答说：‘那就等一等吧’。但这以后什么回信也没有。我感到焦虑不安，就问松野：‘这是怎么回事？党的总部还在等着开干部会，让我汇报情况呢！……’松野说：‘就再等一等吧！吉田说，他要把女儿和子从九州叫回来，等同和子商量后才能回答’。”

河野一郎处境困难，着急得很。鸠山一郎对他的困境也很同情，就帮忙说：“在这儿再等下去也没办法，干脆一起去吃鳗鱼吧！”鸠山喜欢吃鳗鱼是出了名的。他们去的大田洼鳗鱼馆，无论质和量都堪称日本第一。饭菜很丰盛，到烤鱼串端上来时，如果不是特别喜欢吃鳗鱼的人，肚子几乎全都饱饱的，再没法吃了。河野写道：“在鳗鱼饭馆消磨了很多时间。回来一看，吉田还没有回音。后来回想起来总感到这段时间有些奇怪的动向。”河野干事长似乎是被当作局外人蒙在鼓里了。

## 六

鸠山总裁和河野干事长的关系有点象单相思。虽然河野对鸠山是一边倒，可是从某些情况来看，鸠山未必完全信任河野。吉田茂在决定接替鸠山职务的阶段，鸠山曾对吉田吐露心情说：“对河野干事长要当心，我对他并不抱好感。自由党成立以来，包括金钱在内，所有事情都是他一手包揽的。我对他只不过是使用而已。”

如同后边还要提到的一样，河野对吉田也不抱好感。吉田听了鸠山的心里话，从一开始就对河野十分警惕。这样，吉田茂和河野一郎这两位自信心很强的政治家开始形成一种敌对的关系。众所周知，后来吉田茂提出了他最讨厌的三个人，这就是：河野一郎、李承晚和苏加诺。

关于鸠山一郎后继人问题，鸠山一郎和松野鹤平始终把吉田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在田中内阁里鸠山当书记官长，松野鹤平是内务部政务次官。松野之所以热心于抬出吉田茂来也是由于从那时起两人关系密切的缘故。

值得注意的是，古岛一雄推荐吉田茂的一般说法遭到河野干事长的强烈反对。据《自传》所记，情况是这样的：

“世上一一般都传说，古岛一雄推荐吉田并动员吉田出马，赞

扬古岛说他如何如何。可是现实是，古岛当时卧病在床，至少当时古岛卧床是事实。由于遭到拒绝，决定让松平出马也都是真情。第二天，鸠山拜访吉田，要他去动员松平出马以及吉田说服了松平也是事实。这期间的情况都是确凿无疑的。

“但是，如果硬要我说的话，古岛、松野、吉田之间，抛开鸠山先生和我，谈了些什么，越想越觉得不对味，有值得怀疑的余地。实际上，我们的会晤，表面上是沿着所谓推举松平这条线向前进展的。可是背后松野君却欺骗了鸠山先生。所谓‘那以后越墙见吉田，恳切请求他出马并取得了他的同意’这些话是真是假，我不知道。在那天晚上的干部集会上，3时以前松野表态说，‘同我们毫无接触的松平相比，还是我们所熟悉的吉田更合适’，这是他没有表露过的，可这也是事实。”

读了上述引文，突出的印象恐怕是，河野一郎完全相信鸠山与自己是身心一体的。他所说的“抛开鸠山先生和我”、“背后松野君却欺骗了鸠山先生”充分暴露了这位被称为出类拔萃谋士的河野一郎是一个格外天真、容易上当的政治家，被欺骗的不是鸠山而是河野，甚至可以说鸠山是站在欺骗者一边的。

5月4日在鸠山家的会晤，河野干事长推荐松平恒雄，对此鸠山问河野是否很了解松平，河野回答说“不熟悉”时，鸠山便说，“那么这样吧，古岛一雄倒是……不过这个人我倒认为不错……”。河野干事长说：“古岛一雄这个人既不出色也没什么了不起，年轻时的情况，不了解，晚年一点也不出众。所以我并不特别尊敬。”尽管如此，“因为是鸠山先生提出来的，他说‘那很好’，我当场就表示同意了。”

河野真心反对古岛一雄出马。因此，5月5日鸠山一郎到古岛家拜访时，干事长没有同行，而是由松野陪同的。到这一阶段，认为吉田上台合适的鸠山、松野二人和推荐松平的河野之间存在着根本性意见分歧，已经是十分清楚的了。

在这一时刻，让我们离开自由党的角度，回到吉田茂自己的立场上来看一看。前面已提到，他在鸠山被确定整肃以前就曾被要求在最坏的情况出来收拾残局。东久迩内阁总辞职时，吉田茂也是仅次于币原喜重郎的第二候补。从他和鸠山的亲密关系看，吉田成为最得力的候选人也是理所当然的。

吉田就任外务大臣以来，曾召集过不少经济学者研究问题，努力向他们学习内政，有关日本经济问题，越听越觉得严重。再加上关于政党，他也毫无经验，所以吉田茂对鸠山一郎请他出马的要求只能回绝。

但是，吉田茂通过在伦敦大使馆的工作，清楚地知道议会内阁制是政党政治，如果不控制众议院的多数就不可能建立稳定的政权。仅有鸠山自由党的支持显然是不够的。作为一个保守主义者，他不赞成同社会党建立联合内阁的设想。吉田茂认为只有自由党和进步党两个保守政党强有力地携起手来，才能保持政局的稳定。

于是，进步党方面有人来做工作。吉田茂有一封信最能简洁地表达这方面的情况，让我们来引用一下。信是寄给岳父牧野伸显的。日期是1946年5月11日。在“备忘录”的标题下，吉田省略了“拜启”，开门见山，进入要点：

“几天来鸠山强烈要求我继任领导自由党的职务，我一直拒绝。昨天，町田忠治老翁和进步党方面又来进行劝说，而且由于町田老翁的推动，首相昨夜也来劝说。过去我对鸠山的愿望只是听之任之，情况越来越发展，如今我已答复，将进一步体察鸠山君之诚意，加以考虑。关键在于进步、自由两党能够结成联合阵线，以聚集政界的稳定势力。无论如何希望明天下午能听到你的意见。如下午4时左右方便，我将高兴地前往晤谈。 顿首。”

吉田茂接受自由党的领导工作，决心与进步党建立联合内阁的第一步就这样决定了。毫不过分地可以说，促使吉田茂下此决



心的决定性因素是町田忠治和币原喜重郎的“劝说”。

町田忠治和币原喜重郎之所以劝吉田茂出马，背景是从滨口内阁时代以来，三人关系密切。即：町田忠治是滨口内阁的农林大臣，币原喜重郎是外务大臣，吉田茂则是币原手下的次官。町田忠治生于文久三年(1863年)是比吉田茂大15岁的元老。在町田被整肃、进步党失去总裁时，是吉田茂劝币原首相加入进步党并担任总裁的。在《十年回忆》第一卷里，吉田是这样对币原说的：

“今后的政治决不是官僚政治，你虽然受命于陛下做了首相，但今后一定是选举中占多数的政党的总裁出任首相。请你现在也加入政党，并且做进步党的总裁。恰巧目前进步党因为町田先生遭到整肃，因无总裁而苦恼。町田先生和你曾在同一个内阁任职，彼此的友谊又很深，这很好，就请你接替町田先生吧！”

吉田茂以同样理由劝町田忠臣让币原担任后继总裁，町田也非常赞成。进步党的干部大麻唯男等人也进行了工作，终于，币原当总裁得以实现。

据《十年回忆》第一卷记载，大麻唯男好象也希望吉田茂加入进步党，大麻问吉田：“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吉田回答说：“我对政党并不怎么感兴趣，不想参加。”大麻说：“这就不对了，我所以请币原出马，原来是想把你一块拉进来。”于是吉田茂对入党一事模棱两可地回答说：“只要币原先生能当上总裁，我个人怎么都行。”和大麻君的谈话就此不了了之。

从进步党的币原总裁和实力人物町田忠治以及大麻唯男和吉田茂的上述关系看，吉田5月10日接受町田忠治和币原喜重郎两人的劝说也是非常自然的。

到了5月11日，吉田茂的心情已非常倾向于出马。前边引用的“备忘录”中也写道：只有与岳父牧野伸显商量，才能作出承诺的回答。因为牧野伯爵曾经强烈忠告过他，对内政，特别是对党务不熟悉，不能接受首相职务。吉田茂在“备忘录”中要求同牧野

伯爵会谈以什么方式进行的，或者没有进行，都不清楚，不过，吉田茂自己在会见牧野伸显之前，业已在币原的极其强烈的劝说下，倾向于同意让牧野伯爵“事后”允诺。

## 七

币原内阁决定总辞职后，后继首相悬而未决的状况已经拖了将近20天。

对于当时的情景，吉田茂在《十年回忆》第一卷中有如下描绘：

“可能是由于当时的报纸登载了我担当自由党顾问或者受到继任总裁的劝说等消息，有一天，内阁会议结束之后，国务大臣松本薰治博士对我说：‘请你赶快接受吧！我们现在辞职不行，干下去也不行，真是苦极了！’我开玩笑说：我不是自由党党员，这件事与我无关，芦田均是自由党党员，最好还是请他偏劳吧！芦田当时任币原内阁的厚生大臣。

“然而，当场听到我和松本这段谈话的币原氏，在内阁会议以后对我说：‘请你来一下！’当我走进首相办公室的时候，币原对我说：‘无论如何请你接受下来！’我严肃地对币原说：‘在我劝你当政党总裁的时候，你说这是残忍；现在你好象很为难，你想把这件难办的事推到我身上吗？’说罢，我们就分手了。

“经过两三天，事情毫无进展。于是，币原氏又把我叫去，一定要我担任自由党总裁。当时政局尚不明朗，自由、进步两党之外，社会党、协同党以及共产党等政党之间的动向非常复杂，特别是共产党的活动颇为积极，以致进一步加剧了战后的人心动荡。

“当时的社会形势是：大选前夕即4月初，在日比谷公园举行了打倒币原内阁的国民大会，共产党指挥成千上万的群众拥向首相官邸，发生了警察开枪事件，占领军也出动装甲车和武装吉普

车，进行警戒。此后一直到币原内阁总辞职为止，向首相官邸的游行示威几乎每天都有，并且在战争期间曾经中断的国际劳动节集会，也在这年5月1日在宫城前广场举行，有数十万工人参加。据当时的报纸报道，同样的集会曾在各地举行，红旗的波涛淹没了全国。在这种吵吵嚷嚷的形势下，首先必须迅速平复政局动荡，安定动摇的民心。不但理应如此，而且迫于时势，非这样做不可。”

吉田茂的性格是，越有困难越坚强，决不退缩，犹如面对斗牛士的红布猛冲的雄牛一般。吉田茂在红旗如林的局面下斗志更坚。币原首相对吉田茂的坚强性格是很清楚的，他确信除了吉田茂外，没有第二个人能冲破目前的难关，而且认为为了使吉田茂下定最后决心，应当说服牧野伸显伯爵。

币原就任首相以来，恢复了长年任外交官时代的敏锐感觉，目光炯炯，他的观察是很准确的。吉田茂本人的主意已定，但唯一的障碍是岳父牧野伯爵反对。

币原首相和牧野伯爵在银座武见太郎的诊疗所进行了会谈。医生中间对政治强烈关心的人不少。武见太郎和牧野伯爵的孙女结婚，和吉田茂攀上亲戚，是吉田的外甥。他非常好学，作为内科医生，又具有出类拔萃的医术，他结识了不少名人病号，和政界有特殊联系。自从币原、牧野会谈以后，许多重要会谈都在武见诊疗所进行。诊疗所是一种“圣域”，可以不让新闻记者或其他人知道而运筹某种事物。

币原、牧野会谈持续了将近一个半小时。这期间武见太郎一直在候诊室等候，并不知道谈的内容。后来币原首相从医疗室走出来，武见去安排自己与牧野伯爵一起回千叶县柏地方的具体事宜时，币原又一次回到诊疗所，并且脱下帽子郑重地说，“阁下，只这一次，希望能帮忙。”留下这样一句谜语般的话就走了。

在向柏地方行进的车中，牧野伯爵对武见太郎说，“这次谈的是让吉田就任后继首相问题。不过吉田是外交家，而不是政治

家，我认为他很难接受这个烂摊子，所以替他回绝了，这样我也安心了。”

可是，第二天早7时左右，武见太郎接到了吉田茂打来的电话：“到理化研究所上班前，请到外相官邸来一下，哪怕5分钟也好。”吉田茂对马上赶来的武见太郎说的话，使他大为吃惊。

“币原说牧野伯爵也同意，所以我决定接受下来。昨夜我已当了自由党总务会长。不对，完全搞错了”，武见努力把昨晚听牧野伯爵讲的话转告给他。可是一切都是马后炮了。

“阁下，只这一次希望能帮忙。”币原这句谜语般的话，终于弄明白了。原来币原首相没能说服牧野伯爵，所以硬性决定要求事后同意。从武见诊疗所出来又特地返回去，并脱帽打招呼：“希望能帮忙”，这显示了币原首相令人惊叹的老练。

武见太郎问吉田：“你有信心继任吗？”吉田茂回答说：“在战争中败北而在外交上取胜的历史也是有的。”武见回忆说：“当时那种毅然的态度好象是脱离了姑父和外甥的关系。”

武见看到吉田已下定决心，只能给予帮助了，就问他：“我能帮着做点什么事吗？”吉田回答说：“你和石黑忠笃非常亲近，这届内阁将是粮食内阁，农林大臣非常重要，你到石黑忠笃那里听听他的意见。”这就形成了后来吉田茂百折不挠地追逐、请教东大教授东畑精一的情景。在讲述这一经过之前，必须谈一下吉田茂接替鸠山一郎的附加“条件”。

吉田并不是单单由于鸠山一郎的恳切要求而接受的。因为町田忠治和币原喜重郎的强烈劝说，才开始动心了。由此也可以看出，吉田茂是极为慎重的。吉田茂的继任与只要能当上内阁首相的政权迷是有区别的，这从他接受鸠山一郎的后任时提出的“条件”中最清楚不过地体现出来。

在这里还必须提到币原首相所起的另一个作用。鸠山一郎被确定整肃后，社会党为掌握政局的主导权，5月5日片山书记长和

币原首相举行了会谈。片山书记长提出要求说，“为了克服目前的严重危难局面，建立由社会党担任首相的联合内阁是最合适的。对此，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币原首相也表示同意并答应予以合作。

这里也显示了币原的老奸巨猾。币原首相知道，社会党的联合组阁工作，由于党内左右两派的对立、抗争，一定失败。正因为他看准了这一点，所以对片山书记长的要求，基本表示同意。这样，为实现吉田茂任首相的自由、进步两党成立联合内阁的设想，争取了必要时间。

## 八

据《十年回忆》第一卷，吉田茂提出的条件有三，让我们引用一下“接受总裁职务三项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我开始考虑，我可能终于不得不答应就任自由党总裁。于是，把鸠山请到麻布市兵卫町的外务大臣官邸，作了最后商谈。我当时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我既没有钱，也不能给党弄钱；二、关于内阁成员的选定，请你不要干涉；三、我如果感到厌倦，随时可以不干。鸠山说这很好，我便承诺下来。鸠山的心情可能是暂时把自由党托付给我，以便等待不久以后重新收回去的机会，而我也无意长远干下去。结果，迫于周围形势而不得不接受下来，这是我当时的心情。

“决定接受以后，鸠山便让我正式参加自由党，就任总务会长。因为总裁一职必须由党的大会决定，所以作为代表党的职务让我担任总务会长。由于这个原故，在很久以后，我才经党大会正式推举为总裁。”

也就是说，同意就任自由党总裁职务是5月14日，而正式就任是8月18日。

吉田、鸠山的上述会谈是什么时候进行的，不清楚，推测可

能是在5月13日深夜。因为据住本利男著《占领秘录》称，“5月13日，鸠山、松野、河野三人等待吉田外相的回答，已经不大耐烦了”。

因为一点消息都没有，实在忍耐不住了，松野就往官邸打电话，而得到的回答是：“现在正在会客”。第二次挂电话时，“现在正在院子里散步”。第三次联系时，回答说：“已经回大矶了”。据说都是这种“吉田式愚弄人的回答”。

我推测他决定返回大矶，可能是为实现吉田与鸠山的会谈。吉田茂一定是考虑到，已经到了快要接受的时刻，有必要在与鸠山一郎之间，确定一些明确的条件。

更值得注意的是，鸠山一郎本身对于吉田与鸠山的会谈根本没有和河野干事长谈起。这不仅显露出看来十分开朗的鸠山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而且可以知道，他与河野干事长之间的关系决非同心同德。

根据《河野一郎自传》的记载，我们来看看河野干事长勉强接受吉田与鸠山会谈既成事实的前前后后。

“第二天早晨，我去鸠山先生处。他告诉我说：‘吉田君已有回话，表示接受担任干事长，你正式到吉田君那里去一趟吧！’于是，我带着两名干部代表平冢常次郎和大久保留次郎拜访了吉田。我与他寒暄说：‘初次见面’时，吉田说：‘不，不是初次。战争期间我们在东海道线火车里见过面，我清楚地记得关于是否要打倒军部问题争吵过一通。’吉田式的回答照例使人难堪。

“‘今天是来迎接你当自由党总务会长的’，‘不是总务，据说是让我当总裁。’

“‘不，当总裁，党还没有作出决定，已经决定欢迎你作总务会长。’

“‘噢，那太好了。同时还有一件事要和干事长讲一下。这就是我和鸠山之间讲好的条件，你知道吗？’

“‘不知道，别的我也没问，’‘那就难办了，你不了解那谈妥

的条件，不好办哪！’

“这样一问一答之后，我就回答说：‘那好吧！我并没听到鸠山讲什么别的条件，鸠山先生一定知道，所以我无条件地同意那些条件。现在我回去，向鸠山了解一下那些条件。为了党，请给予支持。’吉田也泛泛地说道：‘如果能同意那些条件就行’。”

河野干事长的气愤是不难想象的。对于代表党的使者，鸠山隐瞒了最关键的“条件”。而且，谈判的一方吉田茂对河野简直象耍孩子一样，吉田的态度是傲慢的，欺侮人的，高压的。

让我们继续引用《河野一郎自传》。“我内心有一种很不平静的感觉，就很快到鸠山那里追问：‘先生，不好办！到吉田那里如此这般，他还说就任总裁是有条件的，至少我去之前要让我了解一下有哪些条件……’鸠山这才说道：‘河野君，如果告诉你那些条件，我想你会提出反对意见，说这不行，这样就可能抵制吉田君任职，而把基本谈妥的事推翻。因此没有和你讲。你是怎样回答他的呢？’我回答说：‘先生同意的条件，我无条件地同意’。‘那太感谢你了，谢谢’。鸠山先生一边说，一边从书桌抽屉里拿出一卷铅笔写的纸说：‘这就是条件，看吧’！这卷纸就是人们所说的‘三条件’，根据念法不同也可以说是‘四条’，是吉田亲笔写的。

“还有点题外话，这卷纸后来在鸠山从麻布石桥官邸搬到小石川鸠山官邸时丢失了，怎么找也找不到，因此没能作为记录留下来。我的推测可能不准确，我想这份东西可能是松野君从中斡旋和起草的。

“……这卷铅笔写在纸上的三条，第一条是金钱问题，一切不要麻烦我（吉田），党的资金由鸠山和干事长负责；第二条，人事问题，全部由我安排；第三条，根据我的情况辞去总裁时，你们不要阻拦。在这第三条同时，还有与此相关的‘你们要我辞职时，我随时都可以辞职’。

“我十分生气，吉田这个家伙当总裁还要提出这样的条件。关

于资金，我认为他太放肆，人事问题要无条件由他处理，也是独裁的办法，整个说来，他过分自私了。

“但是，事已如此，我也只好同意了。”

据前面所引《十年回忆》第一卷，第三条是“自己不愿干时，随时都可以辞职”，而没有“你们要我辞职时，我随时都可以辞职”。从当时吉田茂的心情来说，的确是“不想长期干下去”。因为没有留下文字，这一点已很难弄清。可以认为住本利男所著《占领秘录》记载的情况相当接近事实真相：

“我是外交官，不能理财，钱的问题由你们去操心吧！人事问题由我处理，你们不要干涉。但当我不愿干时，随时可以不干。当你（鸠山）能干的时候，我随时都可以辞职。”对吉田提出的条件，鸠山回答说：“人事等问题，我不干涉，将作为党的一分子，为了国家利益给予帮助。”吉田又说：“在你被整肃时，自由党交给我来代管，我把党加强和扩大以后，再还给你。”

第三条，鸠山一郎解除整肃以及脑出血等，后来成为吉田、鸠山斗争的焦点。不过在吉田茂接替鸠山任职的1946年5月14日前后，并不是什么紧迫问题，当时最重要的是第二条。

原来，在组阁时，党的首脑对于选择大臣拥有独裁权限是英国议会政治形成的优良惯例。保守党和自由党在19世纪确立了这一惯例，工党在1924年1月麦克唐纳开始组阁时破坏了这一惯例。被选为党首的人如不能根据自身的考虑和需要组阁的话，就不可能顺利进行议会内阁制的工作。根据党内派系力量关系，分配大臣职务，按照当选次数的顺序选拔大臣，不能发挥首相的领导作用。

第二个条件，人事问题一切委托吉田茂，是他从英国议会政治学来的明智之举。可以说显示出他的政治家手腕。这一先决条件能被鸠山一郎接受，河野干事长后来也同意，是得力于当时整肃旋风袭击的特殊客观形势。



当整肃开始解除，当然这第二条就难以实行了。

由于同意吉田茂任自由党总裁(目前是总务会长)，币原首相得以按照预定安排，推荐吉田外相担任后继首相。这样，1946年5月16日下午2时25分，天皇对吉田发出组阁令。当时天皇指示，“因为有粮食问题等情况，要尽早完成组阁工作”。

根据平时和币原首相的磋商，吉田茂在首相官邸成立组阁总部，着手进行组阁工作，参谋是币原内阁时的国务大臣石黑武重，预定由他担任内阁书记官长。

但石黑武重和三土忠造关系密切，有迹象表明，三土通过石黑阻挠吉田内阁的成立。自由党反对在政党内阁书记官长职务上安排官僚，吉田茂利用了这个好机会，便根据自由党的推荐，起用自己的同乡、亲戚林让治担任书记官长。

吉田和币原之间已决定，吉田内阁要由自由党、进步党成立联合内阁，但吉田茂让石黑武重到社会党书记长片山哲那里交涉入阁事宜。预计社会党会拒绝，因此无非是履行一下手续而已。吉田茂反对与社会党联合，从5月14日吉田、河野会谈中可以明显看出。

吉田叮嘱河野干事长说：“听说你在进行与社会党的联合工作，我是不同意的。”

从5月16日天皇发出命令到第一届吉田内阁成立，意外地花了很长时间。17日的报纸曾预计，快的话，当天就可以组成内阁。实际上却非常难产，前后花了一周时间。如果只是凑齐大臣的人选，一两天就能办到。可是吉田茂非常负责，他认为，为了完成这一使命，必须造成一种使人感觉他要放弃组阁的紧张情况。

## 九

吉田茂着手组阁时已经67岁。后来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一任总理的阿登纳只比吉田大两岁零八个月。1945年12月任意大

利总理、为复兴作出贡献的德·加斯佩里比吉田小三岁。吉田、阿登纳、加斯佩里三个人都是暴政下的受难者，这是他们的共同点。战败以后，日、德、意都把国家的命运托付给了暴政的受难者。

吉田接受这一使命时，无论国际情况还是国内情况都是十分严重的。苏联军队1946年5月3日从东北撤退完毕，5月9日虽根据美国强烈要求从伊朗北部撤兵，但美苏两国之间的冷战到第二年3月12日发表杜鲁门主义的宣言期间开始恶化。5月9日，意大利爱麦虞限三世退位，在第二天举行的国民投票中决定废除君主制，这使日本保守势力受到极大震动。5月26日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立宪会议选举，共产党出乎意料地成为议会第一党，党首哥特瓦尔德当选总理，这也给保守派敲了警钟。

在日本国内，粮食危机引起社会动荡不安。从五月一日劳动节起，在全国范围内要求供应大米的示威运动不断发展，显而易见，这些示威是共产党领导的。共产党一方面呼吁农民拒绝交售粮食，另一方面又在城市煽动市民“要求大米”。如前所述，东京由于全市延迟配给粮食，市民生活极度困难。共产党企图利用粮食危机扩大党的势力，在各地组织要求突破粮食危机的示威游行。5月12日，世田谷区举行了“要求大米”区民大会，共产党的野坂参三、岩田英一等发表演说之后，岩田率领113人分乘两辆卡车，以向天皇送交决议书为名拥到坂下门，把决议书当面交给了宫内省运输课长岩濑圭一。过了两天，岩田又率领50人跑到宫内省，要求对上次的决议作出回答和开放物资。交涉结果，答应19日再次见面，之后才撤走。

5月19日，在皇宫前广场，劳动战线统一管理会主持了“粮食五一节”集会。自称动员了25万人的这次集会选举听涛克巳为议长，并通过了决议。此后，听涛议长等12名代表中午12时35分从坂下门进入皇宫。听涛一行会见了宫内省大丸总务课长后，一再

逼迫大丸安排他们与天皇见面。后来交了大会决议，直到下午3时才撤走。同一时刻，世田谷区民5名代表和宫内省官员进行交涉，要求对14日的区民大会决议作出回答，下午4时以后才离开。

皇宫的游行示威也震动了美国占领军。麦克阿瑟元帅担心这种非法的暴力使占领政策本身受到威胁，便于第二天20号发表如下声明：

“我认为有必要提醒日本国民，这种有组织、有领导的群众性暴力和人身威胁日益增加的倾向将严重威胁日本未来的发展。在当前从封建军国国家向民主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允许一切采用民主方法争取合理的自由，今后也将允许。但是，不法分子现在开始行使的暴力行动，今后不再允许。这种行为不仅是对有秩序的政府的威胁，也是对盟军占领日本目的及其安全的威胁。

“如果日本社会中少数分子不能保持现阶段和当前形势所要求的自制和自重，为了管制和纠正这种值得忧虑的状态，我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手段。我相信大多数民众是不同意一部分不法分子的这种过火行为的。我非常希望，为绝大多数舆论所支持的健全意见能充分发挥作用，使我无须进行干预。”

5月20日麦帅的这一声明，无疑成了吉田茂第一届内阁得以成立的一个重要因素。大家都期望，只要国内安定就好，可是情况却远非如此。因为当时世界性粮食危机正在蔓延，在德国的英占领区粮食分配数削减到每人每天1,050卡路里，甚至说，如果到5月底还不能得到谷物，将有900万德国人饿死。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让美军和美国政府理解，为使日本国民不致饿死，向日本进口粮食是必不可少的。吉田茂充分理解高举红旗的游行示威在这一意义上具有极大的效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吉田茂正是一边凝视着红旗和占领军双方，一边组阁的。正是在这方面充分显示出吉田茂作为老练、成熟的外交官的手法。

吉田茂派外甥武见太郎到农政元老石黑忠笃处，也正因为他

最重视解决粮食问题。留着漂亮胡须、颇有名望的石黑忠笃听了武见所谈情况回答说：“东畑最合适。因为他现在担任农林省粮食对策委员长，对事实了解得最清楚，再加上他在美国学习过，可以和美军直接对话。”

东畑，当然指的就是东大教授东畑精一博士。石黑以老人特有的急性子催促武见说：“现在马上就到东畑那里去，我和你一块去！”东畑后来讲到他们两人搭伴去东大农学部研究室拜访的情景：

“那天天气很好，石黑忠笃和武见太郎到了东大，石黑穿了一套很怪的衣服，还穿着长统靴。我问他们‘有什么事’，回答说：‘没什么大事，昨天晚上小偷进来把东西统统偷走了。’我又追问一遍：‘到底有什么事？’他们才如实地说是受吉田委托来要我接替农林大臣的职务。

“我作为粮食对策委员长，写过首相关于粮食问题的宣言，提出这一宣言之前，币原内阁就倒台了。石黑说：‘那你就作农林大臣来履行宣言吧！’依我看，这是很荒唐的事，于是又说了声‘再考虑考虑，24小时之后再答复’，就分手了。”

武见太郎判断成功希望很大。当时并没有断然拒绝，这是事实。石黑忠笃和武见太郎马上将情况汇报给吉田茂，并劝他直接会见东畑教授。石黑忠笃对吉田说：“东畑很象你，如果能会见的话，一定能谈得来。”吉田和石黑并不特别亲熟。吉田把粮食经营团和农林省混同起来，对石黑说：“你的部下不好。”而石黑由此反而对吉田抱有好感。于是，吉田茂决定与东畑精一举行会谈。东畑写道：“两三个小时以后，武见又来了，说吉田想见我，我回答说：‘那就去见见吧！’所以去了武见诊疗所。吉田已经先来了，坐在武见的扶手椅上，我坐在患者的椅子上。当时吉田说的话，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是这样，明天根据旧宪法我将接受组阁的圣旨。接着，吉田内阁要干两桩事，一是修改宪法，另一件是到今年秋天

大米收获之前,要使国民有饭吃。请你无论如何要在内阁任职,帮助做这件事。”

吉田茂希望,如果可能的话,还准备让东畑担任新设的经济安定总部长官,至少在新米收获之前一段时间,要担任农林大臣的职务。可是这对一直作为研究者、教育工作者的东畑来说,并不是能够立刻决定的。所以答复说,“那么请等一天一夜吧,明天这个时候一定回答。”这件事只讲了几分钟就谈完了。然后,海阔天空地闲聊一通,他们俩都是被称为杂谈名家的人,所以有趣的话多得很。吉田也好,东畑也好,情绪都非常高。突然东畑说:“你真是一个好老头,搞政治之后可能就得另说了,如有别的事,什么都可以一起来干。”吉田回了一句:“东畑,我不记得求你干过别的什么事。”

分手时东畑精一提出要求说:“很不好意思,因为还想和别人商量一下,明天请借辆车用一下。”吉田回答说:“教文馆附近准备了一辆车,请随便使用吧。”吉田茂在这方面是一个考虑很周到的人。东畑对吉田的关照也很感动,兴致勃勃地赶回中野自己住处去了。车是相当老牌的罗尔斯·罗伊斯,在当时汽车还很少的东京,是很引人注目的。

据说东畑精一回去对夫人说:“今天吉田和我谈,要我当农林大臣,”可是夫人并不信以为真。

## 十

第二天,即1946年5月16日早晨,东畑精一坐上来接他的车子,首先去拜访农林省的农政局长和田。和田博雄是东畑的弟弟东畑四郎的顶头上司,1941年4月所谓“企划院小集团事件”中作为中心人物被捕,战争结束后判处全体成员无罪,和田博雄重新担任农林省农政局长。

东畑问道:“如果我接受的话,你能当次官吗?”和田说:“可

以，我们一起殉职吧！”从交谈中也可以看出粮食问题是多么严重。

这以后东畑精一又到东大校长南原那里去征求意见，南原繁好象并不积极。接着，东畑又同石黑进行了交谈。不过，考虑来考虑去，东畑的劲头也不大了。因为不论怎么考虑，大米不足的问题摆在那里，于是东畑下决心推掉这一差事。下午5时左右经过武见诊疗所，对吉田说：“很遗憾，那件事……”吉田也不让步，说：“等一下，请你先见一个人再说。”不一会儿，秘书井上庚二来到武见诊疗所说：“不管怎样，请你去见一下。”把东畑领到了麻布市兵卫町的官邸。

为了避开新闻记者的耳目，是从后门进去的，东畑精一刚一进屋就明确回拒说：“总之，没有能力，缺乏信心，我不能挑这副担子。”但据东畑精一后来回忆说，吉田茂的招数更为高明。吉田茂说：“明天正式派人去找你，请在明天再正式拒绝。”东畑认为，反正我不想干，明天也是一样，就说：“那就明天吧！”然后从前门告辞。新闻记者纷纷提问，东畑精一回答说：“吉田叫我来是想了解粮食问题的有关情况……”

东畑夫人在16日清晨汽车来接的时候才知道让东畑当大臣的事是真的，她很忧愁。听东畑说，“已经回拒”，也就放心了。明天正式派人来虽不知道是谁，但东畑指示家里人要认真接待，自己也穿好和服外套等候。来的人是东畑精一在第八高等学校上学时的同学横田喜三郎教授。他受吉田茂的委托来到东畑家劝东畑接受农林大臣的职务。“不，那件事已经结束了，我已经明确拒绝了。”“是吗？”正当他们谈话的时候，正式“使者”出现了，令人吃惊的是，“派来的人”就是吉田茂。东畑低下了头说道：“作梦也没想到你自己会来。想来想去，没有自信，所以我无法接受。”东畑一再重复这几句话，吉田也坚持要他接受，谈了两个多小时。吉田从会客的椅子上下来说：“就是在这儿向你求情，也要你答应。”他最后

的招数只是重复一句话：“请帮忙。”

东畑精一和吉田茂没有谈拢。送走吉田后，回到自己房间看到新闻记者等许多人连厨房都占满了。东畑痛感到，如今这样的世界，自己无法忍受，他越来越下定决心不干。东畑见到夫人恐惧的面部表情和孩子们的哭泣，认为自己拒绝还是对的。东畑精一对于名利地位，一向是淡然处之的。

吉田茂粗制滥造地挑选大臣以来，虽然大臣的价值很不值钱，但是战争刚刚结束，大臣的职位无论对谁都是非常有力量的。可是对于想把学者身分贯彻始终的东畑来说，复杂万分的政界，从来都是和他无缘的。

这期间从报上得到消息的人不断拍电报给东畑表示祝贺，虽然其中也夹杂着“别干那种傻事”的电报，可还有人专门拿着酒前来祝贺。东畑精一深知，在这危机的紧急关头，有什么值得祝贺的呢？

但是，吉田也是坚韧不拔的。他知道石黑忠笃考虑让和田在东畑农相手下担任次官，吉田茂让武见太郎安排了与农政局长和田的会谈。和田博雄当过内阁调查官，他因为说“如果战争再继续两年，日本就没有粮食了”而被逮捕，对此吉田深表同情并高度评价和田的勇气。通过两个人的会谈，吉田对和田越发抱有好感，双方达到了情投意合的地步。

从牧野伯爵住处聚会以来，和田与武见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和田从组阁工作第二天起就住进吉田外相官邸，全力进行协助。

和田博雄按照吉田茂的旨意开始去说服东畑精一时，东畑说，“你来当农林大臣，我在你手下帮忙当个次官也不错。”这使有关人士都为之震惊。这期间也许作好了让和田当农相的准备。

那时还在继续对东畑进行说服工作。下边还要提到，连东大教授田中耕太郎也被动员来到东畑家拜访。组阁参谋石黑武重考

虑出一个方案，即如果起用东大教授大内兵卫担任经济安定总部长官的话，东畑教授也可能同意接受农林大臣的职务。后来因为大内不愿意接受而未结果。而东畑的决心是，即使大内担任经济安定总部长官，他也绝不改变初衷。社会上传出的消息似乎说，东畑教授本人提出了要大内教授出马自己才就任农相的条件，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误传。东畑精一从未提出过这样的附加条件。

这里还要提一提另外一种说法。有人说东畑教授拒绝担任农林大臣，是因为夫人以“孩子们还小，你如果当了大臣被暗杀，可怎么办”为由反对的结果。东畑夫人也可能讲过这种意见的话，但是仅仅因为吝惜自己的生命就拒绝吉田茂那样拼命的要求，东畑教授肯定还不是那种胆小鬼。而恰恰从断然拒绝的行动上显示出东畑精一的勇气。东畑拒绝的理由在于，他要作一个彻底的研究家、教育家的信念，以及他对那种连招呼都不打就拥进人家厨房的政界的厌恶。

但是，即使到了这一阶段，吉田茂还没有完全死心。吉田茂和盟军总部交涉，得到准确情报说，美国政府已同意在1946年谷物年度对日出口60万吨粮食。根据这一情报，吉田准备对东畑教授进行最后的说服。

这时被弄得精疲力竭的东畑精一对来访者——比他年轻8岁的弟弟、农林省秘书课长东畑四郎说：“真想喝两杯。”虽然有人给东畑家带来不少酒，可是由于东畑严令拒收，都挡回去了。东畑四郎说：“我那里有两瓶啤酒”，“那就给我喝了吧！”于是，两人一起又到了东畑四郎住处田园调布。那里是四郎夫人的娘家。

东畑精一感慨地说：“平沼内阁时，因为三国同盟问题曾参加过几十次五位大臣联席会议，也不觉得怎样，可是现在不到一星期就弄得这样疲惫不堪，体力还是不行啊！”说着就到了东畑四郎临时住处。令人吃惊的是，在门口迎接他们的是吉田茂、石黑武重、那须浩和田博雄四个人。去过东畑家的四个人先乘汽车赶来



了。据说看来即将向最后说服投降的东畑精一蹲在便所里，闻了一股阿摩尼亚臭味以后又增添了勇气，决心坚守自己的信念。

他对吉田说：“作为一个男子汉，受到如此恳求，仍然拒绝从命，实在于心不忍，可是我无论如何没法接受。”听了东畑的话，吉田茂非常不高兴，但是事出无奈，只得罢休，说了声“你出来喝酒，今晚我也去喝两盅”，吉田一行就回去了。东畑不住地说“实在对不起！”

的确，吉田茂肯定是很不高兴的。我不认为感觉敏锐的吉田误解了东畑的本意，恐怕吉田的心情是，“不接受也好！你跑掉了，我追上去。不久，日本国将出现红旗林立的情况，那时组阁的条件就成熟了。”情况难道不是这样吗？

据说吉田一回到组阁总部就对武见太郎透露说：“我懂了让学者来肩挑重担渡过难关是不行的。不当大臣也好，他跑掉了，我反而赢得了时间。”德田球一等人乘“粮食五一节”的余波，整夜包围首相官邸，并越过护墙，进到楼内静坐，把组阁参谋、国务大臣石黑武重和预定就任内阁书记官长的林让治关在一间房子里。正在这一时刻，谣传四起，说吉田茂放弃了组阁念头。

但是，吉田茂并不因此而气馁。每天晚上8时，天皇陛下都要来电话问：“内阁什么时候能成立？”吉田茂很不安，他只能回答：“正在努力”，他难道能够甘心败在红旗之下吗！？

吉田茂重新振作精神，决定起用东畑教授的老前辈、东大教授那须浩任农相，他本人也表示愿意接受，可是由于战时他在北京活动，也在被整肃之列。

在东畑精一接到吉田茂的长信，告诉他已得到那须浩允诺任职的消息请其放心时，东畑立刻赶往祝贺，路上看到了“那须被整肃”的号外，不得不返回来。事态就是这样瞬息万变地发展着。

可是，吉田茂又选中了“第三个目标”农政局长和田博雄。据武见太郎回忆，决定整肃那须博士时，吉田本人正向和田提出要

求说：“和田局长，你不能担任大臣吗？”

武见太郎说：“我认为这是与和田五天接触的结论。所以，我与和田一起去拜访石黑“听取他的意见，和田担任农相的局面终于出现了。和田在光线很暗的汽车里流着泪，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因为是战败时期，所以我接受这一职务’，我敢断言，在和田的心中是没有‘我’字的。”

和田博雄和吉田茂的关系是从参加牧野伸显伯爵的学者集团时开始的。吉田茂和雪子结婚是由经常到牧野伯爵家下围棋而经人介绍促成的。从这件事就可以知道牧野伸显对围棋的兴趣和实力。其水平不亚于日本棋院总裁，作为专业棋手以外的人，可以说具有出类拔萃的本事。而在有泽广己、中山伊知郎、东畑精一等学者集团中，实力最强的就是和田博雄。因此，吉田茂很早以前就了解和田这个人，这是一点都不奇怪的。

## 十一

和田任农相的方案引起了自由党的强烈反对，而吉田茂当时必须为坚持三项条件同鸠山一郎进行苦斗恶战。在讲这一点之前，我想再谈谈吉田茂和东畑精一的亲密关系。

吉田茂不屈不挠地尽力恳求和争取东畑精一就任农相，而东畑坚决拒绝。通过这不到一个星期的交往，在两个人中间，奇妙地或者说自然地产生了友情。东畑很喜欢吉田，吉田也感到和东畑情投意合。如石黑忠笃所指出的，他们两人的性格非常相近。但是性格的相似并不见得就情投意合，一定还有什么互相吸引之处。

我认为有一个线索可以考虑，即：田中耕太郎受吉田茂委托前去说服东畑精一，东畑大动肝火。已经答应就任文部大臣的田中说：“早知道声望全让你抢走，我也不马上答应就好了！”不料这句话激怒了东畑，据说东畑听后大吼一声：“卑鄙无耻！你这家

伙！”

众所周知，田中耕太郎教授不仅是商法权威，而且在荒木文相时代一直努力，最大限度地坚守“大学自治”，坚持贯彻自己的信念。这样一位以《世界法理论》得过文化勋章的大学者仅仅因为刺激了东畑的神经就遭到责骂，这说明东畑多么认真。即使是对可尊敬的前辈，有些事情，也不含糊这种认真的态度打动了吉田的心。

组阁完毕不久，东畑夫人收到吉田茂写的一封十分郑重的信，内容大意是：“前不久组阁时，打搅了府上过意不去，谨此致歉。顺告你，我准备一桌简单的饭菜，望你和丈夫一道光临。”东畑教授说，“首相自己写请帖，一定有好吃的”，就催促夫人一起赶往吉田官邸去了。

一进餐室就听吉田茂命令说：“喂，因为今天夫人们作主宾，换小碗吧！”于是拿出了妇女用的小饭碗。东畑教授是作为夫人的陪餐者。吉田茂和东畑精一的关系抛开政治不谈，一直保持到吉田去世。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讲讲组阁的经过。吉田茂决定让和田博雄任农相的消息一传出，自由党的成员们群起猛烈反对。本来，自由党只准备推荐河野一郎当农林大臣，可是因为他曾因违反治安维持法嫌疑被捕过，不能同意这种经历的人当大臣。

“和田是个共产主义者，他的农业政策绝对难以被人接受”，这是反对者名正言顺的理由。

5月21日夜晚召开的自由党紧急临时总务会会议反对吉田茂的组阁人事方针，闹得无法收拾。最后，鸠山一郎终于开口说道：“给吉田打电话，提出反对和田当农林大臣。”人事本应完全委托吉田处理，所以对于鸠山一郎的介入，吉田茂何等恼怒是可想而知的。

于是，吉田派林让治到鸠山那里传话说，“内阁人事应委托我

安排，你目前这样反对的话，我只好放弃组阁。”吉田拿出了“鸠山、吉田三条约定”，自由党方面只好让步。如果吉田茂真的撒手不干，可能由于政局混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占领军的直接军事管制，情况好不危险。

当天夜里，从麦克阿瑟元帅那里来了一辆接人的吉普车，说是只让吉田茂一个人去。不用汽车而用吉普车是为了从总部后门悄悄把吉田接来。经过20分钟左右，吉田回来，脸上露出了微笑。麦克阿瑟元帅向吉田保证：“只要我当最高司令官，就不会让一个日本国民饿死。”

吉田对在官邸等候的和田博雄、武见太郎说：“这样就可以成立内阁了。”武见太郎说道：“这期间，吉田在麦克阿瑟元帅表示提供粮食之后说‘组阁条件具备了’，还说，如果在全国飘扬一个月红旗，美国就会很快把粮食运来等等，吉田一边说，一边详细分析了形势。这是可以大记特记的。”

吉田认为，从麦克阿瑟元帅那里得到提供粮食的确切保证，满足了组阁的前提条件。武见太郎追述说，“听到吉田这样讲，我才第一次看到什么是外交。”

至此，5月22日清晨举行了第一届吉田内阁特别任命仪式，从而原内阁总辞职起整整花了一个月时间。

首先看看内阁的班底吧：

内阁首相	吉田茂
外务大臣	(首相兼任)
内务大臣	大村精一(前内务次官)
大藏大臣	石桥湛山(自由党)
司法大臣	木村笃太郎(前检事总长)
文部大臣	田中耕太郎(文部省学校教育局长)
农林大臣	和田博雄(农林省农政局长)
商工大臣	星岛二郎(自由党)

运输大臣	平冢常次郎(同上)
厚生大臣	河合良成(进步党)
邮政大臣	一松定吉(同上)
国务大臣	币原喜重郎(同上)
国务大臣	斋藤隆夫(同上)
国务大臣	植原悦二郎(自由党)
内阁书记官长	林让治(同上)

在上述职务中，由内阁首相兼外务大臣，到日本获得独立止，一直是吉田内阁的一条铁的规则。整个领土被占领的日本，并不存在通常意义的外交，但是同盟军总部进行交涉的极为重要的“外交”依然存在。吉田茂十分重视这一职务，所以自己兼任。

大藏大臣石桥湛山、商工大臣星岛二郎都是自由党推荐的。对于曾担任东洋经济新报社社长的石桥湛山，吉田茂老早就对他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怀有敬意。商工大臣原定由河合良成担任，根据自由党的要求，吉田不得不作出妥协。司法大臣本应由岩田宙造留任，可是由于他被判定为不符合公职资格，所以起用了检察总长木村。

吉田首相在任命仪式之后发表了如下引人注目的谈话：“不料由我接受任命，担任要职，考虑到目前时局要求真正举国一致的政府的事实，在各派联合内阁的方案里，本应实现以自由党和进步党为基干、谋求其他党派的合作，不幸直到今天仍未能如愿，甚为遗憾。

“局势极为严重，特别是尽速解决粮食问题是我国国民生存之关键，不容瞬间延迟。我相信，解决粮食问题是本内阁的一大使命，为此，内阁的全部施政方针政策 and 全部工作都集中在这一点上。断然采取进步而又合理的对策实属绝对必要。据此信念，对粮食问题的内阁人选给予了特别注意，力图选拔能满足国民要求和愿望的最合适的成员入阁，我满怀诚意、披肝沥胆地进

行了工作。粮食紧急对策的实际情况是，不得不伸手谋求盟军当局的善意援助，但我想强调的是，从根本上还需要国民和政府齐心协力，下定决心，拯救我们民族。

“粮食问题之外，还有产业复兴、克服失业、调整金融财政、实现经济民主化等堆积如山的重要问题。在实施紧急对策同时，要考虑根本性的民主国民经济的建设。政府决心以高昂热情和坚定信念，排除一切私情，稳定地实行明朗公正的政策措施。我还殷切期望全体国民在这民族存亡的关头，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忍受困苦，以同胞爱的思想，全力克服危机。新政府在处理这一切工作时，将采取有秩序的民主方法，实行名副其实的彻底措施，排除万难，勇往直前。”

## 十二

关于对第一届吉田内阁的评价，不少舆论认为，它是币原内阁的延续，因此，给予尖锐批判。1946年5月23日《朝日新闻》社论就是这种舆论的典型。我们不妨列举一阅：

“最近一个月的政局变动并没有使国民徒然旁观。具有民主觉悟的劳动人民群众，作为构成政局的重大要素登上了舞台。过去人民大众被当成局外人，搁置一旁，由重臣、军阀来决定有关国民生死、国家存亡的重大问题，内阁的更迭也由他们操纵。总之，他们垄断了整个政局，应当看到这一切是明显与时代相违背的。

“为粉碎币原内阁无视大选结果、进行非民主活动，粉碎反动官僚继续执政的阴谋活动，人民群众的力量强有力地支援了四党联合委员会，击败自由党拉拢社会党、分裂民主战线企图的，也是民主战线的力量。

“吉田内阁实质上很明显是币原内阁和自由、进步两党的联合体，币原内阁赖着不走的动向所表现的非民主官僚性，自由党老

早就应当有所认识，但是，它终于妥协，结果，标榜保守的进步、自由两党所表现的是与反动官僚的勾结。如果保守政党作为资本主义政党的正确路线坚持排除反动官僚而向前进，那么在日本民主革命中还可以发挥某些遗留给他们的作用。但是，进步党在大选后很快就脱离了民主革命的队伍，自由党也加以模仿，接纳了吉田。

“因此，在推进日本民主革命方面，我们对吉田内阁不能抱任何希望。这种性质的吉田内阁实际存在着，与之相对抗的势力应成立民主战线，这是理所当然的，必须如实承认这种政治性的分野。关于民主革命的前进，虽然我们对吉田内阁不抱任何希望，但是在粮食问题，通货膨胀对策等方面，要看它发表的具体政策来决定态度，该支持的就支持，该反对的就反对。”

根据这篇社论的看法，吉田内阁是反动官僚和自由、进步两党的联合体。一言以蔽之，集丑恶之大成，相反，民主战线似乎是完善无缺的。那么，民主战线的实体如何，却没有说清楚。“从击败自由党拉拢社会党、分裂民主战线企图的，也是民主战线的力量”这一句话从文脉来推测，好象以共产党为中心的劳动人民群众是民主势力的主体。直到一年多以前，高喊把绝望的自我毁灭的战争坚持到底的报纸，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如果是二、三十岁的记者一下改变了看法，还可理解，但对于判断力最强的社论委员们露骨的方针转变，人们无论如何也是不会赞许的。

上边引用的社论，老老实实地表露出来支持“民主势力”的实体，还是很坦率的。战后，随着岁月的流逝，时过境迁，许多社论所追求的理想的真面目已经越来越模糊不清。有的社论也写得很不错，但是至今还有不少社论急于追求模糊不清的理想，而轻易否定政治文化现实，使人深感头痛。

说到这里，我想谈谈关于吉田茂组阁的三个特征：第一，吉田茂的政党观。如《十年回忆》第一卷所说，吉田茂直接同政党人

士有所交往是在田中、币原两位外务大臣手下任次官的时候。但是，他对政党全力以赴是鸠山被整肃、委托他领导自由党时才开始的。对于“过去官吏出身而且只有外交官经历、对政治背后的内幕等概不了解也不想了解”的吉田茂来说，可以说是性质不同的经验，是文化冲击。

吉田茂过去以为“政党应以主义、主张而行动”，而且他说过，“本来，政治是什么和应当是什么的问题是政治家必须深思熟虑的。”吉田茂的政党观是立足于爱德曼特·巴库以来正统理论的基础上的，但这始终是“白昼”或“光明”的政党论，而政党还存在着“黑夜”或“阴暗”部分，吉田茂对此是持批判态度的。他写道：

“就我所知，我国政治家的缺点是，往往过于以功利的、个人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政治。他们热中于飞黄腾达的思想非常严重，更极端的是，甚至有人以政治为发财致富的工具。这样是不行的。努力克服和消灭这个风气，也是十分重要的政治。我认为，即使这样作，会在党内遭到憎恶，也应该自行其是。

“为权力所左右的政治家，当出现另外一种权力时，就会毫无出息地屈服于这种权力。在美军占领日本期间，我经常看到这类情况。他们敏锐地察觉到权势的所在以后，便立即设法接近它，继之则阿谀逢迎，进而则加以利用，以巩固自己的地位。这也许是政治家最容易走的捷径，但同时也是不应该走的道路。

“这里所说的权势，并不限于占领军、大臣或者武力。所谓舆论、工会以及时代的潮流等等，有时也会成为一种无形的压力。企图以这些东西为背景或手段往上爬的作风，作为政治家来说是最应唾弃的。至于那些没有任何主义、主张而专靠金钱拉拢一部分人、把拉拢到的人当做势力又来赚钱的把头式的人，乃是市井无赖之徒，决不可与之共处于政界。只要有这种人存在，就难望政界的纯洁，显然不能不说他们是政党政治、民主政治的癌症。”

情况完全如吉田茂所说。尽管有程度之差，任何一个国家的



政党都俨然存在着“黑夜”和“阴暗”部分。没有七情六欲的人是找不到的。以政党为工具进行活动的人们，权力欲望强烈也是当然之事。吉田茂与这些欲望强烈的政党人士打交道，在组阁这段时间总算贯彻了自己的信条，这是很幸运的。我认为，这还应归功于占领下的特殊条件的巨大作用，由于和麦克阿瑟元帅这样握有强大权力的人直接结合才得以实现。其次，吉田茂在和政党的“阴暗”势力进行斗争中也大体上压住了他们。

这是因为如果占领结束，即日本一独立，就意味着“阴暗”的能量要喷发出来。作为政治家的吉田茂，考虑过恢复日本的主权和独立，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吉田茂一旦完成这一使命，即丧失了他的所谓神通力量，受到政党“阴暗”势力的打击，而节节败退。

第二点值得注目的是，吉田茂相当敏锐的权力感觉和政治嗅觉。鸠山一郎要他取代自己的地位挑重担时，他并不理睬，而是币原喜重郎和町田忠治恳切要求时才认真开始考虑，这显示出作为政治家的吉田茂的超群素质。他认为，自由党一党当政不可能有稳定政权，社会党左右两派对立也是不可靠的，只有自由党和进步党联合才能建立稳定的政权。

吉田茂作为政治家的嗅觉之灵敏、权力感觉之锐利，从他把红旗林立的情况加以灵活运用、争取从美国进口粮食这一点上也体现得十分明显。从麦克阿瑟那里得到“不让一个日本人饿死”的确实保证之后直到组阁完成这段时间，就象武见太郎所赞誉的那样，真如同名流汇集演出的一台脍炙人口的节目。

这种政治嗅觉和权力感觉是怎样培养起来的呢？人们认为这里有生父竹内纲遗传的因素，也得力于养父吉田贤三的熏陶。另外，养父死后，从少年时代起就作为吉田家的家长的经历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成年之后，日俄战争媾和的第二年，进入外务省到奉天总领事馆，在获原总领事领导下从事工作的长时间外交官的

经历和经验，磨练了吉田的嗅觉和感觉。担任驻英大使以后又失去职务成为无业游民，为阻止军部的狂暴而奔走，这都大大提高了吉田茂的政治能力。战争中争取和平的活动，战后任外相与占领军之间的谈判交涉，无疑都使吉田茂作为一个政治家逐渐成熟起来。

最后，必须提到的特点是吉田茂对学者的尊重。《十年回忆》第一卷讲到，“其实，‘喜欢学者’的宗师却是牧野伸显伯爵。牧野伯爵很久以前就喜欢学者，经常把学者邀到家里谈话，有时还和他们下围棋。东京大学的东畑精一、有泽广巳两位教授，似乎就是牧野伯爵下围棋的棋友和劲敌。”

牧野伯爵在吉田茂第一次组阁时，反复提醒他“必须尊重学者的意见、专家的主张。不仅要听政党人士的意见，也要认真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应当在坚实的基础上制定政策和执行政务。”吉田茂对岳父的忠告，当然是洗耳恭听的。

尤其在老成练达的政治家和富有经验的财界头目大多遭到整肃而引退蛰居，吉田茂重用经济方面的专家，让他们担任内阁职务的当时，让学者担任文部大臣，这是很自然的趋势。

## 第四章 第一届吉田内阁

1946年5月22日，第一届吉田内阁组成。吉田首相在首次内阁会议之后，会见新闻记者时发表了如下三点意见：

一、有关“粮食问题”。有了满意的农林大臣人选，今后粮食不足部分虽然还要依靠进口，但更重要的是靠本身力量解决。当前要采取的紧急措施有：（1）用新办法促进农民向政府交售粮食；（2）调查库存，揭发隐藏物资；（3）整顿配售机构；（4）努力进口粮食等。下一步的对策是增加包括水产品在内的各种食品的产量，实行土地改革，改善向农民提供农业用品的对策等。

二、坚决不同意进行“生产管理”，<sup>①</sup>政府必须采取适当措施。参照日本现行法律，对于管理是否合法问题，目前正在研究中。

三、“军事补贴”达到一定程度后将停止支付。

吉田首相在一周后，向麦克阿瑟元帅提交了如下致敬信：

“敬启者 盟军总司令部对于5月18日日本政府的请求迅速予以处理，发放了7,589吨粮食和250万磅面粉。对此，谨向阁下表示深切的谢意。由于政务繁忙，拖至今日才发函致谢，上述面粉立即配给了东京、横滨等地区。面临暴动危机的形势，由此得以缓和，尤为欣慰。

“再次向阁下表示，日本政府为解决粮食问题将进行不懈的努

<sup>①</sup> “生产管理”是指日本进步政党所主张的有工人参加的生产管理。——译者

力，同时请求盟军总司令部今后继续给予支援和合作。

谨致崇高的敬意

吉田茂敬启”

这封信的字里行间渗透着吉田茂的感谢心情，说明当时我国的缺粮形势非常紧迫。前面已经说过，在吉田组阁时，由于粮食不足，社会不安，曾出现了政治危机的形势。

吉田内阁把解决粮食问题作为压倒一切的课题，根据6月7日内阁会议的决定，6月13日发表了“关于摆脱粮食非常时期的声明”和“摆脱粮食危机对策要点”。这两个历史性文件清楚地表明了当时形势的严重，这是今天难以想象的。我想先引用一下“声明”的内容：“粮食问题终于陷入了最坏的境地，多数同胞直接面临饥饿威胁，日本民族处于严重而困难的考验时期，这也是排除万难、建设和平日本必须渡过的难关。所有日本人都应发挥同胞友爱精神，相互援助，少量的粮食要分着吃，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危机。面对这种情况，所有政党、团体都要一致奋起，城市和农村结成一体，克服困难，除此之外别无他法。特别是农民的动向是解决这场危机成败的决定力量。

“为了克服目前的粮食紧急情况，政府将实施各种解决方针，希望国民能以坚韧不拔的合作态度克服危机。”这项声明中所说的“各种解决方针”，就是下面要谈的“摆脱粮食危机对策纲要”，其内容为：

第一，关于建立摆脱粮食危机的国民运动基础事项：

1. 政府在讲明本粮食年度粮食危机的实际情况时，为唤起救国精神，将发表粮食非常时期宣言。

2. 请求各政党、言论机关，在非常时期宣言发表时，进行全面合作，摆脱粮食危机，必要时设立由各政党、农业团体、农民合作社、工会等方面代表组成的粮食对策委员会，作为推动政府施政和国民运动的机关。

第二，为摆脱危机应当采取的对策：

1 尽最大可能促进增加1945年向国家交售的大米数量，并由自主救国运动保证。

2. 综合考虑摆脱粮食危机最重要的小麦和薯类的交售量与农家留存的陈谷物的关系，特别希望确实完成每月的交售计划。

3. 由市、町、村粮食调整委员会决定农户的留存粮以及今后用小麦、薯类作为下一个粮食年度的接续粮的必要消费计划、交售计划等。上述委员会是以农户为主体的民主机构。

4. 继续保留强制性交售措施。其实施以市、町、村粮食调整委员会的申请为原则。

5. 为奖励交售，要大量集中供应农家所需要的物资，如纺织品、肥皂、布袜子、工作服等，按照交售小麦、薯类的数量相应地提供肥料。

6. 对于超过预定征购量的部分以及交售小麦、薯类者，全部款项均用新日元支付<sup>①</sup>。

7. 全面检查农业仓库等，同时设立官民联合调查机关，积极揭发隐藏粮食现象。

8. 促进人口疏散，无条件地批准大消费城市人口自由迁到地方。鼓励国民学校和中等学校学生优先向地方转学，缩短上课时间或者停课。大学和专科学校要采取提前放暑假等措施。奖励事务所、企业、事业等单位人员，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轮流回乡。

9. 废除现行的对劳动者家庭的粮食补助办法。按照生产重点和成绩，重新研究劳动粮食补助的范围和标准，尽量节省补助粮。对于需要维持的基本产业劳动者的粮食供应，要采取特别措施予以保证。

---

<sup>①</sup> 日本当时实行冻结存款措施。规定政府征购超过500日元时不付现金。——译者

10. 高级饭店、高级饮食店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临时停业。

11. 采取特别措施，确保对大消费城市供应新鲜食品，尤其要增加水产品的供应，为此要迅速保证对渔船的燃料、鱼网供应。

12. 努力使消费城市的基层粮食配售工作公正进行，并实现民主化。

13. 尽量开发代食品资源，特别注意利用根、茎作为紧急代用食品。

第三，向盟军总部提出请求事项(共四项)：

1. 这项工作由首相亲自处理，政府尽力为促进和接受粮食进口而努力。

2. 请求向京浜、北海道、青森、山梨等最缺粮的地区提供10万吨紧急补充粮。

3. 关于采取以进口粮为担保、暂时征借地方粮的措施，请求予以谅解。

4. 为了增加水产品，请求在现行作业海域之外，批准开辟特定的临时捕捞区。

上述“关于摆脱粮食危机的声明”，充满悲壮言词。如果单从这点看似乎是一篇空文，但是“关于摆脱粮食危机纲领”却有动人的号召力。特别是第二项“为摆脱危机当前应采取的对策”第5以下各项，都是极为具体的措施，它告诉人们，当时的危机是何等严重。规定对超过征购量部分以及小麦、薯等全部用新日元支付一点需要加以说明。情况是这样：该年2月17日，日本政府为了阻止通货膨胀进一步发展，采取了紧急的金融措施，封存了银行存款，改发新日元。旧日元兑换新日元的条件非常严格，因此规定用新日元支付，有助于促进交售。

6月28日又公布了“为摆脱粮食危机的主要粮食征购对策”。这项“征购对策”包括两项内容：一、关于征购去年产米的事项；二、

关于新麦和春马铃薯的征购事项。这样，征购措施更加具体化了。这里不引用全文，只把有关去年产米的征购规定摘出供参考：“为了摆脱迫在眉睫的危机，需要迅速征购紧急救国粮，希望在6月中旬完成所规定的征购量。”

为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扩大已有的市、町、村征购委员会，并使其成为民主和自治的机构。要立即采取最紧急措施，选出农民合作社的代表、农村青年代表等农村各阶层的代表参加上述委员会工作，以期迅速完成征购任务。在规定了征购委员会民主化的基础上，“关于采取强制行动问题，原则上在上述委员会提出请求后实施”，表现了处理紧急情况 and 推进民主化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如果不是具有民主精神的和田博雄担任农林大臣，事情是不可能具有这种进展的。从这点也可看出，吉田茂起用和田是成功的。

由吉田首相亲自出面向盟军总部提出的要求，到了这个阶段总算有了结果，6月10日至7月31日期间的配给粮，估算缺少399,862吨，抛售进口粮208,156吨，相当于缺粮总额的52%，就12个主要城市而言，缺粮量弥补了80%。吉田首相在内阁会议上听到和田农相报告说，已经发放了进口粮的消息令人感到满意。吉田茂有把功劳谦让给他人的美德，这点值得特书一笔。由于投放了进口粮，到6月下旬，不能按时配给的问题解决了，从这时起，日本国民，特别是城市居民开始感到前途光明。8月份投放213,314吨，9月份投放181,662吨，这样总算摆脱了原来估计在7至9月青黄不接时期可能出现的最严重的粮食危机。根据《东京都粮食经营财团史》的记载，当时向东京都居民配给的粮食中，国内物资与进口物资的比率如下：

月份	国内物资(%)	进口物资(%)
4	94.3	5.7
5	70.7	29.3

6	22.9	77.1
7	8.3	91.7
8	5.9	94.1
9	27.6	72.4
10	72.4	27.6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东京都居民，从1946年5月至10月，特别是从6月至9月的四个月期间，是靠占领军发放的进口粮维持生存的。

## 二

使严重的粮食问题解决到这种程度是费尽了心血的。吉田茂在他的《十年回忆》第二卷第十五章“第二次大战后的粮食情况”一节中这样写道：“在我出任东久迩内阁外务大臣时(1945年9月17日)，粮食问题已经成为内阁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当然，由于发放我国陆海军的储藏物资以及1944年度生产大米的征购工作比较顺利等原因，暂时摆脱了危机。但是这批军方储藏粮食的发放，由于战争刚刚结束后的社会混乱，并未能有效地纳入粮食配给的正轨，加之1945年又遇到史无前例的稻米歉收，粮食供应的前途便令人不胜焦虑。到处流传着所谓‘这样下去必定饿死1,000万人’的流言蜚语，似乎也能令人相信，就是在那个时候。农林省当局也报告说，根据计算大约缺少100万人的粮食。因此，我本身也认真地向麦克阿瑟元帅直接建议说，如果不进口450万吨(约3,000万石)的巨大数量的粮食，确有饿死人的危险。幸而当时进口了70万吨粮食，才勉强渡过难关，总算没有饿死人；但后来麦克阿瑟元帅曾经严厉批评日本政府的统计不够完备和任意编造，我也颇觉难堪。”关于这点，吉田茂本人在《十年回忆》第一卷，用“勉强渡过的粮食危机”为题作了说明：“因此，盟军总部方面认为，日本的统计数字荒唐无稽，大加责难。事实上，也许由于农



林省想尽可能少估计农民的交售量，以便让占领军多发放粮食，才提出了这个450万吨数字的。并且，从战争期间以来，我国政府动辄有意无意地片面发表对自己有利的数字，这已经成了习惯。有一次连麦克阿瑟元帅也指责，日本统计数字没有根据，我于是说：‘在战前，如果日本的统计完备，也许不会发动那么轻率的战争，’而且若是发动也许会打胜。说罢一笑了之。”

对于麦克阿瑟元帅的严厉批评，能够巧妙地加以答对，这是吉田形象的真实反映。如果他本人不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他就不可能这样做。

币原内阁的农林大臣、民政党要员、农业政策权威松村谦三，在他所写的《三代回忆录》中谈到，当时天皇曾表示，为了把国民从粮食危机中拯救出来，愿把皇室的财产提供出来。有关内容如下：“终于到了12月，是在10日前后，我接到了宫中召见的通知，于是我急忙进宫，拜谒天皇并致问候。陛下非常担心粮食情况说：‘粮食情况如果继续这样恶化下去，就要饿死许多人。国民深受战争涂炭，如果再饿死许多人，无论如何我是忍受不了的。听说政府已向美国要求提供粮食，美国没有承诺，可能他们认为，我们没有任何可用来偿付粮食的代价，真是毫无办法。但是我想皇室物品中不少是有很高国际价值的，我已令皇室博物馆长进行调查并造好目录，请你把它交给美国，作为代价，换取粮食，使国民少挨一天饥饿，也是好的，希望你来办此事。’我出了一身冷汗，感到责任重大。接受目录后，离开皇宫，我立即前往官邸见币原首相，报告事情经过。币原首相紧闭双目，握着拳头，仔细考虑后说：‘如果陛下有这样的圣虑，只有我去对麦克阿瑟元帅说了，向对方提出请求。’当时只有首相有事时(包括夜间)才有权拜见麦克阿瑟元帅。币原首相见麦克阿瑟元帅之后，我回到了农林省，不久，币原首相就来电话说：‘有事情和你谈，请立即到这里来……。’当我走进首相官邸办公室时，币原立刻站起来紧紧握着

我的手说：‘好了！好了！’……说着就潸潸落泪，我赶忙问原因，接着他详细地向我谈了会见麦克阿瑟的情况。当币原向麦克阿瑟转达陛下的心意，并呈上宫中物品清册时，容易激动的麦克阿瑟非常感动地说：‘天皇的想法我完全理解。这对我本人、对美国都是一项郑重的请求。但是天皇提出以皇室物品担保来换取粮食一事，涉及名誉问题，我不能接受，请把清册还给陛下。通过此事我充分了解到天皇关心国民的心情。我目前担任此职，就决不会让日本国民有人被饿死。我一定设法从美国运来粮食。请转告陛下，尽管放心’。

前面已经谈到，1946年5月21日吉田组阁前，麦克阿瑟元帅对吉田茂也作过相同的承诺。麦克阿瑟元帅向币原、吉田茂二人作了同样的承诺，我想在他的心中除了作为占领军最高司令官的责任外，还对天皇怀有特别敬爱之感。

鸠山内阁外相重光葵，在战争结束后十年，即1955年在纽约访问麦克阿瑟时，也有过暗示性的谈话。麦克阿瑟问重光葵：“重光先生，在这十年期间，你认为到底谁是使日本从废墟中恢复到目前这种状态的最高功劳者？”重光心中暗想，麦克阿瑟大概想说他吧！因此故意沉默不语。麦克阿瑟接着自问自答地说：“你如果不回答，让我来告诉你吧，除了天皇外没有其他任何人！连我这个外国人都知道，难道你就不清楚吗？如果日本人不了解这点，是个大错误。”确实象麦克阿瑟所说的那样，我们特别不能忘记的是，当他向币原首相承诺之后，又向吉田首相作出同样承诺的五个月中间，世界粮食形势严重恶化了。

欧洲小麦严重不足，盛产稻米的缅甸、泰国、印支也都由于收成不好，没有出口能力。甚至中国和印度也出现了饥饿状态。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下，向币原首相作出承诺，又向吉田茂作出同样的承诺，无疑表示了麦克阿瑟元帅本人下了非常大的决心。战争结束后正是陛下的“我本人何去何从都无所谓，必须拯救国民”

的无私形象，使麦克阿瑟深受感动，从而尽全力从事工作。

吉田茂的功绩在于，在世界粮食情况严重恶化的情况下，在赤旗的包围下，巧妙地运用了麦克阿瑟元帅对天皇的敬慕这根唯一的救命绳，依靠进口最少限度的粮食，成功地摆脱了危机。这对于今天有吃有穿的国民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当时厚生省根据占领军总部的指示所进行的营养调查证明，东京居民从食物中所摄取的热量1946年5月1日每人平均为1,352卡，其中配给的粮食只能提供775卡，其余靠家庭生产以及从黑市购买食物来补充。日本人每天正常必需的热量约2,500卡，因此，当年6月以后，如果不大量抛售进口粮食，许多同胞无疑只能饿死。当人们议论战败后的日本时，不少人对当时日本国民所处的严重环境缺乏理解，这真是令人遗憾的。

### 三

吉田内阁另一个重要的课题是修改宪法，正好是和当时严重的粮食危机同一时期进行的。前面已经谈过，1946年3月6日晚在发表天皇敕令和首相谈话的同时，公布了“修改宪法纲要”，后来继续进行了草拟条文的工作。4月17日，用平假名口语体公布了“日本国宪法草案”，并根据明治宪法所规定的修改手迹，同日送交枢密院。

以潮惠文辅顾问为委员长的枢密院宪法审查委员会，从4月22日开始审议。第一次会议开始时，铃木贯太郎议长作了令人注目的不寻常发言，他回顾接受“波茨坦公告”时的情况说：“当时出现了‘波茨坦公告’与国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一部分人主张继续进行战争，他们认为，接受‘波茨坦公告’就不能维护国体。也有人附和这种说法。但是我认为，对方的回答既然明确了日本国的政治形态，要根据日本国民的自由意志来决定，国体就不成问题了。我对这一草案维护了国体感到满意。关于放弃战争，这是非

常重要的决定，自古以来就有‘柔能克刚’、‘柔弱得生’、‘硬强致死’等话。事实上这是日本的生路，目前这是不得已的！也是恰当的。把这点写进草案，我表示敬意。”

截止5月15日第八次会议为止，在进行间歇审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美浓部达吉顾问对修改手续提出了根本性的疑问。美浓部主张：“修改宪法是根据宪法第七十三条进行的。但是由于该条本身就违反‘波茨坦公告’有关‘依据日本人民自由意志’……的规定，因而是无效的。宪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的宪法修改手续是，议案由敕令提出后提交贵族院（政府现在也认为该院不适当，应予废除）付议并经天皇批准后修改方能生效。尽管如此，在草案前言里却说是国民自己制定的宪法，这完全是虚伪的。现在，由于第七十三条失效，修改宪法的手续处于未定状态。因此枢密院也不能审议。应撤回该案，首先在下次会议上规定修改宪法的手续。”

对此松本国务相回答说：“如果是这样，那么手续法又如何规定呢？不能用修改宪法手续法这种法律来规定修改宪法的手续。过去有个阶段，曾考虑先修改宪法第七十三条。从美浓部顾问的意见来看，这也是不可能的。最后，只要实质上尊重民意就行了，通过议会审议，不能不认为是自由表达了民意。政府认为这中间差别不大。前言内容是用敕令提出，道理上也说得过去。”

美浓部顾问提出的宪法修改手续问题，以及国体问题和放弃战争问题，可以说是日本国宪法通过前，争论最激烈的三个大问题。

5月22日吉田内阁组成。根据先例暂时撤回咨询中的方案，27日进行若干修正后重新提出草案交付咨询。两天后，第九届审查委员会重新开会，吉田首相出席并致词，对草案作了简要说明，指出重新交付审议的草案与币原内阁的草案内容没有差别。

林赖三郎顾问提出为什么要加紧审议修改手续？吉田首相对此答复说：“急于进行的理由是，麦克阿瑟元帅认为，内容倒在其

次，时间更为重要。一部好的宪法，失掉时机也就没有用处。麦克阿瑟元帅想在2月26日远东委员会开会前后公布。这对缓和认为日本正在重整军备、进行民主化只不过是伪装等言论也是必要的。该委员会还要在日本召开理事会，在他们到达之前想把一切问题都解决好。不知道本国舆论会发生什么变化，其他国家的军队也许会派进来。在大选之前发表，也想把它作为大选的题目。后来关于各项条款和盟军总部进行了多次交涉。关于皇室财产的规定，日本人有难以同意之处。对此，我本人和对方谈了几次，我认为可以在议会讨论时进行修改。希望现在尽快拟好草案并予公布。”

听了回答以后，林顾问又问：“为什么要急急忙忙审议呢？5月13日各报刊登的美联社消息说，远东委员会关于通过日本宪法三原则的第一项就提出，要有充分时间和机会研究要审议的草案。所以，尽管我国着急，对方还是要仔细审议的。”

吉田首相回答说：“就日本而言，希望尽快恢复主权，撤走占领军。有人说盟军总部的简称GHQ就是go home quickly(早点回国)的缩写。为此必须尽早完成修改宪法，以便向全世界证明，日本没有重整军备的危险，并彻底实现了民主化。

“至于在华盛顿的远东委员会的气氛，由于除报刊报道外没有直接的情报，目前只不过是单纯的推测而已。当时该委员会设立的情况去年12月前后，在莫斯科三外长会议上，决定设立远东委员会，一月底开会时，苏联提出要求直接参加占领日本的行政，结果不欢而散。我推测这次的决议可能是为了缓和那种气氛而提出的。”

在审议再咨询案时，又重新讨论了今后修改的可能性问题、主权所在问题、是否应该删掉第九条第二项的问题、参议院的组织问题、法院是否有审查违宪权的问题、皇室财产问题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第九条第二项放弃军备问题，有人质问，“当国

内发生骚乱时，如何应付？”吉田首相回答说：“占领军撤退后的情况难以预料，历史也许会重演，总之，将来的事情不清楚。”确实象吉田茂所说的那样，将来的情况无法预料。后来在国会等场合，吉田茂不断重复说：“假设的问题，我不能回答。”

6月8日，在天皇亲临下，枢密院召开全体会议，出席的有铃木议长、清水副议长、崇仁亲王、各国务大臣和顾问。审查委员长潮作了审查报告，林赖三郎、野林吉三郎两位顾问发表意见，然后交付表决。除美浓部顾问由于对修改手续有怀疑表示反对外，多数赞成，枢密院通过了“日本国宪法案”。枢密院审议结束后，宪法修改案即提交第90届帝国会议讨论。吉田内阁为应付6月20日开幕的审议宪法国会，以内阁法制局为中心，紧张地准备答辩资料。由于解除公职令，贵族院议员缺员甚多，必须进行补充。过去币原内阁已经任命了京大名誉教授佐佐木惣一、东大名誉教授牧野英一、东大校长南原繁等为贵族院的“敕选议员”，吉田内阁又追加了东大教授我妻荣、高柳贤三、宫泽俊义等许多法律学者和政治学者。明治宪法下的贵族院，在撤销之前，集中了日本最优秀的人物！

吉田内阁还设立了专门负责宪法问题的国务大臣。无任所大臣定员根据“内阁官制第十条的规定，作为国务大臣列为内阁成员者”由敕令决定。为此特别修改了这一敕令，增加一名定员并起用已接受内阁委托参加修改宪法准备工作的前内阁法制局长官金森德次郎为负责宪法问题的国务大臣，在帝国会议开会的前一天举行天皇任命仪式。

修改宪法草案，6月20日用敕书形式向众议院提出：

“朕基于国民至高无尚之意志，为尊重基本人权、永远确保国民之自由福利、消除不利于加强民主化倾向的一切障碍，主动放弃战争而谋求世界永久和平，以此来巩固重建国家之基础，为此认识到，根据国民自由表达的全面修改宪法的意志，兹按照帝国

宪法第七十三条，向帝国议会提出修改帝国宪法草案。”

这个敕书就是根据前不久在枢密院美浓部顾问表示严重怀疑钦定宪法第七十三条的修改手续，以解决与旧宪法性质明显不同的主权在民的新宪法能否实行的重大问题而苦心思考的结晶。第二天，即21日，麦克阿瑟元帅发表了长篇声明，强调了“议会讨论的三原则”，即：（一）讨论该宪法的规定时，需要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二）保障本修改宪法和明治二十二年颁布的现行宪法有完全的法律持续性；（三）通过该宪法绝对要有日本国民意志之自由表现。”这个声明表明，麦克阿瑟元帅的本意是要帝国会议接受宪法的民主化，并把它作为日本国民本身的自主决定而固定下来。

当时吉田茂作为内阁首相，具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他认为，尽管新宪法有各种问题，但为了重建日本，必须在第90届帝国会议通过该宪法修改案。

#### 四

宪法修改案于1946年6月25日正式提交众议院全体会议讨论。但是在这届议会召开的第二天，即在麦克阿瑟元帅发表声明的同一天（6月21日），吉田首相发表施政方针演说后，众议院即以提出质询的形式，实质上已开始审议宪法。施政方针演说指出：“现在，正象各位所了解的，我国的处境非常艰苦。我们正面临着根据‘波茨坦公告’的精神建设民主的、和平的国家这一伟大事业，当前的任务是，必须尽速解决食粮问题……。”接着在此基础上谈到修改宪法问题：

“诸位！本届议会一开始就遵照敕令把建设新日本的基础——宪法修改案，提交审议。幸而本届议会是根据新选举法通过大选而产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民主议会。政府能借此机会和诸位共同讨论国家最高法典——宪法的修改，我感到无上光荣。政府将迅速

本着民主与和平的精神，对于政治的运用以及行政，经济等进行全面的研究，并加以改革，促使我国真正取得作为一个和平的国际社会成员资格与实质。”

众议院提出质问的是片山哲和德田球一，贵族院是山田三郎和佐佐木惣一。片山哲在质问中指出：民主、社会主义以及和平主义是战败后政治原理的三项原则，为了彻底贯彻这些原则，宪法修改案必须进行大幅度修改，政府是否准备这样修改？

吉田首相答辩说：“从理论上讲，议会对于宪法修改案有广泛的修改权。但是，对这部宪法草案，政府考虑了内外情况，进行了慎重审议。因此，请各位充分判断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还希望慎重提出修改意见。”正象上面所谈的那样，回顾一下“日本国宪法草案”制定的过程，可以看出，宪法修改案有类似国际条约的性质。修改宪法的目的是要为我国恢复国际社会地位准备条件，但是不仅社会党和共产党等在野党，就是执政的自由党和进步党也从不同立场出发，对宪法修改案不满。有一部分议员不能理解具有近似国际条约性质的宪法修改案不能大幅度修改的原因。而且即使理解，仍有必要弄清议会是否有可能进行修改，为此吉田首相不能不进行上述那种答辩。

6月25日宪法修改案最后提交众议院全体会议讨论时，吉田首相说明了提案理由如下：“诸位都知道，去年我国接受的‘波茨坦公告’以及盟军总部发出的与此有关的文件，都载有这样的条款，即：‘必须将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趋势之复兴及增强之全部障碍予以消除，必须确立对言论宗教及思想自由以及对于基本人权的尊重’和‘日本政府之最后形式将依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愿确定之’。正是这个方针明确指出了和平的日本前进的道路，因此我认为，国家基本法的宪法必须修改。从前任内阁一直到现任内阁，政府方面曾锐意进行调查和起草工作，现在业已拟就成案，并经奏请提交这次帝国议会，今天特请本院予以审议。”



“本修改草案的基本方针是，依据国民公意至高无尚这一原则来决定各种国家机构，尊重基本人权，永久保障国民的自由福利，以确立民主政治的基础，并在世界上首先放弃战争，把世界人类希望自由与和平的理想表现于国家的宪法条款中。这个精神在本修改草案的序言中已有详细叙述。”

吉田首相接着就有关天皇地位、放弃战争、国民的权利义务、政治机构、司法权、财政、皇室财产、地方自治、宪法修改程序和最高法规等作了概要说明。

从6月25日至28日众议院举行4天全体会议，进行质询，共有11名众议员发言，议论的两个中心问题是：（一）主权所属和国体问题；（二）放弃战争问题。第一个问题，执政党，即自由党和进步党的提问者从保守立场出发，希望首相回答“国体没有变化”这一保证，而在野党极力想使主权属民的原则更加明确。

自由党的北聆吉6月25日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提出保守方面的代表性意见：一部分人称现行宪法的前提是主权隶属天皇、主权在君，从而认为修改宪法与此相反，是主权在民的宪法。也有人国体变革感到吃惊和愤慨。我个人没有这种惊奇和愤慨。我认为日本自古以来就是“君民共治”、“君民同治”的国家，如果使用主权一词，那么主权就是属于君民一体。统治的作用有时强烈地表现在君主方面，有时强烈地体现在民众方面，这中间有过相互消长，但没有西洋那种君主直接和国民争权的历史。政权争夺主要是在君主和国民之间的封建分子与公卿之间、武家之间或者公卿与武家之间进行，但是一君与万民之间总的来说，关系是融洽的，这种信念并没有变化（掌声）。

“因此我通读这个宪法修改案时，认为前言中所写的日本国民一词，也可以把天皇列入，这样包括天皇在内的全体日本人都参与制定宪法，并有贯彻这一宪法精神之诚意。因此我认为没有必要把君主主权学说变为主权属民学说。当然关于主权论的详细内

容，必须回顾博丹以来的主权概念的发展过程，我认为本届议会不可能详细进行这种讨论，我将在委员会上详细阐述。我认为在法律方面论述主权所属、行使统治权是相当困难的。我不准备象社会党总书记片山君方才向会议提出的那样，在这里讨论，但是在日本国民中有某种不安，要进一步明确与国体的关系，有责任也有必要诚恳而亲切地向国民说明本宪法并不是改变国体。”

北岭吉议员的上述意见可以说完全符合吉田茂的想法，吉田茂趁此机会立即回答说：“北岭吉议员就宪法与皇室、皇室地位发表了许多意见，我认为大体上象你所说的那样。我认为皇室存在就是在日本国民中自然产生的日本国体，皇室与国民之间没有任何区别，是所谓‘君臣如一’、‘君臣一家’。君臣之间当然没有对立关系。因此，所谓主权属于谁的问题，在日本国是非常明确的，这里不必多说了。关于国体是否由此而发生了变化，这不是北氏的质问，而是说也许有人这样认为。我认为也许有这种人，但在新宪法下，国体丝毫没有改变（掌声），新宪法中只不过是另一种文字形式记载了日本过去的精神和思想。”

新宪法是否改变了国体，对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如果回顾一下1935年“国体明征”问题<sup>①</sup>曾发展为那么重大政治问题，即可容易理解了。象吉田首相所指出的那样，日本的天皇与国民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君臣如一”、“君臣一家”，在这种意义上，修改宪法确实没有使国体发生变化。

但是受普鲁士德意志型君主主权学说影响极强的明治宪法，严格区别君臣，它的倾向是仅仅强调君主主权，在这种意义上，旧宪法也可以说是日本历史上特殊的宪法。新宪法去掉了普鲁士德意志型的君主主权学说，恢复了古代以来的日本传统。

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期间，关于放弃战争的条款和国体问

---

<sup>①</sup> 战前日本宪法学者美浓部达吉提出“天皇是机关”之说，引起军部的不满，1935年帝国议会讨论了此事。——译者

题一样，是议论的中心。吉田首相在答辩中有失误。我们先引用进步党议员原夫次郎的质问：“这项放弃战争的条款，用一句话来说，最终是为了有助于世界和平。但是一方面从独立国家的体面说来，通过这次痛苦经验，我国固然没有人再想指挥战争或制定发动战争的计划了。但是可怕的是，如果对我国出现突然或有计划的侵略和占领，我国是否连自卫权也要放弃呢？为了确立自卫权，作为其附属物，必须拥有陆、海、空军或其他武装力量，没有这方面的准备就不能行使自卫权。这是个非常矛盾的问题。但是可以想象在这方面，人们是煞费苦心的。如果出现突然袭击，发生入侵，我国究竟如何应付呢？我认为这当然也是政府当局要考虑的问题。从各方面国际形势看，深感我国最终不能不写上这一条款的处境。如果作为自卫也不能用武装来保卫的话，这样就要得出必须依赖他国才能进行防卫的结论。有这样的条款，当然可以想象和其他国家要有应付这种情况的某种条约或换文……”。

这是根据健全的常识，考虑周密的有代表性的质询。但是，吉田首相的答辩却有些粗暴：“本草案关于放弃战争的条款，虽然没有直接否认自卫权，但是由于第九条第二项不承认一切军备和国家的交战权，结果也就等于放弃发动行使自卫权的战争以及交战权。过去和近期的战争多半是在行使自卫权的名义下进行的，九·一八事变是这样，大东亚战争也是这样，现在，各国对我国的疑虑，就是认为日本是个好战国家，对我国的最大怀疑和误解是，认为日本总有一天会重整军备，发动复仇战争，威胁世界和平。今天当务之急是消除这种误解。看一下过去的历史，必须承认这种疑惑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因此在这部宪法中，我国首先主动放弃任何名义下的交战权，以此来为全世界和平奠定基础，表明决心站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前列，为确立世界的和平作出贡献(掌声)。”

吉田首相的重点答辩过分考虑日本曾在自卫的名义下进行过

侵略战争这一历史事实，为了消除全世界担心日本重新复活军国主义，公开说出连自卫战争也要放弃的话。吉田虽然也有“没有直接否认自卫权”这样一些限制性的话，但是由于讲了“也就等于放弃发动行使自卫权的战争……”，这不能不说有些言之过甚。当然，在当时的环境下，吉田茂说些过头话，也许是必要的。

6月29日在众议院，共产党议员野坂参三谈到放弃战争时，吉田首相的答辩更厉害了。当野坂指出：“这里写的是放弃战争本身。我们认为有两种性质不同的战争：一种是不正义战争，如日本帝国主义在九·一八事变后所发动的那种战争，是征服他国的侵略战争，这是不正义战争；但是遭受侵略的国家，为了保卫本国而进行的战争，我们认为是正义的战争。从这种意义上来看，过去的那场战争，从中国或英、美及其他盟国来说是防御性的战争，不妨可以说是正义战争。因此，宪法草案不要规定全面放弃战争，我们认为应明确规定放弃侵略战争。对此，我们共产党就是这样主张，日本国要与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紧密合作，参加国际民主和平机构，不参加也不支持任何侵略战争，我们认为规定这样条款更为确切……。”

吉田首相的答辩比对原夫次郎议员质问的答辩调子更高：“宪法草案有关放弃战争的条款，我认为基于国家正当防卫权的战争，看来是正常的，但是承认这种战争，将是有害的（掌声）。近年来的战争多是在国家防卫权的名义下进行的，这是明显的事实。因此我认为，承认正当防卫权常常会诱发战争。关于放弃战争条款所寄托的期望是建立国际和平团体，要用建立国际和平团体来防止一切以侵略为目的的战争。但是假如承认有正当防卫战争的话，必须有进行侵略战争的国家存在为前提。因此承认正当防卫权、国家防卫权战争，往往只能起诱发战争的有害作用。和平团体、国际团体成立时，承认正当防卫权本身就是有害的。我认为你所说的建议是有害而无益的议论（掌声）。”

也许因为质问的是共产党代表，吉田茂硬说质询本身“有害而无益”。对于原夫议员的质问，曾说过并不否定自卫权本身这种话，而对野坂质问的答复，完全相反，断言承认国家自卫权本身就是有害的，显然吉田又说了过头话。后来当需要把警察预备队改为保安队、自卫队时，在野党经常引用上述吉田对原、野坂两位议员的答辩，而使吉田陷于困境。幸而在修改宪法特别委员会及小组会上，由于芦田均委员长的努力，吉田首相的过头话得以纠正。

修改宪法特别委员会，是在6月28日的众议院全体大会上，由议长指定72名委员组成的。从党派构成看：自由党22名、进步党15名、社会党15名、协同党7名、其他13名。自由党的芦田均被选为委员长。从7月1日到23日对修改宪法案进行了质疑。后来为了座谈修正方案，设立了小组会。经过13次讨论后，8月21日特别委员会进行了表决。

关于自卫权问题，特别委员会委员长芦田均进行的补充回辩要点如下：“不幸的是，政府关于自卫权的答辩不够明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明确承认自卫权。只是为了防止滥用自卫权，采取了把自卫权的行使置于安理会的监督之下。修改宪法第九条生效后，如果加入联合国，当然承认日本有在宪章第五十一条的限制下行使自卫权。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有的认为由于没有武装力量，行使自卫权可能是有名无实。但是，从联合国宪章讲，对日本的侵略也是威胁世界和平，安理会有义务用它能够使用的武装军队来保卫日本。再考虑到为了自卫允许我国采取适当措施，可以认为在防卫方面是不会有大的失误。政府过去对这点的答辩不够明确，希望在这里再次明确表态。”

在特别委员会专门负责答辩的金森国务委员，当然同意芦田均委员长的见解。

以芦田均委员长为首、由13名委员组成的小组会，对日本国

宪法第九条进行了两项重大修改，都是芦田均委员长亲自提出的。第一项是“日本国民真诚地追求基于正义和秩序的国际和平”这一句话，看起来只是积极地表明国民的理想，但是在第二项的开头加进“为了达到前项目的”一句后，第二项的意义就发生了明显变化。如果照原案不动，那么只要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斗力就是违宪。现在由于加上了“为了达到前项目的”这一限制，就变成了虽然禁止把陆、海、空军及其他战斗力作为解决国际纠纷的手段，但是，为了自卫能够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斗力了。

## 六

高柳贤三、大友一郎、田中英夫三人共同编著的《日本国宪法制定的过程》第二节“解说”对于上述修正过程这样写道：

“这项修正，总司令部未提任何不同意见就批准了。赴美宪法调查会调查团已经证实，当时在占领军总部进行过这样的议论：起草宪法的成员之一民政局的皮克博士，把这一修改意见转呈惠特尼局长时说，这项修正意味着日本可以保持防御力量。惠特尼说：‘难道你不认为这是很好的想法吗？’由于他也这样想，所以也就没否定这项修正。从这里可以看出，占领军总部首脑间认为该项条文包含着不应束缚自卫力量的目的，这在从把麦克阿瑟手谕原则条文写入总部方案制定过程中已经清楚，因此也就同意把它从解释上改写为更明确的文字。”

惠特尼与皮克博士的上述谈话令人深感兴趣。根据芦田均委员长的建议，即使对第九条第二项不加进“为了达到前项目的”这句话，也不能否定日本国本身有自卫权，因此可以解释为承认了日本能保持自卫力量。但是，如果没有“为了达到前项目的”这一限定时，念起来就是不拥有陆、海、空军及其他战斗力。从这种意义上说，芦田均的修改意见意义重大。芦田均小组长由于提出

并实现这一修改，可以说留下了历史的功绩。

吉田首相对重建日本所起的巨大作用已经有了正当的评价，但是与此相反，芦田均的业绩却被轻视，甚至无人谈起，实在令人遗憾。当吉田茂作为政府最高负责人，强调即使为了自卫也不进行战争，努力消除战胜国和邻国的猜疑心时，芦田均却在立法机关为了使日本国将来能够保持自卫力量，默默继续努力。吉田茂与芦田均性格不同，关系并不密切，不久就成为政敌。但是在修改宪法过程中，两者之间却建立了意想不到的合作关系。

由于芦田均的修正，日本将来能够拥有军队，这从盟军总部要求加进所谓“文人”(Civilian)条款这点也可看清。对此，再看一下上面引用的接续部分：“本来，加进这项修改可以理解为是为了允许采取自卫措施，但在进行修改时，众议院和政府却完全没有涉及，但是，盟军总部几乎在同意加进这项修改的同时，提出增加‘文人’条款。政府认为这项条款和关于放弃战争的规定相抵触，盟军总部一度接受，未加变动。但是在贵族院审议阶段，由于远东委员会强烈要求，盟军总部重新提出这一要求，结果加进了有关‘文人’的规定。当时，吉田首相在贵族院修改宪法特别委员会小组会上曾二次说明必须采纳该项规定的理由是：‘由于对宪法第九条的修改（指众议院通过的芦田均修改案），各方面都出现了反对意见。’这一事实清楚表明，在远东委员会等有关国家中，有的认为，由于芦田均修改案，出现了将来不是文人而军人掌权的可能性。”

所谓“文人”条款是指现行宪法第六十六条第二项“内阁首相及其他国务大臣必须是文人”的规定。盟军总部明确提出的另一项重要意见是“主权属于人民”的问题。

吉田茂在他的《十年回忆》第二卷中这样写道：“自宪法修改草案提交议会以后，盟军总部大体上采取了旁观的态度，但在众议院进行审议时，盟军总部所提的意见之一就是主权属于人民的问

题。盟军总部的意见是：金森国务大臣在议会上答辩的宗旨，和旧宪法毫无二致，并且议会上就国体问题和主权问题所以提出各种质问，可能是由于草案的词句含糊不清；因此，希望修改一下草案，把主权属于人民一事明确地表达出来。总之，英译文虽然清楚地表达为主权属于人民，而日文草案却表现为‘国民至高的公意’，因此盟军总部要求把日文草案改为‘主权属于人民’。这个交涉好象是由金森负责办理的，结果众议院小组委员会采纳了这个修改意见。”

1946年8月20日小组委员会整理的各派的共同修改方案中，根据盟军总部的意见，对前言和第一条后段加以修改，明确了“主权属于人民”。对第九条第一项以及第二项加进上面谈过的一句话。此外，还有十处修改。在第二十三条（现行的第二十五条）加进第一项“全体国民都有享受健康和有文化的最低生活的权利”。在第二十四条（现行二十六条）的“全体国民有义务使其保护的儿童受到初等教育。初等教育免费”，加进“依照法律规定”一节，并把“初等教育”改为“普通教育”。第二十五条（现行第二十七条）加进了关于劳动义务规定。关于众议院优先性规定中，修改案缩短了等待参议院通过的时间等。

小组委员会的修改方案在8月21日的特别委员会上通过，三天后在众议院全体会上投票表决的429票中，以赞成票421、反对票8的压倒多数通过。众议院通过的宪法修改案，8月26日提交贵族院全体会议。吉田茂在《十年回忆》第二卷中说，“于是，审议宪法草案的舞台又移到了贵族院。无论币原内阁或我的内阁，都曾预料会有今日，所以一有机会就奏请天皇尽可能任命学术界的权威人士为贵族院议员。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包括这些人士在内的贵族院全体议员以‘最后一次报效国家’的精神，热心地审议了宪法修改草案。

“贵族院的辩论，也是以国体问题为中心的。并且和众议院一



样，还严肃认真地讨论了放弃战争，特别是自卫的问题。此外，参议院的组织形式问题也是许多议员关心的对象。而且这些辩论多半是站在专门的、学者的立场进行的，这一点也表现了当时贵族院的特色。

“在贵族院，虽然未作大的修改，却也提出了‘文人’的问题，已如前述。……结果，宪法修改草案只列入了上述有关‘文人’的事项以及特别委员会决定的其他修正事项，并被通过。记得在表决时，投反对票的共有4人。由于政府的原案经贵族院作了修改，所以再度送交众议院审议，于10月7日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于是我要求发言，表示和国民共同庆祝这个宪法修改草案的通过，并且表明政府将和国民同心协力，在这部宪法的照耀下为完成重建我国的伟大事业向前迈进的决心。议会结束后，即就议会所作的修改，向枢密院再度办理了咨询手续，经枢密院通过后即上奏天皇，得到批准，新宪法于是诞生。”

新宪法的公布仪式，择于11月3日当时的明治佳节举行，地址在贵族院。由天皇陛下颁赐了诏书，吉田首相和两院院长作了奏答。

1954年12月吉田内阁辞职后，鸠山内阁时代曾掀起了修改宪法的议论。吉田茂在三年后的9月公开发表的《十年回忆》第二卷中，对于现行宪法是所谓强加于日本国民的批评进行了答复。1956年2月11日岸信介等向国会提出宪法调查会法案，5月16日通过。在1957年12月18日召开的第八次全体会议上，宣读了吉田致高柳会长的信。吉田茂在信中仍然表示不能毫无保留地同意宪法是强加于日本的论调。这里引用《十年回忆》第二卷的有关内容：

“近来社会上对这部宪法竟有强烈的批评，说它是占领军用强权强加于日本国民的。这种批评，随着修改论调的高涨，似乎更加激烈了。但是，我是制定宪法的负责人，当时对于所谓强加于人这一点，我不能完全同意。诚然，最初在拟定原案时，因为处

于停战不久的特殊情况下，盟军总部曾相当积极地进行了催促，而且关于内容也提出过要求，已如前述。尽管如此，但在后来的谈判过程中，盟军总部并未完全采用‘高压’或‘强制’手段，而是充分倾听了我方专家或担任宪法工作人员的意见，在许多地方采纳了我方的主张。并且，当彼此的争论难于得出结论的时候，对方常说：‘可否先施行一下，看看成绩如何？可能由于日本方面喜欢用旧宪法的头脑来考虑问题，所以有种种不同的意见。不过施行一下看看，也许会意外顺利。可以试一下看，如果确定不妥，还可以在适当的时机重新研究，必要时还可以修改，这样岂不好么？’因此双方的谈判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趋于融洽，成了协商，这是真实的情况。”

## 七

吉田茂接着说新宪法基本上反映了国民的明智和意志。

“此外，在所谓草案拟定后，为了完成国内手续，经过了枢密院、众议院和贵族院这三个国家机关的审议。这些机关的顾问或议员包括第一流宪法学者以及法律、政治和政界的所谓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人，这些人尽管处在占领之下，但其言论却不受任何拘束，因此作到了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也就是说，在这次制宪的国会上，就有关宪法问题，大体上表现了当时我国国民的明智和意志。

“有人特别强调新宪法是在停战后不久、军事占领下制定的，但试看外国宪法，多半也是在战时或非常时期产生的，在一般情况下制定的却非常少。所以我认为念念不忘当时的情况，过于神经过敏似乎也不妥当。一言以蔽之，问题只在于新宪法本身是否符合国家与国民的利益。

“对国民来说，既然制定了新宪法，就应该充分了解它的特点和优点，体会它的精神，最重要的是正确地加以运用。宪法是

一国的根本法，虽然不能说是‘千古不朽的大法’，但是既已公布，就必须尊重它，并力求运用得宜。上述盟军总部所说的‘如有不妥之处还可以修改’这句话，我理解也是为了使日本同意而进行的说服工作。也可以说是并非强制的一个证据。”

这当然不是说吉田茂对新宪法十分满意。作为一个在明治宪法下受教育、经历过日清、日俄两场战争的日本人，吉田茂对大日本帝国宪法当然怀有深厚的感情。旧宪法规定的天皇“统帅权”，实质上变为“由军部掌握、为军部服务的统帅权”，发动与周围邻国为敌的战争，结果遭到彻底失败，最后全部领土被占领，不得不在这种空前不利的条件下修改宪法。无疑他会感到奇耻大辱。但是吉田与其他保守政治家显著不同之处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有出色的“国际感”。为了使完全被国际社会隔离和孤立的日本重返国际社会，必须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盟军总部草拟的宪法修改方案。吉田确信，只要天皇仍作为日本国和日本国民团结的象征而庄严存在，政府形态，即政体，虽然有变动，国体本身还是不变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吉田茂本人也是日本军国主义滥用天皇统帅权的受害者。他认为，这一滥用决非偶然，是体制方面的问题。因此，他对修改宪法的必要性的理解比其他保守政治家更为尖锐而深刻。吉田茂给他岳父牧野伸显的一封信反映了这种心情。该信落款的时间为1946年10月2日。信件全文如下：

“敬启者 日前赐函拜读，所示之事，其原委纸笔难以尽言，现派荻原条约局长前往面告。诚然新宪法确有种种问题，但是我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只能暂以此为满足，且以此暂告一段落，对内外形势反为有利。因此，拟于日后拜晤之时再作面陈，今日暂草此短函。荻原君乃故通商局长荻原守一氏之子。

草之。”

10月2日正是贵族院通过宪法修改案的前四天。对于牧野伯爵就修改案指出的问题，吉田回答说：“尽管有种种缺点，在目前

情况下只能以此为满足……，”并派可靠的条约局长荻原前去说明，还介绍荻原局长是曾把吉田培养为驻奉天总领事的前通商局长荻原守一的儿子，这是出于牧野伯爵本人是外务省的老前辈，很了解荻原守一之故。

值得注意的是1947年2月，吉田为金森国务大臣所画的不倒翁硬纸题了“新宪法，架上的不倒翁也为之羞愧”一语，这表现了吉田对新宪法的“真正看法”。这张硬纸题字一直由当时的高知县知事西村直巳（后为防卫厅长官、农林大臣）所秘藏。三十一年后的1978年5月3日《产经新闻》以题为“又发现新宪法的一桩秘密——吉田先生也曾不满！”这样的报道说：吉田先生的硬纸题字是在新宪法公布后大约三个月，即1947年2月写的。当时为了准备5月3日实施新宪法前举行的大选（4月25日）吉田氏回到了故乡高知县选区。这是吉田以首相身分首次回乡（第一届吉田内阁从1946年5月22日—47年5月20日），受到当时官方任命的高知县知事西村先生的盛大欢迎。欢迎仪式结束后的一天，在高知市城西馆饭店举行宴会，以吉田先生为主，西村先生以及当时负责宪法问题的国务大臣金森德次郎（前法制局长）也出席了。经过与占领当局的艰苦谈判，新宪法终于诞生，而且马上就要实施了，回到故乡的吉田先生兴致极高，在这天的宴会上，他开玩笑说有没有黑美人，点了几名艺妓，并唱了高知民谣《黑夜归去》。正在酒酣之时，金森受人之托拿出硬纸，乘酒势画了个不倒翁，并在旁边注明：“为了安定金森德次郎”。这时吉田先生说：“金森君！我也要写一句”，随即写了“新宪法架上的不倒翁也为之羞愧。素淮”（“素淮”是吉田先生的雅号）。写完之后，吉田看着硬纸，不住地点头赞许。但是，不久即察觉到不合适，据说马上藏在桌子下面了。后来金森先生在同一张不倒翁上又写了“为了稳定的动摇”，吉田先生写了“七转八倒素淮”，当晚一直痛饮至凌晨一时左右。

第二天，吉田酒醒后把西村先生叫去说：“昨晚写了无聊的

话。请你把它毁掉”。西村先生答应说：“明白了”。但是他认为这是吉田先生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对新宪法“真正看法”的宝贵材料，随即悄悄地带回家藏了起来。

西村认为：“当时如果公布这张硬纸，内阁就要被推翻”。《产经新闻》就此评论说：“吉田先生，即使在占领时代，也不主动到占领军那里去问候，可谓日本人当中的气节高尚者。他回到高知时也说过：‘不巴结占领军’，和占领打交道不好办。由于吉田先生的这种性格，大概内心深处也认为宪法的结果并不美满，因此在酒席上无意中提笔写了这些话。”

西村先生1947年当选为众议员，曾担任防卫厅长官、农林大臣等职务，前年(1980年)12月退出政界。他在这么长的期间内，虽然并没有忘记这张硬纸，但是由于在拥宪、改宪问题上舆论出现分歧，吉田先生在世时自不必说，就是到现在也从未发表过，这是“不许出家门的绝密文书”。我承蒙西村先生的好意，看过这张硬纸。当时西村先生不住地说：“这是吉田先生内心深处对新宪法不满心情的表露”。吉田茂是在整个国土被占领的情况下担任首相的，确有屈辱之感。吉田所说的“新宪法架上的不倒翁也为之羞愧”，是指对结果不良而羞愧呢，还是说对于经过比不倒翁更多的折腾最后才站起来这一情况而感到羞愧呢，这点还不清楚。上智大学教授佐藤功对于《产经新闻》的报道评论说：“这不能直接解释为吉田先生曾不满意新宪法……”这也许是最妥当的解释。佐藤教授从一开始就从事宪法修改工作，他的意见值得重视。

佐藤先生说，当他看到吉田先生的“新宪法，架上的不倒翁也为之羞愧”这句话时，首先想到的是，吉田从年轻时起就是一位极易害羞的人。吉田虽然长在城市，但有易于脸红的毛病。把吉田的这句话解释为是爱脸红的人复杂感情的流露，也许是最自然的。

1947年1月3日，麦克阿瑟元帅致函吉田首相：“敬启者 盟国

决定，鉴于去年日本政治的发展，参照新宪法实施的经验，为了向日本国民保证必要时能有自由的机会继续重新审议和讨论该宪法，在宪法实施的第一年和第二年之间，应由盟国和日本国会重新正式研究。如果盟国那时认为必要，也许会要求举行国民投票或采取其他适当手续，以直接确认日本人民对该宪法的意见。换句话说，盟国感到，为保障未来日本人的自由，该宪法应表明日本国民的自由而慎重的意志，对此不能为将来留下疑惑。

“不断重新研究宪法无疑是国民固有的权利，为了充分理解上述情况，特把盟国的立场告诉阁下。谨启。”

麦克阿瑟元帅在这封信中对吉田首相所讲的内容，与1946年10月17日远东委员会作出的“关于重新研究新日本宪法的规定”相一致。组成远东委员会的盟国与麦克阿瑟元帅间的关系很微妙。麦克阿瑟也好，吉田也好，由于修改宪法工作完成，都感到放心了，实际上双方在一、二年之内都不准备“再审查、研究”了。

## 八

第一届吉田内阁的重要成绩，继修改宪法之后，是教育改革和土地改革。从通过法案的先后顺序来说，土地改革在先，但这里想先从教育改革谈起。吉田茂本人这样说过，“第一届内阁，为新日本的诞生铺设路轨的工作大体完成了。说铺设了路轨，也许有点冒昧，但至少可以说完成了铺设路轨的砂石道路。

“首先是拟定并公布了新宪法。对于文教工作，如前所述，显然既担心又抱有希望。总之决定采取以培养民主国家国民为宗旨的进步的教育制度，使有能力的都能进大学。”

教育改革当然也是作为占领政策的一个方面来推进的，为此必须了解美国在战争中进行了哪些准备。在叙述这点之前，先要谈谈日本方面的最高负责人吉田茂的教育观：“在叙述我的内阁时代的文教政策之前，拟就我国战败后的社会情况略述一下我的看

法。

“战败以后，当日本人被剥掉一等国民这层镀金时，便暴露出可耻的丑态，我也是个日本人，所以感到惭愧无地自容。在日本人之中，从前有一种仗恃国家或军部的势力，虽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才能却喜欢妄自尊大的恶习。不论在战前或战时，我都认为这是令人可鄙可耻的。这次国家战败后，到处出现了这样一种人：他们意气消沉，行为卑鄙。只要是外国人说的话，无论什么，不对的也对，有事便向美国人摇尾乞怜。不仅是一般人，即使在政界、实业界和学术界等方面的领导人当中，也不乏其人。

“当我对这种情况有所见闻时，便痛感必须改变教育方针，必须改造日本人的性格。也许我说得有些过分，如果把现在的日本人当做独立的人来看，还有许多人是国际社会中的乡愚。我甚至认为，与昭和时代相比，明治时代的前辈中，无论到世界任何地方都是毫无逊色的人物更多一些。因此，必须使每个日本人改正夜郎自大的毛病，把他们教养成能够受外国人信赖和敬爱的人。

“其次，必须把每个日本人都当做一个纯朴的人，使他们具有正当意义的自尊心。为此，做为一个日本人，必须具有无论到世界任何地方去也毫无逊色的教养，同时还必须继承日本人固有的优良素养。总之，战败后，我深刻感到：如不集中有识之士的力量，重新教育日本人，把他们培养成卓越的、达到世界水平的人，则日本的前途是不堪设想的。目睹战败后的情况，使我痛感教育之重要。”

吉田茂从“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观点指出了日本人的弱点，这是很了不起的。由于没有确立“个人”，因此当“仗恃国家或军部势力”妄自尊大、骄傲的镀金剥掉时，在同胞中出现不少自卑行径。吉田茂认为比起“昭和时代的日本人”“明治时代的先辈们”更为优秀的结论是正确的。值得注意的是，明治先辈中许多人甚至可以说受的是幕府后期的教育，而不是明治时代教育。而“昭和

日本人”才正是明治时代所建立的教育的产物。吉田茂所以能够成为例外的“昭和日本人”，这与他在耕余私塾学习过的经历不无关系。

在指责战后教育缺点的人们当中，许多人不加分析地认为，战前、战时的教育都好。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在日俄战争取得胜利之后，使日本发展成为现代国家，成为大国之一的领导人中，也有受过明治初期教育的山本权兵卫等，但大部分是德川时代后期成长起来的一代。

与此相反，把日本拖上几乎与全世界为敌、发动愚蠢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首脑们，都是在明治后半期至大正初期接受明治时代教育的人。在明治末期到大正年间，从帝国大学、陆军士官学校以及海洋学校毕业的秀才们，完全毁掉了大日本帝国，忘记这点是不能正确处理日本的教育问题的。

吉田茂在耕余私塾，学了汉学和英国学问，又作为外交官三次到英国工作，能够敏锐地看出日本人的教育究竟错在何处。极端的国家主义教育妨碍了“自我”成形，结果作为集团的一员经常产生的丧失理智狂热精神，而作为“一个个人”却暴露出脆弱性。战争期间高呼“灭私奉公”，另一方面大批商人通过黑市交易大发横财，甚至有些将军丢弃部下私自逃跑，也不足为奇。在这个意义上，战败后面临严重的教育改革问题，吉田茂对这个问题是有深刻理解的。

另一方，征服并占领我国的美国，对于日本的教育改革，又有何种构想和政策呢？美国国防部在对日战争爆发前一年拟定了FM二七一五“军政基本方针”，并于1943年12月22日进行了修改。该方针提出“指导教育制度、开放学校、开除起破坏作用和有害的教授等内容”。第二年5月4日，国务院远东地区委员会整理出“美国对日战后的各项目的”，明确提出了要根绝日本军国主义的六项具体措施，有关教育改革的措施是：

“三、通过出版、广播、电影以及学校提倡民主思想。



“四、要使日本的稳健分子加深认识，他们的责任是使日本国民确信军国主义是不利于他们的真正利益的。

“五、要有效地加强日本的自由主义政治因素以及自由主义思想，采取更有效地措施，协助发展对国民实际负责的文人政府。”

上述这些有关自由改革教育的必要性，在民间讨论中也明确提出了。1942年12月，加拿大魁北克召开的第八届太平洋问题调查会议也指出，战后日本在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同时，还希望进行自由主义的改革教育，这也是一例。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通过的海牙条约没有规定占领国要介入被占领国的国内问题。罗斯福总统决心不仅要打倒日、德、意三国的军事力量，为了根除三国国民心中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和侵略思想，要求它们无条件投降，1943年11月27日签署的开罗宣言明确记载了这点。

盟国以要求“无条件投降”为政策和战略是否明智，以及介入被占领国的国内问题是否违反海牙条约，存在问题不少。但是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1945年9月2日在日本签署投降书仪式结束时宣布，从“解除日本国民的精神武装，在某种意义上比解除物质武装更困难”这一前提出发，要彻底清除国家主义和全体主义教育。

美国的这种意图与吉田首相的想法之间既有相同之点，也有不同之处。

## 九

1945年10月至12月盟军总部关于改革教育问题发出了四项指令，这是从消极方面以及禁止的角度发布的。第一项是10月22日发布的“关于日本教育管理制度管理政策的指令”。第二项是同月30日发布的“关于教员以及有关教育人员的调查、解职、批准的指令”。第三项是12月15日发布的“关于废除政府对国家神道、神社神道

的保证、支持、保护、监督和宣扬的指令”。第四项是12月31日发布的“关于停止讲授修身、日本历史和地理的指令”。上述四项指令的目的都是要铲除极端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的教育训练内容，可以说是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后必然的结果。在战争中，根据所谓皇国史观，进行的是与神有关的历史教育，占领军的禁止政有其开明的一面。由于麦克阿瑟元帅充分理解教育改革必须包含积极和建设方面的内容，1946年1月初，他向美国陆军部提出，从美国派教育使节团来日调查。该团的使命是“就有关日本教育各项问题向盟军总部和日本教育工作者提出建议，并进行讨论”。陆军部要求国务院决定人选，最后选出以乔治·D.斯托塔德博士为团长的27人使节团。该团分为两组，分别于3月5、6两日乘飞机到达东京，3月份在日本调查了一个月，3月31日提出了报告。根据文部省官房总务科的资料，该报告的日文译本达63页。选择首任伊里诺依大学校长、著名的教育家乔治·D.斯托塔德博士为美国教育使团团长，这对日美双方都是幸运的。斯托塔德博士不仅是经验丰富的教育家和教育行政家，而且对自由和民主也有深刻的认识。报告的序言是斯托塔德团长亲自执笔的。

例如，他认为盟军总部去年发出的“禁止性措施，只有具体化为自由主义的日本人的意志时，才会有效果”，“消除各种镇压条件，就是解放人们的精力”等等，明显地表现出斯托塔德博士对自由、民主教育的坚强信念。序言对自由、民主作了如下定义：

“我们相信所有种族，所有国民，都有对本身、对全世界有用的东西，都有来自文化源泉的创造力量。这就是自由主义的信条。我们不信奉划一化。我们作为教育者，要不断关心个人之间的差别、创造力和自发性，这就是民主的精髓。”

序言还主张“民主并不是宗旨，而是被解放了的人的精力，并由此表现在多方面的极为方便的手段”。这些都表现了以斯托塔德团长为代表的美国民主的最优秀的方面。实际上，当时民主这一

词象背诵经文那样，使人们产生错觉，好象把人单一化就是民主精神。美国教育使团的报告给日本的教育工作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听到传达斯托塔德博士所说的“只有尊重人的多样性、自发性和创造性，才是民主的精髓”时的那种惊奇之感，现在仍然记忆犹新。继序言之后，正文分六章。第二章“改革国语”，提出国语问题是有意义的，但同时指出提倡罗马字化，却表现了过于性急。最重要的是第三章，“初等和中等学校的教育行政”。

在旧教育制度下，六年义务教育之后，男生有的升入旧制中学，有的进商、工、农方面的实业学校，有的再进入二年制的高等小学并直接走向社会。共有四个途径。女子受歧视，但在双轨教育这点上有些相似，相当于男子中学的有五年制和四年制的两种高等女子学校，只是实业学校的种类有所不同。

教育使团的报告改变了这种双轨教育，建议在六年的初等教育之后，设置各为三年的普通中学和高中，到初中为止是单轨义务教育。从明治5年(1872年)实行小学、中学和大学三级学制以来，经过四分之三世纪的时间，我国的学校制度极为复杂，现在一举单纯化，是要实现机会均等。

吉田茂赞成美国教育使团报告书的基本观点——尊重人权和机会均等。第一届吉田内阁成立后大约80天(8月10日)，吉田首相就设立了直属内阁首相的咨询机关“教育革新委员会”，任命币原内阁时代的文部大臣安倍能成担任委员长，东京大学校长南原繁为副委员长。毋需多说，是为了审议以美国教育使团的建议方案为中心，审查我国教育的基本观念和学校制度。

在教育革新委员会中，虽然没有出现反对美国教育使团基本观点的意见，但是在改变为六·三·三·四学制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双轨方式符合日本的实际情况，也有人主张应该保留旧式高等学校。但是，由于盟军总部希望按教育使团的建议改为单轨教育，也就决定了教育革新委员会审议的总趋势。

遗留问题中除关于教育基本法外，集中于实施六·三制的具体速度问题。吉田茂说：“最成为问题的是所谓六·三制的学校制度。这是为了提高义务教育水平的公平制度，使任何一个有能力接受教育的儿童都能进大学。在原则上，我认为这个制度是好的。明治时代的菊池大麓等也曾研究并提出过这种方案，战争时期由近卫公爵领导的昭和研究会，也拟定了与此相类似的旨在谋求教育机会均等的计划。所以六·三制这个见解，并非美国的‘专卖品’。为了提高一个国家的知识和水平，必须使‘野无遗贤’，而爱国的政治家所必须考虑的是，如何使青少年一代中‘无遗贤’。所以，日本自明治以来提出过六·三制方案，也是当然的。在明治时代，福泽谕吉等也认为‘考虑教育的机会均等，是有益于国家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实行了这一点。所以，明治以来日本能迅速地摆脱封建时代而取得了进步。

“因此，我对美国教育使节团和教育革新委员会的研究结果，大体上是赞成的。不过，假如把它付诸实施，我认为还有一些重要事项必须加以考虑。第一，改善学校制度是好事，但问题在于什么是教育的精神中心以及能否具体地把它表现出来。也就是说，怎样把全体日本人共有的中心精神具体地表现出来。第二，实行六·三制需要巨额经费。即使在战前日本最强盛的时期，推行六年义务教育也是很不容易的。战争时期，虽然在法律上制定了八年义务教育制，但实际上做不到。而在战败后却想把它改为九年的义务教育制，从财政上来看恐怕是不易办到的。能否办到姑且作为别论，但是如果实行，就必然要加重国民的负担。本来国民连饭都吃不饱，所以，决不能随便把这种负担强加在国民身上。因此，我有一个双重的想法，即：计划是好的；实行应该从缓。”

吉田首相认为不能急于实行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在文部省管理局编辑的《六·三制教育的基础》中，文部省教育设施部长田中德治说：“在战争中，……有236万户的房舍被烧毁或遭到破坏。战

后日本有6,200万坪建筑物成为废墟”。当时约有3千所学校受到战争破坏,烧毁约3百万坪<sup>①</sup>,留下来的学校宿舍,“由于战时限制建设,没有进行改建和修理,而且战时又破坏性地使用以及管理不善等,从教育意义上讲,能立即使用的校舍不多”。根据田中教育设施部长的估计,实施新制中学后,缺少4万间教室,推行义务教育缺少的校舍为3万6千间,合计要建筑7万6千间才能应付。当时日本经济十分困难,无疑这是一项难以承受的负担。

吉田茂在《十年回忆》第二卷中强调有关人员是多么辛苦:“然而,舆论和教育工作者的意见都认为,应该大力推行这个计划。不过,这虽然是出于美国占领军行政官员中一些年轻人的善意,却也反映了意见的轻率,同时还说明,所谓日本进步主义者之中有些附和的人的意见也反映到舆论方面……”。

“总之,我认为:好固然好,但是欲速则不达。文部大臣田中耕太郎和文部次官山崎匡辅两位专家的想法也和我相同,他们对占领军这种性急的做法,似乎提出过抗议或忠告。他们为此的确煞费苦心。但是不久,盟军总部竟指示必须从1947年起开始实行六·三制。

“为人诚笃的田中文相等左右为难。他们认为,如果认真考虑战败后的日本情况,六·三制的宗旨虽好,但是最明智的办法却是根据国民经济的复兴情况,逐步将小学、中学、高等学校、大学等按新制度加以调整。田中文相等的想法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文相等的立场。然而盟军总部却要求,从1947年起在三年之内,逐年将小、中、高、大学改为新制度,所以当局感到为难。于是田中和山崎等人做了艰苦的奋斗。当我认为他们的抵抗已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便建议田中去休养。因为我预料到,如再继续抵制,对日美双方都是不利的。”

---

<sup>①</sup> 一坪为三点三平方米。——译者

1947年1月31日，即麦克阿瑟元帅命令停止“二·一总罢工”之日，第一届吉田内阁进行了大幅度的改组，文相田中耕太郎和内相大村清一、农相和田博雄、商工相星岛二郎、运输相平塚常次郎等同时辞职。在后任文相高桥诚一郎的领导下，3月31日匆匆公布了“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强制推行六·三制。吉田首相对“教育基本法”并不满意，这点下面还要谈。吉田选择庆应私立大学教授高桥一郎担任文部大臣，是由于福泽渝吉关于皇室的想法深深感动了吉田茂，这点下面还要谈到，这里不赘述了。

## 十

战败后，在占领下所进行的各项改革中，日本主动采取的是第一次土地改革。美国国务院和农业部早在战争爆发前即对日本的佃耕制度进行过调查。1945年8月30日，麦克阿瑟元帅在飞向日本的专机中，向惠特尼准特（后为民政局长）口授十二项盟军占领政策中的第五项，那就是“解放农民”。进驻不久，9月26日的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社论说：“军部虽然受到了打击，但财阀、官僚、地主仍然存在。美国应以积极的经济政策加以变革，否则难以克服日本的经济困难……。土地改革是日本改革的第一步，提高农民的生活就会切断日本工业的低工资劳动制，也会减少日本军队的征兵能力。另一方面，增加农民的购买力，使国内需求增加还会起到缓和对外出口和进行侵略的效果。因此，在这点上只有美国的压力才是促使日本走向民主化的唯一道路。”

这篇社论可以说几乎是根据对日本社会结构和膨胀政策的一般认识写出来的，正如住本利男所著《占领秘录》所指出的那样：“这虽然是英国害怕日本再次成为贸易之敌的内心表露，但也说明了国际舆论的动向。它确实鼓舞了农林省及其他认为必须进行土地改革的人们的勇气。”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比麦克阿瑟元帅口授政策和《曼彻斯特卫

报《社论》早六年，民政党议员松村谦三就已正式研究过土地改革问题。松村就任币原内阁农林大臣时说过：“我从开始就有一个构思。在平沼内阁时代，我在樱内幸雄农相手下任政务次官时，就调查过土地问题。当时就有奖励自耕农的法律。虽然没有制定佃耕立法，但是有裁定租佃争议基准的佃耕立法草案。这样，我认为如果使其具有强制性，就能进行土地改革。日本的土地改革能够顺利进行，是由于很久前就进行了种种准备。”

在平沼内阁辞职以及松村谦三离开农林省之后，以和田博雄、东畑四郎、斋藤诚等人为中心，继续推进研究土地改革问题。和田因企画院事件被捕后，这项工作也未曾中止。

美军冲绳作战开始，日本战败局面明显之时，他们用“国内成为战场时的粮食对策”名义，想把地租改为现金支付制和实现村落农业团体管理土地等。松村谦三就任农林大臣时，农林省内主张进行土地改革的人们极大地增强了勇气。松村谦三立即起用战争结束时刚被释放尚无职业的和田博雄为农政局长。吉田茂在《十年回忆》第二卷中，以“改革的前驱——所谓第一次改革”为题，对松村、和田的领导体制下所推进的第一次土地改革这样写道：“停战后的我国土地制度的改革，无论作为盟国的占领政策或者作为我国国内问题来说，都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首先就盟国方面而言，一般的看法是：日本的封建土地制度造成了日本经济的畸形发展，而且形成为军国主义的坚固基础，认为地主阶级同军阀、官僚和财阀一样，是阻碍日本民主化的因素，必须把它消灭；认为大多数农民是廉价劳动力和日本军队兵力的供应来源，而他们却处于‘奴隶状态’；从占领日本之初，甚至在占领日本之前，就把解放农民和提高农民生活当作日本民主化、非军事化的占领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显然，这项土地制度的改革工作就是根据这种意见进行的。然而，我方当时也预料到已有必要进行土地改革。这是因为，盟国要求日本政府必须彻底修改宪法，连

续发出指令要解散财阀、停止战时补贴等严厉措施，当我们得知占领政策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都采取废除或改革从前组织制度的方针时，便越发觉得仅仅把土地制度作为例外而原封不动地保留下去是不可能的了。

“而且，作为一个国内问题来说，如所周知，我国远自大正年代就曾经在建立和维持自耕农这个口号下提出了土地问题，许多有识之士都主张必须如此，历届内阁也或多或少地对此表示了关心。同时，在战争时期，为了确保粮食，曾经采取各种统制措施，因而自然产生了尊重农民的气氛，所谓‘寄生的地主’曾经受到严格限制。也就是说，在停战当时，日本的地主与佃农的关系，表面上的形式姑且不论，而它的内容可以说和外国人的笼统的印象有很大距离。然而，如前所述，这种变化虽然主要是以增产粮食为紧急任务的战时情况造成的，但在停战以后，确保粮食的重要性仍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可以说，由于时代的要求，土地制度已经处于或多或少必须改革的命运。”

在这里暂时中断引用，从以上所说，可以看出，吉田茂的洞察力十分敏锐。不少人，不仅对土地改革，对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解放妇女等也误解为都是根据占领政策，自上而下强制推行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些改革的前提条件，实际上，在战时已经从下面作了准备，而且它象愈二战那样会促进革命性的变化。人们都清楚，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的妇女解放飞跃前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也不例外。我在结束战争那年（1945年）3月底把家属疏散到滋贺县，亲眼看到由于劳动力不足，在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力量关系出现了与过去相反的情景。我叔父住在京都，在滋贺县有土地，他去找佃户，希望借助他们的劳动力耕种。如果是从前，佃户会痛快地答应，但那时却以人手不足为理由而断然拒绝了。1945年春天，一种看不见的静悄悄的革命，以相当快的速度在进行着。



我从新桥车站向疏散地运送小件行李时，看见现场的运货人员对上级的指示、命令公开说明理由拒绝服从的情景。国营铁路的职员摆脱家长式的劳动关系的过程，决不是战败后在占领下才开始的。从权威性的大日本帝国向民主日本国变化，并不是在战败后才开始的，随着战局的恶化，早在战时已潜在地进行了，这是我们必须强调的。

最近，有人声称要反击战后民主的“荒谬”，得意地议论从“强大的大日本帝国”堕落为“衰弱”的日本国的风气正在抬头。但是不能不说这些复古主义者完全缺乏正视历史潮流的能力。吉田茂清渐而透彻的历史感，被上面引用的一段话雄辩地证明了。下面继续引用《十年回忆》：“后来实行的所谓土地改革，是在我的第一次内阁当时，在盟军总部的强力推动下完成立法手续的，但在这以前，即在我担任外务大臣时期，已经有了初步计划，这是应该说明的。这个计划后来被通称为第一次土地改革，与其说它是遵照盟军总部的指示而拟定的，不如说是在我方农林大臣松村谦三的领导下主动起草的更恰当。计划的起草人据说是当时的农政局长和后来在我的第一次内阁担任农林大臣的和田博雄。这个计划的内容是：把过去以实物支付的地租改为以现金支付，同时把地主保有的土地限制在三町步<sup>①</sup>以内，超过三町步者强制他让给佃户。在当时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划时代的改革方案。也就是说，它同后来实施的土地改革，在根本精神上是一致的。但是这个方案，并不是根据盟军总部的指示或建议拟定的；好象是我方也考虑了盟总内部的想法，并且认为这是解决我国农村多年悬案的良机，从而是制定的一种先发制人的改革方案。

“我对于这种问题本来不太关心，在内阁议席上听到说明后，才得知这个改革方案的内容。阁僚们对这个方案提了许多反对意

---

<sup>①</sup> 一町步约等于15亩。——译者

见，关于用现金支付地租这一点姑且不论，而强迫让出土地这件事确是一个重大问题。尤其是停战后首次召开的预定审议这个方案的帝国议会，会期仅有短短的两个星期，因此大部分意见认为无须急于提出这种具有根本改革意义的重要法案。结果，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这个意见，修改了原案，把地主保有土地的限度从三町步提高到五町步，这样，阁议才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并于11月23日由各报同时发表。”

在土地改革就要实施的阶段，松村农相与和田农政局长等事务当局发生对立：松村认为应该把建立自耕农作为重点，而事务当局主张通过实行现金支付地租、减少地主的收益为先决条件，松村主张地主所保持的土地面积，应限制在一町步五反的范围内，但最终与和田局长等主张的三町步方案妥协了，并与地租现金支付一并拟定了农林省方案。吉田茂回忆起他的生父竹内纲，作为宿毛的“家老”<sup>①</sup>，80年前曾实行过用现金支付年贡的财政改革。

## 十一

在内阁会议讨论土改方案时，由于国务相松本烝治发表了强烈的反对意见，最后同意把地主保留的土地面积提高到五町步。当时币原首相听了和田农政局长的说明后说：“这样一来，就成了讨伐土豪劣绅的方案了”，对方案表示理解。松本国务相与此相反，虽然对用现金支付地租表示赞成，但是却激昂地指出：“把乡村地主的土地限制为一町步五反或三町步是侵犯私有权。”

象在修正宪法问题上所表现的那样，松本国务相完全缺乏国际感和历史感。松本是商业法学权威，前东大法学部的名教授，但是他不能理解当时的日本正处于某种革命旋涡中的形势。私有财产确实重要，但是为了使日本新生，限制私有财产，特别是限制土地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点上与松本烝治博士形成对照的是吉田茂

<sup>①</sup> “家老”是江户时代大小诸侯的重臣。——译者

的灵活态度。白洲次郎的一段论述值得注意：“战败之后，我确信不管喜欢与否，在政策方面如果不向左转变，国家的治安就不能维持。现在也还这样认识。因此，吉田茂这个人，从本质上讲是反动而保守的。尽管他是保守反动的，但吉田内阁还是作了许多与他性格完全不相容的事。……他战前的信念是，如果不按中间偏左的方向采取断然措施，国内治安就不能维持，认为天皇神权说最终行不通……。”

吉田内阁成立后，顺利地实现了第二次土地改革，表现了白洲次郎所指出的吉田茂的政治家素质。缺乏国际感的不止是法律家松本国务相一人。在1945年11月22日的内阁会议上，主张把地主保留的土地限制为三町步的松村谦三农相与认为是“侵犯私有权”而强烈反对的松本烝治国务相等许多阁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松村决心不惜辞职的坚定态度，使币原首相也深受感动。他对松本国务相等进行了说服，最后达成了维持在五町步的妥协案。但是在制定土地调整法阶段，松本国务相对统治“土地转移”条款，以“侵犯买卖自由和私有权”为由，坚决反对，大多数阁僚也都赞成松本国务相的意见。结果把原案中的有关土地转移时需要有知事、土地委员会的许可，修改为以耕种为目的购买土地，不在限制之内。该法案主要内容几乎全被删除，12月6日向众议院提出时，还是遭到代表地主利益议员们的强烈反对，甚至出现要使该法案成为悬案的形势。这时麦克阿瑟元帅发布了“关于实行土地改革的备忘录”，这项指令签署的日期为12月9日，日本政府在11日收到后，东畑四郎农政课长立即在帝国议会委员会宣读，委员们感到吃惊，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即使这样，议会为了使地主们的损失限制在最小程度内，进行了两点修改：一、地租实行现金支付时，定价从当时的生产米价每石<sup>①</sup>55日元提高到消费米价的

<sup>①</sup> 日本计量容积的单位，每石粮食为180市升。——译者

75日元；二、土地委员会的委员当中，要使“有威望有经验的人”参加。

12月18日，土地调整法修改案通过后，美国农业部外国农业局远东课长拉迪金斯基先生立即到盟军总部来任顾问。他在战争期间就与费里合作，写成了关于在日本进行农业改革的重要文件。土改问题，日本已经先行一步，拉迪金斯基来日后，盟军总部才掌握了强有力的领导权。有关后来的情况，《十年回忆》第二卷这样写道：“根据松村方案而制定的所谓第一次土地改革的法律，于1945年12月公布，翌年1946年2月起生效。但是结果，这次改革的中心目的之一，即强制让出土地这件事，竟因盟军总部认为不彻底而未能实施，遂留待后述第二次改革加以解决；然而这次改革的另一个目的，即以现金支付地租这件事，却顺利地得到实现。这样一来，第一次改革的主要目标似乎没有达到，但是如果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构成第二次改革主要内容的想法，已经表现在第一次改革之中。并且非常接近松村拟定的最初方案。因此，土地改革和战后许多其它改革不同，它是日本政府自主拟定的，这一点我认为值得大书特书。后来，发生土地改革违反宪法的诉讼时，最高法院在判决理由中曾说：土地改革不同于其他没有盟国的指示就不能实现的制度。”

吉田内阁时代实施的第二次土地改革，吉田茂认为，与松村谦三农林大臣的最初方案非常接近，这是很正确的。我认为在保守政治家中，有象松村谦三这样卓越的农业政治家是值得我国引为自豪的。松村方案由于受到松本国务相和代表地主利益的议员们的反对，主要内容几乎都被修改了，以致盟军总部进行干预。1946年2月，拉迪金斯基在千叶县和埼玉县进行了实地调查证实，在所调查的地区，全部地主的保有土地都在五町步以下，佃农没有一个人得到土地改革的利益。下面继续引用《十年回忆》第二卷的有关部分：“如上面所说，盟军总部正式表明态度是，等待日

本政府将于3月15日提出的方案。但是另一方面，据说很早以前就非正式地向农林省指出了第一次改革方案的缺点。并且盟军总部主持土地改革工作的吉耳马丁先生和拉迪金斯基先生，曾在日本政府回答期限届满前的3月12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关于对第一次土地改革方案的不满之处，作了初次公开声明，中心问题共有两个：(1)认为地主保有土地的限额规定为五町步，是太多了，如果按照这个限额，则不适用强制让出办法的出租地就会特别多。为了真正解放土地并且缩短解放的期间，不应承认地主与佃农之间的直接交涉，而应由政府参与其间，主持土地的收买与出售事宜。

“然而当时，根据盟军总部的指示，已经决定举行大选，内阁则变成管理选举事务的内阁，而且松村也因公职整肃而辞去农林大臣职务，所以政府也无暇顾及这个问题，便按照规定的期限，匆匆忙忙地向盟军总部提出以第一次土地改革案为基本内容的方案，作为答复。

“从一开始就主张彻底废除佃耕的盟军总部，对于这个答复当然是不会满意的，我们根据以往的情况已经预料到这一点。但是他们未能轻易作出结论，麦克阿瑟元帅便决定把当时逐渐在国际上引起重视的这个问题提交对日理事会讨论。对日理事会虽然作为负责管理日本的盟国最高统帅的咨询机关设于东京，但是实际上却令人感到，它始终是主要管理国，即美国代表同英苏代表进行争论的场所。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美、英、苏、中四国竟取得了一致意见，并于6月17日答复了麦克阿瑟元帅的咨询。据说在各国取得一致意见之前，苏联代表德勒维扬科中将和英联邦代表麦克马洪·鲍尔曾分别向理事会提出土地改革试行方案，但是最后的共同建议基本上是以英联邦代表的建议为蓝本的。这个建议同盟军总部与农林省主管官员之间研究的结论大致相同，不过其中包括这一项：即卖给佃农的土地面积平

均应以一町步为限。这也许是由于他们对日本的土地情形不够了解，不过，如果这样做，必然在农业生产上引起极大混乱。我方因无法接受便向盟军总部表示坚决反对。盟军总部对此也有充分理解，所以并未采纳这一建议。我认为，这件事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据说苏联代表曾主张全面解放出租土地和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并在共同建议之外，坚持要把这一点作为补充建议。苏联代表的主张虽然没有通过，但是如果说得挖苦一些，也许可以说，这个强硬主张对于地主反对土地改革的气势起了遏制作用。”

## 十二

上述共同建议是在吉田内阁成立四个星期之后提出的。当时正是吉田首相与和田农相为确保最低限度的粮食而进行全力奋斗之时。让我们再引用一下《十年回忆》第二卷有关部分：“另一方面，当时农村同群情骚然的城市相比，一般说来还是平静的，甚至给人一种似乎反对城市里红色骚动的印象。在当时，如果各地的农民和城市的不稳分子同时闹事，真不知道会造成怎样的结果。另一方面，如果当时的保守政党缺乏彻底进行改革的决心，农民方面也许会产生强烈不满，从而酿成政局不稳的祸根。幸而以农林大臣身分入阁的和田博雄，不仅在前内阁松村农林大臣领导下以农政局长的资格担任过第一次土地改革方案的起草工作，而且以后也一直负责同盟军总部进行联系，所以一切都非常顺利。有关农业行政，我也能够放心地交给他处理。

“6月底农林大臣和田博雄代表我取来了盟军总部关于土地改革的建议方案，这个建议方案就是根据上述对日理事会的共同建议而制定的。我们立即就其细节进行了研究，以后又通过同盟军总部的交涉，多少加以补充修改，7月26日由内阁会议决定了‘关于彻底改革土地制度的措施纲要’。其要点有三，即：(1)所谓不在

地主——也就是不在土地所在的市镇村居住的、专门出租土地而不可能进行自耕的地主——的土地，必须全部出让；(2)持有佃耕地的限制，平均不得超过一町步，北海道不得超过四町步(各府县的佃耕田面积由中央土地委员会决定)；(3)佃耕地与自耕地合计不得超过三町步(北海道为十二町步)。此外还详细规定：超过这些限制的土地，政府强制收买，转售给佃农，并以公债支付给地主应得的土地价款。

“这项法案于9月7日提交众议院审议。社会党虽然提出了全面收买佃耕地并使市镇村土地委员会的组织绝对有利于佃农的修正案，但遭到否决；而政府的原案则得到日本自由党和进步党两党的支持，于10月11日获得通过。于是，使战后农村面貌为之一新的土地改革的立法程序，便由保守政党完成了。”

吉田茂把这场由保守党完成的革命性的土地改革当作巨大的光荣，这是当然的。在战后的各项改革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土地改革最为成功。这场甚至可以说是没有流血的革命——彻底的土地改革，能够圆满而有秩序地进行，有赖于吉田首相与和田农相的绝妙合作关系，这样说也并不夸张。和田博雄在每日新闻社出版的《昭和经济史证言》中回忆了当时的情况，并赞扬了吉田茂的政治家风度说：“土改问题交你办。吉田先生的特点是，如果信任你，就把全部工作交你办，这点很了不起。因此，1946年6月在第二次土地改革时，盟军总部要求吉田茂前往听取建议，但是吉田先生却让我去了。我事先就派山添农政局长(后为农林次官，大日本蚕丝会长)去摸清盟军总部的想法是，他们对第一次土改方案不满，要求重新搞，而且内容相当苛刻。这次我去之前与吉田进行了协商。我对吉田说：‘我觉得不搞不行了，而且没有理由拒绝。搞土改不统一党内和内阁意见是不行的，这两方面的工作，只能由你来作。如果你下了这种决心，我可以去盟军总部领回指令。’吉田先生当即说：‘说实在的，我是保守主义者。因此，

从心里就讨厌而不愿意搞土改。但是如果你认为无论如何必须搞，那么就进行。因此，请你放心去吧。’这样我就到了盟军总部。此后吉田先生再没有说过一句怨言，完全放手来让我办此事。进口粮食，这件事也彻底办了，在这些方面，他是很出色的。”

到1950年7月为止，由于实施土地改革法而解放的土地约有200万町步，约有150万户地主卖掉了土地，购买土地的农户约有400万户。实行土地改革的结果使保留下来的佃耕地面积下降为总耕地面积的9%。1947年佃农占农户总数的比率从26.6%降到7.9%，即日本大部分农户变为自耕农或接近于自耕农。

这场土地改革对战后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带来了巨大影响。拉迪金斯基在1951年举行的世界土地制度会议(Conference on World Land Tenure Problems)上报告日本的土地改革时说：“日本的农村成功地创立了广泛的自耕农，变为几乎是不容共产主义渗透的铜墙铁壁。”他还自我欣赏地说：“我想可以断定，土地改革不仅推翻了共产主义的信条，它还加强了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为建立稳定而安定的农村社会作出贡献的各种势力。”第二次土地改革法案，严格地说是“关于以创立自耕农为目的的特别措施法律”和第二次修改1938年制定的“农地调查法”。这两项法案在贵族院通过生效时，麦克阿瑟元帅发表声明指出：“为了树立健全而稳妥的民主，这是最坚实的根据，又为了对抗过激思想的压力，不可能有比它更正确的防卫措施。”这比拉迪金斯基五年后发表的看法意义更为深刻。

如果没有占领军的强大压力，土地改革决不会和平实现。但是，如果没有和田博雄、东畑四郎、斋藤等人从战前即开始在农林省农政局研究创立自耕农，如果没有松村谦三从任政务次官时代起到农林大臣时代为止一直坚持土地改革的信念，土地改革无论如何也不会如此顺利。正如和田博雄回忆录所说的，吉田首相统一了党内和内阁意见，信任和农相并放手让他充分发挥作



用，这方面的功绩也是不可磨灭的。

这里我想谈一下吉田茂的私生活。上面说过吉田非常喜欢风流娱乐，担任首相后，吉田茂很难再进出新桥的酒馆了，他从暂住的麻布市兵卫町的外相官邸搬到了芝白金迎宾馆后，一直过着紧张刻苦的生活。

“菊村”酒馆的女老板知道这一情况后，想带领吉田茂喜欢的几名艺妓前去慰问。武见太郎（吉田的外甥，同时也是他的私人医生）表示赞成并说：“这个想法很好”，并提供了汽车。由于不能从正门进迎宾馆，于是开了后门，夜晚10时左右，在酒馆工作结束后把女人们从后门拉了进来。吉田茂又听到了很久未听的清元曲<sup>①</sup>，十分高兴。

正当吉田茂为处理修改宪法、土地改革等问题而烦恼，为解决粮食危机而发愁时，再没有比她们的来访和悦耳的歌曲更有助于陶冶心情了。

当时“菊村”的女老板吩咐艺妓说：“吉田先生虽然是首相，可是他不干坏事，没有钱。你们可不能向他伸手！”这不仅表现了女老板的见识，也间接地表现了吉田的人品。“菊村”的女老板和“山口”的女老板一样，同是新桥资格最老的经营商，从吉田茂开始进出新桥时起，就很了解他的为人并一直抱有好感。“菊村”的女老板在吉田就任首相时曾赶来祝贺说：“我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你会当首相。”这些女老板在观察人的方面有独特的能力，但有时也看不准。对于吉田茂的观察，她们在很久以前曾犯过大错误，这件事留待后面叙述。

### 十三

正当我国稳步而顺利地执行修改宪法、改革教育、进行土改

---

<sup>①</sup> 清元是日本的说唱（净琉璃）的一个流派。——译者

等各项政策时，我国经济却气息奄奄，徘徊于生死线上。粮食不足问题前面已经叙述过了，现在谈一下当时以工矿业为中心的日本经济的悲惨状况。

根据国民经济研究会的调查，从1945年4月到1947年7月工业生产指数(以1935-1937年平均为100)如下：

	工业平均	矿业平均	综合
	%	%	%
1945年4月	21.7	98.2	24.7
8月	7.6	36.3	8.5
9月	8.4	20.5	9.0
10月	12.7	16.5	13.0
11月	13.5	17.5	13.6
12月	13.2	19.5	13.4
1946年1月	13.4	24.9	13.7
2月	14.3	27.4	15.0
3月	18.2	33.8	18.8
4月	21.3	34.7	21.8
5月	24.7	37.9	25.2
6月	25.2	38.1	25.7
7月	27.1	38.9	27.6
8月	29.0	42.8	29.6
9月	29.9	42.3	30.4
10月	28.9	43.9	29.5
11月	28.0	48.6	28.8
12月	26.8	50.0	27.7
1947年1月	25.3	46.6	26.2
2月	23.8	45.5	24.7
3月	29.9	52.4	30.8
4月	22.5	46.4	29.2

	工业平均	矿业平均	综合
	%	%	%
5月	32.2	50.2	32.9
6月	31.1	52.5	31.9
7月	32.2	50.2	32.9

从上述指数可以看出，1945年8月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投降时，综合指数已经降到8.5%，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明白，叫嚣继续进行战争的强硬派的主张是何等脱离现实！从10月起，综合指数上升为13%，1946年4月达到21.8%。同年9月超过30%，从10月份开始出现下降曲线，1947年2月下降为24.7%。

1947年版的《朝日经济年史》，曾这样说明了1946年3月至9月所出现的暂时好转：“1947年春夏间，我国经济总算摆脱了战败后的昏迷状态，出现了某些起色。但是这只限于借通货膨胀之机，用库存品所进行的消费品生产。对重建经济最重要的基础资材生产依然处于停滞状态。但是这种消费品生产的暂时上升，在用光了仅有库存物资后而陷于困境也是理所当然的。1947年10月1日实施‘物资供求临时调整法’，11月20日公布‘指定生产资材分配手续的规定’，想防止失散和隐藏重建经济所必须的重要物资，并积极加以利用，但是无法防止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各个角落的黑市交易、走后门等无计划的浪费消耗。”

《朝日经济年史》接着所说的煤炭生产情况更值得注意：

“特别是动力来源的煤炭生产，1940年生产5,700万吨为最高峰，后来年年减产。1945年度由于滥采以及设备陈旧，熟练工人的失散等原因，产量下降为2,230万吨，同年11月仅出煤55万吨。此后由于注意保证劳动力，产量逐渐有所恢复，但仍远未达到计划产量指标。”

无须多说，使日本经济陷入最困难境地的原因是进行了愚蠢的战争，经济企画厅战后经济史编纂室编辑的《战后经济史》对此

归纳为六条，我想分为七项来叙述。

第一是领土缩小了。战前控制土地总面积为675,405平方公里，其中丧失了朝鲜半岛(220,791平方公里)、中国台湾(35,834平方公里)、南库页岛(36,090平方公里)、千岛群岛(10,213平方公里)和琉球(2,386平方公里分别为苏军和美军所占领)，扣掉上述地区和尚未最后确定归属的地区外，战败后当时的面积只不过是369,859平方公里。今天回顾起来，归还了朝鲜半岛和中国台湾，使我国不至于在战后如法、英、荷、比、葡等国似的为民族解放战争所困扰，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是幸运的。但是对战败后当时是个重大打击。

第二是国家总财富损失严重。国家总财富的损失，按战争结束当时的价格计算约为1,340亿日元。普通财产损失25%，纯军事财产损失100%。按国家财富总额计算，损失达41.5%。其中工业生产力损失情况另项论述。

第三是由于从国外和占领地撤退，人口增加。1945年11月1日当时内地人口为7,199.8万人，其中男性为3,490.5万人，女性为3,820.9万人。战争结束时，在旧领土和国外的陆海空军有关人员为348万人，加上民间人士，总数约为650万人。由于这些军人、军属以及平民陆续回国，战后我国人口急剧增加。这些复员军人和从国外撤回的人员，在日本经济走上重建轨道后，由于他们有战时和撤退时的艰苦体验，成为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强大力量。但是，一直到第二届吉田内阁成立时，由于遣返在国外的日本人而使人口急剧增加无疑是个沉重的包袱。

第四项是资本设备的损耗。国家总财富的损失中，最重要的是工业生产能力的损耗率：火力发电30.2%、石油提炼58%、电力炼钢22.1%、炼铝23.9%、工作母机25%、真空管55.7%、汽车20.8%、硫酸54.1%、碱35.7%、肥皂38.2%、水泥27%、橡胶42.7%、毛纺33.4%、毛织品17.2%。开始经济重建后，由于

我国引进最新式的资本设备，战争灾害反而带来了有利的结果。西德也是同样情况。但是，在第一届吉田内阁时期，这一切都完全是不利因素。

第五是劳动体制的瓦解问题。战争中累计有160万男性被动员为征用人员，被动员参加劳动的学生人数也超过300万人。此外还有女子被征用为挺身队员。朝鲜人和中国人除作为劳动力移入外，还使用了俘虏劳动。战败时，上述战时劳动体制当然也崩溃了。在我国产业过渡到平时的劳动体制之前，面临了严重的混乱局面。

第六是战争所带来的财政债务。从满洲事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战费，都是靠国债和借款来维持的。到1945年8月底为止，国债的累计总数达1,233亿日元，军需补助估计达1,047亿日元。国债与军需补助合计达2,280亿日元，这必然成为通货膨胀猛烈发展的重要原因。

第七是再生产结构极端缩小。日本进入战时体制前的经济结构是，从海外进口棉花和羊毛，加工为纺织品和杂货等轻工业品出口，再用这种收入购买废铁等基础工业的原料和工作母机。与美、英两国作战后，和海外的关系被切断了。在战争后期，与自己势力范围的交流事实上也被封锁了，再生产结构进一步缩小。战争末期是“依靠国内的库存和贫乏的资源，只有军需生产部门才断断续续地开动着”。日本投降后的经济，在丧失了国土的45%和势力范围后，外贸也被禁止，再生产结构与战败前夕一样在缩小。还应特别指出的是，占领军执行“整肃”政策，把经济界许多领导人赶走了。由于首脑人物被驱逐，日本银行大阪分行行长一万田尚登一跃而升为总裁就是突出一例。整肃政策确实产生过一些混乱，但是却把思想保守、年迈的会长和总经理都赶出了现职，使比较年轻的经营者有机会得以施展才能，从这点看，整肃对我国变为有利因素，老人统治的弊病至少暂时消失了。

## 十四

吉田茂作为被占领下的内阁首相，所面临的最重大任务之一，就是在上述最不利的条件下，解决停止支付战时补贴问题。战时补贴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应该说就是政府补贴。“战时，根据国家总动员法第十一条发布的敕令（银行等资金运用令第七条），生产军需品及其他有关公司可要求金融机关提供资金贷款，或者可以要求金融机关为应募、接受、收买有价证券、受理债务或债务作出担保。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生产军需品的公司及其有关单位，对借贷资金及其他无偿还能力，而不能还债时，政府要对其不能偿还的债务部分给予补助（该令第八条）。这就是政府补助债务的主要内容。”

此外，“根据国家总动员法第五条以及第八条（统制物资令第十八条）的敕令，由于进行军需品统制（让渡、移交命令）的结果，而使军需品所有者蒙受损失，同样规定政府应把其作为通常损失给予补助。根据国家总动员令第八条的敕令（关于配给进口炼铁原料的统制令第五条）政府承诺补助的项目是很多的。”

有关生命保险、伤害保险、火灾保险等方面，由于战争而出现的丧生、遭受伤害或火灾等，也产生要政府补贴债务的问题。如果立即执行如此繁多的战时补贴，显然会促进通货膨胀。战败以来一直把处理这些战时补贴问题作为金融、通货政策的根本问题，不断进行研究。

大藏省主税局，倾向于学习法国二次大战后创立的财产增加税制，想用财产税来收回资金。完全没有考虑停止战时补贴的问题。大藏省不停止战时补贴的理由是：如果那样做，就会仅仅让一部分人承担战争的损失，这是不公正的。

1945年11月4日，东京大学经济系教授会决定恢复大内兵卫等教授的职务。在这之前10月7日，大内教授通过日本广播协会，

发表了题为“向涩泽先生呼吁！”的广播讲话，要求大藏大臣涩泽“拿出勇气停止政府补贴！”大内以他那类似复活的狂热教徒般的声音所作的演说，引起巨大反响。再加上占领军批准大藏省主税局政策的经济通库莱马上校回国，职业军人马贵特少将就任经济·科学局长后，盟军总部的态度突然强硬。马贵特少将强烈主张“占领军不允许支付所谓战时补贴”。

1945年11月24日，盟军总部公布了致涩泽大藏大臣的“关于消除战时收益和重新编制国家财政的备忘录”。同时设立财产税和战时补贴特别税，指示前者为累进税，后者征税率为100%。日本政府的想法本来是“该支付的要支付，应征收的要征收”，而盟军总部的方针是强制推行惩罚性措施，“日本政府应使全体日本人知道，战争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不是有利可图的”。

第一届吉田内阁任命石桥湛山为大藏大臣。《十年回忆》第三卷对石桥藏相的上任是这样叙述的：

“然而，一旦到了实际组阁的时候，我根据上述情况，认为经济方面的阁员必须由对国内外都十分了解的人来担任。因此，使我煞费苦心的就是农林大臣的人选问题，然而在经济方面，幸而很顺利地请到石桥湛山先生（后来任首相）担任大藏大臣，掌管财政和金融工作。

“我对财政或金融本来是门外汉，不过，既然担负内阁重任，就作了如下考虑：

“第一，大藏大臣的人选必须有卓越的见解，毫不动摇地贯彻自己的主张，即使被视为刚愎自用，也要坚持到底。

“第二，因为当时粮食缺乏、生产又不足，所以首先必须恢复生产，但是另一方面还必须采取妥善措施，消除人们所指责的通货膨胀加剧的危险。

“第三，对于国民虽然不能凡事任其我行我素、不加限制，但是就战败后的人心来说，很难对一切事情都用权力来统治；而且无

论国民或者企业，如果一味依靠补贴和救济，将永远不可能自力更生，因此必须尽量撤销统制。

“我同石桥先生平素虽然没有密切往来，但是我仿佛听说他在战前是自由主义的经济杂志《东洋经济新报》的主持人，是一位颇有见解的民间经济学家。因此，当我看到党所提出的推荐名单中列有石桥先生的名字时，便毫不犹豫地决定他为大藏大臣。我记得石桥曾强调说：‘总之，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生产。’

“社会上似乎曾经有过这样的评论：让石桥做大藏大臣，就等于让一个主张废除统制经济又主张通货膨胀的人入阁，谁知道将来会怎样呢？然而石桥所主张的废除统制，和我所考虑的一样，目的在于尽可能清除统制经济的消极面，使经济欣欣向荣地向前发展。石桥似乎从一开始就认为必须解决前内阁遗留下来的停止战时补贴的问题。”

石桥大藏大臣是如何处理停止战时补贴问题的？请看一下他所写的《湛山回忆》：“我就任大藏大臣后，首先要处理的重大问题是，停止战时补贴和必须增加煤炭生产问题。

“战争结束后，要求停止战时政府或军部向军需品公司所承诺的补贴的呼声甚高。在当时日本的财政状况下，立即支付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只有停止或暂不处理。我的看法是，过一段时间再处理比较好。并且正为此研究对策。但是5月26日，即在我就任大藏大臣后的第五天，《朝日新闻》发表了里约·卡扬就此问题和财产税问题的意见。此人是美国税收专家，在币原内阁时代，应盟军总部邀请曾来调查日本财产税。听说目前在美国做税务工作。

“我由此感到盟军总部大概已经有了某种方案。果然不出所料，5月31日，经济·科学局长马贵特召我前去，把战时补贴征税100%和实行财产税的备忘录交给我，要求尽快执行。这是一项很明智的方案。假如把政府承诺的国家债务，一笔勾销，并非不



可能，但是不够稳妥。如果征税100%，实质上与停止支付一样，道理上却说得过去。我基本上赞成这一方案。

“但是有一点无论如何不能不反对，这就是停止补贴的损失，直接影响到银行，这样会出现停止存款的后果。如果给存款人带来这种不安，银行会陷入困境，还会使复兴任务艰巨的日本经济更加困难。何况存款本身是无辜的，却要由银行来区别存款者的损失率，从公正的观点来说是不妥当的。我认为应由财产税来解决。

“为了这一目的，我继续与盟军总部进行交涉。从5月底一直到7月22日。最后由吉田首相请求麦克阿瑟元帅裁决。7月22日元帅有了回答，问题解决了。结果我的意见终于未被采纳，只是对火灾保险费等免于课税部分的金额有了一些放宽。

“执行结果如何呢？没有出现我担心的那种情况。对战时补贴实行了征税100%。其原因之一是，在上述交涉中，大藏省全力研究并拟定了：如果原封不动地执行盟军总部方案，应如何防止财界动摇的问题。但是，最重要的理由恐怕是由于通货膨胀的发展，停止补贴使财界在金额上所受的打击减少了。

“有人指责说，这是日本政府故意掀起通货膨胀，使盟军总部方案实质架空。我敢保证，绝没有这种事。如果经济界由于通货膨胀减轻了损失，这完全是偶然的。”

## 十五

石桥湛山的回忆虽然很平淡，但实际上他的奋斗精神很了不起。吉田茂在《十年回忆》第三卷这样描写了藏相令人感动的努力：“总之，关于停止补贴问题，石桥似乎也相当耐心地一再和盟军总部交涉，他曾经叹息说：‘对方的做法就好象在他们自己国内一样，忽而是非常抽象的原则论，忽而又拘泥于很具体的细节，对于问题决不能轻易表示同意’。所以到了6月底，谈判还没能达

成协议，于是决定由我写信给缪勒参谋长。不晓得是否这封信起了反作用，结果在7月初，石桥就接到了盟军总部类似最后通牒的强硬声明，声明说：无论日本方面能否接受，一定要把这个方案提交国会审议。

“后来，石桥和经济·科学局长马贵特进行了相当激烈的论战，但始终未能达成协议。而内阁会议则议论纷纷；有的认为，如果盟军总部坚决要求按照指示方案办理，就请他们发正式命令好啦！（实际上也许向盟军总部提出了这个意见），还有的建议我给麦克阿瑟元帅写信。结果，通过麦克阿瑟元帅给我回信（7月22日）的形式，算是得出最后结论。这个问题从发生到解决，整整费了两个月的时间。

“结果，石桥的意见并未被采纳，只是对于火灾保险费等免于课税部分的金额，比盟军总部的原案略有放宽。可是，停止战时补贴即课税100%的方案付诸实施后，竟出人意料地并未遇到多大障碍……。也就是说，偶然由于通货膨胀，停止补贴问题解决得很顺利。

“这且不谈。石桥为了这个停止战时补贴的问题，似乎也竭尽全力同盟军总部磋商。据说，后来把有关法案提交国会审议时，他一面报告交涉经过，一面因激动而落泪。他的心情确是可以理解的。当时石桥斗志很强，也许由于他这种斗志伤了盟军总部的感情，后来他竟受到了所谓备忘录案件的整肃……。”

石桥大藏大臣的主张，从理论角度看是正确的。但是当时盟军总部是要惩罚战败国日本，因此石桥藏相的诚意也好，热情也好，都是行不通的。盟军总部要让日本经济界沉痛地感到：“进行战争是讨不到便宜的！”石桥藏相反驳说：“战败国事事吃亏，战胜国处处占便宜是不妥当的。”但是在胜利者与失败者之间的关系上，这种道理是行不通的。我们再引用一下吉田首相和麦克阿瑟元帅之间就解决停止战时补贴问题所交换的信件：

“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元帅阁下：

敬启者马贵特将军和石桥大藏大臣就课税悬案和恢复日本经济问题，经过一个多月的会谈，对于若干细节仍没有达成协议。石桥先生报告说，他同将军对于要达到的最终目标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但对于达到目标的方法问题，两者之间有若干不同意见。我相信，这些分歧总有一天是会解决的。他们之间的分歧有四点：

“一、根据盟军总部方案，由于停止战时补贴，金融机关蒙受的损失应由：(a)剩余金和准备金以及(b)资本补偿，如果上记金额不足，政府要逐项计算，对包括所保证的超过1万5千日元的存款，应根据外部的请求权弥补。石桥的方案是，所有存款都要付给所有者，建议这些存款不受金融机关的损失的影响。石桥反对用存款添补损失的理由是，如果这样做，对存款者是不公平的，将在经济方面产生不安。存款的安全性，与其说是由存款者本身，不如说是由银行的财务状况左右的。石桥认为，为了使存款成为公正的财产税的对象，不能用它弥补存入银行之损失。

“二、盟军总部的方案中，对战时保险请求额，个人以3万日元为限可全额支付。石桥主张，个人平均到5万日元全部支付，超过5万不满10万日元者，支付50%。10万日元以上者的请求权均为无效。换句话说，对个人最大的支付金额为7万5千日元。石桥的论据是，在目前的物价形势下，3万日元已不能足充作最小限度的重建费用了。

“三、根据盟军总部方案，对于公司和企业，不支付任何战时补贴。石桥建议，为了继续国民生活和工作，必须保持企业不可缺少的支付能力，应支付足够的补偿。石桥建议，对所管委员会选定的公司，应支付相当于纯负债额和缴纳资本30%的必要请求额。而且为了对必要产业进行新的贷款，石桥建议成立复兴金融金库。

“四、盟军总部指示对国债利息征税71%。石桥主张对国债金额适当课税。这项税金应与对存款类似的税金一致。本方案的有利之处是使存款和国债分别以不同的利率建立相互关系。

“如上所述，马贵特将军与石桥关于要达到的最终目标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分歧之点是关于达到目的的手段。我确信，石桥的各项建议并不是过分要求。该计划的解决方案对国民经济的前途极端重要，希望阁下给予指导和善意的考虑。

谨启

吉田茂

1946年7月16日”

## 十六

麦克阿瑟回答这封信件的日期，上面引用的《十年回忆》第三卷所写的是7月22日，这是送交日本政府的日期，回信签发日期是19日。麦克阿瑟信件全文如下：

“内阁首相阁下：

敬启者 关于向日本帝国议会提出征税计划的若干规定，我仔细地注意并研究了您1946年7月16日来信中所提出的马贵特将军和石桥大藏大臣之间的分歧意见。我知道，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意见，我允许我的部下和日本帝国政府官厅间继续召开会议并进行协商。理由是，我相信日本政府为解决这些分歧会在议会议事日程上，保证最优先审议征税案并迈出双方满意的第一步。

“关于阁下信中所提的问题，我的看法如下：如果承认政府保证到1万5千日元为止的存款，就会变为保护日本银行存款者的压倒多数。根据对日本的一家代表性银行的分析，95%的存款者均在1万5千日元以内。而且，个人存款者有两个以上存折时，都要分别保证1万5千日元。这种金融上的措施，是为了保护存款数

目少的人而承认保证银行存款。但是企图保证全部存款的建议，是不健全的。因为，其结果将使银行根据慎重而坚实的原则处理借贷业务，就会丧失经常处于能使资产根据必要实行现金化的刺激和动机。如果继续实行政府补助所有银行存款的政策，就等于把私有企业银行实行国有化。其结果将招致国家费用大量外流，为了一少部分特权者谋利，将使广大纳税者背上沉重包袱，使银行的资产内容不稳定，使国际经济社会丧失对日本的信用。关于评价资本征税问题所产生的混乱，即最终由于征税方案一定要规定调整过多申报资产问题，大藏大臣所提出的问题，完全可以解决。

“对于支付战时保险请求权问题，对于一般日本人重建房屋要给予援助这点，意见完全一致。如果以3万日元为限度支付，对于下层和中产阶级，不仅可以完全赔偿他们的房屋损失，而且还包括可以重建小规模的事业和经营个人商店的足够资金。支持应该坚决照原来的日元请求权付给。正如大藏大臣作为对盟军总部方案进行修正的基本前提所提出的建议，用提高支付保证额限度，不能解决随着建筑费的变化而产生的问题。但是，在充分考虑后，如果阁下想一下，为了帮助没有足够资产可以从普通银行取得贷款的阶层的人们得到重建个人房屋的必要资金，就不会反对把个人的战时保险请求限度提高到5万日元。

“关于产业设施的损害，其重建是用普通银行贷款进行，还是在你的信中所谈到的通过复兴金融金库进行，我认为，这点是重要的。

“关于对公司和企业支付补贴问题，这是开始占领以来产生议论最多的经济问题之一。该问题经过了长时间的讨论，我认为还不存在共同基础，使有利害关系的日本人的观点和负责财政、经济专家的观点趋于一致。你的第三项建议，即对所选择的企业，政府进行部分补助，同时通过复兴金融金库进行一般性贷款

的想法，看来政府承认对于值得支持而资本不足的工商企业和银行，也要给予临时贷款。为了使特定的企业长久继续下去，或者为了满足绝对必要的经济要求，给予特别援助，为此而选择企业这种方法，无论如何都将遭到严厉批判。所有期望转向平时生产的工业和其他企业，只要明确证明对于重建国民经济有贡献，从长远看，有值得担风险的话，通过现有银行或复兴金融金库完全可以获得充分的贷款。

“你的第四项建议即关于降低国债利息问题，我已命令撤销征税71%的规定。

谨启

盟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1946年7月19日”

这封信谈到了“将遭到严厉批判”，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出，麦克阿瑟元帅当时不能忽视对日理事会的动向。苏联代表德勒维扬科中将强硬主张：“日本的军需公司，战时在军阀的庇护下从事侵略战争，牟取了暴利。对这样的公司绝不能进行补助。”

日本政府按照麦克阿瑟信件的指示，在8月8日的临时内阁会议上，决定了停止补助的基本方针，并于9月27日向帝国议会提出了“战时补助特别措施法”及其他有关法案，10月19日公布，同月30日实施。

## 十七

从1946年9月到12月，吉田首相在不引人注目的情况下，拼命为同胞继续进行巨大努力。其中之一是，在南方的英国管理地区内，有20万日本人，包括妇女、儿童，处境悲惨。吉田首相向麦克阿瑟元帅呼吁救济。吉田在9月1日发出的信中指出，日本士兵受到了近似肉刑的强迫劳动，由于推迟回国而感到绝望，有的甚至对上级采取了暴力行动。吉田举出“波茨坦公告”第九条规

定：“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乡，享有和平及生产之机会”，特别对正确提供这些人的消息问题，要求麦克阿瑟元帅进行协助。

9月9日，麦克阿瑟元帅的外交顾问乔治·艾奇逊大使向他提出报告说，他会见了英国格斯克因大使，传达了吉田首相的呼吁，英国大使极为同情，答应立即用电报询问英国管理下的日本人的情况。9月26日，麦克阿瑟元帅写信给吉田首相说：“英国大使在9月25日致函艾奇逊大使，提供了相当多的情况。格斯克因大使还口头对艾奇逊大使表示，有关被扣留的人员名单，英国正要求其有关当局赶写。名单一俟寄到东京，立即转交阁下。”

9月30日吉田茂写信给麦克阿瑟元帅，感谢他26日的信件。吉田茂在信中说，“你在繁忙中，立即给我答复并附来英国大使的信件，使我深为感动。根据英国大使的信件，了解到英国管理区域内日本人的确实消息，同时得知日本人的生活条件正在改善。”吉田茂在信中最后说，“我请求你不要忘记，我国人民热切希望现在留在东南亚的全部日本人能够尽早回国。”

第二件是，吉田首相写信给麦克阿瑟元帅就占领政策的基本方针提出疑问。1945年9月29日发出的这封信极为重要，全文如下：

“麦克阿瑟元帅阁下：

敬启者 我刚才从停战联络事务局人员森君那里收到报告，感到非常为难。我并不想打扰阁下，考虑到问题的重要，只好冒昧写信。

“森昨天早晨和我国司法次官一起出席盟军总部民政局的会议，民政局肯迪斯上校和哈西先生出席。在会谈中，肯迪斯上校对司法次官说，9月19日晚我访问你时，你曾指出，由于日本政府公务员常常不服从盟军总部的要求和指令，你表示今后处理问题时，不得不用指令来代替谈判和讨论，不得不考虑把占领政策

从“软”变为“硬”。关于这一报告，我极心关心，在给你写信之前，我已派停战事务联络局次长白洲去哈西先生和司法次官处特意进行了核实。

“该报告有关阁下对我发表的上述谈话一事，与我的记忆很不相同。我感到必须向你说明，我以最热心的态度进行了努力，我和我的同僚们对阁下进行了一切可能的合作，我应该清楚说明这点。当然，对于那天下午阁下所说的话，我也很可能误解了，如果是这样，收到你的回复后，我将立即尽力按照你的希望纠正我的行动。

打扰了阁下，再次表示歉意。

谨启

吉田茂

9月27日”

吉田茂在这封信中以郑重的语气，对盟军总部肯迪斯上校进行了尖锐的谴责和揭发。对于吉田茂充满愤怒的质问，麦克阿瑟元帅当天回信说：“最近与你会谈时，向你所传达的我的立场，没有任何变化。对于你信中提到的肯迪斯上校与日本政府代表间的会谈之事，我一点都不了解。经向民政局询问后得知，发言完全翻译错了，是误解。我认为这是由于语言困难造成的。你为了澄清情况立即向我发出照会，我高度评价阁下的这一行动。

谨启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9月27日”

9月27日吉田和麦克阿瑟之间往返信件是在占领条件下吉田首相保持坚定态度的最好证明。占领军的习惯是，时间久了它的下属往往会耍威风。一名上校，借麦克阿瑟元帅的威严，吓唬日本的官员是大有可能的。如果不是吉田迅速而直接地向麦克阿瑟元帅提出，那么，他的下属无疑会更加骄横。吉田茂的伟大之



处，就在于，平素似乎以懒惰自居，但在关键时刻，会风驰电掣地行动。这件事发生以后，民政局的课长们，就不能再依仗麦克阿瑟元帅来狐假虎威了。两年后，他们用“拟由山崎猛出任首相事件”形式，向吉田茂进行复仇的背景，就是这些信件的来往。

第三件应举出的是吉田茂首相为重建日本经济所起的巨大作用。吉田茂担心停止战时补贴会给重建日本经济带来严重影响，他每周都邀请东畑精一、中山伊知郎、有泽广巳、茅诚司、内田俊一等学者集团，在外务省大臣室和外相官邸协商对策。从那里诞生了著名的“重点生产方式”。在介绍吉田首相致麦克阿瑟元帅提出有关这方面要求的信件之前，先看一下有泽广巳教授的回忆录。在《昭和和经济史的证言》下卷，有泽教授说：

“吉田先生对麦克阿瑟说：‘由于你做了一些粗暴的事，日本才出现许多失业人员，在制造厂，有的地方竟然不工作了。’吉田是否真的这样认识，这点还不清楚，但确实这样说了。这样，麦克阿瑟就表示，很对不起。为了弥补，如果需要什么物资，司令部可以提供，希望把所需要的东西列出清单。这番话是在一次以吉田为中心的午餐会上吉田先生自己讲的……。”

## 十八

有泽广巳教授继续说：“这并不是吉田首相突然提出的。而是麦克阿瑟说了之后首相才指示各省提出所需物品清单的。这样，各省提出的各种物资达几百种之多，但是不能把所需一切物品都向麦克阿瑟提出，压缩了二、三次，仍有几十种。最后吉田终于动了肝火说：‘不和你们研究了’。在这次午餐会上，这也成了话题。

“午餐会过去都以座谈为主，这次开始出现这种问题。先前外务省研究会对此多少也进行过研究，有各种议论。座谈会也认为，应把能够扩大再生产的物资乘这机会搞进来，于是提出了要

钢铁、重油、橡胶、无烟煤，不记得是谁还提出要拖挂式的公共汽车。最后决定要求这五种产品。还有些曲折，最后由于美国钢铁生产也不足，不能供应，但是无烟煤、橡胶、拖挂式的公共汽车都供给了。拖挂式公共汽车，确实提供了2万5千多辆，当时东京市内使用的公共汽车就是这些。

“盟军总部议论说，日本要求重油，如果引进重油，反而会阻碍煤炭生产。对此我们认为情况不会这样，认为如果得到重油，可用来生产钢铁，再把增产的钢铁投入煤矿可使煤炭增产。根据这种理论。吉田在第二封或第三封信中终于提出要求提供重油。”

吉田茂对日本政府的垂直行政的弱点发了脾气之后，学者集团的午餐会，开始拟定经济政策基本方针，起了智囊团的作用。后来有名的“重点生产方式”就是由这个智囊团拟定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吉田茂12月3日致麦克阿瑟元帅的题为“为克服煤炭危机，请求进口必要的物资”的文件写道：“我在10月下旬曾向你提出，为解决目前日本经济困难，进口重油和钢铁等资材，是关系紧迫的煤炭生产死活问题。鉴于其后的形势，我再次向你提出日本政府的这项要求”。这份文件列举说，煤炭下个季度的生产目标为1,380万吨，不仅达不到，甚至生产不了1,200万吨。明年度要达到生产3,000万吨的目标，在技术上是不可可能的，对铁路、电力、肥料以及炼铁都将产生不利影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提出了“去年铁路发生的事故为1936年的8倍，那时的事故还包括空袭事故在内。今年已经没有空袭了，事故仍比去年增加70%。”国营铁路从1946年11月10日开始，由于煤炭不足旅客列车必须削减16%。吉田茂指出的问题具有很大的说服力。这个文件继续强调，由于为占领军建设住宅，消耗了大量资材。“钢管、铁板、铸铁管以及煤矿必不可少的其他资材，我们必须把其中大部分拨给占领军的住宅建设计划，为此，使煤炭生产

资材的困难成倍增加。由于上述实际情况,为增加日本煤炭生产,缓和危机,请阁下一定批准尽早进口下列物品,特别是重油,即使一部分也好,望能尽快运到。”所列举的希望进口的物品如下:

重油(炼钢用)	80,000千公升
铸铁管	41,000吨
铁轨	30,000吨
硅素钢板	4,000吨
无烟煤(从法属印支进口)	140,000吨
焦炭(华北产)	50,000吨(每月)

这份文件列有三张副表,第三项是在1946年第三季度(10-12月)所生产的资料中,占领军要求的部分所占的比率:

品 目	比率(%)
钢材制成品	32
钢管	57
钢板	43
钉子、铆钉	44
锌板	85
铸铁管	89
水泥	53

他还指出,由于为占领军建造住宅等,日本经济承受了重压。这对说服麦克阿瑟元帅,无疑起了很大作用。这里也表现了老练外交家吉田茂的谈判技术。

同一个时期,除了物资以外,吉田茂还有一个案件与盟军总部进行过艰苦的交涉,首先是把整肃公职的范围扩大到地方公职

的问题。1946年10月22日，吉田茂首相给麦克阿瑟元帅写信：“敬启者 根据盟军总部民政局关于要把阁下的整肃令扩大到地方公职和经济界去的暗示，我已指示中央停战事务联络局，把有关这两部分的政府建议向民政局提出。日本政府的建议在细节上与民政局的见解有些不同，但我认为与民政局所暗示的原则是一致的。以密西西比州选出的众议员柯马为首的美国国会议员团，去年访问欧洲后说：‘如果把与统治德国12年的运动、方法以及有某种关系的人，全都排斥掉，其结果就会招致无政府状态和混乱，’我认为日本的情况也完全一样。我只是想把它最后一句话改为‘要招致无政府状态和混乱，以及共产主义’。

致民政局建议的抄件附在信中。

吉田茂

1946年10月22日”

在“无政府状态和混乱”之后再加上“共产主义”，最清楚地表明了吉田茂的立场。其本意就是，如果不希望日本共产主义化，就必须慎重考虑才行。在第二天，民政局长惠特尼少将向中央停战事务联络局长官发出备忘录，对日本政府就扩大公职整肃方案提出的五点建议，进行了严厉批评。日本政府的方案对于地方，即县、郡、市、町、村一级不适于担任公职的全体人员，中央政府并没有加以排除。还有一点重要的是，盟军总部方案把1945年9月1日为止，担任市长，町长，村长以及助理和街道会长、村长职务的人全部整肃，此外还包括大政翼赞会地方组织的一切主要成员。

吉田首相10月31日写信给麦克阿瑟元帅，大胆地谈了看法，并反驳了惠特尼民政局长的批评。

吉田茂首先指出：“关于(A)项，我充分认识到，阁下发布的

整肃令<sup>①</sup>，与‘波茨坦公告’密切相关，而且这一指令的文字和精神，特别是执行其精神，是恢复日本对盟国的尊重和友好、并成为民主世界一员所必需的。但是同时这样进行整肃，即使不能避免若干不公正情况，也应全力把这种不公正情况限制在最小范围内，我感到政府对此负有重大责任。”然后对(B)(C)(D)三项指出，简单介绍如下：

关于(B)项，由于政府当前面临的最重要任务是恢复荒废的国家，因此把那些与军国主义政权有多少有些关系的人也解除公职，只能在国民中产生敌意和失望，徒为复兴增加困难。

关于(C)项，推进军国主义化的是职业军人、官僚、反动右翼以及包括一部分财阀在内的一批党徒，而国民只不过是军国主义化的对象而已。以大政翼赞会为例，中央组织执行部负有错误地把国民引向悲惨而不幸境遇的责任，但地方翼赞组织和所谓“有影响者”，在“理想”和同志感情方面与中央执行部并不一致，他们的立场犹如错误地站在警察的汽车前进行阻挡，从而帮助被追捕的强盗逃走一样。

关于(D)项，整肃应在国民确信“符合正义”的基础上进行，如果超越这个限度，就会对政府及其整肃措施产生疑虑。

在上述前提下，吉田首相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在执行麦克阿瑟整肃令时，日本政府与民政局合作，已经拟定了一定的基准，它适用于旧官僚、贵族院议员、敕任官以上的政府官员、众议员候选人及其他重要公职人员。现在民政局又指示，制定适于地方公职的新的基准。日本政府认为这两项基准应分别适用于不同方面。

按照民政局长这次的指示，如果一旦以不适于担任地方公职

<sup>①</sup> 1946年1月4日盟军总部发布的禁止担任公职的整肃对象分为七项，即，A项(涉嫌战犯)、B项(陆、海军、宪兵、特务人员)、C项(极端主义者、右翼、秘密团体骨干)、D项(大政翼赞会关系者)、E项(金融方面的有关人员)、F项(占领地长官)、G项(其他国家主义者、军国主义者)，七项人员共计21万人。1947年后整肃范围扩大到教育、工会界和日共。——译者

为由，把适于在中央担任公职者也加以整肃时，会根本动摇对政府的信赖。

第二，根据政府的建议，市长和市长助理以及町、村长和村助理的候选人，要依据新的标准进行审查，其他人员应根据居民的自由意志任选。街道会长和村长并不是法律规定的职务，在战时，有人也许在分配粮食方面搞过鬼，但有的地方并无报酬，由于没有人想干这项既费时间又费劳力的职务，以至采用了轮流制。

第三，关于大政翼赞会的有影响人物的问题，日本政府根据民政局的意见，建议解除大政翼赞会地方负责人担任市、町、村长等职务。但是他们对于把日本拖向战争所起的作用几乎等于零。如果对它下面的“有影响的成员”也加以追究，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也不公正。接着吉田首相对惠特尼少将认为“为了把国家和战争联系起来，而对国民的思想、行动以及日常生活直接施加压力正是在这个最基层的阶层进行”的主张表示严重的怀疑，强调这些处在军国主义日本最基层的人们，与纳粹党和法西斯团体的喽罗有根本区别。吉田首相对此提出的抗议是正确的。麦克阿瑟元帅对吉田茂的意见也有某种程度的理解，在11月1日的信中，支持了吉田的第一点建议。元帅承认了在有关中央职务的范围内，到下次大选为止，延期适用地方整肃公职的规定。对于第二点，麦克阿瑟照顾惠特尼的面子，否掉了吉田的反驳。关于第三点，麦克阿瑟元帅对吉田首相和惠特尼民政局长的双方主张都加以考虑，决定把大政翼赞会地方支部负责人分为市部和郡部加以区别对待。

关于1946年11月3日颁布新宪法、发布大赦问题，麦克阿瑟指示，把违反选举法者和违反占领政策者一起都不列入大赦范围。对此，吉田首相11月1日致函元帅，要求把违反选举法者也包括在大赦恩典之内。第二天，元帅即予以承认。汉斯·贝阿瓦德教授说，吉田首相的抗议是为了达到保护保守势力而提出的。该年10月1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院，对12名德国被告均判处死刑，除格

林自杀外，其他11人16日都处以绞刑，如果联系到这种情况，可以说，吉田对惠特尼民政局长备忘录公开进行反驳的勇气是值得称赞的。

## 十九

吉田首相抵制盟军总部民政局的指示，往往采取直接向麦克阿瑟呼吁的方式进行，相当有成效。但也有不顺利的情况。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一是，关于整肃公职敕令，民政局指示要加进第十条，即“禁止三亲范围以内的人，担任被整肃者的原来职务。”1946年12月21日吉田茂致函麦克阿瑟元帅反对上述规定。下面引用信中的一段话：“这一情况使我想起中国几世纪以前的法律和习惯，就是当一人犯重罪时，他的亲属都要受株连。但是，现代正义的概念是，即使是杀人犯，也不处罚其亲属。我认为仅仅宣布‘不喜欢’三亲范围内的人这种单纯的理由，不论是指特定的地位，还是规定10年的期限，都是违反现代正义感的。”

但是吉田首相赞成民政局在公职方面永远排除“不喜欢”的人的影响的意图。因此，吉田茂建议规定，禁止担任公职的人接受备忘录所定范围的人的指示、劝说和报酬，违者停职。而且上述人员不得对公职人员进行指示、劝说或给予报酬来继续维持自己的影响。

麦克阿瑟12月26日签署的答复严厉指出：“我注意地阅读了阁下12月21日的信件。我认为你对1946年1月4日的备忘录扩大整肃公职的有关亲属的规定有所误解。”驳回了吉田茂的理由。

麦克阿瑟说，上述规定的主要意图不在于是处罚性的条款，只是要禁止某个家族人员被解除职务后，再由同一家族的另外人员来继任。要清除被整肃的经济界强有力人物的影响，必须解决共谋这种严重而不可避免的问题。阁下的信也承认这种可能性。如果被整肃者的职务由其父亲、儿子、叔父或外甥等近亲继承，

很明显被整肃职务者的影响仍会继续存在。

预计同一家族成员内部进行同谋决不是什么新奇事儿。例如，美国国税厅就不承认同一家族人员间从收入中扣除商业损失。《日本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六条也承认，三亲以内的亲属有拒绝提供证言的权利。因此，即使亲属要继续保持被整肃者的影响，作为实际问题也不可能宣判他们有罪。《日本刑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藏匿并使犯人逃脱，如系亲属，也可以免刑。接着，麦克阿瑟元帅谈到盟国非常关心把日本政治、经济、生活委托给没有污点的领导人管理的问题。报刊和英国议会表示担心，在占领前拥有强大势力、对现在不满的人的亲属，继续保持与过去相同的影响，可能正在巧妙地改变着盟国的要求。麦克阿瑟元帅断言：“消除这种疑虑，为防止旧势力继续保持影响，阁下若能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无疑对日本是最有益的。”强烈劝告吉田首相一定执行有关家族条款的建议，因为把经济力量集中于少数人之手，继续维持集权的专制主义，同样是危及民主统治形态的。

这种要求，道理明确。吉田茂只能服从，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取消“大不逆罪”和“不敬罪”也是类似问题。吉田首相1946年12月27日写信给麦克阿瑟元帅呼吁说：“有关修改刑法问题值得向你特书一笔。12月20日，惠特尼少将向司法大臣木村口头传达了阁下关于废除刑法有关大逆罪的第七十三条和第七十五条以及有关不敬罪的第七十四条和第七十六条。但是对于第七十三条和第七十五条，有使其继续存在的某些理由。”

接着吉田首相列举了三项理由：第一，在新宪法下，鉴于天皇是“国家和国民团结的象征”，因此对天皇施加暴力时，作为颠覆国家罪，应比对一般暴行更加严惩。第二，皇室成员，从继承皇位的关系上看，应与普通人区别对待。第三，如英国等君主国家，对君主的暴力行为有特别规定。

麦克阿瑟元帅1947年2月25日对吉田这封信作了答复。在近



两个月内，麦克阿瑟元帅看来对英国法律进行了研究。元帅的复信驳回了吉田茂列举的三条理由。关于第一条理由，即吉田主张对天皇人身施加暴力性质就是颠覆国家，麦克阿瑟以“与新宪法的精神不能并立”为由，予以驳回。麦克阿瑟指出，所有人在法律面前必须平等，对天皇没有理由要特殊对待。那种所谓日本国民有与普遍理论原则明显不同的特殊伦理感的主张，已由1946年1月1日天皇本人的“凡人宣言”否认了。由于刑法有关于惩罚暴行、杀伤以及杀人的规定，天皇的人权也受到了充分的保护。

关于第二条理由，麦克阿瑟认为，既然第一条理由没有充分依据，这条更为缺乏根据。

关于第三条，麦克阿瑟元帅说，英国600年前规定的有关袭击国王的成文法是日耳曼封建制度的遗产，不能适用于现代，与日本现状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因此予以驳回。在谈到惩罚对美国总统暴行的问题后，麦克阿瑟说，要求在刑法上对皇室的犯罪作特别规定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因此，对皇室的犯罪，刑法第二篇第一章(第七十三条到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应予删除。麦克阿瑟是在仔细研究后作出答复的，吉田首相对此也是除了服从，没有其它办法。

## 二十

前面已经说过，在吉田内阁成立后不久，6月13日，发布“摆脱粮食危机的声明”的同时，又发表了“政府关于维护社会秩序的声明”，但是后来阻碍吉田茂组阁的群众运动并没有减弱，而且由于工会组织的扩大和加强，罢工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值得特别注意的是，8月1日成立了总同盟，19日建立了产业工会。

1946年7月24日，国铁工会由于反对裁减7万5千人，决定从9月15日组织工潮。9月14日由于国铁方面让步，总算避免了工潮。海员工会，为反对船舶运营会解雇4万2千7百工人，从9月10日起

进行10天工潮斗争。10月1日全炭和东芝决定罢工，共产党领导的全国产业工会会议(产别)开始了“十月斗争”，10月4日，指示报纸、广播工会举行总罢工，报纸工会的罢工遭受挫折。对于全国广播协会的罢工，邮政省不得不从10月8日到25日实行国家管理广播。10月19日电业工会的停电罢工，不仅对工业恢复造成障碍，而且造成了人心不安。

面对这种社会不安，吉田茂试与社会党搞联合政权也是可以理解的。1948年11月26日全官公厅工会<sup>①</sup>共斗委员会成立，12月2日发表斗争宣言，17日与全国工会共斗委员会一起，召开了“保卫生活权利，打倒吉田反动内阁国民大会”。同一天，在帝国会议内，以社会党的西尾末广为中心，提出要求解散议会的决议案。表决时虽然未能通过，但是政治影响很大。

吉田茂开始向西尾末广进行工作也正是这个时候。《西尾末广政治备忘录》这样写道：“正在此时，平野力和我联系说：‘吉田首相一定想秘密见你……。’平野力在战前就与老牌政党的政治家有广泛的交往。他的消息是从哪个渠道来的？总之他不断劝我，‘吉田先生说，一定要见你’。经过慎重的考虑后，决心接受平野君的劝告去会见吉田。地点就在现在国会记者馆后面希尔顿饭店对面的胡同深处，是一栋与前海军有关的日本式房子。我和平野君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吉田先生。

“这是我第一次见吉田先生。身材比想象的矮小，穿着外衣和裙裤，显得潇洒合身。他不断劝我饮酒，用非常巧妙的谈话技巧很诙谐地谈起闲话来。吉田说：‘最近有可能大选，如果都向土建老板去低头讨资金搞选举，这对双方都不痛快，西尾君是这样吧！’但是关键问题，却不说。我是准备他提出建立联合政府或者要求合作而来的，但是这种话题压根没有谈到。这次会见，

<sup>①</sup> 全官公厅工会是指政府机关和公共企业机关职员工会。——译者

只是喝酒闲谈，双方存在着距离。此后不久，吉田首相又通过平野君要求再见一次，地点仍是上次见面的地方，也还是平野君等三人。但是这次会见也还喝酒闲谈，没有特别正经的话。我有些生气了，心中暗暗想‘真不愧是敌手啊’。

“由于他采取这种态度，我这里也不能大意，这时才产生了我的吉田观。”

让我暂时中断引述。当西尾感到吉田把他作为政敌时，吉田似乎对西尾的议会政治的热情深受感动。吉田过于兴奋，喝威士忌过多，在西尾离去后，把已经休息的菜馆又叫开门，并住在那里。下面继续引用西尾的回忆：“吉田先生第三次提出见面是在第九十二届国会举行开幕式的12月28日这天。由于国会就要开会了，对方认为这样下去不好应付局势，于是又提出，还是在原来的地方请我和平野一定去。在这次会见中，吉田首相才讲了真意，首先要求我作为商工大臣入阁，还说最近将建立劳动省和建设省，希望社会党人出任阁僚。吉田首相的联合构想是，现在内阁成员大体不动，主要让社会党出任新成立的两个省的阁僚，使人感到只是作‘生鱼片的配菜’。对此，我详细而明确地讲了社会党内的情况：‘现在社会党也是全国性大政党。既然说到联合，吉田内阁首先应该辞职，然后两党通过会谈建立联合政权，不这样道理上说不过去。在延长吉田内阁的基础上，加进一、二名社会党阁僚，从目前社会党内部情况来看，这种办法不能接受。’并进一步说：‘为了实现联合政权，象今天晚上这种秘密会谈，作为酝酿是重要的，但是不要只进行这种内部活动，希望正面向社会党堂堂正正地提出联合要求；如果不这样，即使我们有热情，社会党也是不能响应的。’吉田先生默默地听着，并回答说：‘这点我清楚了。让我再很好地考虑一下。’这样当天晚上就谈到这里。在回来的路上，我对平野君说：‘吉田先生一定会再次提出要求。这条鱼一定会再来试探的。我现在先回大阪，这期间，如果对方要联

系，要立即通知我，’当晚我回到了大阪。”

吉田-西尾会谈的讨价还价，表明了两位政治家的力量，使人深感兴趣。西尾末广判断“吉田一定会再来试探”的理由，无疑是当时工人斗争的猛烈攻势。“吉田内阁是没办法抵抗工人的这场激烈攻势的。我估计他一定会要求社会党合作。众所周知，当时的工人攻势正在向着第二年(1947年)2月1日的所谓二·一总罢工方向蓬勃发展，表示出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

西尾末广说：“现在回忆起来，在1946年的下半年，即第一届吉田内阁成立后半年的日本形势，可以认为就是革命危机的时刻。交通、电力等基础产业的总罢工，严重地动摇了日本的社会经济基础。这也是日本战败后经历的第一次巨大震荡。”

考虑到工人运动攻势的背景，吉田首相认真提出和社会党的联合问题，应该说是当然的。但是1947年1月1日吉田首相在日本广播协会电台表露了他的真实面目，吉田指责他们是“不逞之徒”。吉田首相在这篇元旦广播说：“现在竟有人不仅利用这个可悲的经济状况，为了政治斗争的目的，空喊经济危机，企图加剧社会不安，阻碍生产，而且企图破坏为重建经济的举国一致行动，因此，我不得不呼吁我国人民的爱国心，抨击他们的行动。”并说：“我不相信在我国人民中有很多这种不逞之徒。”

“不逞之徒”这种说法使人想起吉田茂在任安东领事、天津与奉天总领事时，把大陆浪人抨击为“流浪辈”的情景。吉田茂作为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者，最尊重法律和秩序，最讨厌不管是左的还是右的不法之徒。吉田茂把被共产党暴力革命战略煽动下、用红色传动带巧妙操纵工会的领导人称之为“不逞之徒”，应该说是非常自然的。

吉田茂决没有指责工会会员也是“不逞之徒”，《十年回忆》第二卷谈到了这点：“当然，认为工会的这些行动无一不是共产主义者的活动，也许不正确。但是，与此相反，社会上也有不少这样

的看法：只要是以工会名义发动的工潮，即使是非法的暴力行为，也都当做行使工人的基本权利而认为是绝对不可侵犯的。在当时，这种看法特别多；在今天也是如此。我在二·一总罢工前的元旦发表了新年致词，其中指责加剧当时社会不安并企图在政治上利用这种不安的一股势力；并且说：我不相信在国民当中有很多‘这种不逞之徒’。于是这句话便被人当做口实，断定我是把全体工人阶级称作了‘不逞之徒’，甚至在报纸上出现了对我展开新攻击的评论。实际上要我取消这个新年致词并进行道歉的要求，已经作为二·一总罢工的前提条件构成了他们胁迫政府的十三条要求的一条。因此，当时主要报刊的评论如何接受一部分破坏分子的意图而为其所迷惑一事，已昭然若揭。”

## 二十一

吉田首相的基本战略是，与社会党内并非“不逞之徒”的领导人联合，孤立以共产党为中心的破坏势力，以此来渡过这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因此，正象西尾末广所期待的那样，新年刚过吉田又向西尾进行活动了。关于这次会谈的地点，西尾的《政治备忘录》里没有提到。当时的首相秘书官福田笃泰后来在《外政研究》杂志上发表的《吉田首相的为人》中说，这次会谈是在火灾中幸免的日本菜馆“户田”进行的。又据1971年12月28日池田禎治在《日本经济新闻》文化栏所写的《议会之父——西尾末广的引退》提供的情况，促进实现吉田-西尾会谈的是福田笃泰秘书官和当时的《读卖新闻》记者池田禎治。让我们再继续引用《西尾末广政治备忘录》的有关部分：“这样，我在年底回到大阪，一边等待平野君的联系，一边过了年。1月7日返回东京时，平野君突然跑来对我说：‘我刚刚给你发了电报，吉田又表示愿意见你。’

“第二天，我和平野君一起到了永田町的宿舍。吉田先生见到我立即开诚布公地提出要求说：‘只要阁僚分配问题能够达成协

议，可以接受你的要求，吉田内阁可以总辞职，希望促进上次所谈的内容，情况发展到这种地步，我们也不得不提出一些条件，于是我把早就考虑过的具体条件明确地谈出来：一，现在的阁僚，尽可能不留任；二，尤其是坚决反对石桥藏相留任；三，社会党所要求的阁僚是经济安定本部、劳动、农林、商工、不管部两名，此外协同、国民两党也各有一名入阁。当时把协同、国民两党和入阁问题也作为条件之一提出来是有一番过程的。这就是前不久在临时国会，在野党一致提出解散议会决议案时，协同党的三木武夫先生给予很大合作。实际上，社会党当时希望提出对内阁不信任案，但为了保持在野党的团结一致，三木建议提出‘解散议会决议案’为好，大家同意三木的建议。而且，对三木武夫本人，我早就有期待和好感。战争时期，我们都是年轻议员，常在国会食堂一起吃饭，三木君给人的印象最突出，他有一种与年纪不相称的庄重感，显得沉着冷静。当时就觉得一定会有远大前途。在这次联合中，一定让三木君也参加。至于坚决反对石桥留任藏相的理由是，当时革新阵营坚决反对的停止支付战时公债利息等都是在‘石桥财政’的名义下进行的，社会党由于很早就表示坚决反对石桥财政，因此无论如何也要反对他留任藏相。当时在自由党内，最强烈主张与社会党联合的就是石桥先生，但现在却要他坚决回避，看起来有些奇怪，但是迫于当时形势不得不这样作。吉田先生还要求我一定入阁。考虑到党内情况复杂，我还必须作党内的的工作，觉得入阁不适合，于是就婉言拒绝了。这天的会谈，是所有会谈中最有成果的。我也是抱着这次也许能真正建立联合政权的希望和吉田道别的。”

1月14日日本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听取西尾末广关于与吉田首相秘密会谈经过的报告，并正式讨论了建立联合政权问题。中央执委会讨论后得出的结论是：“为了就政府动向问题求得明朗的解决，我们党决定以书记长为中心收集情况，用民

主的方法，在党的机关进行适当的讨论和研究。”

中央执委会授权西尾书记长后，他在第二天(1月15日)夜12时左右，避开新闻记者的耳目，在平野力的陪同下去迎宾馆外相官邸访问吉田首相。

《西尾末广的政治备忘录》这样写道：“吉田首相见到我们就说，赞成把商工、劳动、建设、不管部部长分配给社会党，但是石桥去职和协同、国民两党入阁有困难。

“这样我方提出的条件完全垮台。我极力说明这样难以统一党内，希望他重新考虑。但是很难谈出结果。这时，吉田突然说：‘西尾君，实际上出现了困难情况……’。吉田接着说：‘情况是这样，当向盟军总部提出入阁人员名单并要求批准时，由于前些天在对日理事会上，苏联代表德勒维扬科发言说，西尾末广、松冈驹吉、平野力三、田原春次、加藤镰造等五人应该整肃。对此盟军总部也难以忽视，这样联合问题不得不暂时拖延一下……’。

“我一下子感到很不愉快，有点绝望似地问道：‘那么计划从一开始不就是落空的吗？’站在首相身旁的福田笃泰秘书官赶忙说：‘西尾先生，不是这样。首相虽然那么说了，关于阁僚资格问题，只要首相向麦克阿瑟元帅提出还可以找到解决办法，不管怎样，联合工作的谈判还要进行……’。

“这时首相也说：‘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在手续问题上没有搞好，实在对不起。西尾君，我可做介绍，你能否去见见元帅？元帅近二、三个月来，对你的情况进行了各种研究，说西尾是关键人物，他很了解你的情况’。

“但是，当联合问题遇到困难时，吉田突然提出资格问题，对这种态度，我有直感性的怀疑。如果从开始就了解资格问题，今晚就没有必要特意来见吉田，见到后也应开始就讲这种情况，正当谈判不顺利时，他突然提出阁僚资格问题，这一着不行之后，现在又提出见麦克阿瑟元帅问题，我感到这可能是吉田之流的外交

手腕。于是明确回答说：‘不必这样。今后我会请你介绍去见元帅的，但是，象你所说的那样，在我的资格被怀疑时，去见麦克阿瑟元帅，这是我的自尊心所不允许的’。”

这样，第一次联合内阁的活动，经过几次会谈，用西尾末广的话来说就是“烟消云散了”。当西尾末广准备告辞时，平野力和福田笃泰相继离席，装作去厕所的样子，悄悄地进行了协商。平野力回来后说：“西尾君，吉田提出的资格问题虽是那么说，只要入阁，资格问题反而会由此得以解决，请不要介意，还是照样协商联合问题吧！”对此，西尾回答说：“但是，平野君，我不能不深深感到吉田是把资格问题作为交易的筹码，我是不愉快的。如果问题不解决，即使入阁，整年要被吉田压着脑袋，在内阁里也不能与自由党进行对等交涉！”

确实象西尾末广所说的那样，在整肃公职的资格问题上，可以说是占领政治最黑暗的部分。特别是应否整肃公职全由占领当局主观判断，正如福田笃泰秘书官所说的那样，只要吉田首相向麦克阿瑟元帅说情，就可以得到帮助。以至有些被整肃的人对吉田首相产生了怨恨，“责怪吉田为什么不多替他说好话！”象平野力三这种人，当被整肃的可能性相当大时，为了逃避整肃，暗中顽强地推进建立联合政权活动。西尾末广对他产生这种怀疑并不奇怪。

1月29日“二·一总罢工”危机到了最后关头，吉田茂又对社会党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这时西尾书记长不参加谈判了，由吉田、币原、片山三位党首会谈来协商。吉田首相提出的阁僚分配方案是：

自由党——首相兼外相，内务，大藏，运输。

进步党——邮政，厚生，不管部两名。

社会党——劳动，建设，商工，不管部一名。

中立——经济安定本部，农林，司法，文部。



上述方案，以石桥藏相留任为前提，与第一次联合谈判的最后阶段吉田首相向西尾书记长提出的方案一样。社会党中央执委会在当晚进行了讨论并全体一致决定拒绝该方案。

《西尾末广政治备忘录》对此用自问自答方式作了说明，“第二次谈判联合的活动，明显地暴露出吉田首相的估计错误和无知。”人们会问：“吉田这种人，为什么会这样错误地估计形势呢？现在回想起来，这仍然与平野君的暗中活动有很大关系。恐怕是平野君，通过平野-福田渠道，向吉田先生吹风说，即使石桥留任藏相，社会党也能接受……。主要是吉田先生过于相信平野君而丧失了威信，第二次活动也悲惨地失败了。”

## 二十二

当吉田茂对社会党的工作遭到挫折时，正是将要举行所谓“二·一罢工”的前夕。当时形势动荡，人心不安，但吉田首相却显得格外沉着。这也许是由于天生的气度吧。从他在1947年元旦演说中指责“不逞之徒”一事可以看出，吉田茂相信企图搞总罢工的是共产党这些“不逞之徒”，并估计在情况严重时，占领军会出面镇压。信夫清三郎教授所著《战后日本政治史》第二卷作了这样的说明：“担任中央劳动委员会中立方面委员的东京产业大学（后为一桥大学）教授中山伊知郎得到情报说，吉田首相大概在1月10日前后会见麦克阿瑟或盟军总部某人时，得到了保证，如果出现总罢工，盟军总部将进行镇压。后来从中山那里听到这个情报的大藏省工资局长今井一男回忆说，怪不得，吉田首相而且只有他一人，由于心中有数，在内阁会议上显得非常镇静。吉田本人从盟军总部首脑那里，特别是通过与军人接触，了解到他们早已下决心镇压罢工。吉田虽然认为，工人运动的攻势不好对付，但是他确信，到了危险的时候，盟军总部会动用占领军的武力进行压制。”

“不逞之徒”这句话，并不是由于不小心讲的过头话，而是经过慎重考虑后的用语。这从中央劳动委员会代会长末弘严太郎到外相官邸访问吉田首相时的对话也可清楚。

“你把工人运动的领导人说成‘不逞之徒’，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非常伤害工会的感情，你是否可以撤销这句话。”

吉田茂毫不在乎地回答说：“这句话是我亲自加的，也是我自己写的。那是指共产党人的事，加的地方也许不适当，请不要介意。”

全官公厅工会共斗委员会1947年1月18日正式宣布要进行二·一总罢工，规定2月1日午夜零时进入无限期总罢工状态。

该共斗委员会，是在去年由日本国营铁路工会、全国邮政工会、日本教职员工会、全国政府机关公共企业职工工会协议会、全国公共企业联合会等五个工会组成的。议长是国铁的伊井弥四郎，下面设立由国铁、全递、全教组、全官公劳协、全公连的委员长组成的共斗委员会。吉田茂在《十年回忆》第二卷这样写道：“在这以前，邮电事业、国有铁路等工会也曾断续地发动工潮，但是把全国官厅和国营企业纠合在一起的260万人的罢工计划，却是空前未有的。与其说是空前未有，莫如说这次罢工如果实现，则由于粮食、煤炭以及重要物资等的断绝运输而产生的混乱，必然使本来就苦于物资缺乏的国民大众，陷于无可挽救的困穷境地。我们决不能相信这个罢工计划是为了达到它的领导者们当时所宣称的那种美好的目的，而只能看作是阴谋扰乱社会的共产主义者的有计划的政治行动。大家都知道，这次罢工由于盟军统帅发布了禁止命令才被制止，而没有闹出事来。不过，我很想知道，罢工的领导者们抚今追昔究竟有什么感想。”

把“二·一总罢工”认为是吉田茂所说的“共产主义者有计划的政治行动”是否合适？对此中劳委的中山伊知郎、桂皋两位委员有不同看法，贺来才二郎干事的回答值得注意，“即使是自发性工

潮,如果深入分析一下,任何工会内都有核心在起作用。例如,电产工会,当时的委员长是佐佐木良作,副委员长是入江君,书记长是佐藤君。但是佐佐木君到今天仍然不是共产党,可是作为整体看,就有些奇怪了。当退职金问题等进入最终解决阶段时,结果成为关键人物的是佐藤君和入江君。东芝委员长石川君是在前台的温和人物,但是最后成为核心的是渡边三知夫君。这样,一个个工会分析起来,确实有自发性一面,但是在各个关键岗位都有核心人物。当时国铁委员长是斋藤君,从整体看是非常温和的工会,但是副委员长有铃木市藏君,伊井弥四郎也是地方委员。松田先生死后,就后任委员问题,我与末弘先生谈了,请他提名斋藤君,他也表示同意。但是在后来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上伊井君当选了,即铃木市藏君和伊井君是国铁的核心。从这里可以看出,各工会都有这种共同的核心人物。这与二·一总罢工关系非常密切。”

这段话具体地描写了共产党的赤色传动带使当时主要工会共同活动的情况。有关“二·一总罢工”的争议和麦克阿瑟元帅发出禁令的经过,当时负责与盟军总部经济·科学局长马贵特少将进行交涉的中央停战事务联络部次长渡边武,在其所著的《占领下的日本财政备忘录》中说:“1947年1月22日,我和石桥湛山、膳桂之助、河合良成三位大臣一起会见了马贵特少将。我方还有白洲次郎、朝海浩一郎、石黑四郎、千叶皓等人,对方在座的有柯恩。会见时,当河合报告全官厅工会罢工情报时,马贵特少将说:‘最高司令官对此非常关心,要坚决采取对策,避免2月1日的总罢工,我决定在今天会见工人代表。日本政府准备让步到什么程度?’

“对此,石桥藏相回答说:一、关于提高工资问题,准备承认暂定月工资总额为6亿5千万日元(1月以后对官吏每人支付150日元和工资的25%);二、撤销工资只能付给500新日元的限制;三、所得税目前正在审议修改方案,届时要充分予以考虑。马贵特少将同意一、和三、两点,主张把500日元的限制扩大为700日元,要求在

明天早晨见报。石桥说，这样能否避免罢工仍不清楚。因此，政府声明中，可否写上，如果这样仍得不到解决而出现违法行动时，要采取坚决手段。马贵特少将说：‘无此必要。激怒工人并不是良策。倒不如戏剧性地宣布要依靠国民的善意来回避经济危机更好。’大家同意后，就离开那里了。我下午在首相官邸协助起草要发表的文件，晚上由书记官长发表了政府声明。另一方面，石桥藏相向工人代表提出了解决方案，伊井(弥四郎)共斗会议议长对此表示不满。

“23日我去总司令部会见芦卡温特、柯恩以及茹地伊三人，向他们报告了要发表的政府声明内容，柯恩说：‘在政府会见工会代表以前，就在报上公布，从手续上讲很不好。这不是协商而是恩赐，将激怒工人。’

“这天下午，又去访问柯恩，想了解前一天工会方面与总司令部方面会谈的内容，遭到拒绝说，由于双方约定不告诉日本政府，因此不能公开。他还指责说：‘日本政府对人与人的关系考虑不周。即使少数人态度顽固，也应该努力启发多数国民发挥良知。胁迫办法对解决所有纠纷，都是下策。特别是政府，不要仅仅宣布采取某种措施之类的，应充分说明它与国民有什么利害关系，为什么不得不这样做，应该更谦虚地向国民呼吁’。”

这里要交待一下，柯恩是盟军总部经济·科学局的劳动课长，是一位非常进步的文官。据当时的中央劳动委员会干事贺来才二郎说，“当时柯恩甚至鼓励共斗委员会‘要坚持下去’。”他与共产党的德田球一总书记关系密切。贺来才二郎还说过：

“德田每天都笑眯眯地到盟军总部来上班。当时共产党不是明确提出‘占领军是解放军’吗？当时不是冷战的年代，德田的话甚至可以说在盟军总部内畅通无阻。德田先生也信任占领军，在‘二·一总罢工’时，有人向德田报告说：‘第八军军长艾克耳伯格(美国陆军中将)正在加紧集结军队，可能要进行镇压’，德田却

说：‘这是毫无根据的，那是为了在我们共产党搞政变时来进行保护的’。”

盟军总部的军队首脑已经决定镇压总罢工，但是好象柯恩课长还不知道。渡边武著的《占领下的日本财政备忘录》有关部分说：“1月28日下午在首相官邸，政府与工会代表会见时，我也在场。把有关情况报告总司令部后，那天夜里，中劳委提出了裁定方案。第二天(29日)，应邀去大臣官邸，讨论对昨晚的裁定方案，平均工资为1,200日元，最低工资为650日元，支付过年费，争取2月底撤销500日元的限制，提出劳动所得税的具体方案等内容。

“1月30日这天气氛非常紧张，从早晨起就在首相官邸召开了治安阁僚昼谈会，我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研究了宣布罢工时维持治安的方针。接着我与币原喜重郎、大村清一等大臣就发表政府文告问题进行了磋商。下午，在大藏省召开了现场大会，决定了政府如果接受中劳委的方案，就可以避免总罢工的方针。这时有情报传出盟军总部的昆斯丹金召见工会代表，要求停止总罢工，如果违反就要逮捕。

“这天晚饭后，我被石桥藏相叫到了首相官邸。石桥、一松(定吉)、河合等大臣正在会见中劳委。他们之间争论激烈。松冈驹吉甚至叹息工人没有领袖。最后，政府决定按中劳委的意见，拟定了月平均收入为1,200日元目标的方案。

“中劳委用该案与共斗委员会方面进行交涉，有关大臣在官邸等待回答，到了夜晚12时仍然没有回答。凌晨2时，由于十分疲劳，我先回家了。后来听说，德田球一出现在官邸，自称带来了扩大的共斗委员会的结论意见并豪迈地宣布：‘虽然还有些不同看法，我认为今天总部提出的方案不是麦克阿瑟元帅的意见。如果是麦帅的想法，为了我们工人运动的自由，为了我们民族，也要坚决斗争，坚决进行总罢工。’大臣们听后认为，这样已无等待的必要了，于是都离开了官邸。后来又有工会代表来到官邸，看

到大臣们不在，便指责政府没有诚意。

“这样，通过谈判已无可能回避‘二·一总罢工’了。1月31日，极度紧张。当天下午，麦克阿瑟元帅，根据盟军最高司令官的权限，向工会领导人发出禁止‘二·一总罢工’的指令。共斗委员会认为对这个指令除了服从之外没有其它办法。当晚，伊井弥四郎议长声泪俱下，用戏剧性的语气发表了停止总罢工的广播。”

麦克阿瑟元帅的“在日本目前贫困和衰弱的情况下，决不允许使用如此致命的社会武器”的声明，无疑获得了绝大多数日本国民的支持。

## 二十三

1月31日麦克阿瑟元帅发布禁止“二·一总罢工”命令之时，中国国民党政权与共产党军队之间的内战扩大到了华北一带。六天后，麦克阿瑟致函吉田首相，指示举行大选，信件如下：

“内阁首相阁下：

我相信举行大选的时间到来了。自从一年前的旧宪法下最后一次大选以来，日本的内部机构、经济发展以及国民生活的结构和形态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于日本社会当前面临的各项基本问题，有必要在最近的将来促使日本国民再次民主地表明意志。这样可以使现在统治该国的民主进程更加向前发展。关于选举过程和细节，我委托日本政府研究决定。我希望选举在本届议会结束后尽早举行，新的立法机构在时间上应与新宪法生效一致。过去一年取得了很大成果。我对将来也抱有同样信念。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1947年2月6日”

对此，吉田茂2月10日复函元帅，表示听从上述建议说：“事实上，阁下指示实施大选问题，对于日本政府、国民来说，都是在新宪法下走向新生应当迈出的一步。阁下可以相信，为保证自由

表现人民意志而尽早举行选举的必要准备工作不久即可完成。”

“二·一总罢工”由于麦克阿瑟元帅下令禁止而得以避免。但是，1月底吉田内阁又面临另一场危机。1月17日石桥藏相的《湛山日记》这样记载，“10时举行了内阁会议，讨论了官公厅职员薪金的问题。下午2时举行了临时内阁会议，公布了吉田首相和社会党建立联合内阁活动失败的经过。这虽然从开始即已预料到的，但办得不漂亮。”接着1月23日的日记记了河合良成厚生相和膳桂之助经济安定本部长官提出辞职的问题，并协商了该问题。前些日子他们两位和石桥藏相一起和经济·科学局长马贵特讨论总罢工问题时，对于工会方面提出的要求的看法不同可能是导致辞职的原因。在1月28日的日记中，值得特别注目的是，石桥藏相写道：“阁僚们对于政局非常不满，充满了对吉田首相的不信任气氛。”

去年5月22日自由党与进步党联合组成第一届吉田内阁以来，借用石桥藏相的说法，就是到年底为止，双方“很融洽”，但是从和社会党开始讨论联合活动时起，不协调气氛，日益明显。吉田首相认为，为了对付工会的攻势，只有与社会党建立联合政权才是出路。但是通过福田笃泰秘书官等进行的活动很不顺利，内阁中产生隔阂。大野伴睦干事长等党派人士不满“秘书官政治”的动向也不可忽视。

在与社会党建立联合政权的活动中，吉田茂亲自和右派的西尾末广、平野力进行谈判，对左派的工作交由农林大臣和田去进行。因此在1月30日的内阁会议上，吉田首相公布和社会党的第二次谈判联合政权活动破裂时，和田农相即提出辞职，并发言说，应该内阁总辞职。这样，改组内阁就不可避免了。1月31日改组内阁，除农相和田外，内相大村清一、文相田中耕太郎以及平冢常次郎都辞了职，商工相星岛二郎改任无任新国务大臣，高桥诚一郎任新文相，新商工相为石井光次郎，新任运输相为增田甲子。农林大臣由吉田首相兼任到2月15日任命木村小左卫门为止。石桥藏

相兼任了经济安定本部长官和物价厅长官，以便将来起用有泽广巳教授。

这次内阁改组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文部大臣人选，前面已经谈过，田中文相由于实行六·三义务教育问题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吉田首相对于新宪法下皇室中的地位问题深有考虑，新文相想选择可信赖的人充任。吉田茂在他外甥武见太郎的建议下，读了福泽谕吉的《帝室论》，了解到只有福泽精神才是支持新生日本君主制的思想基础。选择私立庆应大学的高桥一郎教授担任文相，也是出于这一考虑。第二是提出铁路总局长官佐藤荣作为运输大臣候选人。吉田首相看重佐藤长官出色完成了国铁方面困难的劳务行政的本领，想直接提拔他为运输相，但是由于他是当时还被关押在巢鸭监狱的甲级战犯嫌疑者岸信介的胞弟，未能取得盟军总部的同意，因此只好把他升为次官。在吉田第二次组阁时，起用当时还不是议员的佐藤荣作为内阁官房长官具有上述这种背景。第三是经济安定本部长官的人选也令人感兴趣。前面说过，石桥藏相为了安排有泽广巳教授担任专职长官，亲自兼任了安定本部长官，并向首相承诺，由他亲自动员有泽。有泽教授由于和石桥藏相见解不同，坚决不干。于是吉田首相想起用和田前农相担任经济安定本部长官，并于2月22日把这一想法告诉了石桥藏相。但是根据2月24日的《湛山日记》的记载的情况是：“关于要和田(博雄)出任经济安定本部长官一事，所有阁僚都表示反对。”内阁中对接近社会党派的和田博雄很反感。据《石黑忠笃传》的材料，当时对于石黑忠笃推荐和田博雄出任经济安定长官一事，吉田茂答复如下：“敬启者……。和田君之事，党内颇费周折，现在总算找到了解决线索。

“党内希望他入党，我也曾劝过，党内长者也非常欢迎，但未能得到他本人的同意。该君现对社会党似已不抱希望，心情发生了种种变化，希望老人家再就此点进行劝说。入党之事若蒙允诺，



该案即可解决。恭请再与该君商议，专此奉求。

石黑老台侍史

吉田茂顿首

3月6日”

“又及：上文所说入党之事，请暂时保密，俟适当时机予以公布，只表示入党意愿即可。诚能如此，则所示之事，承诺如上，请予劝说，以合作打开困难局面。”

对于吉田的这封信，石黑忠笃的回信非常严厉。为使和田博雄出任经济安定本部长官，吉田茂认为让他入党以便说服党内长者，这种实用主义态度使刚直的石黑老人非常愤慨。石黑忠笃立即给吉田茂写了言词激烈的信件：

“尊函敬悉，愚者十分失望。确立安全本部，阁下之抱负是新兴日本发展之开端，若能有所成就，对吉田内阁意义重大。今愚者从唯一敬爱的阁下，拜读尊函，竟以庸俗无比之条件，劝诱和田，余深感万事休矣。

“安定本部如以此为条件成立后，又有何价值。阁下本意，原欲排除交易之谈判，但其结果，又不得不容忍交易，阁下之用心良苦，愚亦可谅解，恐系阁下身心衰弱之故，但也不应过分丧失原则。阁下所托之事，难以从命。心中闷郁，多有失敬，希予鉴谅。

吉田首相阁下

石黑忠笃

3月6日夜”

吉田、石黑来往信件表明，当时吉田首相还不能控制党内的旧势力。1948年10月19日解决了“山崎猛事件”，吉田第二次组阁之后，在第二年1月23日的大选中，有了池田勇人、佐藤荣作、增田甲子七等亲信并控制264个议席以后，吉田茂才真正成为“独断专行的首相”。中山伊知郎教授坚决不担任经济安定本部长官一职，3月20日，起用了一桥大学的高濑庄太郎教授。

## 二十四

麦克阿瑟元帅指示吉田首相举行大选的信件是在1947年2月7日收到的。在这之前，石桥藏相和西尾末广社会党书记长之间开始了第三次关于建立联合政权的谈判。这次石桥湛山处于主导地位。《湛山回忆》说，“2月6日我在大藏大臣官舍会见了社会党书记长西尾。虽然对事物的评价有所不同，但想了解社会党究竟有何想法。结果弄清了，鉴于目前的时局，社会党并不拒绝和吉田内阁合作。可是奇怪的是，社会党坚持要我辞掉大藏大臣职务，对此我从报刊上早已知道了，好象吉田首相并没有接受这个条件。

“但是如果问题仅仅取决于这点，我个人何去何从均可。如果我辞掉大藏大臣可以导致自由、进步、社会三党的联合，能够渡过困难时局的话，我随时都想辞职，这点我对西尾君也说过了。

“2月7日，麦克阿瑟元帅致函首相，指令解散议会，在新宪法下举行大选。情况发生明显变化。但是前些天已和西尾君谈过要讨论联合问题，为了进行准备，8日晚在宫内厅的一个房间里，我和吉田茂会面了。我问首相，如果你还愿意搞联合，不管能否谈成，我还想与社会党再谈一次，是否可行？首相说，若有可能，现在更希望搞成。2月9日是星期天，那天晚上我请社会党的西尾末广、水谷长三郎两君来到这里，还有进步党的河合良成，我们四人一起进行了会谈。协商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天凌晨2时，最后谈妥了。

“2月10日晨，与大矶的吉田邸通电话，请他回京，还要求自由党的大野(伴睦)干事长和大久保(留次郎)总务也来大藏大臣官舍，向他们报告了今晨的协定后，取得了他们的同意。上午10时在首相官邸向吉田首相作了报告。那天碰巧进步党由于建立新党问题发生纠纷，自由党内也出现芦田均君要投奔进步党的波动，因此关于与社会党的联合问题，没有充分时间和首相商谈。但是

联合本来是首相所希望的，我也是接受首相指示而进行的，我当然认为首相不会不同意。”

2月12日夜，又在“桂”菜馆举行了石桥、河合、西尾以及水谷的四人会谈，13日上午拟好了关于建立联合内阁的政治协定。内阁构成为：自由党5人（首相兼外相、大藏、内政、厚生、不管部部长），进步党4人（邮政、商工、不管部2人），社会党4人（农林、运输、劳动、不管部），协同民主党及国民党出一人（不管部），无党派5人（司法、文部、不管部3人）。各党的阁僚的分配名额与第一、二两次谈判联合时没有多大差别。决定吉田首相总辞后，再由吉田组织第二次5党联合内阁，这是件非常困难而危险的事。社会党内反对当然可以估计到，就是自由、进步两党内部的抵制，无疑也是巨大的，这项联合活动最后失败了。《湛山回忆》谈了此事经过：“由于这种原因，为了使该协定获得通过，必须在其他方面进行干扰之前，尽快转入实施阶段，于是我们决定采取如下步骤：

“一、13日上午11时，在安定本部总务长官官舍召开自由、进步、社会三党干事长会谈，讨论并通过我们拟定的方案为正式方案。上述会谈除自由党干事长大野外，大久保留次郎、石桥湛山列席；进步党除干事长田中（万逸）外，犬养健、河田良成列席；社会党除西尾干事外，森户辰男，水谷长三郎列席。

“二、三位干事长分别把上述方案带回本党，并立即确定本党态度。

“三、第二次三党干事长会谈定于13日下午5时在安定本部总务官舍召开。

“四、同时召开五党代表会谈，决定所有问题。

“五、14日吉田内阁辞职，同日组织联合内阁。

“13日当方案确定时一切工作均要处理完毕。

“我在13日早晨，在大藏大臣官舍和大野干事长会面，向他谈了上述计划和方案，要求他在11时到安定本部官邸来开会，我

认为，10日已经向首相谈了，这样安排不会出问题。但是到了上午11时，社会、进步两党有关人员准时来到，但是，自由党的大野、大久保两人到了12时还未到场，我到处寻找他们，结果发现他们在首相官邸，当我赶到那里时，见他们正在和首相商谈。我想这大概是我事前向首相和他们报告得不充分，而且他们也尚未亲自研究协定，可能因此而踌躇未来开会。这完全是我的疏忽所致。当时我负责处理‘二·一总罢工’的善后工作，每天与工会谈判，非常忙碌，也没有充分时间和首相谈此事。

“这样，上午的三党干事长会谈的计划搞乱了，到了下午，虽然召开了五党代表会议，正如西尾君所担心的那样，当时已经晚了。社会党沸腾了，召开了议员大会，作出了反对联合的决议，出席五党会议的森户辰男正面反对我们拟定的方案，要我辞去大藏大臣职务，要求停止支付公债利息以及对新日元实行封锁。

“这样西尾、水谷两君从大局着眼所进行的合作宣告破裂，最后不欢而散。”

以石桥藏相和西尾书记长为中心的联合活动为什么会在最后时刻遭受挫折呢？上面引用的《湛山回忆》曾进行两次检讨，是由于和吉田首相事前联系不够，暗示了失败的真相。吉田首相确实委托石桥藏相进行和社会党的联合工作，但是由于石桥藏相十分忙乱，未能不断地和吉田首相协商，对吉田首相来说，石桥藏相似乎是自作主张。

对于这点《西尾末广政治备忘录》揭开了联合工作失败之谜。20年后，当西尾去石桥邸访问时，石桥对西尾说：“13日那天上午11时，由于大野和大久保没有到场，我去首相官邸看到，吉田和大野、大久保等三人正在商谈，见到我后吉田就说，停止谈判联合的活动吧。吉田好象是接受了古岛一雄等人的意见，突然改变了想法。我总觉得对不起你们，但也没有办法。”

西尾结论似地说：“尽管石桥先生在联系方面多少有些疏忽之

处，主要原因是吉田独断专行，他一方面事先把谈判的全权交给了你，但在关键时刻态度突变，这似乎是事情的真相。”

1947年2月14日下午4时，自由党、进步党、社会党、协同民主党以及国民党的五党干事长发表的共同声明，宣布第三次谈判联合工作失败。声明中虽然也表示“今后仍希望政治生活尽可能顺利发展”，但是不久在众议院选举中，围绕修改选举法问题，出现了混乱局面。

## 二十五

2月14日发表共同声明后，政局迅速向大选的方向发展。吉田首相说服麦克阿瑟元帅在这次众议院选举中，有关禁止担任地方公职的规定特别予以暂缓执行。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吉田茂一定要在第九十二届帝国会议期间修改选举法。

币原内阁时期根据盟军总部指令所制定的众议院议员选举法，把有选举权的年龄从25岁放宽到20岁，并实施了男女同权，在这方面有很大的进步。但却采取了一府县一区的大选举区制，正如植原悦二郎所著《日本民权发展史》第四卷所指出的，实行限制连记制是“违反常识”的。在1946年4月的大选中，信夫清三郎也说，“有不少人在选票上把水火不相容的鸠山一郎和野坂参三并列写在一起。由于社会党的加藤下枝和防止饥饿同盟的松谷天光都是女的，也就把她们写在一起了。”

吉田首相虽然相信，为防止共产党的发展，采用小选区制最好，但是认为作为第二对策，中选区制亦可。在1月31日内阁改组后出任内务大臣的植原悦二郎2月1日会见记者时，主张采用中选区单记制。信夫清三郎的《战后日本政治史》第二卷写道：“他大概是12日去见民政局长惠特尼时，强调了采取中选制的必要性。他呼吁说，上次大选中，共产党人所以能大量当选，就是由于采取大选举区限制连记制的结果，如果这次大选仍采取这种制

度，共产党人也许要有几十名当选。惠特尼反驳说，‘大选举区制，只实行了一次，难以判断好坏。’否定了植原的主张。

“如何对付共产党是吉田内阁迎接大选的紧急课题。吉田政府与民政局说不通，只有直接向麦克阿瑟呼吁，于是吉田首相亲自跑到麦克阿瑟那里。麦克阿瑟自从亲自下令禁止“二·一总罢工”后，对共产党可能产生了新的憎恨，他同意吉田首相的要求，决定采取中选举区制。

“吉田首相在麦克阿瑟同意后，指示植原内相向议会提出内容为采用中选举区单记制的修改选举法案。但是，植原内相建议修改方案不要由政府提出，而用议员提案方式提出为好。其理由是，如果把内相向盟军总部提出而遭到拒绝的方案，再用对方改变了看法的形式提出不好。政府可以对此佯装不知，表面上作出服从惠特尼关于继续采取大选举区制主张的样子，然后再以议员提案的方式，把已获麦克阿瑟同意的中选举区方案向议会提出，并使其获得通过，以这种迂回方式来否定惠特尼的主张。吉田首相同意了植原内相的这一建议。”

众议院审议选举法修改方案时遇到很大困难。不仅共产党反对，就是社会党、国民协同党(3月18日协同民主党和国民党等合并了)也都激烈抵制自由党和进步党提出的中选举区制。特别是社会党，提出了大选区单记转移制的修正案，企图延长审议时间。3月25日晚，以自由党的山村新治郎议员突然提出结束审议为契机，发生一场扭打，政府和执政党在混乱中决定把会期延长4天(到27日为止)，30日众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中选举区制，31日贵族院通过后，该法案正式生效。

同一天(3月31日)解散众议院，决定4月25日举行大选。以进步党为主体，还有一部分从自由党和国民协同党分裂出来的人，对选举感到不安，在“修正资本主义”的口号下，标榜“比自由党左，比社会党右”组成了民主党，5月18日(距大选只有三周多的时间)

选举芦田均为总裁，币原喜重郎为名誉总裁。这表明在新党中倾向与吉田结合的保守联合派失势，企图通过与社会党联合寻找出路的芦田均派占了统治地位。

同年3月12日，杜鲁门总统在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宣布了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扩张的所谓杜鲁门主义，同时吉田茂也面临着政治生命的转折点。根据5月3日生效的新宪法的规定，内阁首相由国会议员中任命，因此吉田茂不能不出马竞选议员，但是从哪个选区竞选却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十年回忆》是这样写的：“在上述4月大选时，我有生以来初次做了众议院议员的候选人。我在意外地做了自由党的总裁以前，关于我自己的竞选问题连想都不曾想过，可是既然置身政党，就必须出任国会议员，而且我又是首相，在法律上应该在国会中占有议席。于是我从哪里出马竞选，便成了问题。

“高知这个地方和我的渊源是，自生父竹内纲首先被选为国会议员以来，胞兄明太郎和姊丈白石直治也相继在此当选。我如果选择选区，当然也不得不以高知为目标。当我决定从高知出马以后，有一天，神奈川县藤泽市的羽鸟有个名叫三觜的人来访，要我从该县出马。他恳切地说，‘神奈川县是从中岛县知事以来和自由党有渊源的地方，所以请你不必到遥远的高知去，从藤泽市附近出马比较相宜，至于活动，一切由我承担。’

“我年幼的时候，曾就学于上述羽鸟的小笠东阳先生的汉学塾。偶因同乡先辈中岛信行氏的幼子就学于该塾，我在11岁的时候便被送进了这个学塾，寄居在当地世家三觜家。这已经是几十年前的往事了。三觜家的后代听说我要竞选，便这样来访问我了。”

于是，吉田茂也为之动心，打算从神奈川县出马。当我和当时的众议院议长山崎商量这崎件事的时候，山崎说：“第一次可能当选，第二次以后一定要落选。你对选区的应酬大概不怎么周

到，选区居民来访问你的时候，你也不是尽可能地接见他们，这样的话，你的人缘很难保持到第二次以后。如果是高知县，第一因为路远，即使你不常常到选区去，他们也不会有多大意见。其次，那里选民也不会常到东京来，即使他们到东京来，林让治等也会招待他们。所以你对他们的简慢也不至于太显著。这样看来，还是到高知合适。”吉田认为言之有理，遂决定从高知县出马竞选。

当时还不能利用飞机，从东京到高知并非容易。吉田先从东京到了大阪，在那里换乘去宇野的火车，在开车之前，和跑来问候的西尾末广交谈了20分钟，从吉田对他讲“今后还请多照顾”等话来看，好象吉田已经准备好选举胜利后继续执政似的。从宇野到高松乘轮船渡过濑户内海，再从高松乘土赞线去高知。

吉田茂的演说，人们都认为很不高明，他特别不习惯向选民鞠躬求援。吉田茂的选举全由亲戚林让治等战前政党人一手操办。有人甚至向他建议：“不管是电线杆子还是别的什么东西，都要鞠躬。”这当然是过分的要求。但是吉田生来就有的幽默感有时也能得到意外的收获。在吉田到达之后，高知县知事西村直巳立即在县府前面的广场召开了“欢迎吉田首相大会”，并致词说：“今天我们迎接的不是候选人吉田先生，而是首相。”对此吉田茂接过来就说：“实际上我是回高知选区来的，并且还想对现在这么多的群众发表竞选演说的。由于刚才西村君说了，所以我也就不讲了……”这一席话博得热烈喝彩。站在吉田女婿麻生太贺吉旁边的社会党人佐竹晴笑着说：“这难道不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选举运动吗？！”

吉田茂在高知县停留3天，发表了5次或6次演说。有过这样场面：在他生父竹内纲创建的工业学校毕业生集会上，吉田首相大概是弄错了对象，他把毕业生当成了在校学生，号召他们“加紧学习”，这曾使在场的有关人员极为慌张。吉田茂在高知市内街头发表简短演说时，有人奚落说：“你还是脱掉大衣吧！”对此吉田



巧妙地回答说：“这是街头演说”<sup>①</sup>，并博得热烈掌声。从此“街头演说”这句话也就成了一句名言。

---

<sup>①</sup> 日本话“街头”和“外套”发音是一样的，吉田茂把穿着外套讲演说成是街头讲演。——译者

## 第五章 下野时期

### 一

1947年4月，从月初到月底都忙于选举。5日是地方自治体首长选举，20日是第一届参议员选举，25日是众议员选举，30日是地方议会议员选举。

在5日举行的知事选举中，自由、民主两党所推荐的保守系无党派候选人取得了绝对的胜利。在46名当选知事中，官方推荐的知事有28名，从社会上的声望来看，可以说是必然的结果。

市长选举中，在大阪和横滨等大城市，社会党取得胜利，这可以说是例外。在209名当选市长中，社会党人仅有9名。10,210名当选的町村长中，社会党人当选254名，共产党人只有11名。

但是，在30日的地方议会选举中，社会党却夺得了最多的议席。在20日的参议员选举中，也出现了同样情况，社会党取得47席，成为参议院第一党，自由党为39席，民主党为32席。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没有进展，只取得4席。

第一届参议员选举的特点是，无党派当选人共有108人，其中90%是保守系，有58人在5月16日组成了绿风会。

总之，最重要的选举是4月25日的众议员选举。选举的结果是，吉田茂本人在高知县以98,000最高票数当选，但是整个自由党却从选举前的140席减为131席，仍然是第二党。解散前拥有145席的第一党民主党，获得124席，退居为第三党。社会党从解散前的38席跃进为143席，成了众议院第一党。国民协同党从63席

减为31席，议席减少到不足半数，引起人们的注意。共产党从6席跌为4席，可以说是最显著的变化。

共产党的失利和社会党的跃进，是日本国民在1947年4月4日大选中作出的选择。绝大多数选民，从他们本能的直觉认识到，组织“二·一大罢工”这种鲁莽活动的，正是日本共产党。从大选的结果还可以看出，由于生活贫困，要求“革新”的情绪相当强烈。多数选民选择了非共产党乃至反共的革新政党——社会党，并不奇怪。

国际政治的紧张对日本选举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当年4月，恰好是处于美国发表杜鲁门主义(3月12日)和宣布马歇尔计划(6月5日)之间。由于斯大林的苏联不仅把红军占领下的东欧各国一个接一个地自上而下地实行了共产化，还露骨地支持希腊和土耳其的共产势力，美国决心用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遏制共产主义的膨胀。5月4日法国拉马第政府驱逐共产党部长。9天后，意大利加斯佩利内阁总辞职后，5月30日排除共产党人后重新组阁，这些都是美苏冷战对西欧政局产生巨大冲击的佐证。

4月的选举结果表明，被占领下的日本与美苏间的冷战也并非无关。4月27日《朝日新闻》用大字标题报道了麦克阿瑟元帅的声明——“民意排除共产主义，选择了中间道路”。其结论是，“占领初期，数以千计的共产主义者及其同情者，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给了共产主义及其领导人充分的自由和进行政治活动的自由，使其能够与民主力量和思想进行堂堂正正的争论。他们虽然有了充分的机会，但是在行动上却失败了。日本国民绝大多数人选择了极右和极左之间的中间道路。”

吉田茂遭到了出乎预料的失败后，立即下决心把政权交给众议院第一党社会党，自己下野，这是极为困难的决断。但吉田所考虑的是，要利用这一时机，在日本确立由第一党执政的议会民主政治惯例。这不能不认为是他对我国实行宪政政治的巨大贡献，吉田在《十年回忆》第一卷这样写道：“接着，在4月25日举行的大选，

结果是社会党获得143席，成为第一党；自由党仅以10席之差降为第二位；此外，进步党当时已改为民主党（前不久脱离自由党而参加民主党的芦田均和前任进步党总裁币原等人成为该党的领导核心）获得120席，居第三位。革新政党社会党虽居第一位，但远不到半数。当时的形势非常微妙，保守派的两党如果联合起来，肯定可以控制过半数。于是有人议论与民主党合作建立保守派联合内阁，更有甚者，有人主张从民主党内拉出一部分人来组织第一党。但是我决定把政权让给第一位的社会党、从此树立起我国民主政治的规范。

“大选结果揭晓后，当时还健在的古岛一雄翁来到我的官邸，突然要我辞职。我回答说是要辞职的。古岛翁说：‘啊！是这样，那很好。’说罢浮起了会心的微笑，便离开了我的房间。据说他走到大门的时候，突然对记者说：‘吉田要辞职’，说罢扬长而去。我听到以后，心想这才是古岛一雄翁之所以为古岛翁的地方，也不禁为之会心一笑。”

吉田接着又回忆了第一届吉田内阁的政绩说：“旧宪法下的第九十、九十一、九十二这三届议会，通过了许多有关处理战后问题和重建日本的重要立法。”实际上确是如此，除制定新宪法外，还通过了停止支付军需补助，以及与此有关的重建经济整理法、土地改革法、劳动三法<sup>①</sup>、财产税法、参议院选举法、教育基本法、地方自治法、禁止垄断法等法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奠定新日本的基本立法在第一届吉田内阁时已经大体完备。“尤其是1947年5月3日这天，日本国新宪法生效，天皇亲临在皇宫广场举行的纪念盛典，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件事。”在前一天，即5月2日，麦克阿瑟元帅在给吉田茂的信中，向吉田茂传达了在新宪法生效后，日本可以有限度地悬挂国旗。吉田当天就给元帅回信深表谢意，深

<sup>①</sup> 劳动三法是指工会法、劳动关系调整法和劳动标准法。——译者

刻地表现了吉田茂的兴奋心情。

吉田茂不同意在党内盛行的参加联合内阁的主张，坚决采取下野的行动，这说明他对议会政治的观点。《十年回忆》第一卷这样记述了吉田茂的政治哲学思想：“自由党既然败给社会党，我便决心不采纳党内一部分人所主张的联合或分化等办法，干脆总辞职，把政权交给第一党的社会党，以树立我国民主政治的规范。但是，恰在此时，社会党的片山委员长和西尾书记长一同来访问我。起初，只有片山君一个人走进首相办公室，对我说：‘我想你是不会入阁的，希望你从自由党中推选参加下届社会、民主两党联合内阁的阁僚。’他的理想是成立以社会党党首为首相的各党联合内阁。

“我向他提出问题：‘社会党内所谓左派的想法究竟如何？’片山君没有马上答复，而是把等待在邻室的西尾君叫了过来，叫他来回答。西尾君作了种种说明，结论是‘可以认为是容共’。我回答说：‘那不行！我们一开始就是明确反共的，如果把反共和容共的党派组成联合内阁，那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对社会党也不会有好处。’我们的谈判就此破裂了。

“但是紧接着，根据传闻，听到我们这段谈话的二、三十名自由党的干部，跑到我这里来，展开了面对面的争论，他们说：‘在目前情况下，希望你接受社会党的要求。否则，就这样下野，自由党要垮台的。’我回答说：‘总之，一个政党是应该根据它的政策行动。政策完全不同的政党为了政权而组织联合内阁，就是玷污政党政治。诸位想搞的话，悉听尊便，我是难以奉陪的。党究竟是否象诸位听说的无法维持下去，却是党的重大问题，应该先交众议员大会讨论。究竟是诸位的主张好，还是我的意见正确，由大会决定好啦！’

“于是在第二天召开了自由党众议员大会，我在会上作了演说，陈述了以上意见。没有想到竟博得了鼓掌赞成，这个问题就

这样解决了。因此在5月23日召开的新宪法实施后的第一届国会上，自由党全体议员一致投票选举了社会党的片山为首相，片山内阁于是成立了。”

有人说，吉田茂决定不参加以社会党为主的联合内阁而下野，为他的党在一年零八个月后的大选带来了绝大的胜利，这种说法并不夸张。吉田不计较当前的利益，表现了政治家的远见和领导能力。

吉田茂为什么拒绝参加以社会党为主的联合内阁呢？除了上述那种“反共”与“容共”主张不能联合的“原理”和“原则论”外，感情方面的原因也很重要。他的秘书官福田笃泰这样说过，“吉田首相通过有关联合的谈判，对社会党十分不信任。当他在会谈中刚刚听到西尾和平野所说的‘这点无论如何也不行’或‘可以’之后，下次再谈时，他们又完全推翻，这种情况发生过三次。我夹在中间非常为难。吉田首相不仅顽强，而且情感炽烈，他只要认为哪一个人不行，那人就一钱也不值了。

“对方再三说假话，他就认定这样的党不能信任，并产生了憎恶之感。因此，后来的联合谈判极其冷淡。在片山内阁成立时，自由党没有参加联合内阁，从吉田所说‘再没有比这个党更不能信任的了’的说法看来，那是当然的结论。”吉田茂对社会党的不信任感根深蒂固。

## 二

让我们换个角度，从《西尾末广政治备忘录》再来研究一下从大选到片山内阁成立的历史经过。西尾是社会党内对现实最理解的实力人物。他对社会党在大选中所取得的大跃进感到非常吃惊。投票结束时，他正在由大阪开往东京的火车上，晚9时半到达东京站时，一项意外的消息在等待着他。

“当我走到检票口时，象往常一样，看到了前来迎接的家属

的面孔，准备出站，这时几名记者突然把我包围起来，问道：‘西尾先生，社会党成了众议院第一党了！’‘是真的吗？’我不由自主地反问了一句。‘我也当选了吗？’‘那还用说！当然当选了，而且社会党变为第一党了。’‘你所说的是真话吗？如果是这样，那真了不起。’

“包围我的记者们，当听到‘那真了不起’这句话时发出了一片笑声。他们看到我对社会党成为第一党并没有显露喜悦，反而是一副困惑的面孔，也许更加感到奇怪了……。”

西尾本来预计社会党可能成为第二党，因此对于社会党突然成为第一党感到意外。西尾作为现实的政治家，他知道实施统治是何等困难，他对于第二天早报刊出的片山委员长关于“大选后的后继内阁首脑，应由第一党社会党人担任”的谈话感到困惑。“我的心情正好与此相反，感到压力很重，将承担起严重的责任。这种看法一直在我的头脑中占统治地位，而且总也摆脱不掉。”

4月27日，在《朝日新闻》社主持的政局展望座谈会上，西尾末广对自由党干事长大野伴睦以及其他党干事长说：“从民主程序看，应由第一党社会党来收拾政局。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要由第一党出任首相，应该通过政党间的合作和协商来决定。”

西尾书记长的真意是，“当时我认为，由吉田继续担任首相，组成自由、民主、社会、国协四党的举国一致联合内阁是最明智的政策。”其理由是“即使由社会党出任首脑，如果自由、民主两党反对，马上就会垮台。与其这样，不如让出首相，站在自由、民主两党之间掌握主导权，对于控制政局更为有利。社会党只有在野的经验，在这一过程中可以受到执政的训练，等待时机，再组织我党内阁也为时不晚。”如果真正按西尾书记长的设想进行，社会党的统治能力会扎扎实实地加强，不致在紧接着的大选中遭受失败，战后日本政治史也许会变为另外一种样子。但是，当时社会党面临的形势是，如果犹豫不决，自由、民主两党很有可

能组成保守联合政权。为了避免出现这一情况，5月8日，片山委员长访问吉田首相，向其表明有意出来收拾政局，得到吉田的同意后，9日由社会党召集，举行了四党代表会谈。

出席会谈的共8人：社会党委员长片山和书记长西尾，自由党总裁吉田和干事长大野，民主党最高顾问斋藤隆夫和干事长芦田，国民协同党书记长三木武夫和中央常任委员会会议长冈田势一。会谈一开始，芦田均就记录每个人的发言，吉田茂以其特有的不愉快面孔指责说：“芦田君！今天的会谈很重要，是不是可以不作个人记录？”芦田均回答说：“记笔记是我多年来的习惯……”，他边说边继续记。这是吉田对于芦田均脱离自由党的讨厌心情的具体表露。

这次四党会谈决定了“以社会党为中心，组织四党联合内阁”大纲。

5月12日，又举行了西尾、大野、芦田、三木四党干事长会谈，决定阁僚的分配方案为：社会、自由、民主三党各5名、国协党1名。但是达成政策协议并不容易。西尾末广回忆当时的困难情况说：“这毕竟是资本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政策协定，犹如水火相遇一样。如果社会党色彩增强，两保守党就会认为不能进行合作，甚至会以此为借口推翻联合。如果保守色彩很浓，则难以说服社会党内部。如何使两者协调？如何制定一种任何政党都无意见、而且既革新又现实的政策呢？”

西尾书记长为此十分苦恼。13日晚上整夜不能入睡……在朦胧中突然惊醒，政策协定草案豁然出现于脑海，所得到的启示是，选举前的3月22日，麦克阿瑟元帅曾致函吉田首相，提醒注意“目前的经济危机”。吉田首相对此作出了答复。西尾想到，“如果以麦克阿瑟司令官的信件为中心拟定政策方案，任何人都无法提出反对意见，于是得出了就这么办的想法。”

麦克阿瑟的信件是1947年3月22日写给吉田首相的，内容是



重新提醒注意两年前的第三号指令，并说明盟国没有义务维持日本特定的生活水平，强调日本政府应自己摆脱经济危机。吉田首相相对这封态度强硬的信件，在3月28日回信中列举了准备采取的6项措施，相当具体地表明了日本政府克服危机的决心。

西尾末广注意到了麦克阿瑟 - 吉田茂之间的这封信，说明他的政治感觉很敏锐。以摆脱经济危机为目标，那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观点对立也就不突出了。西尾书记长要求森户政调会长，以麦克阿瑟信件为基础，拟定包括9项内容的政策协定草案，并迅速取得各党的原则同意。但是在5月16日四党干事长会谈讨论制定具体政策协定阶段时，自由党干事长大野提出，“早在谈判政策协定之初，我们就曾要求不应让社会党左派接触机密的问题，但是现在仍未得到答复，这个问题应如何解决？”

大野伴睦在5月12日四党干事长开始会谈时，确实明确提出过“吉田首相认为，经过国民的选举判断，社会党成为第一党，要充分尊重这一事实，同意建立社会党政权。至于组织举国一致内阁问题，由于社会党有人会把当天内阁会议的机密，第二天就通报给莫斯科，因此，我党不能进行合作。如果社会党一定要搞联合政权，那么就必须清除左派容共分子，这样，社会党议席会减少，自由党仍然承认社会党为第一党。”

要求西尾就此表态。由于自由党不断重复这一要求，曾使西尾极为被动。西尾表示：“对于保护内阁机密问题，由我本人负责。请谅解，同时表示，不久社会党中央执委会要进行改选，届时左派一个也不让当选，但是在这之前，请等待。”大野干事长对西尾的解释表示拒绝。谈判破裂后分别时，西尾小声地对大野说：“今晚我们再密谈一次吧！”

《大野伴睦回忆录》对这次秘密会谈有过栩栩如生的描述，“那天夜里，我回到家里已经10点多了。等候在这里的新闻记者七嘴八舌地向我提问说：‘大野先生！会谈的结果如何？’我回答说：‘会

谈破裂了。我党决心采取在野方针，与社会党相互监督。’接着又向记者说：‘几天来的会谈使我精疲力竭，今晚准备早点休息。’汽车进入库房后，告诉家人关灯上门。当时针指到12时，我先让练习生看一下门口是否还有人影，然后汽车又从车库开出来。我对家人说：‘要去木挽町的饭馆见人，也许明早才能回来’，于是到了约好的饭馆。西尾、平野力三、水谷长三郎等早已等在那里了。”

西尾书记长首先说：“大野先生，我将成为片山先生的总管，担任国务大臣内阁书记长。你担任内务大臣如何？建立联合政权后，内阁工作固然困难，但如果你我步调一致，可以干得顺利。希望一定能够得到你的合作。”

大野干事长回答说：“你的心情，我是了解的。但是我本人从来就不想当大臣。我的话可能有些失礼，我从来就没想过要领取片山内阁的俸禄。作为党的条件是，对我所提出的问题，如果不明确答复，就不能合作。”俩人之间的对话一直持续到天亮，但最后仍然谈不拢。“西尾君，我实在太困了，请让我回去吧！”可是西尾还坚持说：“可能有些絮叨，能否让我再见一次吉田首相！”

### 三

在大野伴睦的安排下，这天上午10时西尾书记长去首相官邸会见了吉田首相。当时在座的大野归纳了这次会谈的要点：“西尾对吉田说，‘昨晚已向大野干事长提出了，这次无论如何也要建立举国一致的内阁。如果可能，请吉田首相改任片山内阁外务大臣，如果做不到，那也没有办法，把它作为一个请求吧！’吉田首相当即回答说：‘西尾君，早在今年正月我就考虑过建立举国一致的内阁，也曾向你们提出要求，请社会党一定入阁。当时有人说过卑躬曲节的要求之类的话，现在谨把这句话奉还给你们。’吉田态度强硬。当时已有联合内阁即将建立的气氛，但是，吉田首相和我，从开始就下决心要拒绝。

“由于当时拒绝了西尾的要求，才有后来自由党的发展。这件事今天几乎完全被人遗忘了。如果我本人也是大臣迷的话，那时也许就建立了举国一致的内阁，而且我还会捞到自己所愿意当的大臣的职位……。”

这里多少有些自我吹嘘的成分。但是毫无疑问，大野干事长和吉田首相一起，坚决拒绝西尾书记长强烈要求自由党参加联合内阁一事，确系事实。

5月19日西尾书记长向林官房长官提出，要求举行片山—吉田会谈。当天下午一时，片山委员长、西尾书记长和吉田首相、大野干事长在官邸会谈。吉田提出：“政府首脑应由第一党社会党的片山先生担任，但是自由党难以支持有社会党左派入阁的联合政权。”西尾反驳说：“有关阁僚分配方案，可以协商，但是绝不能同意干涉其他党内的人事问题。”由于第二天就要召开决定首相人选的特别国会（第一届），西尾书记长终于认识到，必须放弃四党联合的念头，排除自由党，实现其他三党的联合。

在1947年5月21日召开的特别国会上，社会党的松冈驹吉当选为议长。同一天，吉田总裁在自由党议员秘密会议上说：“从自由党来讲，党的反共态度是不能改变的。这点从开始谈判联合时就坚持。社会党主张此问题留待以后解决，最后该问题终于表面化了。对片山内阁的出现，要尽量抱有好感，如果接受反共主张，我们可以入阁，但态度上却不能表现为干涉他党内部事务。而且即使建立了联合内阁，也不能同因不满我党主张而离党、后来仍在拉拢我党党员的以芦田均总裁为首的一部分民主党人，在感情上实行和解。

“三派性质各异，不可想象他们之间能够实行强有力的合作。因此可以考虑自由党要处于在野地位，而且从心情上讲，也应该在野。”

由于西尾书记长的努力，在5月23日下午7时召开的众议院全

体会议上，片山委员长当选为首相。总票数为426票，除6张无效票外，片山获得众议院的一致同意。自由党吉田茂总裁履行了协助选举片山为首相的承诺。当时由于其他阁僚均未定，只好片山首相一人去皇宫接受天皇的任命仪式。这样片山内阁组成，吉田茂下野。29日社会党议员大会一致决议与除自由党外的三党实行联合，第二天，民主党也采取了同样的方针。

6月1日，总算建立起社会、民主、国民协同三党的联合内阁。民主党除芦田均任外相外，入阁者还有木村小左卫门(内相)、矢野庄太郎(藏相)、一松定吉(厚相)、苔米地义三(运输相)、斋藤隆夫和平林马(均为国务相)。社会党除片山首相外，还有森户表男(文相)、铃木义男(法相)、水谷长三郎(商工相)、平野力三(农相)、米洼满亮(国务相)、西尾末广(国务相、官房长官)。国民协同党书记长三木武夫任邮政相，中央常任委员笹森顺造任国务相。三党的大臣分配比例为：社会党7、民主党7、国协党2。如果把国务相、经济安定本部长官和田博雄也算作社会党的话，那么社会党大臣有8人。

回顾从大选到组成三党联合内阁的五周经过，可以看出吉田茂的决心：吉田内阁总辞职后即行下野，把政局的主导权交给第一党社会党掌握，他对这点毫不动摇。问题在于，如何引导党内要求与民主党建立联合内阁以及要求建立四党举国一致的内阁的这些势力。为了使片山成为首相，吉田茂参加了四党党首会谈，并赞成搞政策协定。但是为了贯彻下野方针，参加上述活动必须有一定界线，作为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是坚决主张不能与容共左派联合。

松冈英夫执笔的《片山内阁》一书，把上述做法称之为吉田茂的“政治技术”。该书写道：“自由党总裁吉田茂，把赞成片山出任首相和自由党不参加联合内阁二者加以严格区别，采取了一方面投票支持片山当首相，同时又不参加其内阁的矛盾行动，这正是复杂

的政治伎俩的运用。在何种场合支持，又以什么理由拒绝参加，都表现了吉田茂的政治技巧。

“吉田表示尊重第一党的地位，让社会党负责担任四党的协调。这就是承认使片山担任首相而积累起来的既成事实，而且还成立了四党政策协定，甚至讨论了阁僚的分配以及人选问题。这时也就到了自由党对组成片山内阁的合作限度。下一步就是按原定计划，机敏地脱身。其借口就是要求社会党‘肃清左派’。这一要求，正如自由党干事长大野伴睦本人所说的，是干涉他党内部事务的横蛮的口实。明知如此，却硬要社会党接受，在社会党拒绝后，即以此作为脱身之计。”

这的确是值得注意的解释。但是，这一解释过高估价了吉田的“政治技术”，却低估了吉田的政治家风度。

“在支持组成片山内阁的同时，又决定不参加该内阁”，这并不矛盾，也不奇怪。支持是为了确立议会制民主政治的宪政惯例，不参加内阁是由于社会党内有与自由党政治根本不同的容共派。《片山内阁》的作者在书中接着坦率地承认了吉田茂的长处：“‘不作社会主义内阁的帮手，主动转向在野的立场’，这种顽强劲和坚韧性，不久就把吉田自由党推上了保守主流的境地。自由党认为，‘只是把政权暂时寄存而已’，这是由于看到片山内阁是由性质不同的社会党、民主党组成的，不久就会出现难以调和的矛盾，无论从哪种意义上看，都是短命内阁。片山内阁及其后的芦田内阁都以短命告终，说明自由党和吉田总裁的估计是正确的。……自由党团结和发展的基础正是在这个在野时代建立起来的。参照片山内阁、芦田内阁的惨淡后果，吉田茂的统率力和政治手腕是应该加以肯定的。应该说这是对吉田茂的正当评价。”

1948年2月10日，由于社会党左派造反，片山内阁不得不总辞职。1个月后成立的芦田内阁，也由于昭和电工事件，在10月7日总辞职。一周后，吉田茂当选为首相，并在10月19日组成了第

二届吉田内阁。对于这段在野时代，吉田茂在《十年回忆》第一卷中这样写道：“从1947年5月到1948年10月大约一年半的期间，正是片山、芦田两内阁即社会党与民主党的联合内阁时代。在此期间，自由党和我本人都积累了在野的经验。而且以在野党的地位为下届的大选进行了范围广泛的地方游说，我到了许多以前没有去过的地方，这确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和学习。

“以革新派的片山为首相的内阁虽已组成，但我国的各种客观形势不仅没有任何特别改善，而且国民生活的困苦情况也未见好转。因此，在野的自由党终于不忍坐视这种形势，便主张保守派的大团结，以担当政权，共渡难关，并于1947年11月倡议组织‘救国新党’。当时，身为民主党人而批判民主党与社会党联合内阁的币原喜重郎等虽支持自由党这个倡议，但民主党的大多数却不赞同，因此，币原氏等终于退出了民主党。

“在酝酿组织这个新党的时期，一方面，片山内阁虽然下台，但是紧接着又在社会、民主两党的联合下成立了芦田内阁。因而当时受到非难，‘说是轮流掌握政权’，这件事，我想许多人记忆犹新。另一方面，组织救国新党的时机也迅速地成熟，以前为参加新党而退出民主党的民主俱乐部的36人便和自由党结为一体，于1948年3月15日组成了民主自由党（民自党），我被推为总裁。”

#### 四

民主党分裂的直接起因是国家煤矿管理法问题。在社会党内部，连西尾书记长也不大赞成该法案，认为它无助于当前紧急的煤炭增产。但水谷工商大臣却认为，该法案是以社会党为首的内阁的一项招牌，强烈要求通过。

民主党内与煤矿业关系密切的西田隆男、长尾达生等干部，通过币原派与自由党结合起来，掀起了反对国家管理煤矿的运动。结果在1947年11月20日至22日的众议院三天讨论期间，连续发生殴

斗，12月8日该法案虽然获得通过，却使民主党产生分裂。策划在众议院全体会议投票反对该法案的7人被开除出党，其他17人被劝告退党。投反对票的24名民主党议员和先前被开除的降旗德弥等人另组俱乐部，并与自由党实行合并，这点前面已有叙述，这里不再重复了。

出丑的不仅是民主党一家。社会党也在11月4日，以不与片山首相合作为由，罢免了平野力的农林大臣职务。平野力是否具备担任公职的资格，从他就任农相时就有争议。片山内阁成立时，以平野力不可缺少为由，是用类似“假释”的方式让他入阁的。

平野力与盟军总部情报部部长威洛比少将关系密切，为此得罪了民政局长惠特尼和肯迪斯课长。10月11日，平野农相在奈良演说时指出，“从国会的情况以及内阁关于处理米价问题的现状来看，应该说最近有可能举行大选。”10天后，自由党总裁吉田茂在和歌山市，似乎有意和平野演说相配合似的，也说“建立保守新党构想，应以反共、自由主义为前提。关于这一构想，平野农相大体上接近我们的政策，人们已在议论他有可能参加新党之事。当然，我们并没有主动诱使他参加。我只是感到，政变时期已经出乎预料地提前到来了，有可能在11月国会通过后举行大选。”

民政局对此感到愤慨，并断定接近威洛比少将的吉田茂和平野力正在进行合作。在吉田演说后的第四天，肯迪斯上校访问了片山首相，口头传达了民政局长惠特尼的指令，要求解除平野力的职务。

中央公职审查委员会在11月中旬审查过平野力是否该被整肃的问题，12月26日得出结论说，“平野不属于被整肃之列”。这时肯迪斯上校又把牧野英一委员长叫去，命令重新审查。结果中央公职审查委员会以5与4的票数决定整肃平野力。由于平野力夫人痛哭哀求，大河内一男委员写了一张字据说“自己的赞成票并非真

意”，这就是所谓大河内“言行不一”的著名事件。

平野力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应“确认整肃决定无效，并在本案判决前停止整肃决定的效力”，这一要求被接受了。1948年2月4日，最高法院判决：“日本法院对整肃问题没有判决权”，因此，东京地方法院作出的暂停整肃效力决定无效，这样该案总算有了结果。这也是表现占领政治黑暗面的事件。

正当社会党与民主党内阁遭遇困难之时，吉田茂象他在和歌山市演说所表现的那样，正在为重新掌权进行准备。他以在野党党首的身分，怎样进行活动的，《十年回忆》第四卷这样写道：“我虽然不赞成联合内阁，但是对片山内阁的成立曾表示过好意，并告诫党内不要加以阻挠。不仅如此，我还曾经希望尽可能同反对党的各位来往，以便沟通意志，然而这一点未能如愿以偿，我至今引为憾事。

“我国目前的政党有这样一种倾向，即不论是在野党还是执政党，都急于攻击他党，为了进行攻击，竟不问事情本身的善恶是非。在外交、经济、财政、劳动、国防等问题上，只是一味攻击他党，而倾听他党意见的宽容气度则似乎不够。换句话说，也就是政治斗争缺乏节制。”

在这段引文之前，吉田茂强调了民主政治就是宽容政治。他是这样说的：“构成民主的基础思想，乃是宽容(magnanimity)而不是敌意(feud)。唯有有知己爱己而又有知敌爱敌的宽容气度，才能实行民主政治……”。

“数年前我访问欧美时，曾在英国出席丘吉尔首相举行的晚餐会，除英国内阁阁僚之外，艾德礼等工党领袖也应邀参加。丘吉尔首相曾亲自把艾德礼先生领到我的身旁介绍给我。外国政府首脑招待外宾时，同时邀请反对党领袖参加，并且把他们介绍给外宾，给他们同外宾晤谈的机会，这正是民主的特点。据说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决定今秋访美后，立即会晤工党领袖盖茨克尔先



生，向他说明了访美的目的，并要求他谅解。这点也是值得效仿的。

“在内政和外交方面，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彼此进行正大光明的争辩，并且由舆论加以评论，这才是为了国民同时也是依靠国民而实行的民主政治。民主政治之争，应该是君子之争，民可使知之，不可仅仅使由之。执政党和在野党都靠它的良知推进国政，为国策之运筹和贯彻而彼此协力，这才是民主政治。该争则争，需妥协者要妥协，以期完满地贯彻和运用国策。具有这个信念，才能使民主政治有益于国家和国民。

“只有执政党优良，并不能说是民主政治已经完成。执政党应该具有淡泊的情操，不可贪恋政权，有时也应该给反对党以执政的机会。一党企图垄断政权，决不是民主政治的正道。反对党如果缺乏执政的经验，它的理想和主张就会远离实际政治，成为空洞的理论，或者失于过激，使政治斗争变得尖锐，使民主政治不能推行。只有执政党与在野党光明正大地彼此对立，为国家的繁荣互相协力，才能发挥民主政治的优点。如果反对党软弱无力，作为反对势力来说力量还不够的话，执政党的团结自然就会松懈，以至造成政党政治的堕落颓废，使国民失望，使民主政治碰壁。”

上述这些是吉田从1954年12月离开首相职务后，过了几年，包括自我反省所谈的民主政治的形象。他本人并不是总按上述理想行动的，但却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政治信条。

在这里再谈一下吉田茂的私生活。吉田在野时代，以大矶的私邸为活动据点，在那里照顾他生活的是坂本喜代。她在新桥时代是很出名的，艺名叫“小玲”。坂本喜代是日清纺织公司常务董事佐久间福太郎和新桥名妓坂本志能之间的生的。志能后来成为佐久间福太郎的续弦，并到了佐久间家。1911年佐久间福太郎遭车祸身亡后，志能便携带自己所生的子女三人离开了佐久间家。她

离开的原因据说是为了避免发生争夺财产等不愉快的纠纷。

对此崑山清所著《秘录陆军中野学校》中写道：“把别人推倒在地并踩在脚下，只顾自己的利益，这是今日的人情世故。从这点考虑，志能的行动，也许难以理解。其实这就是明治名妓的气质。这种明治气质，小玲也继承下来了。”该书还谈了吉田茂和坂本喜代的关系。“吉田与小玲之间的结合始于昭和之初，在吉田出任驻意大利大使之前。在他驻意期间，几乎完全忘掉了小玲，也没有给她寄过象样的生活费。当时吉田认为，反正她还会找另外的人。但是吉田回国之后感到意外的是，小玲一直在等待他回国。后来吉田向最接近的人吐露说：‘从艺妓小玲身上看到了日本女姓的典型’。”

在吉田茂就任首相之时，新桥的女主人们有不少人感到意外，这点在前面已经说过。吉田与小玲的结合也出乎她们的预料。她们曾设想也议论过，哪个艺妓可能成为吉田的小老婆，但任何人没有想到吉田要选择小玲。老练的老板娘也斗不过吉田茂。难怪吉田喜欢把私邸大矶称为“饱经风霜楼”。

## 五

1948年2月23日民主党总裁芦田均被国会选为首相。3月10日组成了民主党、社会党、国民协同党三党联合内阁时，人们对新内阁的评价是不佳的。2月7日和8日，日本舆论调查研究所从以东京都23个区选举人名单为基础所进行的舆论调查中，对于哪个政党是下届政权的中心政党的回答是：自由党35.7%、社会党22.5%、民主党8.8%、共产党1.8%、国民协同党1.4%，有29.6%的人表示不支持任何政党。

在片山内阁总辞职的当天（2月10日），《读卖新闻》社在京浜地区所进行的街头舆论调查结果是：主张自由党人担任首相的占45.6%，主张民主党人担任的为11.4%，38.3%的人主张解

散众议院。《每日新闻》社在11日和12日两天进行调查的结果是：主张自由党人担任首相的占55.4%，主张社会党人的为25%，主张民主党人的为12.2%，主张共产党人的为1.6%。

尽管舆论调查的方法不尽完善，规模也不够广泛，但从中也可看出，多数国民希望第一在野党自由党出来组阁。这也是吉田茂一贯坚持的宪政常理，即大选后由第一党党首担任内阁首脑执政，当该内阁总辞职时，应由第一在野党党首出来组织新内阁，这种观点得到了日本国民的广泛支持。

但是，当片山内阁由于社会党左派造反而陷入困境时，社会党和民主党却在策划政权的转移，为此，社会党的西尾末广在各党代表座谈会上说：“问题的产生是由于社会党左派突然采取反对党和中央执委会的决定所引起的。这样，国民不仅对社会党，甚至对片山首相也产生了不信任问题。首相未能以国民满意的方式来处理该问题，对此应明确责任，于是就有了总辞职的念头。因此，并不是政策问题引起的，而是由于社会党内部的情况而产生的首相责任感问题。”也就是说不是政策行不通了，后继政权即使在执政党间授受，也未偿不可。

2月10日，片山首相发表谈话，宣布总辞职，同时说明原因是，“在联合内阁的情况下，经常出现由于党内情况而产生的烦恼，这也是我国在目前情况下，难以避免的一个历史阶段”，并进一步说：“我深信，日本民主革命应以排除极右和极左的中间道路来实现。也就是说，在出现拥有绝对多数议席政党之前，今后仍然必须有联合内阁，这也是中道政治的一种形态。”

民主党的立场更为清楚。民主党政调会长北村德太郎，在回答《每日新闻》社的“片山内阁总辞职后，应如何收拾政局”时说：“从政党角度来考虑，下届政权只能以民主党为核心。原因是在目前形势下，极右、极左的想法都是行不通的。片山联合内阁的首脑虽然是社会党人，但是所有政策都是以民主党为主体的。

有人担心，如果芦田担任首相会被说成是私相授受，但我不这样认为。理由是，内阁辞职不是由于政策失败，而是由于社会党内左派的分裂活动造成的。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那种断言内阁辞职就是政策失败、应把政权交给在野党的理论是脱离现实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民主党内，最高顾问斋藤隆夫也从宪政常理的角度，主张应由自由党人担任下届政府首脑。船田享二也代表第三个联合政党国民协同党说：“从宪政常理来说，应该把政权交给自由党。但是，如果不是政权转移，只要有正当理由也不妨由芦田担任首相。”船田又说，“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等到自由党拒绝执政以后，才有充分理由。”

从这里也可以知道，在片山首相下，三个联合政党内部，主张按宪政常理办事的呼声也很强烈。由片山委员长把政权转交给民主党总裁芦田均，在道理上显然是说不通的。

2月10日，众议院议长松冈驹吉接到片山首相的总辞职通知后，立即召集社会、民主、国民协同以及自由党四党干事长、书记长进行协商，并同意召开四党党首会谈。11日，松冈议长先走访了片山委员长、芦田均总裁和三木委员长，建议由议长来协助召开四党党首会谈，他们三位都表示赞成。最后访问自由党总裁吉田茂并要求合作时，吉田断然拒绝了。《朝日新闻》就此用大字标题报道说，吉田在和松冈会谈中认为“四党党首会谈不可取”。这天下午3时，松冈议长在荻外庄会见吉田总裁时说：“为了协商组织下届内阁问题，准备召开四党党首会谈，其他三党党首均已同意，请你也一定参加。”吉田回答说：“从宪政常理的前提来说，在大选后由第一党党首组阁，当内阁总辞职时，应由第一在野党党首组织下届政府。在野党党首在国会当选为首相后，应根据自己的信念组阁。如果那时认为有必要召开三党党首或四党党首会谈，由该人召集即可。因此，我本人认为，在此之前，召开四党党首会谈，这是模糊不清的办法，很遗憾，本人不能出席。”

松冈议长拼命说服吉田，希望他在四党党首会谈中谈上述看法，对此吉田茂说：“这不仅是我的看法，也是党的方针，并为此作出了党的决议。”

由于在去年大选后自由党推举第一党党首社会党委员长出任首相，而自己宣布下野，正因为有了这一实际行动，吉田的主张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上面已经谈过，社会党、民主党的内部对立和争夺更加激化了，吉田认为即使与中间势力联合起来，也不会建成强有力的内阁。作为第一在野党党首，如果不被推为首相，不如暂时仍然在野，等待中间政权的最后灭亡更为有利。

这次又与去年大选失利后决定下野一样，吉田茂拒绝参加四党党首会谈的行动再次受到古岛一雄的称赞。古岛评价说：“吉田虽然对政界的情况不太熟悉，但是他有极大的坚韧性，严格地守卫了应该坚持的界限。”

但是吉田茂要贯彻宪政常理，当时有两大严重障碍：一是，盟军总部民政局继续支持中间联合内阁，并不喜欢吉田组阁。二是财界十分担心再次出现“二·一大罢工”那种事态，希望和社会党组成联合内阁。

在盟军总部内部，惠特尼准将领导的民政局和威洛比少将领导的情报部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对立和争夺。惠特尼是麦克阿瑟元帅的亲信中的亲信，他的不少部下是同情30年代新政的自由派人士。因此，民政局支持社会党、民主党以及国民协同党的中间联合政权是极其自然的。

吉田茂在领导第一届内阁时，常常越过民政局长惠特尼和肯迪斯上校直接同麦克阿瑟元帅接触，他经常顶撞惠特尼和肯迪斯的指示而直接写信给麦克阿瑟元帅，以此来破坏民政局的计划，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曾在惠特尼局长下担任过国会课长的威廉斯在1979年发表的著作《麦克阿瑟统治下的日本政治革命》中，谈了吉田茂与惠

特尼之间的争执。威廉斯指出，他们两人对立的原因是第一届吉田内阁对民政局推进的改革政策进行顽强抵抗引起的。在这点上，双方都有不得不坚持自己立场的内因。

饶有兴趣的是，1948年8月1日，惠特尼民政局长虽大声疾呼：“麦克阿瑟元帅在努力拯救天皇制，而吉田及其政党却一心想保护天皇的财产。”

当时吉田茂的确为了保护皇室财产尽了最大努力。但是吉田茂与惠特尼之间的对立，正如威廉斯所说的，从根本上讲，是两位意志坚强的人物之间的争执。威廉斯还指出，片山哲和芦田均都是通过民政局而和盟军总部接触的，而吉田茂则是通过惠特尼的竞争对手班克上校（麦克阿瑟元帅副官）而直接与元帅面谈的。

1951年4月11日，麦克阿瑟元帅被杜鲁门总统解除职务，5天后离开日本回国，众议院在麦克阿瑟离开后的第二天就通过了对麦克阿瑟元帅的感谢决议。当时也准备对惠特尼局长也作出感谢决议，根据吉田茂的意见，这项决议被“延期”了，最后终于不了了之，惠特尼局长对吉田茂的敌意受到了应有的报复。但是，从1948年2月-12月期间，惠特尼局长手下的民政局人员，在明里暗里都整过吉田茂。

财政界也以各种方式表明了自己的想法。经济团体联合会常任理事诸井贯一和经济同友会干事大冢万丈的发言最有代表性。诸井说：“从宪政常理来说，也许应该建立自由党内阁。但是如果看一下工运问题，必须是能够取得社会党合作的内阁方可。”大冢说：“自由党组阁难以取得社会党的合作以及劳动群众的支持，因此希望建立有社会党参加的联合内阁。”

## 六

自由党总裁吉田茂在1948年2月17日下午2时召开的自由党议员大会上谈了自己的看法，要点如下：“目前的问题并不是由谁

来担任首相或政权如何演变的问题，而是要为议会政治树立良好的先例，并在此基础上，使宪法更好地发挥作用。政府由于施政困难而总辞职时，执政党应该承担政治责任，要果断地把政权交给在野党。以淡淡之心实现议会政治之美，应是议会政治的最高政治道德。各党只有坚持这种纯正而高尚的政治道德，才能确立民主政治和议会的基础。

“政权应该象流水那样运转。正是出于这种心情，自由党在去年大选后立即决定全党一致支持社会党片山出任首相……。”

这时众议院各党的议席数为：社会党123、自由党119、民主党106、国民协同党32、同志俱乐部22、全农派有志议员俱乐部7、共产党4、无党派2、缺员20。总议席数为446席，没有任何一个党能控制过半数议席。以民主党总裁芦田均为首相的民主党和社会党的“翻版”联合政权，也未能控制议会稳定多数。吉田茂强调宪政常理，明确提出“或者由吉田组阁，或者下野”的立场，是不为眼前微小利益所惑而做出的最正确的战略判断。因为吉田茂清楚了解，为了完成媾和这项重大课题，政权稳定是不可缺少的条件。

2月21日众、参两院分别投票决定首相人选，结果发生了不协调。众议院投票总数为421票，芦田均获得216票，吉田茂180票，结果芦田均被选为首相。但是在参议院却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在总投票数218票中，吉田茂获101票，芦田均获99票。由于都不过半数，又进行了决选投票，在216票中，吉田茂获得104票，芦田均得102票，结果吉田被选为首相。由于众、参两院选举结果不同，根据宪法第六十七条规定，23日召开两院协商会议，由于芦田均和吉田茂都未能获得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数，最后按照“召开两院会议后，意见仍不能统一时众议院的决议即为国会决议”的规定，最后决定芦田均为首相。

3月10日，以民主党、社会党和国民协同党的政策协定为基

础，组成了三党联合的芦田均内阁。西尾末广以副首相身分入阁，这说明芦田均政权是片山内阁的翻版和政权转移的证据。上面已经谈过，在2月上、中旬进行的舆论调查中，只有少数人希望建立民主党内阁，从这里也可预计，芦田均内阁从成立时起就是不受欢迎的。

《每日新闻》从3月10日开始进行了10天的全国舆论调查，结果是，芦田均内阁的支持率只有30.7%，不支持者达49.5%。《朝日新闻》从3月16日到18日进行的三天全国舆论调查的结果，芦田内阁的支持率也是30%。而且在这些舆论调查中，当问及在下次大选中支持哪个党时，40.4%的人表示支持吉田茂的民主自由党，支持芦田均民主党的只有13%。任何人都清楚对芦田均内阁和他的民主党的评价很低。

下面谈媾和问题时还要详细涉及，芦田均从担任片山内阁外相时起，就对媾和问题进行了最热心然而是不引人注目的努力。从必须恢复主权和独立这点来说，有芦田均那么坚定构想的人是不多的。上面说过，在修改宪法时，众议院的特别委员会以及由他作为委员长的委员会，对宪法草案进行了重要的修改，对我国的安全保障问题作出了重大贡献。换句话说，芦田均并不是政治掮客，而是堂堂皇皇的政治家。

在芦田内阁成立时，从2月25日的捷克政变和4月1日封锁柏林事件所显示的，美苏间的冷战日趋激化。该年（1948年）6月，美国陆军部长罗雅尔在旧金山发表了“要使日本成为对付共产主义堤坝”的有名演说，表明美国已下决心，使日本在政治上成为“反共堤坝”，在经济方面自立为“东洋工厂”。

3月9日，即芦田内阁组成的当天，美国陆军部发表了斯特莱库调查团的报告书。明确提出，复兴日本经济必须有外部援助。对复兴日本经济日益关心的不只是美国陆军部。去年5月就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司长的乔治·凯南，根据国务卿马歇尔的要



求，从3月1日至23日视察了日本和马尼拉，4月2日向国务卿提出了报告。

美联社从华盛顿报道说，这位遏制政策制定者也承认，“如果确实不能取得盟国的赞同召开媾和会议，美国应在日本采取单独行动，要把日本经济重建到能自立的程度，这样就能防止共产主义的入侵。在这点上，我和麦克阿瑟元帅的意见完全一致。而且鉴于美苏关系在世界范围内正在恶化，有必要考虑日本作为亚洲防共堤坝的军事重要性。”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已转入了总反攻，但是凯南认为这对美国并不是威胁，比起中国，凯南更重视日本。凯南在《回忆录》指出了他关于日本建议的实施过程，并被评价为仅次于马歇尔计划的他所作出的另一个重要贡献。

接着陆军部副部长道莱伯来日，他除与盟军总部首脑会谈外，还和芦田首相、北村藏相、栗栖经济安定本部长官等也进行了会谈。回国后，发表了重建日本经济四年计划，指出了增加以主食为中心的救济、缓和征收赔款、提供商业信贷、和缓排除垄断等问题。上述这些都表明在芦田内阁诞生前后，美国对日政策明显地转向要在短期内实现日本经济自主的方向。这点对芦田内阁来说，是极为幸运的。但是，芦田均未能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这是他的不幸之点。

3月15日下午2时，在永田町小学召开民主自由党成立大会，吉田茂当选为总裁，他在致词中点明了芦田内阁面临的问题，“去年5月社会党内阁成立以来，政府施政不当，致使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生产下降、社会不安、道德沦落、治安松弛等，这都是由于只顾维持自己政权的结果。政界混乱，极端腐败，这是明治以来未曾有过的，令人忧虑之至，究其原因在于没有控制议会多数议席的党。以维持自己的政权为目的而与他党合作，勉强维持联合政权，无暇他顾所致。我等有心之士，要把政见相同的政党、政治派别

团结起来，使政治、经济走上正轨，以期完成重建国家之宏业。为了克服空前的困难，并为祖国复兴奠定基础，抛弃以往一切瓜葛，为结成一个大政党而努力奋斗。”

吉田演说中当然也有出于为本党利益考虑的因素，但是他所指出的芦田均民主党“没有控制议会多数”、“只是为了维持政权而与他党合作，勉强维持联合政权，无暇他顾”等等，恰好击中了芦田“翻版内阁”的致命弱点。尤其不能忘记的是，结成民主自由党后，在自由党119席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同志俱乐部的36席，成了国会第一大党。

尽管如此，“翻版内阁”还能勉强维持，主要原因是有盟军总部民政局的支持。2月23日，即决定由芦田均担任首相的第二天，民政局举行临时记者招待会并发表声明“人民的统治”说：“决定新首相的手续完全符合新宪法的规定。”民政局的这篇声明实在是很特殊的，它把自由党总裁吉田茂所倡导的、并获得了多数国民支持的“宪政常理”说成是“旧宪法的、非民主的阴谋”，称颂中道三党联合内阁“符合新宪法和民主精神”。

声明还指责说：“对于决定新首相的手续是否符合宪法一事，某个方面议论颇多。这些以日本国民自由的维护者自居的人士当中，对旧宪法又说了些什么呢？他们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怀疑新宪法？”这段话对吉田茂的宪政常理表现了露骨的敌意。接着，声明又说：“一言以蔽之，主张联合内阁主动辞职后，应把政权交给反对党的言论是曲解民主、背叛选民，是政治权术。”这些都反映了民政局讨厌吉田茂的自由党，支持芦田均和西尾末广中道联合的感情。

## 七

芦田均内阁成立后，芦田首相首先明确了新内阁的重要使命是引进外资、重建经济和恢复对外信用。1948年5月17日发表了

经济安定本部拟定的复兴经济五年计划第一次试行方案。计划规定从1949年度起，用5年的时间，争取恢复到1930-1934年的生活水平，为了使这一计划具体化，6月15日制定了以中间安定计划为内容的第一次试行方案，把到1948年3月的时间作为准备时期，从该年11月到1950年3月为第一和第二安定期。

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由于受乔治·凯南向美国务卿提出的建议和道莱伯副部长使团向陆军部长提出的查斯顿报告的影响，发生了大幅度变化。6月9日总部批准向日本提供6千万美元的棉花贷款。8月5日，日本立桥号货轮，从横滨启航，8月29到达波斯湾的巴林岛，装载10万桶重油后返航，10月1日回到尾道。同月美国根据“占领地区经济复兴资金”开始对日提供物资援助，日本经济出现某些光明前途。

但是芦田均内阁未能乘势强有力地指导经济复兴工作，内阁软弱无力。6月1日在众议院调查非法财产交易特别委员会上，芦田均内阁最大的支柱，西尾末广副首相被迫提供证言说，作为“书记长个人”，他从土建业主那里接受了50万日元的捐款。1948年度预算通过后的7月6日西尾宣布辞职。第二天，东京地方检察厅以“违反政令”、“提供伪证”为由，对西尾末广提出起诉，8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宣判无罪。事件虽然了结，但是对芦田内阁的冲击相当大。

6月23日，昭和电工经理日野原节三，由于涉嫌向商工省的技术官津田和课长野见山行贿而被捕，这就是所谓“昭和电工事件”，它最后结束了芦田内阁的生命。当时由复兴金融金库负责向各企业、公司提供贷款。由于通货膨胀严重，取得这种贷款有利，因此围绕获得贷款问题，常有许多流言和议论。特别是在森晓经理作为经济整肃对象离职后，由日本氢工业公司经理日野原节三就任昭和电工新经理以后，各种怀疑都集中到该公司来了。浦和地方检察厅在埼玉县秩文郡影森村搜查隐匿物资时，发现昭和电工侵

吞了大批锡、铜、黄铜等物资，还查获了该公司重要领导人员和工厂厂长的联名秘密指令。于是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对昭和电工总公司进行搜查。1948年5月25、26两天，搜查了在赤坂溜池的总公司，没收了大量证据材料，其中有经理秘书砂原季也所记的向商工省技术官行贿的笔记。6月23日逮捕了日野原经理，在审讯中，弄清了他为了取得复兴金融金库的贷款，不仅向商工省化肥局二课行贿，向实力雄厚的商业银行行贿，而且案情还涉及到政界、官界。

9月2日，东京地方检察厅设立了昭电事件特别搜查本部，10日，日本肥料股份有限公司理事、前农林次官重政诚之被捕，3天后，大藏省主计局长福田赳夫也被捕。福田的涉嫌是，他担任大藏省银行局长时，利用复兴金融金库委员的地位，对昭和电工的贷款提供了方便，从日野原那里受贿10万日元，但一审、二审均宣判无罪。

9月22日，兴业银行副总裁二官善基被捕。8天后，现职内阁经济安定本部长官栗栖赳夫也被捕。栗栖的涉嫌是，在他担任片山内阁藏相时，在批准向昭和电工提供近13亿日元的第三次贷款时，从日野原那里获得许多贵金属品。栗栖在一审中被判徒刑1年6个月，罚款350万日元。在二审中，减刑为8个月，缓刑1年，罚款150万日元。栗栖上诉后，经最高法院驳回，最后确定为有罪。

由于栗栖被捕，芦田内阁面临崩溃危机。芦田均首相决心立即辞职，但民政局不断要求其留任。芦田均在为了使国会通过国家公务员法修改案的名义下，要求北村藏相兼任经济安本部长官，想以此项人事安排来克服困难。但是，10月6日晨，由于西尾末广被捕，社会党中央执委会决定要求芦田均内阁总辞职，第二天，芦田内阁终于总辞职了。

昭和电工事件后来继续发展。该案的中心人物日野原节三，甲府中学毕业后，经第一高等学校，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是铁路

建设业泰斗菅原恒宽的女婿，与芦田均首相的幕后支持者菅原通济有内亲关系。11月2日，东京地方检察厅逮捕了芦田前首相的秘书官下河边三史，12月7日芦田均也被逮捕。

芦田均以受贿为由被起诉。1952年10月22日，东京地方法院宣判无罪，检察当局上诉后，二审也宣判无罪，检察当局也放弃了上诉，确定为无罪。

这件大贪污案的背景中，有盟军总部的影子。信夫清三郎所著《战后日本政治史》第三卷对日野原和肯迪斯上校之间的关系是这样记述的：“肯迪斯与前子爵鸟尾启光夫人鹤代（后改名为多江）之间有艳闻之传。日野原替新桥艺妓秀驹赎身后收留在杉并区和泉町为妾。秀驹曾是鸟尾夫人经营的银座董服装店的常客，因此日野原也认识鸟尾夫人，经她介绍，日野原把民政局的要人接到杉并的妾宅，采用各种手段讨其欢心，为了取悦这些人，据说日野原花费的金钱超过2,500万日元。”

日野原节三就任昭和电工经理本身，就是充分利用了“盟军总部意见”的结果。占领军这种绝对权力，用阿克顿男爵<sup>①</sup>的话来说，就是“绝对腐败”。盟军总部内民政局与情报部的对立和争夺，与昭和电工事件密切相关的问题无须多说了。该书第三卷这样写道：“情报部很早就企图通过搞肯迪斯来打击民政局。曾担任警察总监、国警长官的斋藤升，从山梨县知事转任内务次官时，曾到盟军总部有关部门去拜会，肯迪斯当面警告斋藤说：‘听说最近日本警察在调查我们占领军的女友以及社交关系。’斋藤回答说，‘那是根据有材料揭发，有的军官把占领军物资弄到日本妇女那里，是为了查清事实和证据而进行的，现在结果已清楚，没有违法现象，上述调查已经停止。’他向肯迪斯作了假报告。回来后经过查询，原来是内务省调查局长要求警视厅警务部长进行的。事情的经过是，

<sup>①</sup> 阿克顿男爵(Acton)——英国历史学家，曾任剑桥大学教授(1834-1902)。——译者

吉田内阁时的某要人，在情报部有许多朋友，他正在和情报部一起策划把肯迪斯赶出日本的活动。情报部攻击肯迪斯的活动更加顽强了。”

美国记者把总部人员与昭和电工事件有关的报道发回本国后，肯迪斯上校，为防止烧到自己头上，拼命进行防御活动。当他要求把该案的搜集工作由警视厅移交给国警的活动失败后，民政局首脑最怕出现与情报部关系密切的吉田内阁。他们认为，如果成立第二届吉田内阁，在总部内民政局的地位就要下降，就会处于情报部之下。

芦田内阁总辞职后，所有的人都认为，应当由吉田茂的民主自由党组织下届内阁。因为民自党已经是国会第一党了。由于民主党和社会党都卷进了昭和电工事件，不可避免地要由吉田茂出来组阁。但是盟军总部民政局却不这样认为，为了把不可能变为可能，他们进行了最后的活动，这就是企图建立以民主自由党干事长山崎猛为首相的所谓举国联合内阁的阴谋。

山崎猛在担任众议院议长时，就与民政局长惠特尼、副局长肯迪斯、课长威廉斯等关系密切，而且又有“绅士”风度。在芦田均内阁崩溃已不可避免的1948年9月下旬，肯迪斯和威廉斯，把民主自由党副干事长山口喜久一郎叫去，暗示要架空吉田总裁。

山口副干事长接受了总部的“在吉田总裁领导下，即便倡导自由主义经济，民自党也是永远没有希望的”说法，为山崎出任首相进行了活动。山崎猛也向威廉斯课长流露说：“如果选我，也准备接受。”由于民主党、社会党也倾向支持山崎组阁，一时由吉田总裁组阁的希望小了。《十年回忆》第一卷这样说：“当时我正因病隐居在大矶，这时有人来访，他述说了以上的形势，并且说盟军总部可能拒绝提名我担任首相。我并没有理会他的话，只对他讲：‘是否拒绝还不得而知，应该直接谈谈看。’”

“记得是在10月7日党的干部紧急会议上，我斩钉截铁地说，

‘我相信决没有象外间传说的那种事，政治不能为个人的好恶所左右。’并且在8日的两院议员大会上明确陈述了我的信念说，‘处此政变之下，比取得政权更重要的是，我党应该具有为树立民主政治而示范的觉悟。对于违反民主政治精神的流言蜚语，希望全党一致以坚决的态度应付。’

“于是，民自党内的体制逐渐巩固，舆论也对山崎出任首相问题明确表示了反对。并且，迄今处于动摇的山崎也被民自党领导人特别是益谷秀次等说服，于10月14日主动辞去议员职务，就此结束了这一活动。”

## 八

吉田茂的叙述是平淡无奇的，但是山崎事件，无论是对吉田的政治生命还是对民自党都是一场严重的危机。该事件发生时，吉田茂由于患胆囊炎，卧病在大矶私邸，正与严重的胆结石病痛斗争。

总务会首席成员星岛二郎和广川弘禅携带总务会决议来到吉田这里。该决议在主文“总裁应成为首相”之后，加上了“但是，考虑到其他党的提名情况，因此需要重新研究”这一“但书”。总务会只讨论了决议的主文，“但书”是星岛二郎和广川两人加上的。

民自党顾问增田甲子七向在大矶的吉田通电话说，“但书”并不是总务会的决议，是星岛和广川增加的。吉田茂善于应付危机的特点这时又充分发挥了出来。他得知在民主自由党内有人正在搞阴谋活动，第二天就回到东京，并在麻生太贺吉家召开了紧急干部会议。吉田首先说：“各位大概都已听到了吧！这件事可能是真的。如果是麦克阿瑟说的，那无办法，只好服从。任何国家，不由总裁而由干事长担任首相都是不民主的。如果麦克阿瑟要把这种做法强加给我，我要服从，但是我有言论自由，要向全世界宣布这件事。在此之前我要亲自去麦克阿瑟那里问清楚。”据说看

到吉田茂的这种决心后，除星岛二郎外，其他人都深为震动，并改变了立场。

10月9日下午6时，吉田茂会见了麦克阿瑟元帅，表明了要执政的决心，受到了元帅的赞同和鼓励。由于吉田-麦克阿瑟会谈取得了成果，民自党内的背叛问题解决了。但是策划由山崎猛担任首相的活动并未消失。民主党对吉田茂的激烈敌对情绪正在燃烧，决定采取全党一致推荐山崎任首相的方针。社会党和国民协同党也可能同意。民自党内也有人在进行各种策划，但是却拿不出好办法来。

10月13日是国会决定首相的前一天。增田甲子七顾问、益谷秀次和广川弘禅第一副干事长等在商讨对策时，益谷得出结论说，除了做山崎本人的工作外，没有其他办法。益谷和山崎两人都是1920年当选为国会议员的，相互了解底细，由他去说服山崎猛最为适当。中正雄执笔的《益谷秀次》中说，“我（益谷）和同事增田甲子七一起走出国会大厦后，在虎门附近的中国饭馆边吃面条边说笑：‘如果明天山崎君当选为首相，日本议会政治就完结了。这样我们两人也可以回家去干律师了。’益谷与增田分手后，他独自去高轮议长公邸访问了山崎猛。当时山崎患有轻微疾病正在公邸休息，由于是时局的中心人物，许多记者都集中在这里。

“益谷避开了记者的耳目，和山崎两人到了一个单独房间坐下后，他强烈地责备了山崎的这次行动。‘我到这里来干什么，你大概也清楚。你是水户人，水户人历来都尊重正义，而且经常以自己的所为于国有利或无利为行动的准绳。看一下你们一伙人的这次行动，能够说是正义的吗？在明天的首相选举中，也许你能当选并坐到首相的宝座上，但是这却是反叛。如果反叛政治象宪政常理那样通行无阻，那么民主政治的前途又会怎样呢？我是你的老朋友，如果从私人交情来说，很希望你这位长期艰苦奔波的人能够当一次首相。但是，采用这种手法，我作为公职人也



不允许自己同意你当首相。山崎君！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心情……。’

“山崎默默地听着，突然展现出明朗的表情，并把夫人喊出来，叫取出益谷喜欢喝的威士忌，两人才又象过去坦率朋友那样，谈了当前的政局等问题，从他那毫无顾忌的谈话中，益谷感到山崎大概要主动辞职；谈话结束后离开公邸立即给党总部去电话说：‘请等到明天，山崎会妥善处理的’。然后益谷就回家了。”

忠厚、诚实的益谷秀次的忠告，打动了正直的山崎的心。第二天(10月14日)，当民主党代表向山崎传达“民主党议员大会决定推举山崎担任首相，为了保守势力的统一，请你一定出马”。山崎回答说：“这虽说也是为了保守势力的统一，反而会加深隔阂。等一会我就要用行动来回答你们。”

山崎清楚，他必须辞掉议员职务<sup>①</sup>，才能避免选为首相。这时已下定决心这样做了。他在上午10时以后，把众议院秘书课长久保田义麿叫来，要他把自己的辞呈交给众议院议长松冈。

在选举首相的前夜，山崎猛突然提出辞职，在众议院运营委员会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细川隆元所著《昭和人物史》中，这样写道：“该委员会的委员长是浅昭稻次郎，委员有民自党的小泽佐重喜、石田博英，民主党的椎熊三郎，社会党的吉川兼光和笔者，国协党的石田一松(已故)，共产党的林百郎等人。委员会议论说这封辞职书是否是真的？因为当时有流言说，山崎已经被吉田势力软禁起来，辞职书可能是什么人搞出来的，云云。因此需要由本人确认。经过事务当局的调查，确实是山崎本人亲笔写的，这样，此事才提到议事日程。椎熊等认为辞职理由不充分，主张不予承认，由于民自、社会等党赞同承认辞职，最后全体会议以多数通过，承认了山崎的辞职书，民主、国协、共产等反对辞职，这也是件完全反常的情况。”

---

<sup>①</sup> 日本宪法规定，首相应从议员中选举。——译者

10月14日夜，国会选举首相。先是参议院以114票赞成的绝对多数通过吉田茂为首相。在众议院吉田茂虽然也获得了最多票数，但是由于没有超过半数，决定进行决选投票，结果是：吉田茂185票、片山哲1票、弃权213票。这样吉田当选为首相。

当晚，吉田会见记者说：“首相的选举刚刚结束，我本人当选了。我对国会几天来出现的混乱情况表示遗憾。本来可以更简便地选举首相，但做不到，这在日本宪政史上也是非常遗憾的。首相选举时出现这种情况，说明为了使日本的民主政治树立起良好的形象仍需付出很大努力。坦率地说，对于这种结果，在国会投票之前即已获得舆论的支持，为了日本的复兴，希望能得到国民的支持，这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为了重建日本。”

吉田茂说，在国会投票选举前即已获得了舆论的支持，这并不夸张。许多国民不满片山、芦田两届联合内阁的软弱无力，也不满意盟军总部民政局的过分“内部指导”。而且群众对社会党和民主党都卷进了昭和电工事件充满愤怒，对于去年大选后一直在野的吉田茂民自党的期待更高了。这样，吉田茂得以击败民政局支持的山崎任首相的阴谋。但是，吉田内阁成立后，惠特尼和肯迪斯等仍继续阻碍吉田的施政。

## 第六章 第二、第三届吉田内阁

### —

1948年10月15日《朝日新闻》刊登了东大教授东畑精一论述吉田茂的文章，其中写道：

“总而言之，他这个人，象土佐犬<sup>①</sup>一样具有许多非合理因素。‘非合理’的用语固然很怪，但仅仅从他不是象牧羊狗那样的合理主义者这一点来说也决不意味着‘不合理’。如果说他敢说敢想，有自己的信念，这就过于平凡了。战争末期，宪兵队那样压迫他，但他为和平的斗志始终不移。我很喜欢这位七十岁老人的固执。前不久，第一次吉田内阁组阁时，他到处追逐，请教有泽等教授的事曾经成为种种议论的话题。我想这正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非合理因素，所以主动去寻求合理主义。

“用‘寻求合理主义的土佐犬’来形容，可能有些不礼貌，但是我愿这样称呼他。他出生于土佐名门，挥霍了当时据说有百万多元的家产，看来是一个相当奢侈无度的人。就顽固这点来说，厌恶他的人可能称他为反动，但对他的为人和待人接物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喜欢他。我对政治毫无所知，好象过去的吉田总裁和自由党之间确有鸿沟，可是他按照自己的思想办事，结果党也跟他一道行动了。

“到这次被提名为首相之前，他隐居在大矶不露面，新闻记

---

<sup>①</sup> 土佐即现在的高知县，那里产的狗，性凶猛、顽强。——译者

者不了解真相，纷纷猜测。当他到东京后，开门见山陈述己见，而且合情合理，大家不是都很清楚了吗！？真有点象宁死也咬住不放的土佐犬一样的勇猛顽强。这就是他的个性。在这种顽固性的基础上追求合理主义，他的政治生命不也正在于此吗！？

“他的顽固性被人误解了。换句话说，从表面上看，他不是一个人，似乎是一种意气用事。但他最大的缺点是缺乏系统考虑问题和有组织地处理事务的能力。这不单单他本人，包括他在内的全党都有这一弱点。仅仅靠限于当时当地的想法，就顽固坚持到底这一手是不可能战胜目前这场经济恶浪的。可以说，他只有在土佐犬勇猛力量基础之上，再加上真正已为自身所掌握的合理组织体系，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政治家，那样的党也才能成为健全的保守政党。

“我作为国民之一，寄希望于吉田首相。希望他把自己所具有的坚强力量转用于国内，采取果断措施，立即制止通货膨胀。对于打了败仗的日本来说，即使出现社会党内阁，或者民主党内阁，政策上都不会有大的变化。希望把那些建立所谓‘选举管理内阁’的近视而狭隘的想法放弃掉，因为在同通货膨胀斗争的关头，国民不堪忍受再浪费宝贵的时间了！”

在组阁的时候，吉田茂最先决定的就是任命佐藤荣作担任内阁官房长官。上面已经说过，吉田茂在第一届内阁时代改选人事之际，就考虑起用佐藤荣作任运输大臣。因为吉田首相十分欣赏铁路总局长官佐藤处理有关劳务的本领。当时因为盟军总部说他是战犯涉嫌者岸信介的弟弟，表示难色，因此未能就任大臣，而只晋升为运输次官。1948年3月，佐藤荣作辞去次官职务，决心进入政界。他加入了吉田茂的民主自由党，专心致志地从事加强他家乡山口县支部的工作。

选拔当时还不是议员的佐藤荣作担任内阁官房长官，这可以看出吉田茂是多么欣赏和高度评价佐藤的人品和才干。但不可忘

记，吉田茂和佐藤荣作的结合另有原因。这就是吉田茂的长女樱子1931年3月17日与佐藤荣作的表兄弟吉田宽结了婚。

吉田宽是佐藤荣作许多表兄弟中关系最密切的一个。他在小学时代因为生病曾住在佐藤荣作家里；而佐藤荣作上中学时也曾住在吉田宽家寄宿。吉田宽因为羡慕荣作也进了第五高中，接着比佐藤荣作晚一年进了东大法律系。1923年（大正12年）佐藤荣作高等文官考试合格，进入行政科，吉田宽也在二年级时通过了外交科的考试，为外务省所录用。这一年的夏天，两个人曾在户隐山一同学习。

后来，吉田宽从美国大学毕业，步步高升，当上了外交官，大概是由松冈洋右作媒，和吉田茂长女樱子结了婚。不幸在担任美国局课长时患急性肺炎突然逝世。佐藤荣作第一次见到吉田茂就是在吉田宽的葬礼上。由此可知，吉田提拔佐藤不能说和吉田宽与樱子结亲完全没有关系。但这并不是主要原因，决定性因素还是吉田茂高度评价佐藤在劳务行政方面发挥的高超本领，如果需要补充的话，可以举出1938年8月的例子。当时吉田茂从松野鹤平那里了解到，佐藤荣作就任铁道部监督局铁道课课长之后处理浅草·新桥和涩谷·新桥两条线路合并问题时显示了卓越才干，因而很赏识他。

1948年10月15日刚过中午，吉田茂在皇宫接受内阁首相的任命，当时在场的还有众院议长松冈、参院议长松平和前首相芦田。随后，吉田茂便以佐藤荣作官房长官为参谋开始了组阁工作。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布了组阁的基本方针。主要内容有：“选拔与昭和电力、煤矿国营管理等丑闻无关、经历清白、为国民所同意的人物入阁”、“其他党的入阁问题，取决于该党的态度”、“希望由特别优秀的人才担任法务总裁”等。

吉田首相原想再次任命第一届吉田内阁的司法大臣木村笃太郎担任法务总裁，可是木村曾被整肃，整肃的根据是，他当过大政

翼赞会涩谷区支部长和曾任大日本武德会会长这两点。吉田茂由于高度评价木村笃太郎的洁白人品，要求麦克阿瑟元帅特别批准任命他为法务总裁。可是麦克阿瑟元帅在10月17日给吉田的信件中以“这将招致对日理事会和远东委员会各国激烈反对”为理由，拒绝了吉田茂的要求。所以，吉田首相决定暂由自己兼任法务总裁。

原来预定由庆应义塾大学讲师永田清担任经济安定本部长官，但永田当过社长的日本橡胶有限股份公司1947年8月到1949年4月期间曾把64万双胶鞋、拖鞋投入黑市，获得非法收入6千万日元。麦克阿瑟元帅很重视这一事件，在10月19日给吉田的信里表示反对任命永田。结果吉田新内阁成立之初由大藏大臣兼任经济安定本部长官。11月6日吉田茂给麦克阿瑟元帅写信，以“对永田的指责无事实根据”为由，再次要求批准他任经济安定本部长官，由此可见吉田对永田清是多么信任，但是麦克阿瑟元帅在同一天的复信中拒绝了吉田的要求。

关于最引人注目的大藏大臣职务，官房长官佐藤荣作推荐前大藏次官池田勇人担任。池田从第五高等学校上学时起就是佐藤的朋友。佐藤当运输事务次官时，池田当大藏次官，两人同甘共苦，风雨同舟。但是吉田首相最后选拔池田成彬的秘书泉山三六任大藏大臣。吉田茂从战前就深深尊敬池田成彬，战争中又是推进争取和平工作的同志，关系很密切。作为财界权威存在的池田成彬，期望能为泉山三六安排个政务次官等职务，但吉田首相却仅仅因为是池田成彬的推荐，立即任命泉山为大藏大臣，据说池田成彬听了，感到惊异。不久以后的事情更使吉田大为震惊。

这样，10月19日举行了第二届吉田内阁正式任命仪式。内阁成员名单如下：

内阁首相兼外务大臣	吉田茂
副首相兼厚生大臣	林让治

大藏大臣	泉山三六
法务总裁	首相兼任
文部大臣	下条康麿
农林大臣	周东英雄
商工大臣	大屋晋三
运输大臣	小泽佐重喜
邮政大臣	降旗德弥
劳动大臣	增田甲子七
建设大臣	益谷秀次
安定本部长官	藏相兼任
国务大臣（行政管理厅长官）	殖田俊吉
国务大臣（地方财政委员长）	岩本信行
国务大臣（赔偿厅长官）	井上知治
国务大臣	森幸太郎
官房长官	佐藤荣作

起用绿风会的下条康麿任文部大臣是因为安倍能成拒绝就任这一职务。吉田首相本想让一桥大学的中山伊知郎教授担任劳动大臣，中山无论如何不肯接受。

内阁成员中民主自由党干部一级，只有副首相林让治和建设大臣益谷秀次。年轻化的目的基本上达到。币原喜重郎当了党的最高顾问，斋藤隆夫、植原悦二郎、山崎猛等元老都安排为顾问。党的执行机构主要由干事长广川弘禅负责。

## 二

第二届吉田内阁在众议院只有152席，所以吉田首相决心尽早解散国会，重新大选，以控制绝对多数。根据议会制民主政治的典范、英国的宪法惯例，内阁可以通过国王解散国会。第二届

吉田内阁成立时，不仅吉田首相，而且执政党、在野党和一般国民，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有这种想法。

11月8日，重新召开国会的前一天，吉田首相任命国务大臣殖田俊吉为法务总裁，殖田的职务由众议院内阁委员长工藤铁男继任，工藤出身于旧同志俱乐部。

这段时间里，企图阻止吉田首相早日解散国会的活动逐步在在野党中蔓延开来。社会党和民主党在片山内阁和芦田内阁时期不仅已经暴露了统治力量的不足，而且在“昭和电工事件”中弄得焦头烂额，因此，他们非常希望尽量拖延解散，以便利用时间使吉田内阁遭到挫折。因此，在野党依靠多数通过决议把11月9日结束的国会延长21天，吉田首相因为要根据盟军总部的强烈要求，继续审议前内阁留下来的修改国家公务员法议案，也不能一开始就解散国会。

这时又出现了不利于吉田首相早期解散国会的另一个障碍。11月9日，临时人事委员会提议，改善公务员工资应以6,307元为基准。为了实施临时人事委员会关于提高工资的建议，必须向国会提出补充预算方案。在野党当然主张，修改国家公务员法与补充预算两个议案是不可分割的。

在野党又遏制吉田内阁的解散权，把政府的解散权限作为问题提了出来。关于这一点，11月8日《朝日新闻》登载的东大教授宫泽俊义的论文《宪法意义上的解散》颇为引人注目。

该论文说明，“英国型的议会内阁制可由下院通过不信任决议使内阁倒台，与此同时（形式上通过国王）可以解散下院。这样使下院和内阁之间保持平衡。

“日本宪法承认的议会内阁制，显然也是这种英国类型。众议院通过对内阁的不信任案，可以使内阁总辞职，同时内阁有权解散众议院，问信于国民。这中间的关系是，当不信任案和解散权的对立，或其间的均衡遭到破坏时，由主权者国民自己作最后判断。”



宫泽俊义教授极其明确而直率地说明了内阁（形式上通过天皇）可以解散众议院。根据宪法第六十九条，只有在众议院通过对内阁不信任案才能解散的说法，宫泽认为，“实际上象这样由众议院通过不信任案作为解散的事前手续的场合可能最多，但是宪法上并无规定非如此不可。如果考虑一下当前的问题，吉田内阁向众议院提出的信任案若遭到否决，则解散国会也是一种做法。但从内阁成立经过来看，吉田内阁的信任案不见得全被否决（出现那种情况，在野党无论怎样也不会使出拿手好戏，投白票）。这样，不采取特地通过不信任案，立即解散国会的做法，不能说是错误的。”

但是有人主张只能根据宪法第六十九条的解释解散国会，这种说法也应该重视。被称为“宪法之神”的尾崎行雄说过，“众议院是雇主，内阁是佣人。内阁怎么能喧宾夺主地解散众议院呢？”他这种否定内阁解散权的论点正如宫泽论文所引用。宫泽教授驳斥尾崎行雄的看法说，“内阁不是众院的佣人，是国民的佣人。内阁解散众院并非佣人解雇雇主，而是一个佣人在共同雇主面前，指控另一个佣人，这就是英国型议会内阁制的实质，日本宪法的精神。”

在这种情况下，盟军总部民政局为使吉田首相陷于困境，进行了最后的挣扎，不使他们所庇护的所谓中间势力遭到惨败。11月12日上午10时，社会党委员长片山哲、民主党总务会长苦米地义三被叫到民政局。惠特尼局长、肯迪斯次长和威廉斯课长等指示说：“即使通过国家公务员法修改方案，也不能让政府随意解散国会，如果你们不通过内阁不信任案，就不让解散国会。”在野党的反应和对策如何，可以从唐岛基智三所著《昭和政界风云录》中看到：“‘好得很，正中我意’，民主党一松定吉、木村小左卫门等这方面的老手当然会宣称，政府无权解散国会。但是，如果国会采取‘不要解散’的态度，政府是否就非服从不可呢？例如，在数量上在野党占优势时，政府在这方面都不能实行反对在野党主张的政策，根据在野党的主张，连自己的政策也无法执行，这样的政府

不是太奇怪了吗？再加上这个政府无权解散国会，那末它就只能被在野党攻击得体无完肤。

“即使从常识上说也不会有这种蠢事。要么政府总辞职，要么解散国会。特别是这个在野党不久前曾经是执政党，而且由于贪污问题刚刚垮台，吉田政府所能采取的途径当然只有解散国会。

“宪法上当然也有证实这种解释的条款：‘第七条，天皇根据内阁的建议和同意，为国民而推行有关国事。第三项是解散国会。’政府解散国会即取此说。

“当时的法务总裁殖田、法制长官佐藤达夫提出了意见书，经常指出盟军总部的错误。可是总部置之不理。然而吉田首相也不示弱，下决心断然解散国会。总部民政局是否屈从于要求解散国会的舆论和政府的上述态度呢？威廉斯国会课长以下都来到国会，他们把执政党、在野党的代表召集到议长室，作了如下训示：‘我们将同意解散国会，不过要按下述顺序行事：首先通过社会党主张的工资法修改方案以及有关的补充预算方案。然后，提出不信任案，如果获得通过，才能解散。’

“他们终于向政府断然解散国会的主张妥协了。但是关于程序，直到最后仍坚持必须按总部的解释办。这种解散，应称为‘合谋解散’，这种由执政党、在野党合谋解散国会是空前绝后、没有任何先例的。”

威廉斯课长的上述行动是在下边还要讲到的惠特尼民政局长以下竭力奋战基础上采取的。细川隆元著《昭和人物史》论述说，“猜测一下民政局的内心，可知在野党、社会党和民主党提出不信任案之前，它想让在野党依靠多数，尽量猛攻吉田内阁，这意味着把吉田内阁用宪法第六十九条捆绑在那里为所欲为地穷抽猛打。民政局当时就是这样嫌恶吉田的民自党，袒护社会党和民主党。”

据吉田茂11月28日致麦克阿瑟元帅的信件称，民政局长惠特

尼向吉田首相提出了六项妥协方案。第二项是政府要向国会提出修改工资的必要补充预算；第三项规定在提出补充预算两周之后，不管预算方案是否通过，在野党要把不信任案提到议事日程；第四项，在通过不信任案的同时，宣布解散国会；第六项写着惠特尼局长注意到“在野党将遵守信义，按照上述方针行事”。第二天，惠特尼准将给吉田首相信的末尾称，“正在受理在野党领导人确认这一谅解的文件”。

吉田11月28日信件的背景是，在这前一天上午9时半，吉田与惠特尼举行了会谈。参加这次会谈的民政局次长肯迪斯的备忘录生动地记述着吉田首相与民政局之间不愉快的关系。去首相官邸拜访吉田首相的惠特尼民政局长刚到就说，“我奉麦克阿瑟元帅之命，作为他的使者来到这里。”因为众所周知，对盟军总部，吉田茂除了最高统帅之外，不以任何人为对手。

惠特尼说，根据宪法第七条，解散众院恐怕会在盟国之间引起是否要恢复天皇有关国政权限的疑虑；而且如果不解决修改公务员工资问题就解散国会的话，日本政治形势可能出现爆炸性局面，最高统帅对此非常关心。

惠特尼准将继续说，最高统帅感到，在野党关于提高工资与修改国家公务员法有密切关系的主张是有道理的。惠特尼提议，如果提高工资和修改国家公务员法方案同时通过的话，在野党不会反对根据宪法第六十九条解散国会。因此，可在这一条件下达成妥协。吉田首相和惠特尼局长经过争论后，吉田才答应接受妥协条件。这30分钟的会谈的确是非常紧张的。

### 三

根据上述业已达成的妥协，吉田内阁11月29日向国会提出包括提高工资在内的703亿日元的补充预算方案。含有禁止罢工条款的国家公务员法修改方案11月30日上午8时许在众议院获得通

过，当天晚上在参议院也通过，从而成立。这样，第三届临时国会结束。第二天召开第四届国会。吉田首相12月4日发表了施政方针演说，其内容成了“解散宣言”。

“如上月15日我在演说中所说，现内阁是芦田内阁总辞职后我接受首相提名的少数党内阁。这个少数党内阁为了首先问信于民，根据舆论，我相信应在一开始就解散国会。第三届国会是为履行芦田内阁以来的保证，制定公务员法以及有关法规而召集的临时国会。有鉴于此，法案业已获得通过。根据有关方面磋商，上月28日，政府和社会党、民主党、国协党等主要政党达成了协议，即：政府向第三届国会提出提高公务员工资及其他紧急预算案，在野党在预算提出后两星期，要使对内阁不信任案获得通过，以便宣布解散国会。预算已于29日提出，现在，作为第四届国会继续审议的紧急预算。因此，我的施政方针演说也以该预算为主要内容，望予谅解。”

因为有向国会提出补充预算要在两周内进行审议的协议，所以12月12日审议完毕应立即提出对内阁不信任案，然后解散国会，可是由于出现了两件突然发生的事件，日程被打乱了。

一件是关于昭和电工事件，有人提出，逮捕前首相芦田均等三名议员；而关于国家管理煤矿事件，要求逮捕田中角荣议员。12月6、7两日，众议院全体会议决定同意逮捕。

另一件是12月13日大藏大臣泉山三六演出了一幕丑剧。他在参议院食堂喝得酩酊大醉，非要和民主党议员山下春江接吻不可。在审议预算案时藏相酒醉无法站起来进行答辩，当然是个大问题。吉田首相劝泉山三六辞职，由商工大臣大屋兼任大藏大臣，暂时渡过难关。这出“醉虎传”的丑剧对于标榜整肃纲纪的吉田内阁是一个很大打击。吉田茂过于尊重池田成彬，没有很好考虑就把大藏大臣这样重要职务委任给一个从未见过面的泉山三六，当然也有很大责任。

吉田内阁提出的补充预算方案工资标准平均为5,330元,坚持延期解散的在野党根据临时人事委员会的意见,联合提出工资标准6,307元的修改方案。吉田首相12月15日拜会麦克阿瑟元帅,在民政局长惠特尼、经济·科学局长马贵特参加下举行了会谈。关于最后同意6,307元工资标准方案的情况,吉田在《十年回忆》第三卷有如下记述:“当时盟军总部内部的分工是:公务员制度问题由民政局主管,有关工资预算事宜则由经济·科学局主管。对于当时调整工资标准问题,民政局所采取的态度是,6,300日元方案也好,5,300日元方案也好,可以根据国会的自由意志来决定;而经济·科学局方面则认为很难找到调整待遇的新财源。但是,在麦克阿瑟统帅面前,我和两位局长商洽的结果,经济·科学局方面似乎向民政局作了让步,表示‘关于财源这一点可以改日再行磋商’,最后我们竟不得不接受最低标准为6,300日元的方案。当时,预定解散国会的日子已迫在眉睫,待遇问题和补充预算必须在解散国会之前解决。而且当时是少数党的内阁,在野党占绝对多数,从这一点来看,政府接受这个方案也是不得已的。老实说,这是我刚组阁就遭到的一次挫折。”

12月21日,工资修改法终于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第二天,补充预算也通过了。于是,众院在12月23日通过对内阁的不信任案,根据宪法第六十九条,国会宣布解散。这正好是吉田茂接受首相提名10天之后发生的。表面看起来是吉田和在野党之间的斗争,实际上却是吉田茂和民政局斗争的胜利。吉田首相把下野时代积蓄的潜在力量全部动员起来,期望和确信以国民舆论的支持为背景,在大选中也能够取得巨大胜利。

通过山崎组阁和延期解散两个事件,吉田茂痛感日本国需要恢复主权和独立。为此,必须在众院能够控制绝对多数。1948年7月7日吉田茂为准备大选就担任了选举对策委员长,7月21日发表了一大批官厅政界入党者的名单并于21日的干部会上内定了他

们的选区。

主要入党者及其选区情况如下：神奈川县伊藤敏行（前海运局长）、小金义照（前燃料局长）、冈崎胜男（外务次官）3人；静冈县远藤三郎（畜产局长）、后藤慎一（前海运局长）、中村幸八（管理局长）3人；广岛县池田勇人（前大藏次官）；岛根县大桥武夫（建议院次长）；山口县吉武惠市（前劳动次官）和佐藤荣作（前运输次官）2人；爱媛县乡野基秀（隆运管理局长）和安田元七（四国商工局长）2人；宫崎县川越茂（前公使）；岩手县阿部美树志（前建设院总务长官）。

当吉田茂充满希望、期待胜利之时，败北的肯迪斯上校申请到华盛顿出差，随即在美国提出辞职。民政局长惠特尼手下精明强干的一员大将肯迪斯，因为在同吉田茂的斗争中失败而去职了。

这里必须提一下当时的国际形势。1948年是冷战最激烈的年份，2月25日，捷克斯洛伐克粉碎了反动派复辟阴谋之后，4月1日苏联开始封锁柏林，8、9两月朝鲜半岛建立了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两个政权。中国人民解放军9月24日解放了济南，12月1日解放徐州，控制了内战的主动权。

11月12日，即惠特尼民政局长召见片山哲和苔米地义唆使延期解散国会之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25名被告有罪，12月23日东条英机等七人被处刑，正是国会解散当天。

大选定于1949年1月23日（星期天）举行。民主自由党候选人384名，其中新人204人；民主党候选人211人，其中新人109人；社会党候选人186人，其中新人67人。比较一下就可以知道，民主自由党占压倒多数，特别是民主自由党新人众多，很是突出。民主自由党也有前藏相泉山三六的醉酒事件和田中角荣议员被逮捕等不利的情况。但是，远比社会党和民主党在联合政权时暴露的明显弱点，特别是由于前首相芦田、前副委员长西尾的被捕，两党

蒙受的打击轻得多。

投票日1月23日，赶上晴天，有选举权者4,209万人中3,116万人参加了投票，弃权率从上次的32.1%下降到25.9%。在117个选区中，71个当天开票，其余第二天开票。24日傍晚，决定了众议院席位新的分配数：吉田茂的民主自由党获得264席，控制了众议院定员466席的绝对多数。在旧大日本帝国期间，绝对多数党也只出现过4次。战败之后，这当然是第一次。

吉田茂以这种稳定多数为背景，着手处理恢复日本经济和缔结媾和条约两大任务。在两年前的4月进行大选成为第二党时，吉田根据宪政常理把政权交给社会党而下野，下野时代也贯彻了宪政常理。在山崎组阁事件、延期解散事件中，光明磊落地抵抗民政局的干涉，强烈地表明了日本国民的良知和自尊心。

与此相反，社会党和民主党失败得很惨。社会党由解散当时的111席锐减为48席，民主党从90席跌到68席。社会党主要落选者有前首相片山哲、前副首相西尾、前国务大臣野沟、前邮政大臣富吉、前劳动大臣加藤、前农业大臣永江以及吉川兼光、原彪、菊川忠雄、岛上善五郎、山花秀雄等负责干部。民主党一松定吉、竹田仪一、榎桥渡等当过大臣的大人物也一起落选。

这次大选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是共产党的跃进。共产党从4席增加到35席，几乎增加了9倍。这是因为对社会党失望的分子和工人以及对征税问题不满的零散企业者支持共产党的人增多了。

主要政党得票数 and 比较情况：

党派	得票数	同前次比	增减
民主自由党	13,386,610	6,025,289	(+)
民主党	4,835,504	2,004,142	(-)
社会党	4,129,724	3,045,715	(-)

共产党	2,984,583	1,981,680	(+)
国协党	1,042,123	873,624	(-)

#### 四

吉田首相痛感到，为了实行稳定经济九原则（此事后边还要提到）必须有一个保守的稳定政权。因此，他在大选激战中就曾主张与民主党联合，民主党总裁犬养健愿意响应吉田的呼吁，但一松定吉、北村德太郎等中间派反对与民主自由党联合。大选中民主自由党取得了绝对多数，党内的强烈意见是，当然应当组织民主自由党的单独内阁。

可是，吉田茂仍然认为，尽管大选获胜，与民主党合作仍是必不可少的。1949年1月26日，吉田前往犬养住所再次要求民主党合作。犬养总裁当然为吉田首相的诚意所感动，决心合作。吉田首相2月1日从大矶到东京会见了干事长广川，听取党内形势的汇报，竟然没有出席下午2时起在党总部举行的干部会。

在总裁缺席情况下，干部会全体一致决定“干部会向总裁建议组织民主自由党单独政权”。看来，党的总裁和干部会对政权设想处于针锋相对的状态。可是，当时吉田总裁的威望很高，广川干事长、币原、斋藤、植原、林、星岛、大野、田中、山崎、大村、工藤等元老尊重吉田总裁的意向，提出意见并达成协议：党的干部会的决定对总裁没有约束力。因为民主自由党121名新人的当选，由鸠山一郎交下来的党，现在正改变面貌成为吉田茂的党。

民主自由党总裁吉田，2月10日下午4时半起在外相官邸会见民主党总裁犬养，他们和两党的干事长广川、保利的会谈结果是同意组织民自、民主两党的联合新内阁。于是，两党总裁向麦克阿瑟元帅报告上述一致意见后，发表了联合声明。

第二天，11日上午9时，根据宪法第七十条，吉田内阁总辞职，决定进行新首相提名。



这样，吉田茂在众院投票总数的451票中得350票，在参院投票总数219票中得167票，被提名为新首相。吉田首相第二天（12日）一早便着手组阁，因为新内阁要制定和推行稳定经济九原则，所以对大藏大臣的人选特别重视。接受泉山三六事件教训，吉田茂与大学时代同班同学、昭和初期就非常亲近的日清纺织公司的宫岛清次郎进行商量。在鸠山一郎要求他担任后继总裁时，吉田也找宫岛清次郎商量，听取过他的意见。可见他们关系是很密切的。

宫岛清次郎首先提出向井忠晴的名字，由于他被整肃，只好放弃这一想法。吉田催促他说：“只有两三天的考虑时间了”，宫岛感到很为难。这时继宫岛之后，担任日清纺织公司社长的樱田武对宫岛推荐了前大藏省事务次官池田勇人。池田是第一届吉田内阁、石桥当藏相时提拔起来的次官，经石桥湛山和高桥龟吉的开导，成长很快，引起了樱田的注意。据盐口喜乙著《我所听到和见到的池田勇人》一书中记述，宫岛很快就见了池田。

“在池田刚当选的那天下午，宫岛把他叫到了从东京日本桥横山町纤维批发行大街可以见到的日清纺六层干部室，宫岛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地不断提问：‘发行公债怎么样？’‘增加公共事业费……’、‘减税……’、‘盟军总部的经济政策……’、‘海外援助……’等等，池田一一列举数字认真地进行回答。经过两小时的问答，宫岛给吉田打电话说：‘池田是一个靠得住、能力又很强的人，能够胜任大藏大臣。’然后对池田说：‘你要当大藏大臣了！’参加这次会见的樱田武说：‘池田大吃一惊，不断低头致谢，他当时当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当大臣的口试。’”

大藏大臣一决定，其他也就迎刃而解，一口气就定了下来。2月16日成立的第三届吉田内阁成员如下：

内阁首相兼外务大臣	吉田茂
副首相兼厚生大臣	林让治

大藏大臣	池田勇人
法务总裁	殖田俊吉
文部大臣	高濂庄太郎
农林大臣	森幸太郎
商工大臣	稻垣平太郎
运输大臣	大屋晋三
邮政大臣	小泽佐重喜
劳动大臣	铃木正文
建设大臣	益谷秀次
国务大臣（安定总部长官）	青木孝义
国务大臣（行政管理厅长官）	本多市朗
国务大臣（地方财政委员长）	木村小佐卫门
国务大臣（赔偿厅长官）	樋贝途三
国务大臣	山口喜久一郎
官房长官	增田甲子七

民主党总裁犬养虽然没有入阁，但稻垣平太郎和木村小佐卫门两个人当了大臣。关于入阁问题，在民主党的议员大会上不少人纷纷提出批评，主张犬养总裁入阁的一派和前总裁芦田系统的在野党一派实际上发生了分裂。

在刚组成内阁的第一次内阁会上，吉田首相特别要求发言，他谈到，“在着手推行使日本经济达到自立各项政策的开始，必须实现为执行九条原则的预算平衡，为此，政府各部门都要厉行节约，要彻底杜绝浪费。那种认为在会计年度最末月份的三月如果预算用不完，就不能得到下年度预算而浪费旅费和其他经费的情况应当坚决制止。”吉田的发言，得到全体内阁大臣的同意。吉田首相知道当时美国已决心要求日本实行经济九条原则，而且态度坚定不移。2月1日和罗亚尔陆军部长同来日本的底特律银行

行长约塞夫·道奇以公使资格就任麦克阿瑟元帅财政经济问题顾问。吉田首相了解道奇的强硬态度，他正确地认识到，通过稳定经济九条原则的实施，使日本经济自立是第三届吉田内阁面临的任务。

1948年12月18日，即第二届吉田内阁时代，以盟军总部特别发表的形式公布了稳定经济九条原则。道奇公使的使命就是指导实行九条原则。在叙述九条原则之前，应当说一说11月4日总部提出的工资三原则。吉田茂在《十年回忆》第三卷中以“恰合我意的稳定工资三原则”为题，描述了当时日本经济是处在多么困难的境地：

“盟军总部就这个问题阐明了对工资的见解，使我大大加强了信心。盟军总部当局11月4日关于提高工资问题曾明确提出所谓工资三原则，即：(1)不得由于提高工资，而进行导致赤字的贷款；(2)不得调整物价；(3)不发补助费。当时我深感日本的企业动辄依赖政府的统制和保护，以致丧失了自主性和经济性，而盟军总部正在此时提出了上述三原则，所以说是正中我意。

“当时，强烈的通货膨胀仍然发挥着余威，如果说得极端一些，正是物价无止境动荡不安的时代。就物价而论，几乎对所有的商品都规定了法定价格，实际上涨的就是所谓黑市价格，而国民的生活费，特别是城市工资生活者的生活费，无法不受它的强烈影响。因此，如果说工会的提高工资要求漫无止境，也并不过分。提高工资的要求，当然是和罢工分不开的。如果实行联合罢工，生产就要陷于停顿。因为当时迫切需要增产，所以即使罢工一天也会造成严重后果。尤其煤炭等基本产业更是如此。因此，特别是在最初，盟军总部有关部门曾有这样的见解：为了避免生产停顿，增加工资的要求即使不甚合理也可以接受。

“这种情况和想法便使人产生了赤字贷款、发补助金以及调整物价。所谓赤字，就是由于提高工资，致使入不敷出的部分用贷

款来弥补，这笔款子由复兴金融金库等借来。现在想来，政府当局鼓励用借款来弥补营业收支赤字这种异常的措施，虽然十分荒谬，但在当时来说，可能是出于不得已的。在这种为弥补赤字而贷款之外，还采用了调整法定价格，也就是准许提高价格以增加企业收入，或者根据情况由国库发给补助费使其摆脱困境等办法。这些办法，在当时来说，虽然是不得已而采取的，但是它必然要引起工资和物价的所谓恶性循环。在我的第二届内阁成立之初，即盟军总部明确提出上述三原则的1948年底，可以说正是经过这种恶性循环之后生产已逐渐增加的时期，同时也是朝野上下对于恶性循环已经难于忍受的时期。”

吉田首相也好，池田藏相也好，都意识到指导1948年6月18日西德进行通货改革的道奇公使业已下了相当大的决心，指示推行紧缩财政政策。但道奇的活动一开始就使藏相忙得团团转。道奇公使所谓“切断高跷脚”的那种大刀阔斧的改革，连吉田茂也感到吃惊。

## 五

经济企画厅战后经济史编辑室所编《战后经济史》一书载称，1948年12月18日，作为盟军总部的特别文件，公布了有关稳定日本经济九项原则和美国政府的指令以及麦克阿瑟元帅根据这些指令给吉田首相的信件。书中把所谓“经济九原则”归纳为：

“一、严格控制支出，最大限度地扩大包括必要而适当的新收入在内的政府全部收入，以期在最近的将来实现综合预算的真正平衡；

“二、加强和促进推行税收计划，在广泛范围内对漏税者采取迅速而彻底的追究刑事责任措施；

“三、慎重提供资金贷款，仅限于给真正对日本经济复兴有贡献的事业，要限制提供信用贷款；

“四、制定实现稳定工资的有效计划；

“五、加强现行价格统一控制的计划，如有必要，可扩大范围；

“六、改善外国贸易管理的工作，加强现行外汇管理，以便能够委托日本方面的机构采取有关措施；

“七、以最大限度振兴出口贸易为目标，改善现行的分摊、配给制度；

“八、谋求增加所有重要国产原料和工业品的生产；

“九、提高粮食交售计划的效率。

“推进上述计划，以期尽早设定单一汇兑率。”

上述九条原则和1948年7月麦克阿瑟元帅对芦田内阁指示的经济十原则，几乎完全一致，没有什么特别新的内容。十原则减为九原则是把有关征收租税的两项合并的结果。十原则没有直接提到有关财政支出的削减，仅仅停留在要求有计划削减特别会计赤字程度上。与此相反，九原则在强调确保包含一般会计的综合预算的均衡和把提供资金贷款的对象限于被认为真正对日本经济复兴有贡献的事业等方面都有所不同。而且十原则把有关财政金融部分放在后半部，九原则则不同，将其放在前半部，这也是很引人注目的。

但是，与这些小小的差异相比，根本性的差别在于：十原则不过是盟军总部对虚弱的芦田内阁的劝告，没有收到任何效果；而九原则则是在美国看到中国接近共产化的情况下，决心使日本经济自立和稳定而对吉田内阁发出的指令。

12月27日下午，吉田首相在外务省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谈了政府对经济九原则的决心。他说：

“18日发表的麦克阿瑟元帅有关经济九原则的信件可以解释为总部历来要求日本实现自立政策的催促公函。政府认为应当认真考虑有关实施问题，尽早成立由我当委员长的研究委员会。为

了引进外资，首先要使接受外资的体制完备起来。经济安定本部的五年计划准备先从繁荣国内市场着手，创造条件，而麦克阿瑟元帅的信指出，在国内市场狭小的国家里，还是应当把扩充国外市场作为重点，才是经济复兴的捷径。委员会当然要对这两方面进行调整。为了获得出口市场和重建国内产业，要求国民暂时忍受艰苦的生活是正确合理的。”

吉田首相在大选中获得大胜，在绝对多数基础上建立稳定政权以后，最先碰到的问题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实行经济九原则。吉田内阁先抓九原则的实施，从2月18日起着手编制1949年度预算方案。23日决定了总额为5,780亿日元的预算大纲草案，其主要内容为下述五点：

“一、 废止贸易高税，作为替代财源，创设数种新税；

“二、 对价格差额的补贴金要特别压缩，对煤铁等基础物资，一定程度上补充提价；

“三、 公共事业尤其要重点进行灾害复原工作；

“四、 铁路、通讯等特别会计坚持独立核算制的原则，不从一般会计依次计算，提高货物运费和通讯费用；

“五、 为厉行预算节约，坚决进行行政整顿，这部分钱用于安排失业和灾害复原方面。”

由此可见，1949年度预算完全是遵循九原则的紧缩预算。

吉田茂3月15日向国会提出预算方案为目标，开始同盟军总部交涉。但3月22日道奇公使所拟定的内部预算方案却是一个总额超过7,040亿元的超均衡预算，和政府方案完全不一样。道奇的预算方案，不仅一般会计均衡，连特别会计和总计、政府有关机构部分也是均衡的。扣除重复结算的纯利，为年收入2.54兆日元、<sup>①</sup>年支出2.38兆日元、1,567亿日元的黑字预算。因为民主自

<sup>①</sup> 日文中所说的“兆”是一万亿。——译者

由党在选举中作过保证，要减轻所得税、撤销贸易高税、增加公共事业费等，可是这些都不能实现，在党内引起轩然大波。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大藏大臣池田几乎决心辞职，吉田首相知道道奇公使高度评价池田藏相，所以挽留了池田。政府于4月4日向国会提出了道奇预算。

有泽广巳校阅的《昭和 economic 史》对道奇公使的想法有如下的描述：“从道奇有关财政的考虑看，他是站在自由经济论基础上的一个严格的均衡论者。当时道奇的笔记本上记着这样的话：‘有三个单纯的真理：第一，生活水平只能根据生产的增加而改善——一个人的消费不能高于自己的生产；第二，储蓄是进步的必要前提条件；第三，国家财政实现均衡，要求国家支出不能超过该国经济的可能性。’

“道奇来到日本和他的顾问班子一道研究了手头的资料，经过深思熟虑，3月7日才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表明了他的政策想法。他表示无意采取货币等措施，如果没有足以维持汇率的经济能力，设立单一汇兑率也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更重要的对策是首先紧缩财政金融，控制通货膨胀。结论是：1. 不能容许日本从美国国民税金中得到援助来维持生活；2. 日本人要靠自己用更廉价的生产费用进行生产，应当由储蓄和节约来积蓄资本。道奇在补充中还讲到，美国已支出了12.5亿美元，‘日本经济象是两脚不着地踩高跷，高跷的一只脚是美国的援助，另一只是国内提供补助金的机构。高跷过高，就有跌倒、摔断头颈骨的危险’。”

道奇公使来日本前夕，曾任全美银行协会会长职务，声望和实力不言而喻。仅仅经过17天的审议，4月20日道奇预算获得通过。5天以后开始实施一美元兑换360日元的单一汇率，道奇公使试图控制通货膨胀、使日本经济自立的目的，由于执行这一预算而圆满实现。1948年底日本银行券发行额为3,552亿日元，到第二年6月底减少到3,006亿日元，同年12月底，也只为3,553亿日元，基本上停留

在头一年年底的水平。至于消费者物价，1948年平均为100的话，第二年6月底为138，同年12月底降为134，又过一年到6月底降为123。

控制通货膨胀避免不了所谓稳定危机。1948年底，失业人数26万，一年之后达到34万，一年半后增加到43万。特别是中小企业受到很大打击，据“农户经济调查”结果表明，农家生活出现了亏空。稳定危机当然伴随着社会不安。如果不是强有力的政府，是难以支撑的。占领军总部的支援自然必不可少。但是，吉田内阁在大选中取得压倒胜利这一内政方面的因素也不应忽视。

道奇公使的超均衡预算不单单使民主自由党的公约不能履行，而且加重了日本国民空前的租税负担。在众院的意见听取会上，东京商大的井藤半弥教授作证说：“税金占年收入的91%，国民所得的26%，这是明治、大正、昭和以来最高的。”难怪道奇预算刚在内部提出，民主自由党议员会上就有人要内阁总辞职。4月8日众院预算委员会上民主自由党的上林山荣吉议员提出质询，追究池田藏相说：“大藏大臣表示下最大决心进行，可是既然作出了那样的公约，你将负责采取什么行动呢？”

在面临这样危机之时，吉田茂的领导能力最鲜明地发挥出来了。他断然平息了党内的不满，强烈责备了上林山议员。宫泽喜一所著《东京—华盛顿密谈》一书，描述当时情景说：“大家都很激动，只有池田一人无精打采。在吵吵嚷嚷达到高潮时，吉田突然出现在面前，他立刻控制住局面。当时对吉田是有压力的。可以想象，吉田迄今对道奇这样的人及其背后华盛顿的势力等一直注意观察，他可能判断，在这种情况下还是附合他们为上策，如果走错了，对方还可给以帮助。”

我认为，宫泽的考察和判断还是很高明和切合实际的，吉田茂的行动方式是在慎重观察的基础上，从大局上做出正确判断，充分显示了第三次就任内阁首相的成熟程度。

如果吉田首相动摇，党内就要堕入一片混乱，池田藏相则势



必辞职。一度信任过的人物，只要不发生背叛就坚定支持到底，吉田茂这种固执的性格在这一时刻表现得最为明显。从困境中得救的池田勇人终生深深尊敬和衷心景仰恩师吉田茂也是很自然的。“全托吉田先生的鸿福，我才能有今天”成了池田的口头禅。

## 六

执行道奇预算的1949年正是欧洲进行冷战、中国革命迎来最后阶段的岁月。2月22日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发表声明说：“如果苏联军队进入法国，法国共产党将站在苏联一边，欢迎苏联军队”，4天以后意大利共产党陶里亚蒂也发表了类似的谈话。在这种紧迫的情况下，以美国为中心，英国、法国、加拿大等西方12国4月4日缔结了北大西洋条约，北大西洋公约定于8月24日开始生效。6天以后，英美法三国明确了在西德建立联邦国家的设想。5月6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了临时政府，9月7日西德议会开会，同月20日，阿登纳为总理的联合内阁宣告成立。10月7日，在苏联占领区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欧洲的冷战虽然由东西德政府的诞生进入了新阶段，但5月5日，美英法苏四大国之间发表关于解除封锁柏林的声明，非常引人注目。就连斯大林那样的人，在美国不惜空运柏林市民所需要的食品、燃料这种坚定的决心面前，也不能不后退一步。

中国的局势发生了急剧的转折。1月21日蒋介石辞去国民政府总统职务。10天以后，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北京）。4月21日，毛泽东命令发起全面进攻，当天，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两天之后攻占南京。这样，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的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只要考虑一下欧洲和中国的上述急剧变化，吉田首相是在怎样的国际环境下、面临着怎样急待处理的课题，便不言自明了。1月23日的大选，民主自由党取得绝对胜利的同时，共产党的跃

进也是值得注目的。共产党的得票增加了将近200万张，接近300万张选票，从4议席变成了35席，增加将近9倍。对于厌恶共产主义的吉田茂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危险信号。在组阁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吉田首相回答了有关共产党对策的问题。

他说：“对此我想考虑一下，请你们看将来执行的方针政策。因为想了解美国的非美活动委员会的组织，所以决定索取一些资料，我想这个委员会将有参考作用。至于具体对策的详细情况，所谓非日活动怎样进行才好也要了解一下。听说共产党在税务署利用减少税收的方法来提高自己的声望、获得支持，这是不合法的，我想进行详细调查。征税方法，如果有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因此，要在税制审议会上加以研究。法律和规章制度的修改，还不大清楚。此外，教师进行共产党的宣传，教唆破坏社会和进行革命，这是很成问题的，要严加管束。”

吉田首相想废除不正当财产交易调查特别委员会，创设非日活动委员会，结果成立了两个机构合并的考察特别委员会。3月9日，民主自由党提出了关于设置考察特别委员会的决议案，克服了社会党、共产党的反对，考察委员会从4月份开始活动。在吉田首相同盟军总部磋商基础上修改了1946年第101号敕令。4月4日公布了名为团体等矫正令的政令。第101号敕令虽规定解散右翼团体，整肃其成员，而团体等矫正令，除极端国家主义的团体之外还以反民主主义团体为取缔对象，不言而喻，目的是为了限制共产党的活动的。

1949年5月4日，内阁会议决定了以对行政机关267,000人进行整顿为内容的行政机关职员定员法案。5月11日向国会提出，30日获得通过。这一行政机关的整顿可以说是近代日本政府成立以来空前规模的行动。267,000的数字虽包含着缺员，扣除之后也要精减22万人，这是一项相当困难的工作。没有吉田首相坚定不移的决心，无论如何是无法实现的。

大量解雇当然要带来社会不安。日本共产党在6月18、19两天,召开第十五次扩大中央委员会,会上总书记德田球提出了具体行动目标。

6月30日福岛县平市发生的平市事件,7月5日国营铁路总裁下山定则去向不明。第二天在常磐线上北千住和绫濑之间铁路线发现被车压死尸体的下山事件,7月15日中央线上三鹰站无人电车乱跑乱撞事件,以及8月17日东北本线金谷川、松川之间列车翻车三人死亡的松川事件,都和“解雇”、“九月革命”的社会背景有关。平市事件是令人震惊的不幸事件,在共产党地区委员会领导下,大约500名工人和朝鲜人袭击了平市警察署,使在进出口加以阻止的10名警察负了轻重伤。约30人占领了警察署,拘禁警官,使这个警察机构完全陷于瘫痪。

下山事件是自杀还是他杀又当别论,下山总裁是在国营铁路开始通告第一次精减37,000人的第二天去向不明的,后来发现了死尸,带来了严重影响。7月12日,第二次通告精减6,300人。7月18日,铃木市藏副委员长等国营铁路工会中央斗争委员会里的共产党及革同<sup>①</sup>派的14名委员被解雇,主张合法斗争的民主化同盟(民同)派掌握了国营铁路工会的主导权。结果,这一年6月到8月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反而剥夺了反对解雇斗争的活力,可以说,使吉田内阁精减人员的工作获得了成功。

这些奇奇怪怪事件,被一些人指责为共产党的阴谋,但也有人认为,在这种使左翼势力遭到孤立的背后,一定是占领军遏制共产党策划的谋略。东西方的冷战使日本国民分成了亲美和反美两大对立阵营。以吉田内阁为中心的保守势力,把苏联看成是冷战的制造者,亲美反苏的色彩越来越明显。与此相对照,不仅共产党和社会党,就连知识分子的主流也都把冷战的 responsibility 归之于美国,显

---

<sup>①</sup> “革同”是指国铁革新同志会。——译者

出示反美亲苏的倾向。他们的特征是，认为冷战起源于杜鲁门主义，忽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到1947年初三年中间斯大林的苏联如何占领东欧实现共产化，或者对此故意视而不见。

1948年12月12日，安倍能成、仁科芳雄、大内兵卫等聚会讨论和平问题，成为1950年1月15日和平问题座谈会发表媾和问题声明的先声。岩波书店发行的杂志《世界》刊载了上述声明，《日本评论》、《世界评论》、《潮流》、《人间》等杂志也刊登了这一声明。1949年12月9日东京大学校长南原繁出席华盛顿举行的美国占领地教育会议时，恳切希望“美国 and 所有盟国一致协力早日同日本缔结和约”，他说，尽管东西方分裂成两个阵营的世界存在着战争的危險，但是“日本应当严格遵守中立，不参加任何战争”，这与和平问题座谈会的声明是一致的。

但是，国际政治中冷战激化的严峻现实，把全面媾和的可能性推向十分遥远的将来。1947年7月11日，美国与组成远东委员会的11国政府，协商召开对日和平预备会议，由于苏联主张应由四国外长理事会草拟对日和约拒绝放弃否决权而未果。

1949年5、6月间，在巴黎举行的四国外长会议，苏联提出对日和平问题，建议召开美英苏中四国外长理事会，也因为对会议召开方式问题同其他国家对立无法解决而流产。同年9月，华盛顿举行的英美法三国外长会谈声明“对于远东问题，三国意见一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开会前夕关于对日媾和问题表示，“就是否有可能找到某种新的办法解决程序问题，重新进行全盘研究”，与上述声明结合起来看，暗示了排除苏联在外，由多数国家向媾和方向前进的情况。

1949年11月12日，代表参议院无党派议员恳谈会的太田敏兄议员提出问题说：“最近美英和澳洲一些国家传出，如果苏联不同意英美方案，有人认为将不得不进行单独媾和。假定单独媾和成立的话，只与特定国恢复邦交，而与其他交战国依然继续保持战争

状态。我认为，这不能说是真正恢复和平。应当坚持同所有交战国实现全面和平。”对此，吉田首相进行了引人注目的答辩：

“正如我昨天说过的，现在问题不是单独媾和或全面媾和，哪一种好，这是要根据国外的情况，即外交的国际关系来决定的，我们没有选择的自由。但就盟国的希望来说，恐怕愿意全面媾和，如果不能全面媾和，对不愿意全面媾和以及不愿对日媾和的国家也不能强制非要全面媾和不可。因此也有可能单独媾和，可是并不能肯定就是单独媾和。对于假设的问题，我们今天在这里不能随便发言。

“也可以这样来考虑，从单独媾和走向全面媾和过程中作为一种途径，可能产生单独媾和。不论如何，即使能同少数国家媾和，也比不媾和要好。我抽象地认为如果它是导致全面媾和的一条途径，更应当高兴地予以响应。当面临具体问题时，政府将决定方针和进一步阐述。”

应当说，吉田首相抓紧进行单独媾和第一步的想法是符合国际政治现实的。

## 七

这里要谈一谈日本政府为了缔结和平条约，自战争结束以后一直进行的工作。1945年11月21日，外务省干部会决定设立和平条约问题研究干事会。第二年1月16日第一次开会时确定了首次研究的题目，5月22日，干事会又进一步制定了研究计划，到了1947年5月，外务省邀请其他省厅代表成立了各省联络干事会，并根据同年8月6日的会议决定成立了以外务省次官为首、各省厅局长级干部组成的国际委员会。其结果，用《十年回忆》第三卷的话来说，搞了“数十册、数十万言”的说明材料。吉田茂是这样说的：

“想要使美国替日本作代言人申诉日本的主张，就必须向美方提供充分的说明资料，并且这种资料必须适合不甚了解日本实

际情况的美国政府的需要，而不是适合实际了解日本情况的盟军总部的需要。因此，我们早在停战后的第二年，即1946年秋季，就已经着手编写一系列的英文资料。为了使对方对日本的实际情况有所认识，我们首先准备了全面性的资料，即《日本的现状》的经济篇和政治篇，以后又随时对这些资料作了补充和修正。经济篇所叙述的内容是：日本在战败后领土丧失45%，人口反而增加了500万，在资源贫乏的国土上残留下来的工业设备几乎全部遭到战争破坏或陈旧不堪，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重建是十分困难的。政治篇叙述的内容是：尽管经济情况如此困难，但是在政治方面，却正在清除过去军国主义的残余，积极建立真正的民主体制。

“此外，关于领土问题的资料，也是我们费力最大的资料之一。关于冲绳岛、小笠原群岛、库页岛、千岛群岛、齿舞岛和色丹岛等，我们从历史、地理、民族和经济等全部观点，详细叙述了这些岛屿与日本不可分割的关系。尤其关于千岛、齿舞和色丹等岛，曾详细陈述理由，证明它们是日本传统的固有领土。仅仅领土问题一项就编写了7册资料。

“我们最初还有些担心，美国方面究竟能否接受这种资料，但是，从1948年起，在盟军总部外交处的谅解下，由外务省以极不正规的方式送交该处，并由该处转交华盛顿。据说华盛顿方面对此颇有好评，认为这些资料很有参考价值。这一良好反应使我们得到了鼓舞，此后便以外务省为中心，在有关各省的协助下，就日本的人口、战争损失、生活水平、赔偿、航运以及渔业等问题，编写了长达几十册、几十万言的资料。在1950年以前的两年中，凡是可能与和约内容有关的事项，基本上都搜集无遗，编成资料后提交对方。因此，我认为，美国政府在1950年着手起草和约草案时，就已经充分掌握了我方提出的资料。”

以上都是事务性的工作。政治方面进行媾和的试探和结束占

领之后如何保障日本的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吉田茂在《十年回忆》第三卷里，对芦田均外相付出的一切努力，作了公正的评价。

1947年“7月28日，片山内阁的芦田外务大臣在与片山首相磋商的基础上，曾对艾奇逊大使和民政局长惠特尼少将提出过日本方面关于和平条约、特别是关于安全保障问题的愿望的文件，在形式上，惠特尼少将虽于次日以‘盟军总部目前还不便接受这一文件’为理由表示拒绝，但据说由于艾奇逊大使在临时归国途中发生飞机事故遇难死亡，上述文件也损失了。此外，我们还通过种种形式，一有机会便向盟国、特别是美国提出我方向7月访日的澳大利亚外长艾波特所提交的同样内容的意见书以及希望和意见。

“最初，据外务省的许多人观测：如果媾和后盟军留在日本，将会象凡尔赛条约签订后德国被占领的先例那样，成为一种为了保证履行和约的保障占领的形式。但是后来，我方也察觉到，由于美苏关系进一步紧张，保障日本安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美国的看法便逐渐向‘日本的安全保障是国际安全保障的一环’的方向转变。并且，日本本身的看法也倾向于：与其仰赖在当时看来还不十分可靠的联合国，不如直接依靠美国，以便在媾和后，暂时维持国防。

“例如，1947年9月3日，币原喜重郎、松平恒雄、佐藤尚武和我一共4人，特地在参议院议长官邸聚会，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当时币原先生发表过这样的意见，大意是：‘我不赞成对于加入联合国一事寄予过高的希望。日本受到外国侵略时，不可能指望任何一个国家会牺牲自己的兵力来保卫日本。而且即使美国能够援助日本，也是由于美国本身的利害，而未必是由于联合国的存在才援助我们。’我们后来得知，恰巧在同一天，美国也表明：美国政府已经决定单独承担保障日美安全的任务，关于在日本设置军事基地的问题，应通过缔结日美共同防御协定或在和约中加

以规定的办法来解决。

“如上所述，片山内阁诞生后不久想使华盛顿政府理解日本对和约的看法这一企图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同年9月13日，美国第八军司令艾克耳伯格中将因事暂时回国，我方遂将关于保障独立后日本安全的意见书托他转交美国政府。这个意见书是经过片山内阁的外务大臣芦田和官房长官西尾的同意，并在‘对于国内则由外务大臣负责提出’的谅解下，委托转交的，所以发件人的署名是当时的停战联络事务局长铃木九万。意见书的内容是：首先表明了日本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国内骚乱镇压下去；然后说，‘当此国际局势日益不稳之际，我们认为保障日本独立的最好办法，是一方面同美国缔结特别协定，以防备第三国侵略，另一方面从陆海两方加强国内的警察力量。日本国民希望至少在联合国能够按照宪章的规定实际发挥其机能以前，由美国来保障日本的安全。’这个文件的理想是：美国应保持其驻在日本周围的兵力，一旦有事，日本应提供可供美军使用的国内基地。所以虽非积极希望美军驻扎日本，但其方向却和后来形成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基础的想法完全一致。

“我的第二届内阁是在1948年10月成立的，我们认为日本的方针只有大体上遵循上述片山内阁时代的路线，所以内阁虽然更替，但我们并不认为必须改变这个方针。”

芦田外相和西尾官房长官磋商后，以停战联络中央事务局长铃木的名义写了备忘录，交给艾克耳伯格中将。马蒂·维斯坦教授在《战后日本的防卫政策1947-1968》一书中特别强调了这份备忘录的重要性。

## 八

吉田首相认为，有必要利用道奇预算使日本经济基本走上正轨的机会，重新向美国传达有关独立后日本防卫的基本设想。左翼



政党以及理想的甚至空想的和平主义的知识分子高唱的全面媾和论，在严峻冷战之下，很明显是不能实现的。称之为“可能性的技术”的现实政治范围内不存在全面媾和还是单独（多数国）媾和的选择，只存在同以美国为中心的多数国家媾和的一种可能性。如不愿意，只好忍受继续占领的状态。基于这种立场，吉田首相决定派遣大藏大臣池田亲赴美国。但是如果形成从占领下的日本越过盟军总部，由国务大臣去美国的局面也是不妙的，陪同池田藏相前往的宫泽喜一在《东京—华盛顿密谈》中写了这一时期的困难情况：

“最成问题的是麦克阿瑟这样一位占领者对这一问题的考虑。当时他的心情是：一方面，日本的事情由自己承担，既然由自己承担了，美国就不应再更多干预；但另一方面，他又喜欢摆出一副自己犹如是新天皇的架势，君临在日本政府和国民之上进行统治。

“我自己对于司令部迄今为止的所谓内部情况已经相当了解，我感到麦克阿瑟周围那些奉承拍马的军人怎样把他捧上了天。在直接同他见面恭听他近一小时高论时，给我的印象是：这个人相当了不起；可是另一方面，对他自己的任何批评都极端神经质，他认为自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存在，那种自负令人不能不想起过去见普鲁士皇帝时那种不愉快。

“因此，要想从他的统治下摆脱出来，派得力的阁僚直接到占领母国<sup>①</sup>去，如果不很巧妙地提出来，不仅会立刻遭到他的拒绝，而且令人担心会给今后他对日本政府的态度带来不利影响。”。

宫泽引用了1950年2月24日吉田茂给池田勇人写的信：“拜启老兄赴美一事，拟于下周与元帅面谈时提出。此事直到出发之前，一定要保持绝密。否则，效果将受影响，千万慎重，勿使他人知晓。深知你不会有失误，谨慎起见，特再提醒。特此，致意。

<sup>①</sup> “占领母国”是指美国。——译者

敬具。”

吉田首相对麦克阿瑟元帅谈到访美目的说：“让大藏大臣赴美是要实地考察学习先进国家美国的财政经济情况，作为将来我国制定方针政策的参考，同时由他把过去一年来道奇计划执行结果和具体情况作一报告。”道奇在1949年底第二次访日结束时也对麦克阿瑟元帅提出是否让藏相去美国一趟的建议。这样，池田藏相的访美之行得以实现。

池田藏相访美，有几点要从大藏大臣的立场向美国方面说明。关于1949年度道奇预算，由于苛刻的征税，造成国民生活困苦一事已如前述。据说5月10日肖普博士的税制代表团到日本来也对苛税之严重感到吃惊。认真考察日本实际情况后，肖普博士8月26日对国内外记者发表了第一次税制改革方案概要。9月15日，总部公布了肖普建议书全文。

建议书把废除贸易高税、减轻所得税等吉田首相等人所期待的内容基本上都包括了。所以首相发表声明准备接受这一建议并付诸实施。1949年10月30日，人们盼望的道奇公使第二次来到日本，与池田藏相编制了1950年1月1日起到第二年3月底15个月的预算。

这期间池田与道奇的谈判是在两个人相继生病卧床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道奇对池田藏相的书信指示，从病床传到病床。《十年回忆》第三卷里写道：“11月14日，内阁会议好不容易才作出决定，准备把补充预算提交国会审议。事后据池田说，道奇先生对那天内阁会议的圆满结束也非常高兴。据闻，道奇先生曾说：‘这样一来，池田患的Dodge fever(道奇热病)也会好了；我患的池田 fever(池田热病)也将痊愈。’当时我认为道奇尽说些令人难解的话，不过他的确也很幽默。”

池田藏相深为道奇所信赖，他在要求缓和道奇计划的舆论背景下，到美国再次会见道奇，想就肖普建议的减税、处理美国援助

物资出售后的基金、提高工资水平、发放存款部资金、缓和偿还债务等问题进行会谈。为了准备6月份进行参议院选举，要求缓和超紧缩政策更有必要了。

池田大藏大臣出发前夕，前去拜访吉田首相，并说：“日本国内关于媾和问题已经甚嚣尘上，今后政府制定政策时对此要有明确考虑。到了美国当然也会问起此事。”池田是在试探首相对媾和问题的想法。盐口喜乙著《我所了解的池田勇人》一书写道：“要想欺骗别人的话，首先得瞒过自己人。连池田都深信不疑这次赴美的目的是解决财政经济问题。”宫泽喜一著《东京-华盛顿密谈》也写道：“就我所知，吉田首相直到这时对于媾和条约这个最重要问题的基本设想，似乎还没有和任何人透露过。”由此可知，吉田茂严守外交的机密是多么彻底！

由于池田藏相的提问，吉田首相才讲出了心里话。吉田指示池田，把他“也可以由日方提出要求美军驻留”的真实心意，适当地转达给美方并探询对方的意向。

1950年4月25日，大藏大臣池田在秘书官宫泽喜一和白洲次郎特使陪同下出发前往美国。作为内阁大臣，从被占领下的日本第一次去美国，池田勇人必须忍受许许多多的屈辱。据《我所了解的池田勇人》载称，池田藏相在盟军总部文件上签名时，要他接手印。书中写道：“好象是按了姆指指印。池田满枝夫人遗憾地说‘一国的大藏大臣，竟然……’。筹集旅费似乎也很困难。据说也是满枝夫人透露的情况：‘把有人临别赠送的珍珠项链让同池田一起去的人卖给了在美国的日本人，这才换了些钱，摆脱了困境。’”

到美国后住的华盛顿旅馆是一家很古老的中等旅馆。难办的是，从日本出发时，所宣扬的是考察和学习，各省厅的观摩、学习等日程就排满了两个星期。池田藏相对此向道奇表示不满说：“我们不是来游玩的！”道奇回答说：“这我刚刚知道，如果不这样

安排，东京的总部就会挑剔说闲话。弄成你我之间越过麦克阿瑟决定日本什么问题，那就不得了啦！夜里和星期天不是都可以谈问题吗！？”

5月3日下午，池田藏相在秘书官宫泽陪同下，往访道奇办公室，谈到了吉田首相指示的有关媾和问题的内容。

“我受吉田首相的委托，转达如下内容：‘日本政府希望尽早缔结和约。而在缔结这种和约之后，为了保障日本和亚洲地区的安全，恐怕还需要美国军队驻扎日本。如果美方不便提出这一希望，日本政府可以研究由日方提出的方式。关于这一点，曾经参照许多宪法学者研究的意见，据说如果和约里写上让美军驻扎的条款，宪法上将产生不少问题。因此有的宪法学者提出，日方以其他形式要求美军驻留，是不违反日本宪法的’。”

## 九

根据宫泽喜一的《东京-华盛顿密谈》一书所载，我们来继续引用池田藏相1950年5月3日对道奇的谈话。

“1949年2月，美国陆军部长罗亚尔到日本时讲过，美国战略上并不需要日本。现在日本人对这种放弃日本的论调依然记忆犹新。尤其是回顾此后发生的事，美国对台湾的态度是不明确的。对美国是否会真正坚持保卫亚洲这一地区，日本人持相当怀疑的态度。再则，法属印度支那共产党人势力不断扩展。至于南朝鲜，也相当不稳定。人们担心，如果万一出现某种情况，美国会不会抛弃这一地区。退一百步说，即使目前不能媾和，美国应当在政治、经济上给日本更多的自由，建立尽可能接近独立的体制——导致事实上接近媾和的地步。根据这一期待，日本国民支持吉田内阁。如果不能媾和，将再次导致政治上的不稳定。”

如宫泽所指出的，池田发言中关于南朝鲜的部分，因为不久就发生了北朝鲜军队的南进，这是令人特别感到意味深长的。

池田、道奇会谈记录是由两个人签署的。官泽写道：“不管怎样，5月3号的备忘录是日本首次对美国表示媾和以后承认美军驻扎，以促进缔结媾和条约。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基础就是以此为开端产生的。第二年9月，媾和条约得以缔结。”

通过访美，池田大藏大臣不仅看到了关于解决财政经济悬案的前景，而且转达了吉田首相关于媾和问题的重要想法，不虚此行地完成了使命，感到很满意。他经纽约回国，藏相一行在纽约接到吉田首相的指示：“我要为参院选举外出游说，想在5月21日在京都与你们见面，按着这一时间安排回国。”就这样，发生了有名的“访美礼物事件”。还是听听官泽喜一在《东京—华盛顿密谈》一书中是怎样说的吧：

“5月21日早晨到达羽田后，人群熙熙攘攘，非常嘈杂。详细过程已记不清了。当时首相秘书官要我们立刻到京都去，我们问：‘不到麦克阿瑟那儿去行吗？’回答说：‘已经得到对方同意。……，在火车里问了一下不在东京时的情况。听说从驻华盛顿的两个日本记者发往东京报社的来电中，茫然感到似乎与盟军总部之间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

“到了京都附近，乘务员进来，交给我一封电报，当时拍电报还不怎么自由，而且是用英文写的。上面写着：大藏省渡边财务官发 京都站长转 大藏大臣秘书官官泽喜一收。

“马贵特、惠特尼两将军命我将下述内容在大藏大臣进入选举运动之前，立即拍电报转达给你们：

“一、这次大藏大臣的访美目的是视察美国情况和说明日本的实际状况。这一点，大藏大臣访美之前就很清楚。因此，这次访美把有关经济问题，即所谓缓和道奇计划，作为政治性谈判的内容是非常不妥的。

“二、根据道奇的来信，他已对大藏大臣强调了日本将来的政策应服从占领军最高统帅的决定，大藏大臣本来无须直接对美

国当局讲话。

“三、我们认为，作为首相和大藏大臣，把道奇计划获得缓和这事作为政治运动，是非常失礼的。如果有这种事，今后与总部之间在执行经济安定计划上将发生困难。”

宫泽喜一说：看了这份电报，心里很不痛快，说得粗一些，只能用“混蛋，你胡说什么！”来表达。特别是“如不服从这一命令，‘将发生困难’等话非常无理。当时在他们看来，你们是被占领国的国民，这使我们十分愤慨。不愉快的情绪简直无法形容。”人们对宫泽这种坦率的自白是能充分理解的。

这份电报由马贵特和惠特尼两位将军联名发来，所以情况是严重的。据宫泽喜一说：“说老实话，这两位将军都是不值得评论的人。他们两个人都是从菲律宾的巴坦岛跟随麦克阿瑟的奉承拍马之辈。不仅互相争宠，彼此不和，而且在工作上，例如，惠特尼唆使人事院提出提高工资的建议，使马贵特不得不以财政上的理由加以反对，不妨说是一对利害相反、水火不相容的死对头。他们两个人一起行动，就说明麦克阿瑟站在背后。”

池田大藏大臣在京都向吉田首相禀报之后，乘夜车返回东京，第二天一早就到马贵特少将那里进行回国后的礼节性拜访。宫泽喜一在书中写道：“尽管事前进行了联系，可是到了司令部门口，马贵特的副官出面说：‘马贵特有急事不能见，让我代他致意。’马贵特少将可能想用这种失礼的方式来表达他的不满吧，而带来的严重后果是让人震惊地感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充满憎恶、刻薄、嫉妒、怨恨的阴暗感情。报纸上开始登载许多‘盟军总部与政府之间关系急剧冷却’一类的报道。宫泽喜一谈到了这种奇妙事态是怎样解决的：

“这一时期真是无依无靠。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这种状态好象持续了半个月左右。可是一查记录，是自己记错了，混乱的状况到5月30日基本上解决了，还不到10天时间。因为太苦恼了，

所以觉得时间很长。

“这10天时间，各式各样的人在奔走。我们还为华盛顿特派记者在给东京拍的电报中所称关于池田谈话，给马贵特写了一份解释性文件。总之，全是些令人不快的事。

“最后，简直是荒唐透顶，他们竟决定按步骤先由大藏大臣向首相提出访美报告，其中可以提今后拟实行的政策措施（即把在华盛顿谈过的作为希望提出），首相批阅报告后，把文件送到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处求得‘指导和意见’，再由麦克阿瑟写信回复。这样的安排意图是使我们沦为被占领国国民身分，举止动作都要与此相符，而麦克阿瑟及其司令部则可以再次发挥占领者的权威和尊严。

“5月25日，麦克阿瑟给吉田首相写了回信。这一记录现在还留在我处。信里总的意思是，池田考虑的事只能到明年才能实行，目前履行选举公约，谈明年的事会成为笑柄。所以编制明年度预算时再提出本年度的补充预算等等。与此有关的，在5月30日，要求自由党总裁发表谈话，声称减税和提高工资也要到今年下半年制定补充预算时再说。就这样，并没有什么事后的申斥。”

吉田首相对池田藏相报告批写的信件日期是5月22日，藏相的报告提出，在华盛顿和道奇会谈的结果，如得到总部的承认，则拟付诸实施，希望首相请盟军统帅研究。其中包括建立百分之百政府投资的输出入金融机构，提高公务员工资，扩大对政府企业存款部的贷款，减税等有关缓和道奇计划的建议。

对此，麦克阿瑟5月25日的回信是近三页打字的长信。开头指责池田藏相的建议违反经济九原则，而对于根据九原则取得巨大成果的道奇计划则自吹自擂。1950年4月的工业生产达到1932到1936年水平的104%，同月的出口达到6,100万美元，消费者物价指数也比上一年降低11%。因为已经获得这样的成就，麦克阿瑟表示，池田藏相的建议将来应予研究。

“将来应予研究”这一点以及可以编制第四季度补充预算的项目，立刻被吉田首相、池田藏相抓住了。因此得以在5月30日为参议院选举安排的吉田总裁谈话中发表。吉田首相把总部的憎恶、刻薄、嫉妒、怨恨巧妙地变成了池田藏相“访美时的礼物”而收下。

## 十

吉田内阁与总部之间的纠纷刚刚解决，1950年5月30日，南朝鲜进行了大选。结果，李承晚总统的执政党在议会定员210人中只得到54席。这就充分暴露了南朝鲜李承晚体制是何等脆弱。

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迪·艾奇逊在国际新闻俱乐部发表声明说，“合众国的远东防线是阿留申-日本-琉球-菲律宾。要象合众国的一个州一样确保日本”。声明虽然还谈到“南朝鲜虽不象日本一样，如可能，也要协同盟国负起防卫责任”把艾奇逊声明理解为“美国从防线中除去了南朝鲜”是并不奇怪的。

朝鲜战争爆发后，6月28日南朝鲜首都汉城被占领。三年多的朝鲜战争对日本的冲击是相当大的。这里需要首先谈谈朝鲜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共产党事实上已经非合法化。

日本共产党在前一年的大选中议席猛增。可是到了1950年1月6日，由于共产党、劳动党情报局机关报以“关于日本形势”为题发表文章，批评了和平革命论，便陷入了大混乱。1月19日举行的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经过激烈争论，通过了全面接受情报局批评的决议。

在5月3日宪法纪念日，麦克阿瑟元帅发表声明警告日本共产党说：“日共正在撕下合法的假面具，公然充当国际掠夺的走卒，起着为外国的权力政策、帝国主义的目的服务和破坏性宣传的作用……该党从事上述活动，也正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该党是否还有权享受从它要破坏的国家和法律中所得到的恩惠和保护，而且



该党的活动究竟还能否再看作是宪法所承认的政治运动，都产生了疑问。”

吉田首相已在前一年8月9日给麦克阿瑟元帅写了信，强调“政治上必须阻止现今席卷亚洲大陆的共产主义潮流”。并说，在此基础上，要从公务员和教育机关中清除共产主义的影响。显示吉田茂的见识。令人注目的是他得出的结论：“从日本的地理位置和国民性来说，这个国家将成为对共产主义的防波堤和远东的稳定力量”和他所说的“没有必要过分担心中国、南朝鲜情况的进展。历史业已表明，大陆的政治变动决不会直接威胁我日本岛国的安全”。

在该信中，吉田茂强调：“最近，有不少证据表明，如果政府对于赤色势力的破坏性、颠覆性活动，坚定推行果断无畏的政策，国民将支持政府，并表示出坚强的团结。因此，我们政府愿意表明，主动发起进行这场反共斗争，履行自己的责任。为了日美关系的利益，我不希望阁下的司令部直接卷入对共产党人的斗争。”这证明吉田茂在有关同国内共产党人斗争的问题上也不是靠占领军援助的软骨头。在这一点上，这封信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信中还谈到“邻国如实现共产化，日本也将岌岌可危”等。

尽管吉田茂满怀抱负，愿意主动尽到自己的责任来抑制共产党人，但是1950年6月6日他还是接到了麦克阿瑟关于整肃日本共产党所有中央委员的指令。指令是在寄给吉田首相的信中写明的。麦克阿瑟的信从占领目的说起，回顾了整肃的历史，指出共产党人企图进行暴力革命的危险性并不亚于军国主义领导人，然后又列举了24名共产党中央委员的名字，命令对他们进行整肃。第二天(7日)，又命令整肃共产党机关报《赤旗》的编辑和有关的17名人员。

如6月4日进行的参院选举结果所表明的，共产党的议席的半

数<sup>①</sup>由改选以前的5席减为4席，与自由党61席增至76席、社会党由42席增为61席，形成鲜明的对照。以情报局的批评和指责为开端，共产党内派系斗争也有所激化。有选举权的人中间，共产党的势力比一年五个月前众议院选举时大大下降。但1950年5月2日总部民间情报局顾问伊鲁兹博士在东北大学讲演被左翼学生以实力阻止的事件表明，在全国大学里，不仅学生运动，甚至教职员的组织，也都处于共产党系统支配之下。

在参议院确保住第二党地位的社会党从全面媾和论的立场出发，对于想推动同以美国为中心的多数国家媾和的吉田首相越来越表现出势不两立、针锋相对的姿态。以前面提到的“和平问题座谈会”为中心，日本的知识分子很多主张全面媾和。1950年3月，在东京大学毕业式上，南原繁校长高唱全面媾和论，就是典型代表。众所周知，在5月3日召开的自由党参众两院议员动员大会上吉田首相严厉批评南原繁校长，贬称其为“曲学阿世之徒”。南原校长激烈反驳，认为吉田首相的批评是“对学问的亵渎、用权力压制学者”。

吉田和南原“二茂”（因为茂与繁在日文中发音都是 Shigeru，所以书中用了“两个 Shigeru”——译者）的争论停息之后，在太平洋的彼岸，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被任命为对日媾和条约的负责人。他于4月6日就任国务卿的外交政策顾问，直接负责对日媾和条约工作是5月18日。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生于1888年（明治21年）2月25日，比吉田茂年轻10岁。祖父约翰·华特逊·福斯特在本加明·哈里逊总统手下当过国务卿，其父艾伦·麦斯·杜勒斯是基督教长老会的著名律师。众所周知，他的弟弟艾伦·杜勒斯不仅是中央情报局的负责人，而且扮演着美国情报活动总头目的角色。

<sup>①</sup> 日本的参议院由全国区选出100名，地方区选出150名议员组成，任期六年，每三年改选其中的半数。——译者

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时，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利用其祖父福斯特作为中国(清政府)代表团成员出席第二届海牙和平会议的机会，陪同他祖父，第一次参加外交活动实践。这正是吉田茂当领事官帮办去奉天总领事馆赴任的同一时期。他违背父亲要他当传教士的愿望，决心在祖父影响下学习法律，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系毕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刚一参战，杜勒斯就当上了陆军法务将校，颇为活跃。退役时他是少校。杜勒斯还作为美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凡尔赛会议。刚好吉田茂负责牧野伯爵的全部秘书工作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一想到这些，令人感到吉田茂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之间的因缘实在不浅。

关于对日媾和，正如弗来德里库·丹恩教授著书所强调的，约翰·杜勒斯作为超党派外交的象征，被选为民主党政权国务卿顾问是有充分根据的。杜勒斯学生时代，陪同祖父的活动另作别论，他参加凡尔赛会议赔偿委员会以来，还出席了创立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和联合国本身召集的会议。不仅如此，他作为美国代表团的一员，在国际政治各个领域积累了广泛的经验。杜勒斯从1940年起，在共和党的大会上连续三次坚定支持戴维竞选美国总统，并预定如共和党在总统选举中获胜，他将出任国务卿。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在具体讨论成立联合国时为了不再重现美国不参加国际联盟的恶劣先例，赫尔国务卿曾和接受戴维旨意的杜勒斯进行了磋商。围绕中国共产化问题，共和党激烈攻击民主党政权，因此杜鲁门总统和艾奇逊国务卿都热切期望杜勒斯的合作。

## 十一

当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被任命为国务卿外交政策顾问时，似乎并未决定委托他负责对日和平条约的谈判。毋宁说杜勒斯对于同日本媾和表示的极大关心，促使他将了国务卿一军。他

说：“关于对日媾和条约，国务院已经讨论了4年，还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让谁来干，给他一年时间，如果不行，就承认失败下台。”所以说这是他的一种毛遂自荐。

5月18日，杜勒斯被全权委任处理对日媾和条约问题。杜鲁门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明确宣布，对日条约是国务卿的责任。这意味着在与国防部之间发生权限之争时，总统支持国务卿。换句话说，杜勒斯顾问实际上掌握全权。考虑到杜勒斯是前参议院议员，和参议院的关系较好，应当说，赋予他对日媾和的全权的这一人选是非常明智的。

由美国总统实际上授予全权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日本首相吉田茂进行了两个独裁者之间的谈判，奠定了旧金山条约的基础。因此，有必要了解一下杜勒斯有关对日媾和的基本想法。据丹恩教授称，杜勒斯抱有两条基本信念。一个信念是，如果担心敌国重新在军事上增强实力，从而硬加一些苛刻、报复性的条款，结果将会适得其反。因为苛刻的条款不可避免地会鼓励敌国的复仇心；这当然也是根据凡尔赛条约得到的一条教训。

杜勒斯的另一个信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大的威胁是共产主义运动，尽管有时取得妥协，但共产主义运动是以完成世界革命为目标的。在这两条信念中，前者无疑是正确的。而后者则大成问题。对于是否应当把各式各样的共产主义运动都看成铁板一块，以及苏联的政策对世界和平是否构成具体危险等等是有不少疑问的。

无论如何，杜勒斯确信的第二条，在冷战高潮的当时，可以说是包括吉田茂等多数人的共同想法。可是杜勒斯由于他的经历和个性，反共意识形态表现得尤其鲜明。

基于上述两条信念，杜勒斯在1950年6月6日提出了关于日本的第一个备忘录。丹恩教授用了三页纸叙述了这份备忘录的内容。西村熊雄著《旧金山和平条约》把备忘录内容要点精确地译成

日文，这里作一介绍：

“一、这份备忘录首先陈述了关于日本的长期目标。日本人必须和平地保持基本人权，养成不依赖外界恩惠的自尊心。日本应成为自由世界的一员、美国合众国的友邦，在自由世界中繁荣发展，成为其他亚洲国家的典范，有助于抵抗共产主义普遍意志的建立。

“二、其次，备忘录概括了地理、经济、政治、伦理、军事以及种族等问题。因为日本在地理上容易陷入共产圈，为阻止这一点，西方必须掌握主导权。要设置日本经济上不依赖共产党国家就能解决问题的条款。在运用日本国宪法产生困难时，可以设立就这一问题帮助日本的咨询委员会（根据日本方面的要求，最好由麦克阿瑟负责）。由于日本人生活的全部领域有着极端的顺应主义和因循守旧，维护人权、基本自由和保持个人主义可能很困难，为了完成不可缺少的文化革命，需要进行启发和宣传。对日本的间接侵略，即破坏活动的危险，为应付这种意外情况的出现，必须建立强大的警察力量。最后，必须清除妨碍日本参加西方同盟的种族障碍，为此目的，同意有限数量的日本人移居美国是有作用的。同时，要使日本人深信，他们可以利用对中国人、朝鲜人以及俄国人的种族和社会优越感，作为优越于共产世界各国的自由世界一员，与西方各国人民站在对等地位上。

“三、备忘录所说的是在安全保障达成最终协议之前采取的过渡性措施。虽然提出占领军分阶段撤退，但未详述，提到应在盟军统帅监督下立即成立警察部队。

“四、再次，备忘录对和平条约的内容作了简单描述。提出需要有关于分阶段削减军事占领的条款。备忘录列举了占领时期的各种改革，并认为应当坚持不进行赔偿和经济性限制。和平条约签署后，应避免在日本成立管理机构，订立日本申请加入联合国的条款。

“五、备忘录暗示，应在缔结和平条约的同时，分别缔结安全保障协定。这一协定将包括参加预备会议所有国家（可能苏联也会参加，但对于苏联在安全保障协定中所起的作用，杜勒斯没有写明）。注意到日本国宪法第九条关于放弃战争的条款，但把这一条款写进安全保障协定或条约并不成为条约上的约束。

“六、最后，备忘录对条约的缔结程序作了若干暗示。有关美国见解的情报，首先送到组成远东委员会的非共产主义各国。这些国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时，可予修正。但这种交换意见，对条约方案详细之点并不一定需要在形式上完全达成一致，然后由组成远东委员会所有国家，加上印尼、锡兰、南朝鲜以及印度支那各国代表召开预备会议。也让日本代表出席会议。为解决两个中国的问题，邀请国民党政权和共产党政权派代表参加，在双方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双方各占一票，意见一致的问题合并为一票。在预备会议上，一切程序问题由多数表决决定，有关条约内容由三分之二多数决定，预备会议定于1950年夏季、最晚秋季在夏威夷举行。此后同日本交战的所有国家在东京举行全体会议，出席这两个会议的美国代表团是超党派的，意见不一致时，由总统决定。盟军统帅和国防部具有顾问的资格。授于麦克阿瑟元帅预备会议全权委员的资格。”

杜勒斯的这份备忘录在利用日本人对其他亚洲各民族优越感等方面包括许多道义上、政治上令人不能赞许的想法，但是以下两点显示了杜勒斯的卓越见识。一点是全部废除赔偿；另一点是关于两个中国的解决方式。不过，前一点被固执地要求赔偿的国家所否定，后一点也没有实现。丹恩教授指出，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朝鲜战争，这一方案已变成废纸，即使不爆发朝鲜战争，对北京和台北同时出席对日媾和会议，几乎也是不能抱任何期望的。但如果中国不参战，可以设想，日本不至于被杜勒斯、诺兰德等参院议员强行要求同台北蒋介石政权媾和。

在刚刚写好这份备忘录的6月14日，杜勒斯顾问在东北亚司长阿里逊陪同下动身经南朝鲜前来日本。杜勒斯一行到达汉城时正是朝鲜战争爆发的前一周。在南朝鲜军队和美军陪同下，杜勒斯6月18日视察了38度线，苏联把当时的照片散发到全世界，宣传杜勒斯是被派遣发动朝鲜战争的。6月19日，杜勒斯在南朝鲜国会发表演说，他提出的想法是颇为引人注目的。他讲到南朝鲜国民今天站在“自由的最前线”，威胁南朝鲜的危险来自“38度线以北的苏维埃共产主义”，这可以说是把一切都断然标上光明与黑暗的结论，万恶之源归于苏维埃共产主义的杜勒斯式思考方法的典型。当地的原因基本上被忽略了。

杜勒斯接着说：“美国国民欢迎你们这个构成自由世界一员的平等伙伴。自由世界在道义上、物质上具有莫大的力量，其决心不可动摇。只要你们在人类自由这一伟大历程中继续发挥出色的作用，那么，你们决不会是孤立的。”据随行的约翰·阿里逊说，他感到杜勒斯补充了艾奇逊国务卿一月份演说中没有讲的。

6月21日，杜勒斯顾问到达东京，立即往访麦克阿瑟元帅，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会谈。双方都是共和党员，反共意识也是一致的。两人相处似乎立刻达到了意气相投的地步。6月18日国防部长约翰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来到日本，第二天和麦克阿瑟元帅举行了会谈，但加上杜勒斯的四者会谈似乎并未实现。

## 十二

这以后的4天中，杜勒斯顾问和吉田首相等众多日本人依次举行了会谈。凡尔赛会议没有让德国代表参加，把仅由国际联盟决定的条约方案强加给德国，结果失败了。杜勒斯从中吸取了教训，想听取日本人的意见，推进对日媾和。杜勒斯会见了众院议长币原喜重郎、参院议长佐藤尚武、国民民主党的三木武夫等

人。此外还会见了财界、工会的一些领导人。

据丹恩教授所写，被杜勒斯征求意见的日本人，大都对本国安全保障只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想法，许多人回答说，期待着联合国对此有所作为，或者根据宪法放弃战争条款，安全将得到保障。这使杜勒斯感到非常困惑。“吉田本人也没有很具体的考虑和安排。对于基地虽然未作口头保证，但杜勒斯得到的印象是吉田会同意。”已经派池田藏相到华盛顿，把准备接受美军基地的意思转达给美国方面，但吉田首相鉴于“访美礼物事件”的教训，对于同杜勒斯第一次见面，可能认为还不是表露真心的时机。

杜勒斯夫妻在京都参观的那天，爆发了朝鲜战争。于是杜勒斯急忙赶回东京，他对麦克阿瑟元帅不重视这一事态感到失望。杜勒斯想起了在南朝鲜国会演说中所作的保证“你们决不是孤立的”，所以他和阿里逊会谈后，向麦克阿瑟的政治顾问希波鲁特大使提出要求，给国务卿艾奇逊和腊斯克副国务卿帮办拍一份电报，内容是：如果南朝鲜在对付北方进攻中不能击退对方，“相信应当使用美军”。美国如果只被动应付，将落得一个悲惨的结局，并很有可能扩大为世界战争。

华盛顿的反应是极为敏捷的。6月25日下午2时，在纽约召开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美国决议草案。指责北朝鲜为侵略者，要求立即中止敌对行为，两天以后又通过了要求联合国成员国以武力击退进攻和援助南朝鲜的美国决议草案。6月27日，杜勒斯在返回美国途中由于飞机发动机故障在威克岛过夜。据说他非常佩服杜鲁门总统的果断，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和党员而称赞杜鲁门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

7月1日，即汉城被占领后三天，美国陆军开始在釜山登陆。吉田首相在7月4日内阁会议上表示同意美国在南朝鲜的军事行动，并宣布要在行政措施范围内给予合作的方针。由于压倒优势的朝鲜军队的进攻，南朝鲜军队全面溃败、后撤，美军被迫进行顽



强奋战，训练和装备都很不充分的驻日美军，几乎全部投入战斗。面对这种形势，麦克阿瑟元帅7月8日给吉田首相写了信，与其翻译这封庄重的文言信件，不如看看《十年回忆》第二卷是怎样写的：

“1950年7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我收到了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一封紧急重要信件。内容是关于确保日本国内治安措施的命令，其中包括建立警察预备队事项。要点是：命令日本政府采取适当措施，开始建立由75,000人组成的警察预备队，并为扩充海上保安厅的现有实力，增加名额8,000人。

“我以前就曾担心警察力量不足，而痛感有必要以某种形式加以充实，因此对于盟军统帅的这一指示特别关心，甚至认为这是加强警察力量的绝好机会。于是为了早日促其实现，当日就命令有关部门负责人员开会研究信件所要求的措施。要求的目的本身，立即被大家看穿了。也就是说，与会者一致认为：这是为了填补因朝鲜战争而调往前线的美军部队所遗留下来的空白；而且从当时的形势来看，为了防范在朝鲜以外的地区也可能发生的共产主义侵略的危险，所以想要加强维持日本国内治安的实力。但是在这次会上最成问题的，就是弄不清这个即将设立的新警察的性质如何，尤其弄不清它与现在的警察关系如何。

“关于新设警察预备队这个问题，我们预料，正当7月中旬召开的临时国会上也必然成为质问的对象。因此我们以上述疑点为中心，提出了我方的意见，同盟军总部进行协商，并充分探听了对方的意图。于是对国会议员的质问，我们根据协商的结果说明，它是不同于现有警察的另外一支政府直辖的警察部队，并阐明它的任务是同国家的地方警察以及地方政府警察保持密切联系，以增强治安警察的实力。此外，对于这是不是重整军备的第一步这个疑问，我们强调了新设置这个部队纯粹是为了确保国内治安，同重整军备毫无关系。关于同重整军备的关系这个疑问，

以后也一直没能澄清，随着日本防卫力量渐增方针的实行，始终成为国会内外批判的重点，这是众所周知的。”

警察预备队作为政令第260号公布，是在1950年8月10日，而总部长官的人选，7月中旬事实上就决定了。吉田首相定的人选是当时的香川县知事增原惠吉。吉田茂和增原惠吉第一次见面是在吉田任外相的时代。那时增原当警察局长，有一次他和大阪府知事两个人一起请吉田吃过饭。以后增原又回到警视厅担任警务部长，他和他的同事“特高”部长、刑事部长等又受到吉田外相的招待。当时的外务次官寺崎为使吉田外相学习了解治安问题，请增原等人给讲一讲，结果便安排了一次晚餐会。

寺崎的弟弟和增原是第一高等学校的同级生，寺崎对增原说“有时间给外务大臣讲讲治安的重要性”，可能是用这种方式比较容易讲话吧！寺崎太郎别名“吵架太郎”，顾名思义，他是很爱吵架的，不久就和吉田闹翻了。开战前他任外务省美国局局长，负责对美谈判，右翼怎样整他，都不退缩，是一个无所畏惧的硬汉子。

吉田茂对人是爱憎分明的。可是他非常佩服增原这样踏实的人。第一次吉田内阁成立后，吉田茂曾考虑起用增原惠吉当警视总监，可当时大村内务大臣已内定由别人担任这个职务，增原就郑重地推辞了。于是又决定任命增原为级别很高的官选知事，他便担任了香川县知事，不久增原又被选为第一任民选知事。

麦克阿瑟元帅刚发出成立警察预备队指令时，增原接到善通寺的市长的申请书，说到善通寺由于废除师团，象消失了火种一般。因此，非常欢迎警察预备队。在这以后增原知事到东京出差，听说第一高等学校同级生大桥武夫法务总裁负责组织警察预备队，所以就去见大桥法相，转述了善通寺市长的申请。大桥也很吃惊地说：“香川这个地方真了不起呢！”

第二天增原又被大桥叫去，他一到，大桥就劝他说：“警察预备

队的总部长官人选物色了不少，可是首相想让你来干，你就接受吧！”“那不行，我有别的差事，无法接受。不当民选知事，要召开全县议会得到批准才行。”增原连连设防。结果就这样在一问一答中结束。增原知事接着又受到冈崎官房长官的追问，冈崎催逼说：“昨天大桥君说你回答不能接受，这件事你如果不担任，就不好办了。因为是首相决定让你干的。”增原尽力避免立即作答，只说：“需要和两三个人商量一下！”

就这样，7月20日内定增原惠吉任总部长官，由劳动次官江口见登留任次长。因为增原知事需要几天时间回高松，在县议会办理辞职手续，所以实际上开始工作是在7月25日前后。盟军总部7月14日任命民事局长肖普少将担任顾问团长，在出发到朝鲜半岛的第七骑兵团的兵营设立了顾问团的大本营，增原总部长官为首的警察预备队总部也搬进了这座大楼。

增原惠吉还没有提出县知事辞职令就开始彻夜连续工作了。肖普向他介绍了前大校服部卓四郎以下7名旧帝国陆军将校，并说：“已决定让大校担任穿制服的预备队头头。”这使增原很吃惊。增原吃惊是必然的，前大校服部何许人也？他作为关东军的作战参谋主任是诺门汉事件<sup>①</sup>的急先锋，在遭到惨败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就任了作战课长。校服部说：“我是根据威洛比少将的指示前来的，他说，‘有关制服问题，不需要和增原总部长官联系’。”增原听了这话深感情况严重。

### 十三

增原惠吉感到惊异是有道理的。吉田首相接到麦克阿瑟元帅的指令以后仍然要增原挑担子，让他“一定接受下来”，所以增原

---

<sup>①</sup> 1939年5月12日，日本关东军向我东北靠近外蒙的诺门汉进攻，遭到苏、蒙军队反击而失败。——译者

连夜进行建立警察预备队这件最艰巨的工作。这时，接受总部情报部长威洛比少将指示的7名前帝国陆军少将出现在眼前。服部说：“我将成为不穿军装的指挥官”。当时有消息说，威洛比少将讲过关于不穿军装的问题，不仅没有必要同增原联系，实际上他下了更强硬的命令：根本不用把增原放在眼里。因此，情况是极为严重的。

前面已经提过，服部卓四郎上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占据参谋总部作战课长要职，战争结束前，被任命为步兵第65团团长的，在中国前线，很是活跃。1946年5月，服部从中国复员回来，以“关于美苏战争和日本地位的考察”为题写过小论文。据秦郁彦教授的《日本重新武装史录》（文艺春秋1976年版）一书所记，服部的论文是这样写的，“世界上担心美苏战争者不少。早晚总有一天将惹起武装冲突，这种可能性极大。……对苏开战之际，美英将攻占远东的政治战略要地，接着用四周时间发动进攻……。有关开战时间的判断是非常困难的……可能尽量想赶在苏联依靠五年计划增强国防力量之前。苏联将优待60万日本官兵，自然而然地对他们实施赤化教育。”

苏联优待日本60万官兵等说法，完全不着边际，而且把自己旧军人的命运寄托在美苏爆发战争上，这种计划更同打了败仗的旧陆军参谋相适应。以服部和陆军士官学校同期的西浦进、堀场一雄两名前上校以下10名校级军官为中心组成了一个服部小组，在威洛比少将手下帮助编纂太平洋战争史，并悄悄地进行重建陆军的准备。1949年4月12日，整理出一份“国防军的中央机构第一方案”。第二年3月10日，制定了“编组大纲”。服部的方案修改了宪法第九条，拥戴天皇为新国防军统帅，明显地企图复活旧军队。

经过上述准备活动，1950年7月前上校服部和6名前参谋将校级军官到警察预备队顾问团长肖普少将那里报到，接着又到预定就任警察总部长官的增原惠吉处“拜访”。增原和肖普根本不知道服部和威洛比之间正在一步步推进重整军备的活动，而且业已定

了一份400名基干将校的名单。

前上校服部一一介绍了6名前参谋将校，并对增原致意说：“请多关照”。增原让6个人先回去，答应“晚上找时间好好谈一谈”。这样，当天夜里在麹町警察署的楼里，举行了增原和服部以及大桥法相的会谈。方式是共进晚餐，边吃边谈。服部反复讲到，“警察预备队是纯粹的军队，不是警察，因为采取文官统制的形式，总部长官是文官，但穿制服的部分人由我来管。有关穿制服的问题不仅没有必要同增原长官先生联系，而且不准联系。”

对此，增原惠吉开导服部卓四郎说：“服部君，让我们考虑一下看。彼此都是日本人，都主张必须建立日本警察预备队。我也认为它将成为军队，但是这要分不同的阶段、按步就班地进行。问题很困难，特别是美国方面说，不要长官开口。我们彼此作为日本人，事情不好办。既然要建立一支出色的警察预备队，我认为不应当这样，不知你以为如何？”前上校服部表示同意说，“正如你说的。”通过这次会谈，增原和服部消除了一些不和，关系得到改善。但和服部一起出面的7名前参谋中间，包括服部在内，有几名没有被警察预备队采用，结果有些旧陆军将校非常憎恨增原和敌视警察预备队。

考虑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增原认为，只有请吉田首相与麦克阿瑟元帅直接谈判。增原去见吉田首相并说：“仅仅解除整肃的中心人物、前将校级参谋那些人，并让他们当警察预备队的干部，我认为，是不适当的。不知首相以为如何？”吉田首相立刻回答：“我也认为不合适，我和麦克阿瑟直接交涉。”

据说在上述7名参谋将校中，吉田首相很重视其中包括了东条大将前秘书官服部和西浦、井本三人。在总司令部内，威洛比少将的独断专行引起了惠特尼民政局长的愤慨。原来，吉田首相和威洛比较为亲近，而与惠特尼准将关系不很好，只在这一问题上，报吉田首相和惠特尼准将结成了对付威洛比少将的联合战线。结果

麦克阿瑟元帅站在吉田首相一边，威洛比起用服部小组的计划彻底失败。

这里要提一下旧陆军和吉田茂的关系。吉田茂被陆军宪兵队以反战嫌疑逮捕的情况已经讲过了。自然，吉田茂对旧陆军的主流是不抱好感的。但是另一方面，吉田茂尊重寺内正毅元帅、田中义一大将，这也是没有疑问的。对于那些九·一八事变以来使陆军向一个强大的压力团体变质、犯上作乱的军官们，吉田茂是非常憎恶的。

至少有两名陆军军人过去是深受吉田茂信赖的。一个是吉田茂任驻英大使时代大使馆的武官辰巳荣一前中将，另一个是副武官松谷诚前上校。辰巳荣一明治28年(1895年)1月19日生于佐贺县；大正四年(1915年)陆军士官学校第27期毕业。1930年1月奉命到英国赴任，第二年一月当了驻英副武官，任职两年后转到关东军当参谋，1936年8月就任驻英武官，与吉田大使共事。当时，在日德意三国同盟缔结同盟问题上，驻德武官大岛浩为说服吉田大使前来伦敦时，辰巳被夹在他们两人中间焦思苦虑、左右为难，这已在前边提到过。

辰巳武官了解吉田大使和大岛武官的争论，认为吉田大使的看法是正确的，从那以后一直十分钦佩吉田茂的外交观点和国际感觉。战争结束时，辰巳任第三师团长，在中国大陆作战，在九江接受停战命令，第二年5月回国，到家属疏散的岛根县大社隐居。吉田茂就任首相之初，就打电报令其“急速进京”，辰巳很快就前来拜访吉田首相，首相非常高兴同他握手说，“辰巳君，没想到我这次当了首相，我打交道的对手是盟军总部，麦克阿瑟元帅以下基本上都是军人，但我对军事问题一无所知，请你在身后帮助。”

从伦敦时期以来，辰巳就衷心尊敬吉田，所以很快答应了这一要求。吉田首相首先把辰巳介绍给总司令部的情报部长威洛比少将，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让我们引用一下高山信武著《昭和名将

录》第二卷所载辰巳的回忆录：

“于是我很快就到总司令部威洛比少将那里去了，碰巧情报部副部长布兰顿上校也在那里，战前我任参谋部欧美课长时，他来过日本。从那时起就很熟悉。因此，基本上每天都到盟军总部去。每次都让我看各种情报，并征询我的看法。例如，战后被整肃的旧军人动向，日本共产党的情况以及日本国内外种种形势等等。但是，情报种类极为广泛，多种多样，我一个人无论如何力不能及、处理不完，所以威洛比将军成立了以河边虎四郎陆军中将为中心的情报机构，直属情报部。”

辰巳荣一当然也加入了河边的情报机构，作为吉田首相幕后的军事顾问，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组织第二届内阁时，吉田首相曾就有关把日本和朝鲜半岛以及沿海各州建成非武装地带可能性的问题，征求过辰巳的意见。当时吉田茂反对重新武装，所以研究非武装地带问题。但是由于冷战的激烈，才知道不可能实现这一设想。

关于朝鲜战争爆发时吉田首相不赞成重新武装，辰巳讲道：“杜勒斯来日本时谈及重新武装问题，威洛比少将明确告诉我谈的情况说，如果媾和成功，美国军队总有一天要撤退，这样日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保卫国家。我把这话都转报给了吉田首相，吉田首相以宪法为依据表示强烈反对。”

前中将辰巳对于前上校服部根据威洛比少将的指示选拔四个师团的基干成员并准备了名单一事是知道的。当布兰顿上校把那份名单给他看时，辰巳回答说：“没有一个不够资格。”作为不穿军装的军事专家，他们都很优秀，但是否符合新生的日本军队负责干部的要求，恐怕辰巳并未研究。

## 十四

关于服部小组的问题，吉田首相与麦克阿瑟元帅会谈之际

朝鲜半岛在北朝鲜军队猛烈进攻之下，美军和南朝鲜军队被赶到了釜山的桥头堡，进行着相当艰苦的战斗。在这种紧迫的情况下，开始招募警察预备队员，8月23日第一批约7,000人入队，原定招募75,000人，可是竟有382,000人报名，吉田首相也十分高兴。合格者通过国家地方警察管区的警察学校学习，然后到美军驻地接受训练。

因为没有采用旧军队职业军人，培养干部遇到很大困难。结果，吉田首相接受辰巳中将等人的建议，下决心采用旧军队的正规将校军官，并于1951年3月得到了盟军总部的同意。6月，以陆军士官学校58期毕业生为中心，约300人解除整肃、加入了警察预备队。1952年6月30日，由前中将辰巳的强烈推荐，9名陆军前上校和一名海军前上校入队，两周之后，松谷诚前上校也加入了警察预备队的行列。前面说过，松谷在伦敦日本大使馆吉田大使手下曾任陆军副武官，即辰巳武官的副手。松谷诚曾以《有为的转变·我的生涯》为题写过回忆录，这对了解人们所不知的吉田茂与旧陆军的关系极为有益，因此引用如下：

“记得1949年春天，从停战到1947年，在中国的日本人和日本军队大体上已都撤回日本，被指名为战犯的人依然扣留在中国各地。这时中国共产党军队逐渐把国民党政府军从北方赶走，国民党政府方面的形势日趋不利。厚生省撤退援护厅复员局得到情报说，国民党政府正在把华北、华中的日本战犯向上海地区集结。掌管有关战犯事宜的复员局法务调查部据当时情报判断，如国民党政府过早放弃大陆而逃往台湾等地时，日本战犯有可能落入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手中。

“于是，向盟军总部提出要求，要美军尽力把这些日本战犯从中国大陆国民党政府手中要回来，由盟军总部处理。对此，正在通过正规程序，由复员局撤退援护厅长官(斋藤惣一)及厚生大臣(林让治)通过停战联络中央事务局等对美军方面进行工作。但是



由那些半死不活的旧军人临时组成的复员局，对于要由哪些有关人士处理，怎样处理问题，完全不清楚。等了一段时间，仍然毫无音信，时间又非常紧迫，时时传来国民党政府军败退的消息，在中国的日本战犯的安危，令人十分担心。

“我当时是法务调查部的官员，处在十分困难的境地，想起上述昭和 11至12 年(1936-1937年)曾在当时日本驻英大使吉田首相手下当过副武官，所以在得到了复员局长(上月良夫陆军中将)的同意后，向吉田直接陈述上述情况。可是停战以后，我和吉田没有任何联系，现在他又荣任首相，能否和一名败军小官面谈，我内心一片疑团。

“一大早我从复员局直接打电话给首相年轻的秘书官杉浦，希望会见首相，没料到很快秘书官就来电话说首相在他官邸(东京目黑旧朝香官邸)等候，让你‘马上来’。这是我由衷感激的一个场面。我立即赶往官邸，要事在身、繁忙异常的首相已在等我。我想就站着对他讲讲要求，首相则让我坐在椅子上慢慢讲述。他还问了军队撤回回国复员等情况，详细听取了在中国的战犯问题。首相指示说，‘因为定在今天下午与麦克阿瑟总司令官会谈，赶快把战犯问题的内容要点写出来。’我就立即赶回复员局，用毛笔在两张粗糙的白纸上写了内容要点，又拿到首相官邸，通过秘书官交给了首相。

“当天下午4时左右，秘书官又来电话让我赶快到官邸去。我马上动身，赶到官邸时，首相在前面的办公室说，‘麦克阿瑟总司令讲，被占领国方面提出这样的要求是不适当的，但只限于这一次，予以同意，下不为例。24小时内由驻日美军方面安排便船把日本战犯从上海运回日本。’我从来没有象那时那样感动得流下热泪，对首相表示了深深的谢意。后来回到警视厅向复员局长上月以及法务调查部长大山汇报了上述情况。

“在中国的日本战犯得以回到日本，虽然看起来是有关人员

事前通过正当途径要求的结果，可是首相和麦克阿瑟总司令官直接的会谈成为实现的有力转机，也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1949年2月4日，冈村宁次陆军大将以下160名在中国的战犯和嫌疑分子，坐美军坦克登陆船顺利到达横滨，进入巢鸭监狱。其后，中共方面一再要求送回冈村宁次将军一行，作为战犯处理。盟军总部后来根据对日政策的变化，不久相继释放了这批战犯。

“过了一个月左右，为了慰劳长期被扣留在国外、最近才从南方回国的军人，首相设宴招待，首相秘书官打电话给我，要求提出名单。于是我同复员局商量，提出了南方军总参谋长沼田多稼藏陆军中将等一些人的名字。首相把将军们请到东京赤坂葵町首相公邸(原安田积善社)共进晚餐，亲切慰问，我记得自己也列席，座席在末位。

“本来，吉田首相反对英美开战，战争末期因从事争取和平活动而被宪兵队逮捕、关进陆军监狱，对于军队、特别是主战派的陆军，他内心肯定是很反感的。陆军的中央部门里的主战派经历过战前、战后的这些情况，对吉田首相也不抱好感，这是事实。然而‘武士之情义’和已经故去的人对吉田的心情，从1949年起，逐渐在旧陆军有关的人们中传开，尔后，似乎吉田威信上升，人们对吉田首相产生了好感。”

此后不久，1949年3月底，松谷诚辞去了厚生省归回援护厅复员局法务调查部的职务。松谷上校5月3日对吉田首相进行辞行拜会时，把前上校辻政信通过植田谦吉前大将和木村武雄送来的一份意见书交给吉田首相，听说首相连看也没看就批转了。前上校松谷和吉田首相后来关系较深。10月15日松谷以“关于国防的调查研究”为题写了一份意见书提交吉田首相。12月12日，在目黑官邸从中午起，松谷把这份意见书和有关形势观察和方针政策的意见对吉田首相作了一个多小时的说明。当时，吉田首相征求有关警察问题的意见。松谷和杉田两人又以“目前警察的缺陷”、“当前

若干改进警察问题的基本设想”为题，写了意见书，1950年2月7日向首相提出。后来，松谷在杉田一次和林三郎前上校等人协助下又写了一份“最近的世界形势和日本——共产党对策”，4月20日提交吉田首相。

8月7日，松谷前上校从杉田前上校那里听到有关服部卓四郎前上校等校级军官小组由威洛比少将的推荐被起用为预备队干部一事，第二天就和杉浦秘书官进行了联系。根据首相的指示，松谷8月9日会见冈崎官房长官，提出建议：“希望慎重处理警察预备队干部人事问题”。他迫切希望，“如可能，暂时不采用被整肃者，今后由下村定、上月良夫、河边虎四郎、辰巳荣一等以前的将军们讨论或个别听取意见。对于从旧军人中物色干部务必慎重。”

松谷8月13日写了“关于警察预备队人事”的备忘录，说出了他的忧虑：“英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家对军国主义势力的抬头感到担心。考虑到国内知识分子阶层反军的猜疑心等，必须认识到，如果不能巧妙地顺应微妙复杂的内外形势，将带来相反效果，将来必然耽误国内防卫的实现。”这段话深刻地表明了前上校松谷的思虑。

旧海军方面形成了以野村吉三郎前海军大将为中心的局面。野村在1950年6月6日致“吉田老大人”的信，说明了两个人的亲密关系。野村前大将不仅在美国海军、而且在各界都有很多知己。为了让吉田首相看其中一位知己的回信，野村给吉田写了信。野村在信里对美国朋友写的内容概要地作了说明：

“美国在东亚的安全保障和日本的安全保障是一致的。红色方面利用日本人将来免受原子弹灾难的心理，呼吁全面媾和、永久中立，某政党也随声附和。红色方面的学生扮演着共产党劳动党情报局走卒的角色。在仙台、北海道等地阻挠伊尔司博士的演讲。

“占领国中有苏联这样的国家，日本虽不能采取明确的反苏态

度，但日本政府应当对红色方面逃避法律制裁的行动严加管束。大学校长等应以更明确态度确保学校秩序。正因为吉田茂抱有坚定信念，所以能够作到这种程度。He is the best prime minister we had after war and we can find now(他是战后和目前我们能够找到的最好的首相)。

“日本的有识之士深知，如果没有美军，目前日本是不可能确保安全的。但战争已结束五年，对行政细微末节的监督和干涉令人厌恶。”

## 十五

7月下旬到整个8月，在朝鲜军队猛烈进攻之下，以美国第八军为中心的联合国部队被迫进行着相当艰苦的战斗。看来，釜山的桥头堡一时也难以保持。但是9月14日，麦克阿瑟元帅命令第一海军师团和陆军第七师团从仁川奇袭登陆获得成功，两个星期内收复了包括南朝鲜首都汉城在内的几乎全部地方。

吉田首相9月22日给麦克阿瑟元帅发了祝贺信，贺信内容如下：

“拜启。听说阁下从前线归来，阁下的部队在仁川登陆成功，并正向汉城城门迅速胜利进击，对此表示衷心祝贺。

“由于阁下这大胆袭击的战略，朝鲜半岛形势一夜之间完全改观。半岛早日恢复和平的前景更加明朗起来。

“谨向联合国勇敢的陆海空军以及给他们鼓舞的不屈不挠的最高统帅致意，全世界都受到你无限的恩惠。 敬具。”

与吉田首相的期望相反，仁川登陆作战并没有给朝鲜半岛带来和平。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的参战，逼近中国边境的联合国部队再次遭到失败。

仁川奇袭登陆的前一天，即9月14日，杜鲁门总统指示国务院就对日媾和问题开始与远东委员会12个成员国进行非正式讨

论，并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布了这一消息。吉田茂担心朝鲜战争的爆发可能推迟媾和的谈判。事实上美国国防部也认为，朝鲜半岛进行战争，日本继续处在占领之下较为有利。与此相反，杜勒斯则认为，正因为爆发朝鲜战争，有必要加快对日媾和的步伐。所以，他正在对杜鲁门总统进行工作。

在第二天，9月1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杜勒斯顾问谈了美国政府对日和约的设想。据同一天华盛顿发的《纽约时报》特电称：

“一、对日本重新武装不加限制。最大限度承认经济通商的自由，推动日本参加联合国和反共同盟国的行列；

“二、为了从远东的侵略中保卫日本，美军被允许驻留日本，但条约不涉及美军取得基地问题，希望这一问题的处理与美空军驻留英国采取同一办法。”

这两点是最基本的内容。此外，关于苏联，“同包括苏联等12国之间开始进行预备性谈判……关于讨论的方针是，如苏联固执历来的主张，美苏两国之间的讨论将在极短时间内结束。美国认为，目前缔结对日和约是刻不容缓的急务，将通报远东委员会各国，不论苏联参加与否，都应推动谈判的进行。”

从这时起，日美两国之间第一次谈判在东京开始。到1951年1月26日4个多月时间，对日本来说是极重要的准备时期。当时的外务省条约局长西村熊雄是担任这一准备工作的主要成员，他写下了珍贵的备忘录，生动地再现了吉田首相的领导艺术。虽然稍长一些，但我还是想引用一下：

“1950年9月26日

与太田次官去箱根拜访吉田首相，说明美国对日和约方案的设想，拟研究我方对美国设想的对策，整理出一份事务当局方案向首相提出。后即告辞。

“10月5日 外相官邸 晚餐会

出席者：小泉、板仓、有田、古岛、津岛、马场(恒吾)、向

井(忠晴, 缺席)、佐藤(喜一郎)、冈崎官房长官和井上、井口两位。

这是关于条约问题的第一次会晤。记录另外整理。今天完成A作业(1-4)向外务大臣和次官提出。

“10月19日

井上秘书官来访, 征求下次开会让野村大将与横田博士参加的意见。

首相7日有电话(首相在箱根), 与太田次官等三人商谈。次官说他们与会没什么关系, 但如果横田博士参加的事透露出去, 人们马上就会知道这是有关媾和问题的会议, 而且野村大将是被整肃者。大家谈到会议越来越需要保密。

“10月11日

关于A作业, 首相已有批复, 批评说: ‘没有治世济民的见识’还标注: ‘带有在野党的口吻’。

下午3时, 有关同事碰头谈重新作业的方针。

根据5日会上指示, 完成了驻军协定方案的草拟。条约方案与说明书由高桥、藤崎、西村三人合作, 藤崎和西村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中心是我主张应在条约里写上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 而藤崎认为不必要。”

这里要给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加一个注。第五十一条是联合国宪章最重要的一项。关于同盟国个别和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 明确记载说: “宪章的任何规定, 对联合国同盟国发生武装攻击时, 在安理会为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采取必要措施之前, 不能损害个别或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在行使自卫权之际, 同盟国采取的措施必须立即向安理会报告, 而且这一措施不能影响安理会根据宪章为维护和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随时采取认为必要行动的积极性和责任。”

下边再回到西村条约局长的备忘录上来。

“10月16日

井上秘书官来访。谈到15日野村前大将(17日又记载,井口要求订正为山梨和小林前大将)在箱根与首相会谈的要点,并透露将安排辰巳前中将与首相会谈。据井口说,下次会晤将安排在24或25日。

向首相提出西德解除整肃的资料。

“10月21日 下午1时半 外相官邸

首相指示要拟出一个以下述三项为基本内容的安全保障条约方案:1、日本、朝鲜的非武装;2、在一定地区内撤除空军基地;3、减少西太平洋的海军。接受指示后返回。

外务省人员向报刊杂志等投稿,涉及媾和问题时要慎重。

“10月24日 上午10时半 外相官邸

河边(虎四郎)前中将、下村前大将、辰巳前中将、榎本前海军教授、井口、井上与会。

由我说明:1、非正式会谈进行情况;2、美国对日媾和七原则;3、安全保障的处理方案 A.驻军方案, B.非武装地带方案。然后又讲了下述情况和意见:

首相对本国重新武装问题讲到,缔结和约前不打算重新武装。这是基本想法。为此,要准备设置非武装地带的理想方案。需要提出“希望怎样做”的建议。因此要集思广益制定摆脱现实的理想方案(这中间详细说明了麦克阿瑟元帅关于日本安全保障的意见以及同杜勒斯顾问会谈的内容)。

关于重新武装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为了拟定一个比较出色的方案,需要事先进行准备和研究。谈到希望大家支持和出力。

最后决定从下次开会起,在海军同仁中让堀悌吉前中将参加。

“10月31日 目黑官邸 上午11时至下午1时

河边、下村、辰巳、堀、榎本、井口、井上和西村讨论非武装地带方案。讨论内容见另外整理之记录。”

## 十六

继续引用西村条约局长的备忘录：

“11月16日 外相官邸开会 下午6时

参加者：古岛、马场、津岛、板仓、荒川、横田、佐藤、菱刈、西村。

晚9时20分散会，记录另行整理。

上午首相关于我在今天会上的报告内容有批示，在报告第4项上。我对照查看了一下。

“12月26日 目黑官邸 正午至2时

下村、辰巳、堀、榎本、堀田(前大使)开会，井口菱刈和西村也参加。根据首相相对安全保障的要求，完成了作业。有关议事内容，另整理记录补进。

“12月28日 目黑官邸

对堀田大使说明D作业，大使异议甚多。

“1951年1月4日 目黑官邸

听取堀田大使对D作业的意见。答应重新进行修改。

“1月6日 目黑官邸

向堀田大使提出并说明

“1月10日 目黑官邸

听取堀田大使对‘重新武装’的个人意见。这是为了要在同首相谈话时提出大使的看法。大纲包括在关于重新武装的看法(修改稿)中。

历来事务当局拟订的方案以及向国务院提出的文件都是尽了最大努力的。人们鼓励说，‘再无提出意见的余地’。

军事专家开会，下一个题目本拟检查‘整備自卫力量’的具



体内容，后来决定讨论整備自卫力量是否妥当。

“1月13日

有田前大臣来访，就芦田老前辈在福地山所提意见(新闻报道)和宪法第九条联系起来征询意见，我请他看作业订正稿。他回答基本同意。

目黑官邸。和堀田大使会晤。12日和大臣谈过，大臣表示想看看修改稿，方案已送到目黑官邸，大使前来了解首相关于重新武装的想法。

首相坚定地否定了重新武装。至于客观形势，可能认为两阵营不会进入全面性战争，当前的对立纠纷时缓时紧，将长久持续。这期间会有‘眼看要打起来’的神经战，不能上当受骗。看来苏联不会冒然入侵日本。如果基于这种估计，首相否定重新武装、打算寻求以其他方式保障安全的途径，似乎可以理解和接受。

紫云庄桥本氏来访，听取重新武装的意见，我也谈了否定论。

“1月19日 目黑官邸

河边、下村、辰巳、堀、榎本、富冈、堀田、井口、西村开会，讨论的中心问题是为了确保国内治安必要的警察力量的具体数字。议事记录另行整理。

“1月20日

昨天与同事(安藤、高桥、藤崎)苦心制订的方案修改稿(根据首相意见修改)送给堀田看。根据大使的意见，仅把修改稿的要领提交首相。

这期间，前辈堀田提出，希望写成一份有关媾和作业目录(按事项分别列出)。

“1月26日

西波鲁德大使、阿里森公使到目黑来访首相，交来讨论题目和七原则的文件。

当夜，开始研究美方提案和我方对策。”

从这份备忘录可以清楚看出，以西村条约局长为中心的外务省事务当局先准备了一份A方案，受到吉田首相的严厉批评，才又写出D方案。前已提到，这时期联合国军把败退的北朝鲜军即将赶到鸭绿江边，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参战，导致联合国军败退。1951年1月1日，北朝鲜和中国军队越过38度线。1月4日再次占领汉城。真是局势瞬息万变、波澜起伏的4个月。

吉田首相把政、财、学、舆论各界有学识、有经验的人士集中起来讨论，并且听取少数军事专家的意见。结果，外务省当局根据首相指示制定了恢复独立后关于安全保障的两个条约方案，即相当于B方案和D方案的草案。

外务省的A方案受到吉田首相严厉批评是有充分理由的。在“形势判断”一项，首相批评说，“外务省历来只以观察客观形势为主，而不能针对上述形势考虑对策，请注意，缺乏管理国家的理论，对此表示遗憾。”《我们希望的方针》“口气象在野党，空话连篇，不值一顾，作为治世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工。”就这样，方案被打回了。推测吉田茂的内心，有关A方案安全保障的想法还是为固有观念所拘束，即想根据联合国大会决议使美军驻扎日本合法化。如西村条约局长所承认的，事务当局还没有完全摆脱以往全面媾和为前提的考察和结论。受到吉田首相严厉批评和激励的事务当局，全力以赴，发挥治世济民的伦理，制定出D方案。1951年1月19日提出的D方案修改稿，不仅谈到“日本要对抗共产主义势力，与民主国家一道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而合作。为使日本作为民主阵营一员的地位得到实质性加强，日本必须恢复完全的自主性。为此，首先应缔结和约”，而且明确表示，“在美国为实现媾和的努力不能迅速取得成果，还需要相当时间的情况下，也希望首先同美国一国缔结和约。”

B方案是为保障没有军备的日本的安全，以美国在日本常驻

为中心的“有关安全保障的日美条约方案”。C方案是以“加强北太平洋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提案”方式，12月28日向吉田首相提出的。B方案是在10月5日会议上吉田首相指示西村条约局长负责拟定的。10月5日会议与会者都是有代表性的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人，对安全保障问题，特别是重新武装和对苏关系问题，大家充分活跃地交换了意见。

小泉信三在发言中问道，“缔约后在日本重新武装的情况下，与苏联的关系会怎样？苏联不会要求占领和管理吗？必须设法消除国民的不安。”可以说这一发言的含义代表了当时一般日本国民的不安。另外，津岛寿一问，“能否在《联合国宪章》范围内拟定中苏都参加的集体保障？”他提出全面媾和论的意见是意味深长的。尽管当时这种理想论已完全丧失现实基础，可是与以美国为中心的多数国家媾和，可能使日本同中苏关系恶化，从根本上威胁日本安全的恐惧心理还是根深蒂固的。

有关重新武装问题，有田八郎说，“不应当重新武装，日本的财力也不允许。美国的目的是从日本和德国得到人力支援。”这一发言引人注目。对此，板仓卓造说，“日本应当重新武装。一切都依靠他人，谋求本身安全，这种想法过于一厢情愿，太自私了”。吉田首相的发言确实具有吉田方式，他说：“杜勒斯言外之意希望日本重新武装，这一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我的原则是缔结条约之前不重新武装。可是，实际上是会重新武装的。”严格区别原则和现实，谈判前不轻易表露真心。

10月5日第一次会议上，值得注意的是，吉田首相提出一些看来十分离奇的问题。例如，能否考虑朝鲜的非武装，能否同时考虑苏联某些地区实行非武装等。这些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在必要时，随时都可以提出的理想方案，这就是后来的C方案。特别意味深长的是，10月24日举行的军事专家聚会上，河边虎四郎作了如下发言：“日本重新武装是非常困难的。要贯彻日本在

和平中生存的新方式，或作为谈判中讨价还价的筹码。我认为，第一，应当考虑使非武装能有效利用，因此，现实性又当别论，要象中立地区方案一样加以推进。在不能顺利进展时，应当同意以战争为前提承认美军驻扎的条约。”

吉田首相没有出席这会议。首相参加午餐时，谈了关于重新武装的看法，这是用前面所引的西村条约局长备忘录的形式表明

的。

1951年1月19日上午，在目黑官邸举行的军事专家会议，关于“确保国内治安，最低限度需要多少警备力量”的问题，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讨论。当天的结论是：陆上20万人，海上舰艇8万吨，最大舰型是1,500吨的驱逐舰。

## 十七

1951年1月11日发布消息说，约翰·福斯特·杜勒斯顾问为了同麦克阿瑟元帅和日本政府首脑研究实现对日媾和问题，将以大使资格访问日本。两星期后，杜勒斯使节团乘坐的专机到达羽田机场。该使节团一行除杜勒斯大使夫妇外，还有助理国防部长帮办R.D.约翰逊夫妇，公使约翰·M.阿里森，军事占领问题负责人卡特·B.马格尔达少将，文化系统负责人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夫妇，国防部的C.斯坦顿·巴布克库上校，国务院使节团秘书罗伯特·菲阿里，杜勒斯大使秘书多林斯·德伊尔，只有菲阿里先期到达东京，为接待一行进行准备。

在机场，杜勒斯大使说：“使节团来日本的目的是想找到使日本尽快恢复完全自主权的途径。在讨论媾和问题时，不是把日本看成被征服的国民，而是看作可以商讨的对手。”这一声明的发表是值得注目的。如前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军队参战以来，朝鲜半岛的战况极度恶化，1月10日麦克阿瑟元帅竟向华盛顿报告说，现在的“条件和限制是：没有援军，不允许攻击中国大陆的军事

基地等目标，继续禁止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行动，以及中共军事力量在朝鲜-满洲地区集结。这些情况造成了使我军军事地位难以支撑的后果。”

尽管存在这种危机状况，国务卿艾奇逊和国防部长马歇尔还是顶住了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反对，劝说杜鲁门总统推进对日媾和，其意义是重大的。1950年11月24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对日媾和七原则，其中明确写道，“合众国为结束战争状态，恢复日本国的主权，并使日本国重新走向自由人民的社会，成为平等的一员，特提议同日本国缔结条约。”在此基础上，当事国就是“在提议和同意的基础上，愿意使和平降临的对日交战国的全部或一部分”。这里明确表示了多数国家对日媾和的意向。对此，苏联以备忘录形式提出尖锐指责：“根据1942年1月1日华盛顿宣言，既然存在着不单独媾和的义务，能否认为对日和约应由美、英、中、苏在对日战争中起过积极作用的一些国家参加？根据少数国家意见就能单独媾和吗？”

杜勒斯使节团到达日本的第二天，即1月26日下午，与阿里森公使、西波鲁德大使一起到目黑的官邸拜会了吉田首相。寒暄致意后，把美国政府关于对日媾和七原则的文件和会谈要讨论的议题亲手交给了首相。

吉田首相立即指示事务当局研究从阿里森公使那里拿到的文件并商讨对策。以西村条约局长为中心的事务当局以D方案为基础起草对策，直到深夜，才基本脱稿。第二天，27日上午11时到晚上10时，在信浓町的次官官邸，堀田大使也参加一起讨论前夜拟定的草案。1月28日上午11时直到下午2时，堀田大使和西村条约局长在大矶的吉田住处对首相说明了事务当局的对策方案并听取指示。接着首相意见改动后，29日拿出了修改方案。

这一天下午4时，吉田首相在被占领军接收的三井本馆与杜勒斯举行了会谈。杜勒斯一开口便说：“如果三年前定条约，对

日本来说条件比今天坏多了。今天我们不是签订一个胜者对败者的和平条约，而是作为友邦的条约。”对此，首相也回答说：“对于媾和问题，我的考虑同去年6月所说的没有不同。我希望签订一个不损伤自尊心、日本能接受的条约。遵循和平条约恢复独立、确立日本的民主化，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在日本变成这样国家的基础上，愿对加强自由世界进行合作，而且对日本来说，也就可能解决最关键的问题，在日美之间确立坚强的友好关系。总之，日本是一个可以有助于增强自由世界的国家，希望缔结使日美友好关系更为牢固的和平条约。在占领过程中，要求日本实施许多改革，随心所欲地无视日本的实际，妨碍日本的自主（象废除家族制度，事业团体的活动和劳资关系的法制），所有这些，都希望占领军在日本期间由占领军进行实事求是的修改和废除，以便达到上述两个目的。准备向麦克阿瑟提出这一要求，请其采取措施。”

杜勒斯反问说：“虽然如此，可是日本只谈恢复独立、恢复独立后成为自由世界的一员，那么，日本准备对增强自由世界作什么贡献呢？现在，美国在为世界的自由而战斗，作为自由世界一员的日本，准备为这一斗争作什么贡献呢？”

杜勒斯把世界各国划分为好人和坏人的态度暴露无遗。可是吉田首相始终很冷静，他回答说：“问日本作何贡献，是否想知道日本有无重新武装之意？今天的日本一心期望恢复独立，提出进行怎样合作的问题为时过早，现在能否成为自主独立的国家还是一个问题，实现之后才能计划日本作何贡献。”

“重新武装将使日本自主经济垮台。对外，人们对日本重新武装抱有疑惧；对内，残留着军阀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因此，重新武装是成问题的。在两个阵营对立抗争的世界上，希望美国在广义上把日本看成美国内部的一个合作者。”

杜勒斯大使听着吉田首相的发言，流露出极为不愉快的表

情。对杜勒斯来说，凡不是百分之百的朋友就要看作敌人。在朝鲜半岛，美军正遭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军队所谓人海战术的折磨。杜勒斯可能认为，除了训练日本青年使之同中国和朝鲜的共产党军队对抗、以争取自由世界的胜利之外，别无他途。吉田茂在逝世前不久曾经在日本广播协会电视节目中就“杜勒斯外交”问题接受荻原延寿和高坂正尧的访问。他回答说：“你们认为杜勒斯有外交可言吗？”在以外交专家自居的吉田茂看来，杜勒斯无非是一个满脑袋过多的反共意识的外行。

已经到了吉田首相和杜勒斯大使去麦克阿瑟元帅那里进行礼节性拜会的时间，他们中止了会谈，前往总司令部。吉田首相对麦克阿瑟元帅诉苦说：“杜勒斯大使刚才提出了相当棘手的质问，逼得我好苦。为实现自主独立，希望缔结和约的日本，准备对自由世界作何贡献。”对此，麦克阿瑟元帅微笑着对杜勒斯说：“自由世界现在对日本要求的，不应是军事力量，这是不实际的。日本是具有军事生产能力的，也有劳动力，如果供给他们资材，使其生产能力得到全部发挥，就可以用于增强自由世界的力量。今后，会谈出现分歧陷于困境时，我随时愿作调停人。首相的想法，我是很清楚的。”

就这样，吉田首相成功地把麦克阿瑟元帅拉到了自己一边。1月31日下午2时到3时半，在三井本馆的总司令部外交部，吉田、杜勒斯举行了第二次会谈。日本方面参加的有井口外务次官，美国方面参加的有约翰逊助理国防部长帮办、马格尔达少将、西波鲁德大使和阿里森公使。杜勒斯对前一天通过西波鲁德大使交来的日本方面的看法，逐项发表意见。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有关安全保障和重新武装的部分。关于安全保障，杜勒斯说：

“一、对小规模武装进攻的防御，日本自己的力量可能不足，美国可以援助。在日本自己能够防卫之前，美国军队驻扎日本。但并不是永久驻扎，随着日本防卫能力的增长，将逐步缩小。

“二、对大规模侵略的防卫，只能靠集体保障。单单一个国家是不行的，即使美国也一样。”

下边再看看他关于重新武装问题的见解：“日本方面所写的经济上的困难等，我了解，但不能以此作为不对自由世界防卫作贡献的借口。希望克服这些困难作出某种贡献。参加联合国的话，应当对联合国的安全保障作出贡献。日方讲到加强警察力量，应以此作为第一阶段，至于以后的问题，采取何种手段，希望考虑逐步进行。当然美国并不抱很大的期待。”

## 十八

吉田、杜勒斯的会谈当然并不限于有关独立后的日本安全保障问题，还涉及到领土、人权、文化、国际福利、经济、通商、渔业、赔偿、国外资产、战后债务、战犯等许多领域。特别是关于领土问题，为了使冲绳、小笠原留在本国，吉田首相提出了百慕大方式的租借，<sup>①</sup>美国方面完全不理睬。吉田首相面色丝毫不改，表现坦然。事务当局却受到相当大的冲击。

然而杜勒斯一行对于日本的重新武装并没有完全放弃希望。2月1日到6日，在双方几乎每天继续举行的事务级谈判中，最难谈的还是安全保障和重新武装问题。特别是1月31日吉田、杜勒斯会谈中，吉田首相得到麦克阿瑟元帅的支持，拒绝日本的重新武装，使美方相当焦虑。杜勒斯使节团一行流露不满说：“日本首相没有理解特使的诚意”。不仅如此，竟然怀疑地问道：“首相懂得特使的英语吗？”

这一点是通过使节团的菲阿里向井口次官、白洲次郎和田中弘人三个人透露的。井口次官和西村条约局长对吉田首相建

---

<sup>①</sup> 百慕大群岛在北大西洋西部，是英国殖民地。1941年英国将其中摩根等三个岛群租借给美国建立海空军基地，为期99年。——译者



议：“由我方提出早已准备的有关安全保障具体方案，使会谈转入讨论具体问题，并希望成为今后会谈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最佳途径。”于是，吉田首相指示，在2月1日事务级谈判中提出“有关安全保障应纳入和平条约的条款”和“关于相互安全保障日美合作的设想”两个方案。

美方问道：“在发生对日本侵略时，日本将尽一切可能的手段进行合作，给予什么样的合作呢？”井口次官和西村条约局长只回答说：“作为物质力量(Physical force)，包括警察的力量，工业生产力量，提供设施，还有运输力量，以及法律方面事实上可以使用的一切手段。”

对此，阿里森公使和约翰逊助理国防部长帮办，特别是阿里森，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下述观点：“既然日本拥有警察力量、生产力量，美国期望至少应以一定程度的地面部队(正规部队)进行合作。日本目前考虑的增强警察预备队，在现阶段是充实国内的治安力量。美国提出的问题是下一阶段，日本将建设多大程度的地面部队。这个部队当然应当逐渐得到增强，随着这种力量的增强，美国考虑将把在日本的兵力转为他用。至少希望知道在第一阶段日本将拥有多大规模的地面部队。美国准备在财政、物资上充分支援日本建设地面部队。”

这期间，美国对海空军是有绝对自信的。因此专门关心日本的地面部队，恰恰因为在朝鲜半岛进行了苦战，越发希望增强日本的地面部队。美国方面根本不满足日本警察预备队的扩充。在同一天的会谈中，助理国防部长帮办约翰逊和马格尔达少将强调了设立国防部中央机构的必要性，那种过分热心的程度，使井口次官和西村条约局长都感到吃惊。

还有一点也很引人注目。美国方面询问：“为重新武装而修改宪法是否有困难？”日方回答说：“现在看来，修改宪法是一个很敏感的困难问题。”

第二天，2月2日上午10时半到中午，召开了事务级会谈，日方提出了有关设置国家治安部以及关于重新武装和宪法的备忘录。国家治安省吸收了警察预备队、国家地方警察、自治体警察、海上保安厅、国家消防厅、出入国管理厅等，管理有关维护国际和平和秩序的事宜，处理有关日本安全保障方面合作的事项。

美国方面评价成立国家治安部的方案，但对陆军部没有人参加，也没有参谋本部的人参加，提出了批评。日本方面解释，该省同警察部和国防部有区别，后者才属参谋本部，美方表示谅解。

以“重新武装和宪法”为题的备忘录内容为：“仅仅为重新武装而修改宪法，在目前情况下，看来是极为敏感和困难的问题。在最近的将来，假设和平条约能够缔结，与缔结条约同时立即建立军队也是极为困难的。日本政府相信，上策是日本在缔结和平条约、回到国际社会之前，而且在日本人对重新武装的认识提高、感情上愿意接受之前，保持警察力量一般概念之中的自然力量，由此达到实际上重新武装的目的。但日本必须保持的这种自然力量的规模要看日本所能期待的合众国在财政物资上的援助。”对此，美国方面也表示理解。

2月3日上午，西村条约局长赴大矶向吉田首相汇报对“日美相互安全协定”的意见要点，听取批评。吉田首相在了解大致情况基础上作了重要指示。考虑到美国方面非常希望知道日方在和平条约缔结后，作为重新武装的第一阶段，关于建设地面部队的设想方案，吉田首相指示，向美方提出，除警察预备队、海上保安队之外，建立拥有5万人的保安队并把保安计划管理总部设在国家治安省的方案。以“关于重新武装的开始”为题的日文原方案如下：

“在和平条约及日美合作协定缔结同时，日本需要开始重新武装。考虑到美方希望了解日本政府设想的方案，兹将政府的一个方案陈述如下：

一、新设包括海陆在内5万人的保安队(暂称)。这5万人与警察预备队、海上保安队分属不同部门进行训练，装备也将比上述两者强有力，隶属国家治安省防卫部。这5万人便是日本将来重建民主军队的雏形。

二、以自卫计划管理总部命名的机构，设置在国家治安省的防卫部，将起用通晓英美军事情况的技术专家。由他们参与根据日美协定而成立的共同委员会的工作，并吸收美国专家(军人)的意见。该委员会将来应发展成为日本民主军队的参谋总部。”

杜勒斯还出席了2月5日上午进行的事务级会谈，并把美国对日媾和设想方案交给井口次官和西村条约局长。两个人通读之后认为，杜勒斯对条约的设想是极为宽大的。几乎没有对战败国惩罚的内容，所以很高兴。杜勒斯对他们说：“美国的真意如同这份备忘录所写，但菲律宾等国仍然强烈反对，需要努力说服。请把美国的真心实意很好地向首相转达。”

吉田首相2月6日下午零时半与美国麦克阿瑟元帅会谈，第二天，7日上午10时半，又在三井本馆会见杜勒斯，进行了事务级会谈的总结。特别值得注目的是，吉田首相强调，在媾和条约和其他文件中避开涉及关于日本重新武装问题。在这一基础上对于将来民主军队的创建，热切要求美国指导与援助。

吉田首相对麦克阿瑟元帅说：“向杜勒斯大使提出的方案，建立5万人的安全部队，正是将来的民主军队。希望将其训练成出色的队伍。正因为如此，对于将来的参谋本部，希望建设成为英美式的优良总部。期望得到优秀美国军人的支援。日本在明治时代，由于让德国的麦凯尔将军当顾问，结果逐渐建成了德国式陆军。不能再重犯这一过错。象威洛比将军那里的日本军人等等，我不想使用。”麦克阿瑟对此回答说：“最近武器的急速进步，离开实际工作5年，就成了没用的人。战争结束已经5年半了，我想日本军人已经成了不起作用的代用品。”

在吉田茂对杜勒斯讲述相同意见时，助理国防部长帮办接过去说：“德国式和美国式的不同在于，美国军人置于文官领导体制之下，三军最高统帅是文官的总统。总统任命国防部长、三军部长和副部长等。这些都是文官任命，而且需要得到国会批准。离开文官，军人和军队不能独立行动。首相的心情，我已完全理解，将向华盛顿的负责人转达。”

1月29日、31日和2月7日，吉田、杜勒斯会谈真是棋逢对手紧张的交涉。已经年逾73岁的吉田茂，向比他小10岁的杜勒斯充分发挥了他的老练性。他没有屈服于杜勒斯要他建立地面部队的逼人压力，而只允诺将来重新武装。

## 十九

2月11日，杜勒斯特使飞往菲律宾。在离开日本之际，杜勒斯发表了日本政府欢迎美军驻扎的声明。吉田首相也发表了“欢迎与美国缔结安全保障协定、认识到自卫责任”的声明。关于媾和后美军驻扎日本不写入和平条约本身而另外缔结有关安全保障的日美协定一点，按吉田首相的主张通过了。但对日本方面的提法“日美两国同意美军驻留”，美国方面不同意，坚持要写明“日本要求美国军队驻留，合众国同意”。吉田首相已于头一年5月3日通过池田大藏大臣表示可由日本方面提出要求，因此没有理由反对美方的意见。重要的是尽早恢复独立，在这方面也显示出了吉田首相的见识。

2月7日，吉田、杜勒斯会谈结束之际，杜勒斯特使说：“美国将根据这一条约的基本设想、集体自卫协定、行政协定三个文件里表达的大政方针同联合国其他国家进行交涉，但对能否贯彻这一方针尚有疑问。恐怕需要作某种程度的妥协。例如，有的国家惧怕日本拥有过多的船舶和过大的造船能力，也有的国家难以同意取消赔偿。”

杜勒斯特使一到马尼拉，果然感到菲律宾政府的态度比预想的要严厉得多。考虑到菲律宾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遭受过严重损害，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杜勒斯回国后在3月1日的广播讲话中指出，“菲律宾的气氛与1919年法国的情绪极相似”。杜勒斯一行对菲律宾方面做工作说，如果向日本索取赔款，将使日本国民陷于失业和饥饿的困境，结果必然要由美国支付。但是这种论调没能说服菲律宾。他们还对菲律宾人说，作为对付苏联扩张主义的防波堤，有必要使日本经济保持活力，但杜勒斯这一劝说也未能奏效。

杜勒斯特使从马尼拉飞往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特使一行同澳大利亚麦金斯总理、斯帕达外长举行了会谈。还与新西兰外长多伊治进行了会谈。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类似1919年法国的情绪，与苏联的扩张相比，更害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但是杜勒斯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使他们理解美国立场方面获得了相当的成功。2月17日，关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成立三国同盟一事基本达成协议。比旧金山缔结媾和条约会议早三天，9月1日签署了澳新美安全条约。

2月25日，杜勒斯特使回到华盛顿，在同有关各国交换、调整意见基础上写出了对日和平条约草案。3月27日西波鲁德大使拜访吉田首相，递交了美国的和平条约草案。条约草案全文由4月5日合众社电发出，两天之后，4月7日，报纸以大字标题报道。

4天后，麦克阿瑟元帅被杜鲁门总统免职，16日杜勒斯特使再次来日本，同吉田首相举行了会谈。在第二次谈判前，有一段必须记录的插曲，这就是杜勒斯特使离开日本5天后的2月16日，吉田首相给杜勒斯特使写了一封信。信本来应当托2月19日离东京到华盛顿出差的西波鲁德大使转交，可是吉田改变了主意，没有让他带，结果杜勒斯竟没有收到。这封信表明了吉田茂的中国观。我想引用一下：

“本想阁下在东京逗留期间能有机会讨论一下中国问题，不料未能如愿，只得呈上此信。

“1934年我在纽约会见了豪斯上校。本来约定谈5分钟，但谈了一个半小时。为增进太平洋整个地区的和平和繁荣，我们讨论了美英日之间关于中国应当加强了解和合作的问题。考虑到目前包括中国在内席卷亚洲大陆的共产主义势力的进展，不但我们三个国家，所有有关各国之间增进对中国问题的了解和合作已成为这些国家本身最紧迫的事。我们最初的工作应当从俄国人手里把中国拉出来，使其成为自由国家阵营的伙伴。

有许多方法可以把中国拉回。关于这一点，日本能够有所作为的一项就是渗透。渗透是苏联喜欢用的方法。但我认为没有理由说明，我们不能用这种方法。由于地理上相邻、人种、语言和文化、贸易悠久的联系，日本人发挥突破竹幕的作用是最适当不过了。不知你以为如何？

“这仅仅是我所考虑的一点意见。不是要放进和平条约讨论的新论点。但是作为实现和平之后应当提出的问题，希望阁下考虑日本对共产主义中国反渗透的这一想法。”

可以想象，即令这封信能够送到杜勒斯手里，信的内容也超越了杜勒斯的理解力。从吉田茂写这封信起，直到美国下决心把中苏对立作为美国基本战略立场加以利用，花费了20多年的岁月。

不过，麦克阿瑟的解职也是与对华政策有关的。元帅与美国政府的政策针锋相对，3月24日发表了一份挑战性声明，使免职成为不可避免之势。据当时国务卿迪恩·艾奇逊的回忆录说，杜鲁门总统根据文官和军人顾问班子全体成员的一致意见罢免了麦克阿瑟元帅，选拔李奇微中将为其后任，考虑收拾朝鲜战争破产性残局的，正是李奇微中将，可以说这种人事安排还是顺理成章的。麦克阿瑟元帅违反了最高统帅的指示，发表“进攻中国本土也

在所不惜”的声明，又给共和党议员马蒂尼写信，自己毁了自己，他对前年以来美国军队的败退应当负最严重的责任。无论怎样的名将，对形势判断错误，在战场上遭到失败，也会垮台。

华盛顿在罢免麦克阿瑟问题上最担心的是，日本政府和国民是否感到不安。4月11日傍晚，西波鲁德大使拜访吉田首相，明确保证：美国的对日政策没有变化。接着，美国政府为了表明按既定方针推进对日媾和，公布将派杜勒斯特使前往日本。就这样，4月16日上午7时，麦克阿瑟元帅离开日本，同一天下午4时半，杜勒斯特使到达东京。

4月18日上午11时到中午，在盟军总部，李奇微、杜勒斯、吉田举行了三人会谈。吉田首相说：“日本已经无条件投降。日本在无条件投降的同时，又要象一个男子汉似地投降，不当两面派。这一点麦克阿瑟元帅也承认。我经常会见元帅，有时提出一些不愉快的要求。今后也会向新的最高司令官提出。”这使得杜勒斯和李奇微大笑不止。接着，吉田首相说，“在这里想立即就占领改革提些意见。在占领下各项改革当中，有些已不适合当前的形势，也有的不符合日本的风俗习惯。在占领期间予以改正才是适当的。这一意见已于特使前次来访时表述过，后来，麦克阿瑟元帅也表示原则赞成。在准备由事务当局研究、向元帅提交愿望书的时候，发生了此次人事变动，从而失去了机会。今天愿向新任最高司令官提出，并让特使了解全部内容。”说着就亲手递交了有关占领改革的愿望书。

结果，1951年5月1日李奇微发表声明，委托日本政府重新研究占领下各项法规的权限，同月14日，吉田首相个人咨询机构“政令咨询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晤。

4月18日下午在三井本馆，吉田首相和杜勒斯特使举行会谈，23日上午又在同一地点进行会谈，讨论的问题很广泛，最重要的是有关英国政府的对日和约方案。英国的方案比起美国方案来，文

字相当长，充满战胜国强加于战败国的传统的浓厚色彩。已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国提出邀请北京政府出席媾和会议的想法是理所当然的。

杜勒斯特使6月4日前往伦敦，在那里逗留10天，和莫里逊外交大臣举行了会谈。14日发表的杜勒斯、莫里逊联合声明宣布，两国意见完全一致，明确拒绝了苏联的主张（苏联主张应召集美、英、苏、中四国外长理事会），表示英美两国决心推进除苏联之外多数国家的媾和。杜勒斯和莫里逊达成协议的英美两国条约方案，由美国阿里森公使6月24日带到日本。到7月3日公使离日本之前，日美之间举行了第三次谈判，讨论了托管地区居民的日本国籍问题，未归还的日本人问题等不少困难事件。

## 二十

1951年7月7日晨外电报道，将在旧金山签署对日和平条约。7月17日夜将近10时，西村条约局长代表吉田首相从西波鲁德大使那里接受了对日和平条约方案。

在杜勒斯特使7月9日的私信中谈到旧金山会议将要求吉田首相本人出席，接着又有消息传来说，16日美国已组成超党派的强有力的全权代表团，热烈希望日本也派遣以首相为首席代表的全权代表团。吉田首相已从6月中旬起要求国民民主党的参议院议员林屋龟次郎给予合作。说到吉田和林屋的关系，在刚刚组织第一届吉田内阁之后，吉田曾访问金泽，受到商工会议所会长林屋的欢迎。从那时以后两人开始交往。后来林屋当上了参议院议员，在同一个国民民主党内，却与众议院的苦米地义三最高委员长、书记长三木武夫很不和。许多人并不知道，正是由于林屋龟次郎的斡旋，吉田首相和芦田均、币原喜重郎三人举行了会谈。

吉田首相通过林屋龟次郎作参院国民民主党工作的同时，指示自由党干事长增田甲子七正面与众院的国民民主党负责人谈



判。增田干事长以誓死的决心，同三木书记长多次会晤，一再说服他们参加举国全权代表团。敢死的决心，不单单是一种形容。谣传说，“增田把短刀揣在怀里真准备豁出去拚了！”这是由于总务会长广川弘禅明里暗里阻挠增田干事长的工作，以及吉田首相对三木武夫书记长不抱好感等复杂因素造成的。

据说准备豁上性命拚的还不仅是增田干事长一个人。原大陆浪人町野武马提醒增田注意，“吉田下决心在旧金山签署和约后，准备剖腹，小村寿太郎的心情也如此。希望你帮忙把气氛弄得轻松一点！”由此可见当时的气氛多么紧张。

增田干事长得到吉田首相的允许，公布了要求林屋龟次郎在内阁进行合作的信。三木书记长强烈谴责说，“吉田、增田的活动是挖墙脚！”这种责备也是很自然的。但在这种恶劣情况下，增田甲子七终于成功地说服了三木武夫，国民民主党的三木书记长答应在召开国会、吉田首相对日和约作出充分说明的条件下，该党可以参加举国全权代表团。

7月31日，增田干事长得意扬扬地前往箱根，拜访吉田首相，汇报上述情况。可是当吉田茂散步回来时，却对他说，“你突然闯到别人家里，不是太失礼了吗？”流露出颇为厌恶的表情。吉田首相申斥增田干事长说，“三木说的不可信，我反对召开国会！”这就是所谓的“箱根山霹雷”。

吉田茂厌恶三木武夫是因为三木从杜勒斯和总部那里直接拿到情报，经常刺痛吉田首相的要害。可以想象，如果不召开国会，便不能授国会议员全权赴美。因此，只能说明吉田的打雷与“天气”有关。后来经常到大矶吉田住处送报批文件的内阁参事官桥口说，“接触吉田首相，三次有一次情绪不好，五次才能有一次好情绪。”“箱根山霹雷”正是在情绪最不好的时候落下来的。

增田甲子七回到东京向三木武夫表示道歉。三木书记长安慰增田干事长说，“不要做为时过早的事，”并决定发表国民民主党的

声明。8月1日发表的声明，语气较为温和，声称：“不能组成举国全权代表团很是遗憾，但祝愿自由党政府顽强斗争。”这是三木武夫对增田甲子七诚意的响应。

8月1日上午5时，吉田首相给林屋龟次郎打电话说：“实际上，昨天不该对增田发脾气，推翻了好不容易谈妥的内容，能不能想点什么办法？”听了吉田的话，林屋回答说：“你不应该那样，完全是你不好，增田发火理所当然！”处在被整肃中的政客大麻唯男也在会见增田甲子七以后规劝吉田首相。7月31日夜，吉田茂躺在床上辗转反省，并准备采取能扭转局面的各种措施。

就在这种情况下，参院议员林屋想出高招，让吉田首相拜访国民民主党最高委员长苔米地一举解决问题。8月1日早晨，麻生太贺吉和保利茂来找林屋，打听“有没有什么办法？”林屋回答说：“没什么关系，吉田拜访苔米地，低头认错就行了！我认为只要这样，拍拍他的肩膀，请他合作，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麻生和保利就说：“那么，回去商量一下。”他们走后，林屋找来经常采访他、接触较多的《朝日新闻》记者赤间英夫，要他试探一下苔米地的心意。记者赤间担任有关国民民主党的报道工作，和苔米地委员长关系很近。赤间记者问了苔米地义三，苔米地说：“首相如果来，当然要见。”于是，林屋次郎要记者赤间在林屋房间住一夜。赤间说：“我必须不断向政治部长报告，不能睡在你家里！”听到他的回答，林屋给《朝日新闻》政治部长增田寿郎打电话说：“把赤间记者借给我一天一夜，作为报酬，消息一定交给你发表！”增田政治部部长很快答应说：“好！”

8月1日夜8时左右，保利茂给林屋龟次郎打电话：“我到你的住处去了，门前记者太多，进不去，在你住处附近找了个地方，能不能麻烦你出来一趟？”林屋参议员经过与自己家二层房顶相连的邻居的空房，先把木屐扔下去，拄着松木，下到地上，才来到保利说的地方，保利和麻生太贺吉两个人已经等在会客室了。麻生

太贺吉问道：“说服吉田明早去见，可是一国首相无论如何不能吃闭门羹，希望确认：如果拜访苦米地，一定能够见上。可以从箱根直接去苦米地住宅，请找人带路。”

林屋早已准备了这一步，所以他把记者赤间关在自己的房间里。麻生太贺吉由林屋龟次郎和记者赤间陪同，8月2日前去拜访苦米地，苦米地表示：“如果首相来访，将高兴和他会面”。这样，8月3日晚8时，吉田首相的车离开箱根的三井别墅，由未公开身分的赤间记者引路，9时40分到达苦米地的住宅。吉田首相恳切请求“帮忙”，苦米地最高委员长满口答应，两人热烈握手。林屋参议员按着对增田政治部长的保证，事先通报消息给他，吉田苦米地会谈成为《朝日新闻》独家特种新闻。而林屋为此受到其他报社的严厉非难。

8月16日，召开第十一届临时国会，吉田首相在参众两院作了关于和平条约和安全保障条约的报告。18日，国会决议增加众院议员苦米地义三、星岛二郎和参院议员德川宗敬三个人为媾和全权委员。由于国民民主党最高委员长苦米地和绿风会的德川宗敬的参加，超党派全权代表团得以组成。增田甲子七干事长和林屋龟次郎参议员等人的辛苦，换来了开花结果。

日本全权代表团有6名全权代表：吉田茂、池田勇人、苦米地义三、星岛二郎、德川宗敬和一万田尚登，有5名副全权代表，再加上随员共27人。全权代表团之外，另有众院议员6名（自由党3、民主党2、社会党1），参院议员5名（自由党2、绿风会1、民主党1、社会党1），共计11人组成的国会议员代表团同时前往。

1951年8月31日，全权代表团一行离开羽田机场前往旧金山。在出发的头一天晚上，吉田家里举行了只有自家人参加的欢送会。吉田的长子健一也难得回来参加，吉田茂情绪很高。认为吉田茂和健一关系不睦，可以说是误解。据健一讲，第一届吉田内阁成立后不久，有一个拿着熟人介绍名片、象是地方政治家模样

的人来访说：“想设便宴招待你一次”，健一接受了这种好意，分手时，对方要求推荐他当某县选区自由党公认的候选人。饱尝这种痛苦经验的健一下决心：“只要父亲处在首相、总裁地位上，自己就不到父亲那里去！”

吉田茂和健一两个人的个性都很强，因此与普通父子关系不同。他们是河水不犯井水，在这一意义上，相互还是尊敬的。

## 二十一

吉田首相等人的全权代表团乘泛美公司的专机8月31日下午5时半抵达檀香山。他们住进夏威夷皇家旅馆，停留一个晚上。第二天上午吉田首相到陆军墓地献了花圈。下午4时半到6时出席隆哥州长的欢迎宴会。在旅馆食堂用过晚餐后，再次登上泛美公司的专机。9月2日上午11时，全权代表团到达旧金山。

代表团在机场受到西波鲁德大使、阿里森公使等人的迎接。还有许多报社的摄影记者赶来，吉田首相情绪也很高。吉田到苏格兰式的住宅休息。提供海岸幽静的住所，让吉田首相得到充分休息，显示了美国政府的好意。除吉田首相及其身边几个人外，全权代表团一行都住在麦克·霍普金斯旅馆，和英国、法国代表团住在一个地方。

吉田首相下午6时到皇宫旅馆拜会艾奇逊国务卿和杜勒斯特使，同他们进行了59分钟的重要会谈。吉田首相对美国的努力表示感谢，艾奇逊国务卿接受谢意后，强调下述三点：

第一，“这次会议是签署和约的会议，不容许重新审议条约内容。过去一年里，已经给了充分陈述意见的机会，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哪怕是接受一处细微的修改，也就难拒绝更大改动的要求。会议的议事程序规则，应当明确这一方针，并限制各国代表的发言时间。”

第二，艾奇逊对吉田首相提出要求说：“会议参加国中，有不

少国家对是否签署条约尚未作出决定，菲律宾和法属印度支那三国虽然不满，估计会签字，巴基斯坦、锡兰和印度尼西亚态度不明，希望日本进行外交努力，争取更多的国家签字。”

第三，艾奇逊谈了赔偿问题。“不大愿意签字的国家是对规定赔偿的第十四条不满意，日本如果表示满怀诚意、响应进行谈判的态度，情况将会得到改善。”

接着，杜勒斯特使谈了西南诸岛问题，批评了一部分日本国民的态度。“美国根据战略上的需要，管理琉球及其他岛屿，并不是划归美国所有。愿将主权仍留给日本，对于你所表示的居民保有日本国籍等要求，目前正在考虑中。如果进行绝食罢工等示威运动，美国人是接受不了的。希望日本人自己能够有所克制。”

吉田首相问道，关于中国问题“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可否认为现在不要求立即选择国民党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艾奇逊国务卿回答说，“是的，会议中日本绝对不要表明选择哪一个政府。如果表示选择国民政府，将给许多承认北京的国家以不好的影响；相反，如果表示选择北京，将给承认台北的国家造成坏影响。”这时，杜勒斯插话说：“那样的话，美国参院就不批准条约了。”使得大家哄堂大笑。

其后，杜勒斯特使又发言讲到，“希望明确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目前正在谈判之中这样一条原则。如果在会议期间公布安全保障条约，苏联必然要进行猛烈的谴责和攻击。”艾奇逊国务卿也表示赞同。

正如艾奇逊、杜勒斯和吉田三人在皇宫旅馆会谈所表明的，旧金山和平会议和凡尔赛和平会议等性质是根本不同的。从1919年1月中旬起在凡尔赛开了将近半年的会，一大半花费在战胜国之间谈判和调整意见上。1951年9月4日在旧金山召开和平会议时，这谈判和调整已经由杜勒斯特使一万多英里的周游外交或航空外交全部解决了。和战败国日本的会谈，也仔细周到地进行完毕。